传统村落

从观念到实践

罗德胤 —— 编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

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

罗德胤　编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工作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而越是在探索阶段的事业，就越需要更多的人一起交流碰撞。在传统村落领域，总体来说，保护的理论和原则是基本清晰的，尽管在普及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发展的路径，尤其是发展和保护相互支撑的路径，则要面对很多挑战，同时也充满了众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这些挑战和可能性，恰恰也是传统村落领域最令人着迷之处。本书及其作者愿意成为一块垫脚石，在传统村落这门行业的前进中发挥一点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 / 罗德胤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69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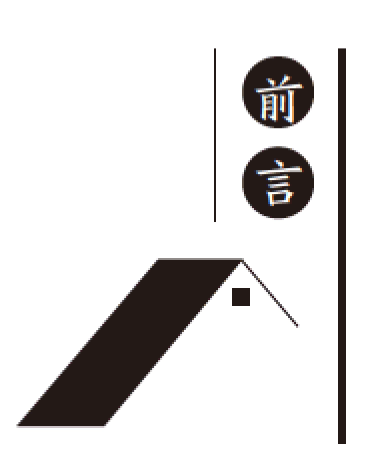
Ⅰ．①传… Ⅱ．①罗… Ⅲ．①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国 Ⅳ．① 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2725 号

责任编辑：周莉桦
封面设计：李召霞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 × 210mm　**印　　张：**10.875　**字　　数：**29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产品编号：074201-01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近年兴起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还是一个涉及多个行业同时又相对独立的领域。

之所以说传统村落是热门话题，是因为讨论和参与其中的人已经不再局限于遗产保护、规划设计等专业领域，而是扩散到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相当数量的理工学科，扩散到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扩散到了颇为广泛的普通国民。2012 年 9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牵头成立的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可以说是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此前的一段时间，正是由于以冯先生为首的学者专家们在不同场合的大声疾呼和广泛宣传，保护古村落的主张才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并由住建部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简称四部局）共同下发了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就开展了评选中国传统村落的工作。当年 10 月，评选出第一批传统村落共 646 个。第二年（2013 年）和第三年（2014 年），又分别评选出 915 个和 994 个。三批一共评选出 2555 个传统村落，尽管对于拥有几百万个自然村的农业文明大国而言还是

比例相当小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达到此前开展了十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 10 倍左右。随着传统村落名录的公布，社会各界的关注力也在迅速提高。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媒体报道的大范围跟进；二是以云南、贵州、浙江、山东等为代表的省份，在组织申报传统村落的过程中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努力提高本省在全国的排名；三是不少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在积极举办与传统村落有关的交流会议，并得到相关从业者的踊跃参与。

我们说传统村落是充满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是因为我们面临几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特殊背景。

首先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从而造就了极为丰富的乡村文化遗产。

其次，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们就以“剪刀差”的方式，优先保障城市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城乡社会的事实差别。1978 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经济一度有较快发展，但其后随着沿海加工业的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又被吸引到城市，从而不断加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专家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城市化率在达到 50% ~ 60% 之后，将很难再大幅提高。这意味着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在 5 亿以上。这与欧洲国家的城市化普遍在 90% 以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城市化率越高，农村人口就越少，房屋荒废的情况就越严重。所以在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欧洲乡村也经历过一片衰败的景象。我国农村长期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口，对于乡村遗产的保护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一面是指房子只要有人住，就至少有了基本的维护，寿命可延长。有弊的一面是指村民普遍有拆旧建新的冲动，这又大大加速了对传统民居的破坏。另外，农业产出虽然在国家粮食安全上意义重大，但是反映到经济数字上却往往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所以城市化率越高，就意味

着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可以更大，从而比较容易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反观我国，由于农村人口的基数庞大，城乡差距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这导致我们在做传统村落保护的工作时，不得不先努力填平城乡之间的那道鸿沟。如此一来，保护成本就在无形中大大增加。

第三个特殊背景，是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文化遗产保护（包括乡村遗产保护）的观念，是诞生并成熟于欧洲的。而欧洲乡村遗产的保护，最主要的力量是下乡购置第二居所的市民。大约从 1970 年开始，欧洲市民逐渐兴起了乡村度假的风气，先是由村民改造自家住房为市民提供住宿，之后发展到市民下乡买房自住。因为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一个行业，而且是一个可以保值的行业。而在我国，由于宪法的此项规定，限制了市民下乡购房，自然也就将那些愿意投资于乡村民居保护的人拒之门外。

第四个特殊背景，是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旅游业暴涨的过程。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消息，2015 年中国国内旅游突破 40 亿人次，旅游收入过 4 万亿元人民币，出境旅游 1.2 亿人次，中国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国内旅游消费、境外旅游消费均列世界第一。遗产保护是一项成本相当高的事业，旅游收入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迅猛的旅游业，对传统村落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旅游业给遗产地带来的负面甚至破坏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旅游消费不高，遗产地多半会走上大众旅游的路线，这时候因为游客数量多和旅游行为不当而产生的各类污染，都必须由遗产地来承担。中国近年来的旅游业，除出国游之外，城市游、风景区游和乡村游大致上是三分天下，其中又以作

为新起之秀的乡村游，发展势头最为强劲。乡村游的主要目的地，就是传统村落（包括已经列入国家和省级名录的，也包括那些有条件列入但还没列入的）。但实际上，由于此前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在各方面的差距，我们大部分的乡村是没有做好从事旅游业的准备的。不管是基础设施、吃住条件，还是服务意识、管理水平，乡村都远远比不上城市和风景区的。在此前提下，旅游业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就显得尤为剧烈。

第五个特殊背景，是我们的遗产观念尚未普及。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不少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欧洲各国对遗产保护有着相当完备而严格的法律，破坏遗产是要被罚款甚至抓去坐牢的。于是就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也应该出台更为严格的法律，以保护文物单位之外的文化遗产。其实这是本末倒置了。法律是国民集体意志的固化，只有当大部分国民对某件事情或某种观念有了统一认识之后，才有可能形成法律条文。在此之前，即使政府强行制定并公布了法律，也很难得到执行。当违犯或不遵守法律的情况多了之后，就会出现法不责众的现象，这时候政府或国家权威反而受损。遗产保护的观念是在欧洲诞生的，从少数专家普及到上层精英再普及到社会大众，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一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算完成。时至今日，欧洲民众在面对一栋老建筑时，上至国王、总理，下到底层民众，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尽量不拆，至于怎么保护、怎么利用，可以下一步再讨论，反正是先留下再说。当全社会只有一部分人在主张遗产保护时，保护成本就只好由少数人来承担了，这就导致保护的范围很有限。而当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到全体国民时，前面讲的三个特殊背景也就不再成为急迫问题：村民再穷，也不会急于拆除传统民居；打工挣了钱的村民，也不以拆旧建新为自豪，而是以留下老屋为自豪；下乡旅游的市民，在面对传统民居时也会多几分尊重，对传统民居的居住条件不理想会多几分理解，也就不会毫

无节制地要求提供现代化设施；到传统村落做投资的开发商，在制订开发计划时也会将传统民居的保留作为重要的一环，而不是将其视为发财的障碍。

我们说传统村落是涉及多个行业同时又相对独立的领域，是因为它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社会，而是需要来自上下游行业的支撑。欧洲社会在普及遗产保护观念的过程当中，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工程等行业和学科，也都跟进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支撑的行业链。保护遗产的观念和理念被引入我国之后，并不是整套行业链都同时引进的，所以中国的遗产专家经常会发现自己是在单兵作战，缺少来自上下游行业的支持。我们必须认识到，当遗产保护没有上下游行业支撑时，失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幢濒危的文物建筑在修好之后，如果既无人居住，也无展览功能，那么两三年之后它就会再次沦为濒危建筑。如果要让人居住，那就要解决水电等基础设施，这就涉及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的专业。如果要做展览，就涉及布展和灯光等专业；而要让更多的观众知道并且对展览感兴趣，就少不了宣传推广的力量。

遗产保护，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基本学科。与它直接相关的学科或行业，包括城乡规划、景观园林、工程学、材料学。对乡村遗产而言，当地的历史地理、农业生产和社会结构跟遗产的产生关系密切，所以历史、地理、农业、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理解遗产的诞生原理与存在意义的重要学科。

遗产保护，尤其是传统村落的保护，跟建筑设计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遗产是诞生于传统社会的，但是遗产又要存在于现代社会，而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都是有巨大差别的。用十九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的一句话来概括：从传统到现代，

就是要人去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个人总是从属于某个或某几个组织，终生听命于组织安排。而在现代社会，个人与所有组织之间都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在此基础上个人可以最大程度地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遗产的空间物理属性，是由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是并不符合现代人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对意义重大的“纪念碑式建筑”（它们多数存在于城市），因为它们携带的历史信息既丰富又重要，所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保持其真实性——用《威尼斯宪章》的话，就是“一点都不走样地传给后代”。而对意义相对来说没那么重大的日常遗产（乡村遗产大多属于此类），“一点都不走样”的目标就显得过于理想了。我们需要用建筑设计的手段，在减小真实性损耗和实现功能最大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遗产保护还和经济学有着密切关系。所谓经济学思维，就是有成本和效益上的考虑。这里说的成本和效益，都是综合意义上的。成本包括资金，也包括人力投入，还包括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的遗产真实性损耗。效益也不仅是现金收入，更包括社会影响、文化教育等方面。

讲到遗产保护的经济学，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人类简史》这本书。该书作者赫拉利认为人类的历史有三次大的跃进：第一次是 7 万年前开始的认知革命，起因是人类突然变异出“讲故事”的基因，从而使得集体合作能力有巨大提升，打败了地球上的很多其他物种；第二阶段是在 1.2 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人类的生活方式从采集变成了定居，这使得居住密度大大提高，思想交流加速，从而加快了知识传播，导致生产力又有了一次大的跃进；第三次始于 500 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被称为科学革命，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资本、国家和科技三者的结合，使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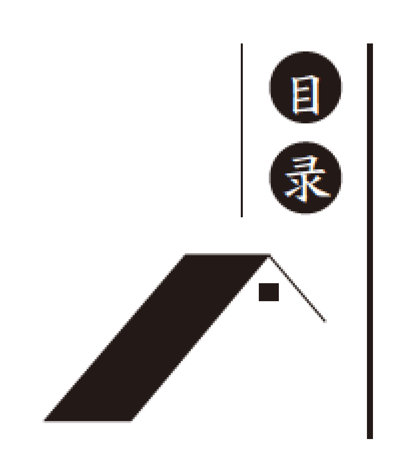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乡村遗产？再大点说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实际上这和兴起于西方的科学体系有着密切关系。500 年前，欧洲人开始把大笔钱投放到科学研究和地理发现上，由此带来巨大收益。这个事情是从哥伦布开始的，西班牙国王资助了一笔钱，让他发现了美洲。在那之后，欧洲人发现，只要大规模投入资金搞科学研究和地理发现，每隔几年都一定会有新的科技进步，就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在 500 年之前，大家并没有这个意识，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在玩零和博弈的游戏——社会生产力是固定的，全球的总产值就那么多，给了你我就少了。但是，哥伦布开启的事业让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可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我花了钱支持你，然后你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而且是十倍甚至百倍的好处。现代科学体系由此诞生。

这个逻辑也适用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是为了完善我们的科学体系，让我们每一代人的素质都得到提升，人类的福祉也不断提高。遗产的直接效益可能不是那么显现，但是长期来看是有效益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合法性。这个事业对我们民族有利益，对人类有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做。

欧美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遗产保护的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政府、社会团体和商业。政府管的是列入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因为它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一般只有进入政府认可的保护名单的文化遗产才可以享用。社会团体的资金来自于各种捐款。它一方面可以补充政府资金不足的文保单位，另一方面可以用来保护那些暂时还没列入文保单位但是又比较重要的文化遗产。商业也是重要的保护资金来源。这是因为相比于政府税收和社会团体捐款的间接性，商业是在遗产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一座直接的桥梁。这种直接性对于鼓励消费者和公司投入遗产保护，是有着立竿见影的作用的，在很多时候它更符合人的本性。

正是从传统村落的跨学科性和多专业性考虑，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发现价值，旨在从科学角度来挖掘传统村落的存在逻辑和存在意义（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同时也尽量从不同角度呈现村落文化的多样性；第二章是激活人心，目的是探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并普及乡村遗产保护的观念。乡村遗产的价值，光有专家学者去挖掘发现是不够的，还需要经过大范围的普及教育，才会沉淀为全社会共有的知识财富；第三章是实践案例，尽量采集了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村落实践，也尽可能地涵盖了传统村落保护所涉及的各个工作环节。

尽管本书的章节设置对应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工作的三阶段——发现、普及和保护，但读者仍不难发现，全书内容尤其是第一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案例式的。这种体例让整本书显得相当离散。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作者知识的不系统。之所以在如此不成熟的阶段就推出本书，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工作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而越是在探索阶段的事业，就越需要更多的人一起交流碰撞。在传统村落领域，总体来说，保护的理论和原则是基本清晰的，尽管在普及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发展的路径，尤其是发展和保护相互支撑的路径，则要面对很多挑战，同时也充满了众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这些挑战和可能性，恰恰也是传统村落领域最令人着迷之处。本书及其作者愿意成为一块垫脚石，在传统村落这门行业的前进中发挥一点作用。



目录

第一章 发现价值

第二章 激活人心



第三章 实践案例



第一章

发现价值

第一节

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刍议

由住建部、文化部和财政部发起并组织的中国传统村落评选，目前已开展三次，总共有 2555 个村落入选。当列入名录的传统村落达到两千多个时，谱系的建立就应该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建立起谱系，这一两千个传统村落才不会是一盘散沙，而是编织起来的一张结构清晰的知识之网。也只有建立起谱系，我们才知道哪些村落是属于“稀有物种”，需要我们去主动发现和重点保护。

建立传统村落的谱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谱系的建立，关键是要找到让个体之间产生差异的第一要素。这个第一要素一经产生，个体的其他特征就可以沿此推导，形成有线索可寻的逻辑关系。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传统村落的第一要素呢？人口、面积、地形、村庄轮廓，都可以成为区分传统村落的一个指标，但是都不足以成为第一要素，因为村落的其他要素与它们之间还不存在足够的关联度。

在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的评审会上，面对各地上交的信息量超大的申报表格，村镇司赵晖司长曾经提出一个建议：看一个村落能不能入选传统村落，要从聚落、建筑和非物质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这三个因素来考量；聚落指村落选址（包含周围环境）、布局，建筑指现存传统建筑，

包括历史较长的和历史不长但以传统技术建造的。三项都过关的就通过，两项过关的要讨论决定，低于两项过关的就不通过或补充材料后下次再审。这个建议得到所有在场专家们的认同，因为它把复杂的问题给具体和简化了，有利于评审的公平和效率。鉴于该方法简捷有效，第二批传统村落评审时它也得到了沿用。

应该说，尽管还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抓住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个因素，确实是抓到了传统村落的要害。尤其是非遗成为三要素之一，可以说是以冯骥才、乌丙安、刘魁立等先生为首的非物质遗产专家们的一次胜利。之前从事民居建筑研究的学者们，是普遍没有把非物质遗产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的。

然而，不管是聚落还是建筑，抑或是非遗，都还不足以成为建立传统村落谱系的第一要素，因为它们之间似乎是相互独立的，缺乏关联性。我们还需要一个超越于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要素之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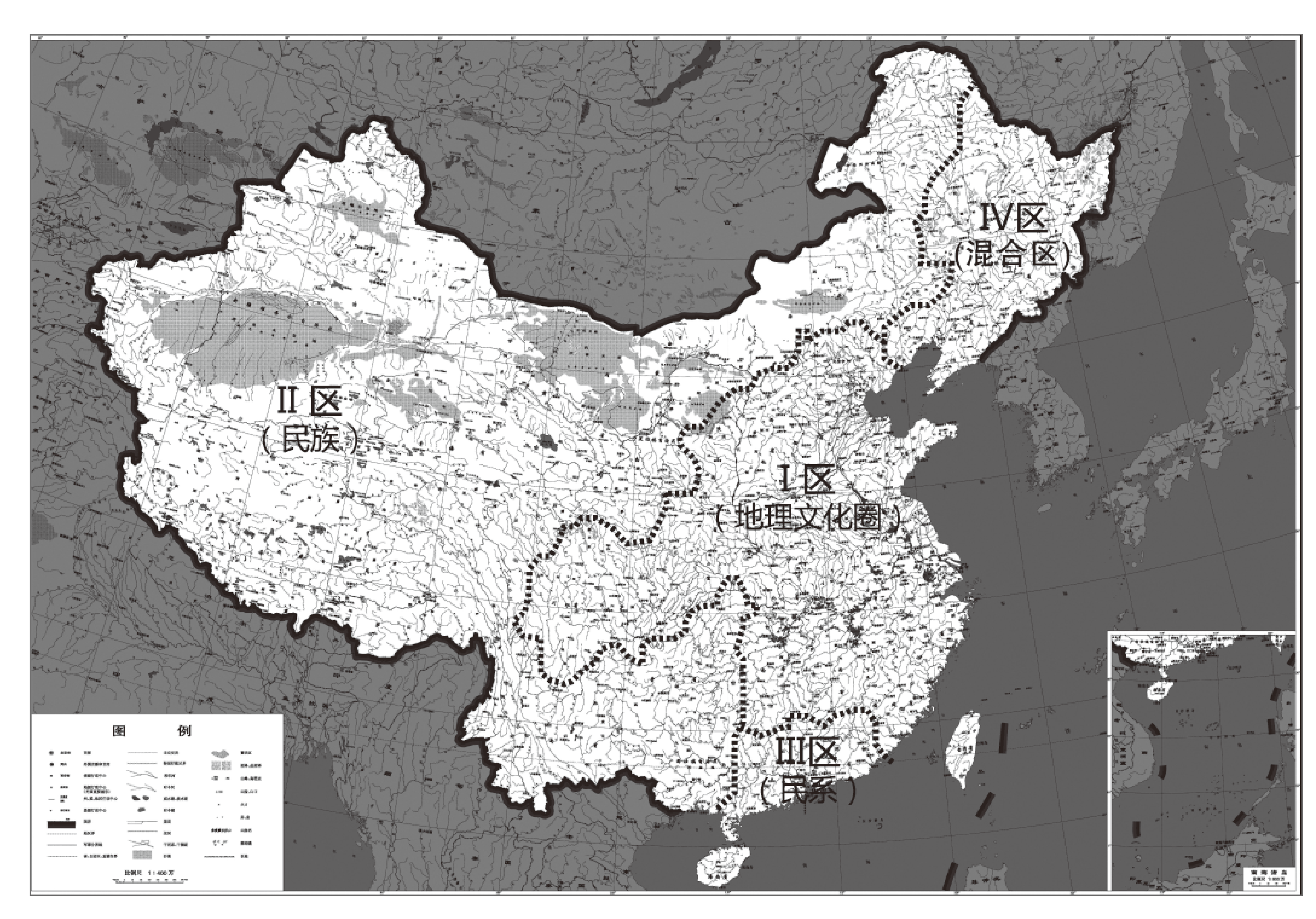
文化重要性是建立谱系的第一要素

笔者认为，要找到建立传统村落谱系的第一要素，可以借鉴目前国际上讨论较多的一个文件——《巴拉宪章》。《巴拉宪章》是澳大利亚于1979年制订的针对本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文件，其核心思想是用“文化重要性”来代替《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历史信息”。澳大利亚的文化遗产，特点是“两头多、中间少”，也就是史前遗迹或原住民文化多，现代建筑多，而古希腊以至近代的历史建筑很少。显然，用《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历史信息”（实则是建筑的历史信息）来评判，澳大利亚人是大大“吃亏”的，所以他们提出了“文化重要性”的概念，以便把史前遗迹和原住民文化都纳入到世界遗产的范围里。

《巴拉宪章》提出后，尽管不断有争议，但是国际上对它的关注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符合了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评选和认识趋势。在世界遗产的概念出现之初，主要是一些已经得到公认的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名单。比如，中国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长城、故宫、颐和园，就属于“重要的没法不列入”的项目。对于这些项目，其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不需要论证，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完整地收集和保护它们的历史信息，以便我们的后代可以完整地认识这些人类的杰作。后来，随着列入名录的项目增多，逐渐有一些不被人熟知的项目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这个时候，论证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所谓论证，就是对历史信息的总结与评判。也就是说，光靠提供历史信息已经不足以让评委们认识一个文化遗产项目了，而是要归纳总结出它最重要、最突出，而且与之前已经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都有着明显差异的特征，才能说服评委，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在短时间接受并记住这一项目。

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界遗产谱系建立的过程，因为每一个新的项目都与之前的不一样，从而每一次新项目的列入都在丰富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说，《巴拉宪章》的文化重要性法在世界遗产名录的建立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文化重要性法在中国传统村落的谱系建立中，是否也能起同样的作用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文化重要性，正是我们需要寻找的超越于聚落、建筑和非遗之上的第一要素。文化的分类通常从民族或地域入手，而中国的情况是一个汉族加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针对这一特殊国情，笔者将全国划分成了四个片区，这四个片区之内各有自己的文化重要性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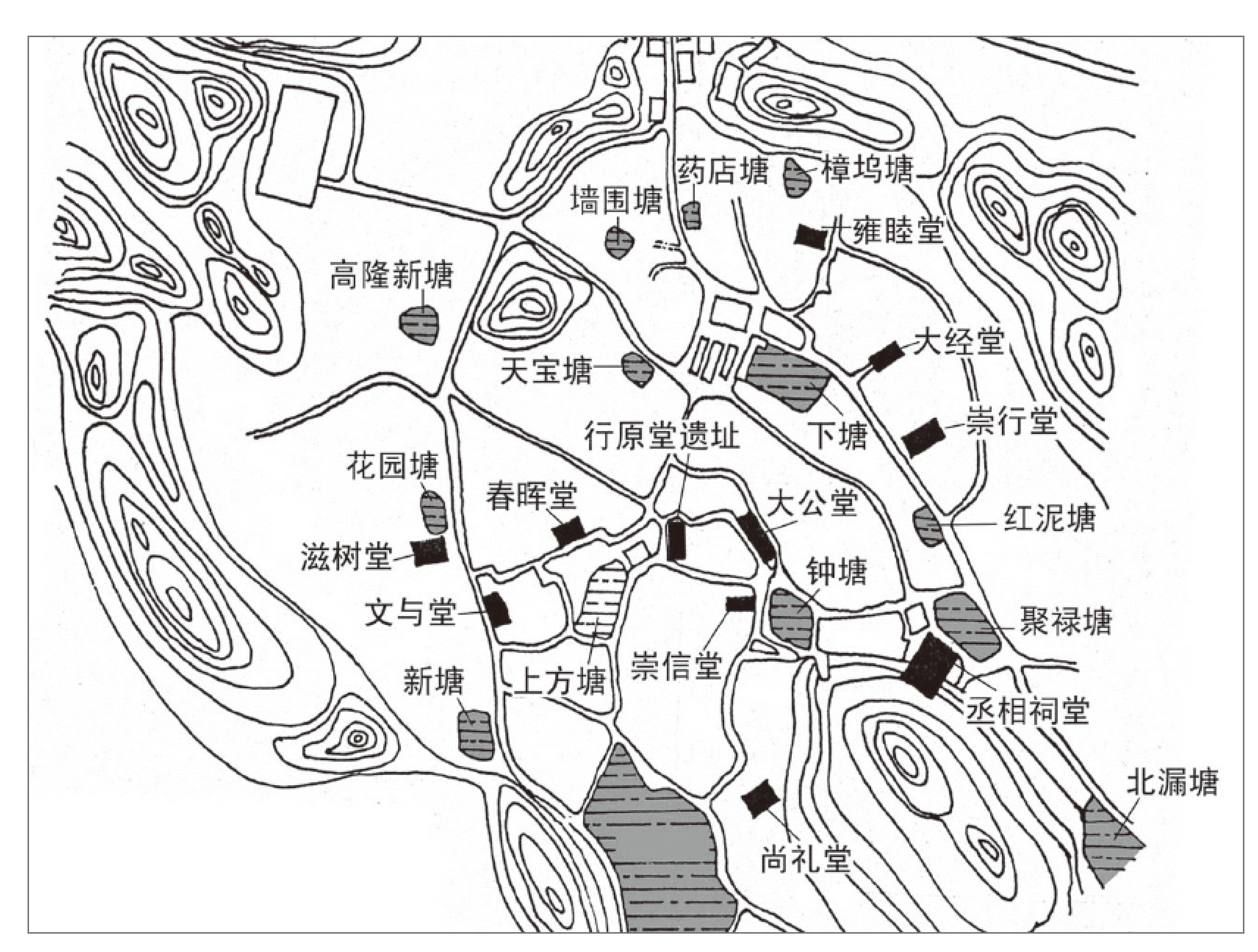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建立刍议

I 区：文化地理片区

I 区是东部片区（包括重庆和四川的部分地区），以文化地理为文化重要性要素。这里的人口以汉族为主，所以这里的传统村落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汉族的，而是要证明自己是属于哪个地方的——从聚落、建筑、非遗这三个维度；另外，还要证明自己是属于自己的——这样才能与本区内的其他传统村落拉开距离。I 区的传统村落往往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从非遗维度而言，是强弱不等的宗族文化或明或显的泛神崇拜、程度不同的科举影响；从聚落维度而言，是村子围绕农业开展，因各地气候、地理差异而形成丰富多样的农业景观，并且讲究风水；从建筑维度而言，是住宅以合院为主流，而公共建筑通常有宗祠、庙宇和文教建筑这三类。

考虑到省的范围依然太大，而且确实存在有明显的内部差异，所以有必要将多数省份再划分成几片。比如山西，可以分为晋北、晋中、晋南、

晋西、晋东南五个地区：晋北是长城沿线，这里的村子多呈现军事化特征，有堡墙、堡门，堡内是规划整齐的巷路和建筑，堡北端常有真武庙。晋西是吕梁山区，多窑洞村落。晋中是山西农业最好、晋商最发达的地区，很多村落是由商人建造的豪宅组成的（如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晋南也是晋商的根据地之一，其村落、建筑和晋中的比较相似，但这里有地坑窑，为山西其他地方所无。晋东南的晋商也很发达，但这里是山区，气候比山西其他地方湿润，而且有铁、煤等矿产资源支撑起商业，所以传统村落也有些变化，比如楼房比较多、石头房比较多。山西的传统村落常有关帝庙，因为山西解州是关羽的老家。朝廷对关公崇拜的推行，在山西得到了最有力的响应。



浙西诸葛村宗祠分布图

图片来源：陈志华，李秋香．诸葛村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再如浙江，可以分为东、西、南和北四个地区。浙东如楠溪江流域的村落、宗祠和文教建筑都比较发达，庙宇也不少，住宅以半开敞的中小型三合院为多，建筑材料以木、石为主，山墙不做马头墙。浙南如松阳县的

村落，宗祠和庙宇建筑都比较发达，文教建筑则比楠溪江流域的少，住宅以封闭的小型三合院或四合院为多，建筑材料以夯土或土坯为主，山墙做马头墙。浙北为水乡，商业发达，多古镇，留存至今的传统村落数量较少。浙西靠近徽州，这里的村落宗族和理学文化发达，多祠堂而少庙宇，建筑以封闭的合院为主，规模有大有小，建筑材料则变成了白墙黑瓦，山墙多做马头墙。浙江的村落普遍对水口很重视，经常在水口由祠堂、庙宇、池塘和老树形成一个风景优美的园林。

又如陕西，可以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陕北属黄土高原，民居以窑洞为主。同样是窑洞分布密集的地区，陕北和晋西是有差别的：陕北的窑洞常用石头砌筑，属于就地取材；晋西的窑洞常用砖砌筑，因为山西多煤，不缺烧砖的燃料，而且晋商的富庶也决定了山西人有资本和有意愿用砖来建房。到了关中，尽管还有窑洞，但民居已经变成以单坡顶“半边房”为主。陕南地区，因为位于秦岭以南，从地理划分上已经属于南方，所以这里的传统村落与湖北、四川两地的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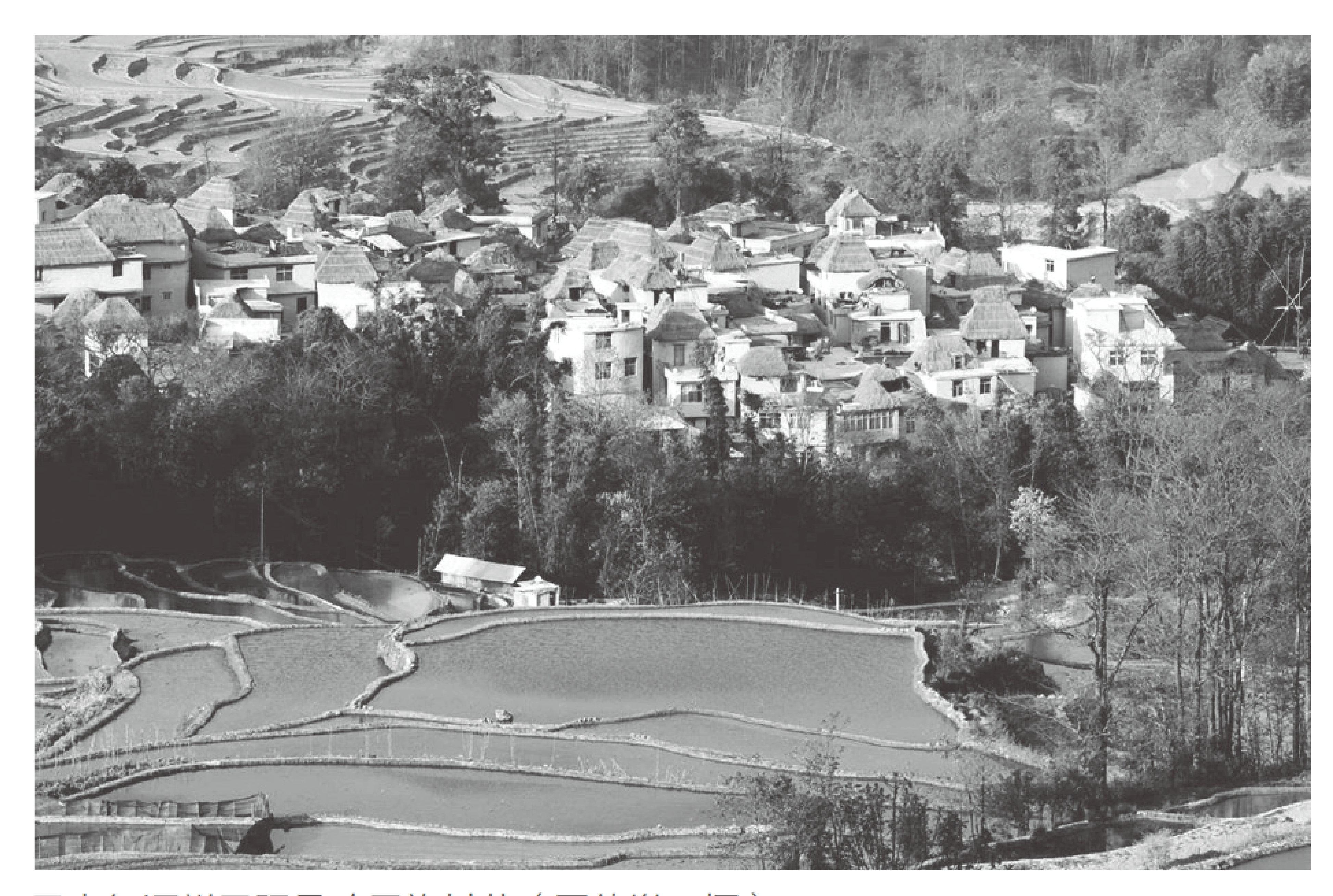
其他省份的情况，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II 区：民族片区

Ⅱ区是西部片区（包括北部的内蒙古），这是以民族特征为文化重要性的片区。这里的人口，在城市里常以汉族为主，在农村则是各地区有各自的民族。尽管民族杂处的情况也存在，但就单个村落尤其是自然村而言，多数是以一个民族聚居于一个村落为常见的。所以，这里的传统村落首先要证明自己是属于哪个民族的——也是从聚落、建筑、非遗这三个维度；另外，也同样还要证明自己是属于自己的——这样才能与本民族的其他传统村落拉开距离。

拿侗族来说，其传统村落经常有以下共同特征：从聚落而言，侗族人集中分布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选址常临水；从建筑而言，

其民居为干栏式建筑，公共建筑常有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种类型；从非遗而言，侗族人每年有祭“萨坛”的节庆活动。这些元素加起来，就使得侗族的传统村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村落，也使得侗族区别于其他民族。



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族村落（罗德胤　摄）

再比如哈尼族，其传统村落经常有以下共同特征：从聚落而言，哈尼族人集中分布于云南红河州的元江南岸，多选址于海拔 1000 ~ 1800 米的中高山区；从建筑而言，其民居以土墙、四坡草顶的“蘑菇房”最为典型，几乎没有公共建筑，但有寨神林、磨秋场等公共空间；从非遗而言，侗族人重要的节庆活动有二月年（昂玛突）、六月年（苦扎扎）和十月年（哈尼族历的新年），其中前两个节日分别在寨神林和磨秋场举行集体庆祝和祭祀。

再如傣族，其传统村落经常有以下共同特征：从聚落而言，傣族人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州，多选址于低海拔的临水区；从建筑而言，其典型民居为竹材或木材建成的、占地宽大的干栏式建筑，有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州的傣族村子还建有佛寺；从非遗而言，傣族人信奉南传佛教（所以有佛寺），每年过泼水节。

以上三个是地域上呈集中分布的民族。有的民族在地域分布上是呈现分散特征的，比如苗族。苗族的传统村落，由于地域分散，其共同特征似乎不太明显。就建筑来说，苗族或许是由于受附近强势民族影响的原因，表现得种类多样，除常见的吊脚楼之外，也有土坯房、石砌房等。不过，苗族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也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其中也会反映在村落上。比如从聚落而言，苗族村落多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农业条件不理想，所以狩猎是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从非遗而言，苗族人信奉巫术，牯藏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

Ⅲ 区：民系片区

Ⅲ区是华南片区（包括广东和闽南，不包括台湾和海南），这是以民系特征为文化重要性的片区。这里的人口大都是汉族，为什么不将其直接划入Ⅰ区而要单独列一个片区呢？原因是，这里的民系分化现象十分明显，但又没到各自成为一个民族的程度。从民系来理解华南地区的种种文化现象，往往是顺理成章的，比如语言、饮食、节庆等。用民系来划分传统村落，也符合这一地区的特殊情况。

造成华南地区民系现象突出的原因，是古代中原汉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徙到了这里，他们在带来先进的技术与文化的同时，也与当地原住民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与中原、江南等地的汉族并行发展的人群。这些人群和现在中原、江南等地的汉族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所以学界只好用民系而不是民族来加以称呼。

华南地区的民系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客家、广府、闽南、潮汕和雷州。笼统地说，闽南、潮汕和雷州都属于“鹤佬人”，他们原本是一个民系，但由于分隔的时间较长，互相之间已经不认同。

华南地区的传统村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宗族对村落的主导作用极为明显。浙江、江西等地的传统村落，宗族力量也是比较强的，但是

在对村落的主导作用上，与华南地区相比还是要略逊一筹。其中一个表现是：浙江、江西等地村落在初建阶段，几乎是没有什么规划的，等村落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才会有宗族出面来做统筹调整；而华南地区的村落，经常是在初建之时就已经由宗族来规划设计了。

广府民系的传统村落，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学术界称之为“梳式布局”，即村落的形状像一把梳子一样。“梳子”的每根“齿”都是一排房屋，其前端通常是祠堂或书院；跟在祠堂或书院后面的，是一个个小天井住宅，像糖葫芦串一样前后相接。在祠堂前面有宽宽的禾坪，禾坪前面有大型池塘。尽管“齿”的长度不统一，但是它们排列起来的规则感是相当高的。要实现这种规则感，在初建阶段就需要宗族出面做统一规划。



福建永定县初溪村土楼群（薛林平　摄）

客家民系的传统村落，在华南五个民系之中可以说是最为多样的。它们经常表现为大型围屋的建筑形式，其种类大致可以归结为“客家四州”——赣州、汀州、梅州和惠州，分别对应着现在的赣南、闽西、粤东北和粤东南四个地区。尽管造型各有不同，但客家围屋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祠堂与居住功能合一。

闽西的客家土楼，是世界遗产“福建土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状以方形或圆形为主，以厚厚的夯土墙为围护结构，形成防御性极强、内部为空场（有时也有祠堂）、房屋三至五层且沿墙分布的建筑形式。

赣南围屋有“口”字形和“国”字形两种，集家、祠、堡于一体。“口”字形围屋与闽西客家的方形土楼很相似。“国”字形围屋，尽管在外观上与“口”字形围屋相似，但其内部的功能组织则大为不同：沿外墙的房屋通常是仓库、牲口房，中间部分才是主要的居住房间。如果把围墙及其相连的房屋去掉，剩下的部分其实和江西其他地方的大院民居很相似。

粤东北的梅州地区，地处客家民系的腹地。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梅州客家人不需要与非客家民系斗争，所以其围屋的防御性不如赣南围屋或闽西土楼明显。它转而关注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生殖崇拜和风水观念。梅州客家典型的围屋叫“围龙屋”，是一种平面近似椭圆形的建筑。它由中间堂屋、两侧横屋、前方禾坪与半月形池塘、后部弧形房屋组成。其中有一个特殊的部位，叫“化胎”，是一个形状像孕妇肚子、平面近似半圆形的场地，位于后部弧形房屋与后厅堂之间。“化胎”的前端有“五方龙神”，是整座围屋的“穴位”，也是风水上龙脉的结点（“围龙屋”因此得名）。

粤东南的惠州地区，与广府、潮汕两大民系相邻，所以这里的围屋村落与建筑也受到了这两个民系的影响，出现了样式上的融合。在深圳的龙岗，至今保存有数量庞大的客家围屋，其中“鹤湖新居”就是一个典型的融合了客家与广府的案例。从外观上看，鹤湖新居与赣南围屋或梅州的“四角楼”类似，只是规模要大。进到里头，房间的配置就与梅州围屋的大相径庭：后者是宿舍式的，一间间房屋并列；前者是天井小院式的，每个天井院自成一体。也就是说，鹤湖新居把梅州围龙屋的大家族聚居和广府梳式村落的小天井宅院给融合到一起了。这也是它占地面积大的一个原因——进深只有几米的一排宿舍，变成了进深十米左右的一排院子。

对比客家民系和广府民系的传统村落，大致可以总结为：前者家族聚居，住祠合一；后者家庭独居，住祠分离。潮汕民系的传统村落，在住宅与祠堂的关系上——实则为村落的基本组织方式上——是介于客家和广府之间的。潮汕民居，小型的有竹竿厝、单佩剑、双佩剑、爬狮、四点金等式样，它们都属于单幢建筑或单进小院，这与广府民居类似；中型的有三落四从厝、驷马拖车、八厅相向等式样，属于多进院；大型的有围寨和围楼，这就和客家围屋接近了。另外，潮汕的建筑讲究装饰，在华南地区首屈一指。

闽南民系的传统村落（不包括闽中的土堡），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泉州、晋江一带靠海的，与潮汕类似，但是外墙材料改以红砖为主，不像潮汕用青砖。另一种是漳州、龙岩一带的，与客家毗邻，其建筑形式也变成了土楼。客家土楼与闽南土楼从外观上看几乎一样，但其内部有明显区别：前者是通廊式，所有住户共用几部楼梯；后者是单元式，每家有自己的楼梯。也就是说，在闽南土楼的内部，各家是过着小家庭生活的，而在客家土楼的内部，居民们过的是大家族生活。

华南沿海各地，由于出海方便，很早就开始了与海外交流的过程。这给当地城镇和乡村的建筑带来了“洋风”。在传统村落里也不乏此类表现，比如泉州与晋江一带的英国式别墅、开平地区的西班牙式碉楼和深圳宝安地区的客家碉楼。在一些传统民居里，也有融入西方建筑元素的现象。

IV 区：混合区

Ⅳ区包括东北、台湾和海南。Ⅳ区的特点是原住民加外来人口，原住民即原先居住的民族，外来人口即后来迁入的民族或民系。因此，Ⅳ区实际上是前三个片区的综合。

在东北，如果是原住民为主的传统村落，可按Ⅱ区的民族原则来处理，比如满族、朝鲜族、达斡尔族等；如果是以外来人口为主的传统村落，由于大多是从Ⅰ区的汉族地区迁来的（尤其是“闯关东”的山东人），所以

可按Ⅰ区的文化地理原则来处理。

在台湾，原住民有泰雅、阿美、布农等民族，外来人口以闽南、客家两个民系为主。如果考虑到原住民的建筑已经消失，只有重建的博物馆式民居，台湾大致上可以划入Ⅲ区，即民系区。

在海南，原住民以黎族和苗族为主，所以原住民的传统村落按Ⅱ区的民族原则处理。外来人口以闽南人为最，其次有广府人（主要在琼北），所以外来人口的传统村落按Ⅰ区的文化地理原则处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历史上有不少中原来驻军，又有来自东南亚的影响，所以这里的传统村落还融入某些中原和东南亚的元素。

结语

本文将全国划成了四个片区，这种看似复杂的谱系分类法，其根本仍是遵循以民族为基本原则的。在Ⅱ区，民族的分类法顺理成章。在Ⅲ区，民系可视为一种特殊的“亚民族”。在Ⅰ区，由于汉族文化的地域广大，因此有必要将其划分为若干个较小的片区。这其实也属于“亚民族”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强调的不是地理属性，而是文化地理属性。Ⅳ区是前三个区的综合，归根到底还是民族分类。

应该承认，这一谱系分类法并非完美无缺。比如，在每个片区的交界地带，甚至在每个子片区的交界地带，都会存在一些难以明确归类的传统村落。对于这些传统村落，我们需要加强它们与两边腹地的典型村落的对比研究——这不但会使各自的特点都更为突显，也将会使中国传统村落的谱系更为完善。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建立刍议 [J]. 世界建筑：2014（6）：104-107，1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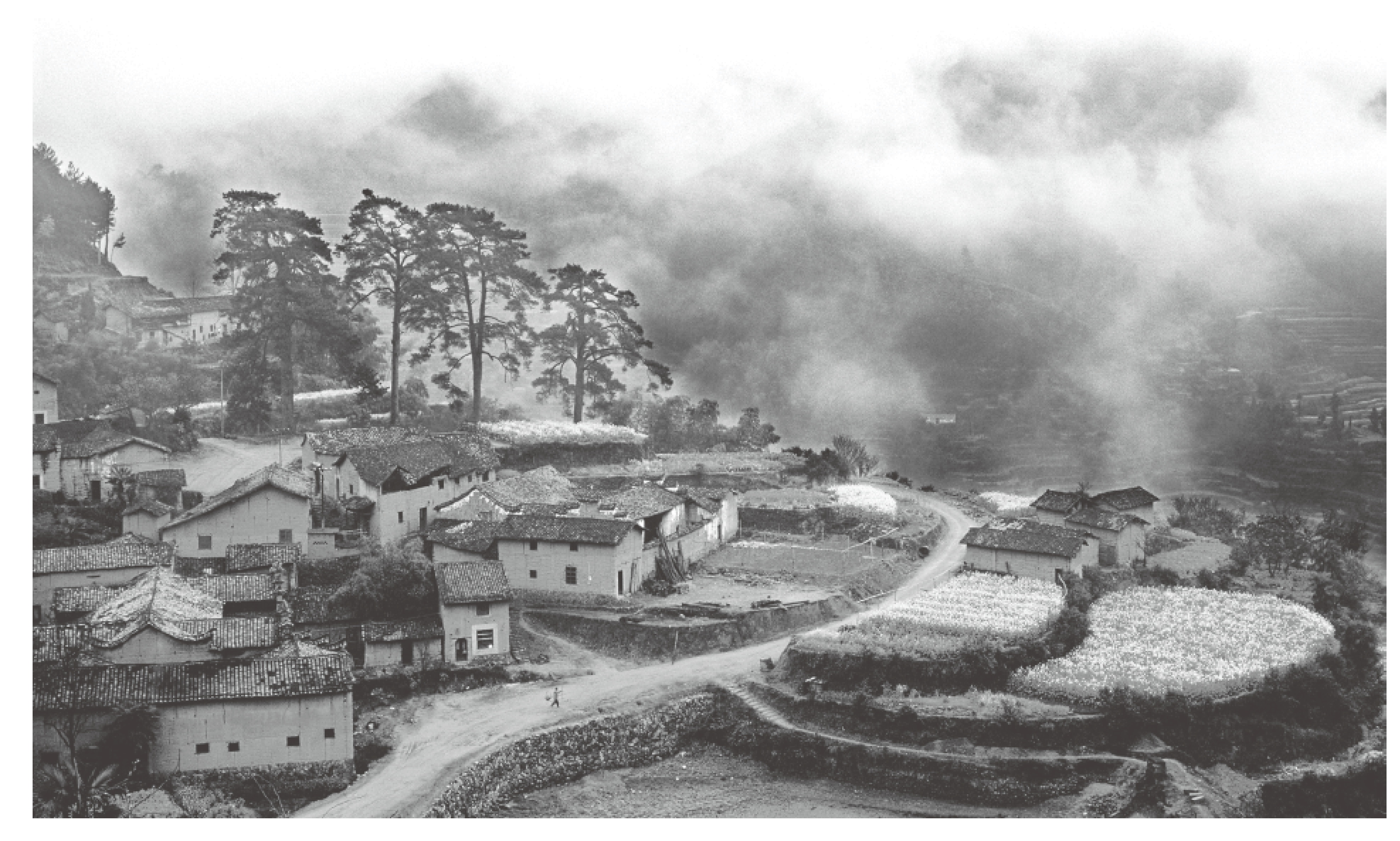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古典中国”在松阳

在乡土建筑领域，或者说传统村落领域，浙江的松阳无疑是我们这几年最大的发现。第一次认识松阳古村，是阅读刊登在2013 年 4 月号《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瓯江上游：一片残存的江南田园》。这篇出自松阳本土作家鲁晓敏和摄影师叶高兴之手的文章，洋洋洒洒，占据了三十多页的篇幅，足以反映编辑对松阳的偏爱。封面上还压了一行富于诗意的文字：最后的江南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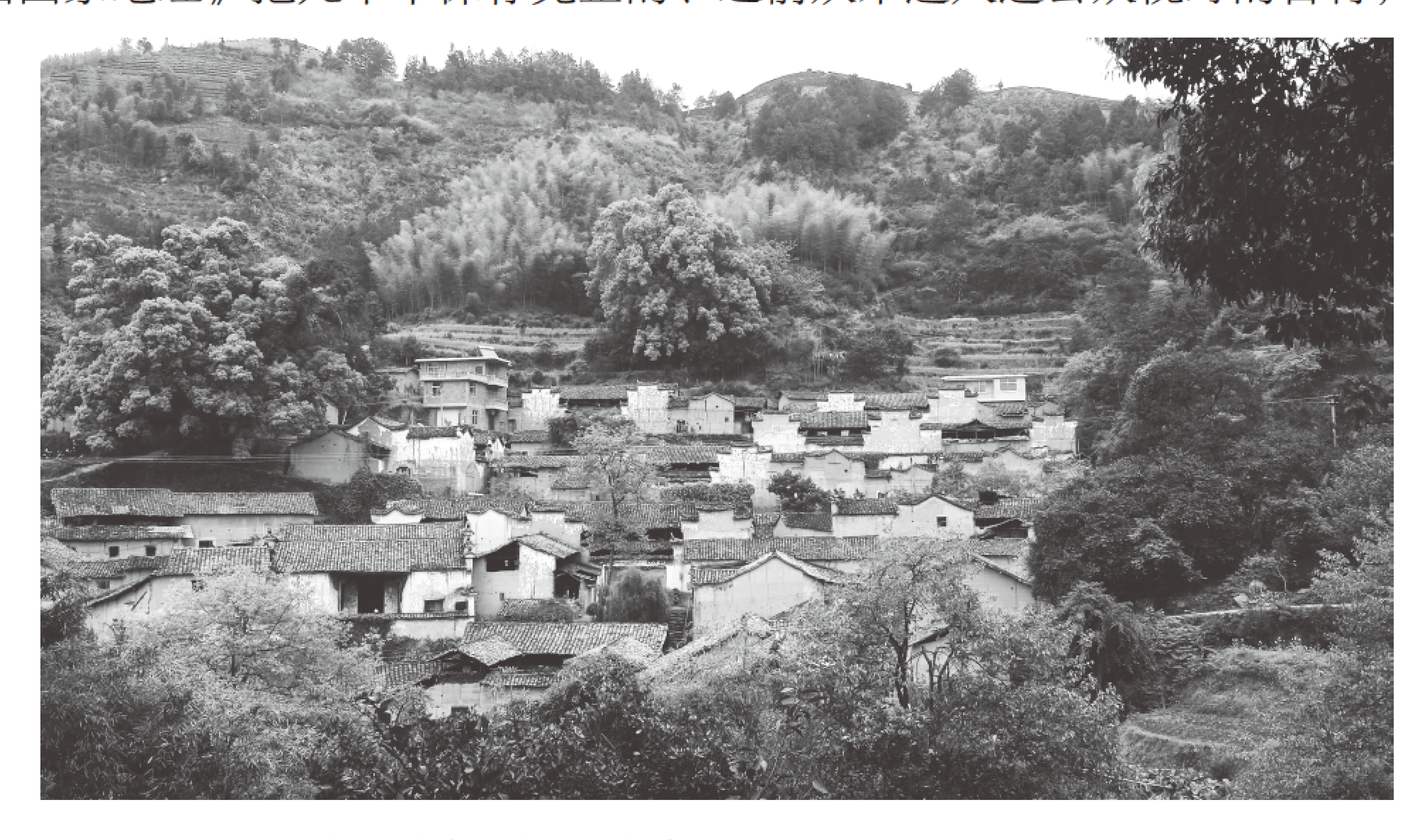
江南确实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这种诗意，源于她时常呈现的烟雨迷蒙，源于她袅娜多姿的林泉山水，也源于她在经济上的富庶，更源于她在文化上的发达。自中唐以降，中国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就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好日子，一过就是一千多年，直到今天。

可惜，江南的诗意在最近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一多半都消失了。山水不改，烟雨依旧，但是建筑大都变了样。白墙黑瓦、翘角飞椽，纷纷化作平顶或尖顶的瓷砖楼、红砖楼。这些楼房，说土不土，说洋不洋，和诗意两字是半点扯不上干系的。



松阳县三都乡酉田村（朱永春　摄）

江南的诗意倒也不是全面沦陷。西湖还是在的，还是那么美丽，而且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几个著名的古镇，还有几个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村，比如诸葛村、长乐村，也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如果没有松阳，我们也许会认为，江南能留给后人的诗意，大抵就是如此了。然而，当《中国国家地理》把几十个保存完整的、之前从未进入过公众视野的古村，一



松阳县三都乡杨家堂村（罗德胤　摄）

下子铺陈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仿佛被猛地当头棒喝：不，不能就这样，因为还有这么多的精彩，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关爱！

最后的江南秘境——既然是最后，就不能再丢掉了。

一千多年的江南，经济中心加上文化中心。代代才子，生于斯，长于斯，反哺于斯，最后又回归于斯。这里不仅是中国的中心，还曾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前工业化时代里，一度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古典中国”的空间单元

前工业化时代，村落是中国基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元，大部分生活生产资料在一村之内即可解决，大多数人在这个基本单元里度过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少数人（主要是商人和官宦）会在外地生活较长时期，但他们通过经商或其他途径得来的财富，大多又流回家乡，为家乡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在年老退休之后，他们也大都返回故里，成为主导地方建设、掌握地方舆论的乡绅精英。

关于农业社会中的乡村建筑，陈志华在《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里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国两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主要是农民的文明史，这一部文明史的见证，极重要的是千千万万农民生活在其中的乡土环境，主要是建筑”“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乡土建筑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可以凭借它的乡土建筑对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做出重大的贡献，原因在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里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给中国乡土聚落带来了大量艺术水平很高的建筑，这些建筑就是这些制度和崇拜的最生动的历史见证。正是它们，无论在结构技术上、功能型制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是中国传统乡土建筑最典型、最高水平的代表作。这三大类辉煌的建筑又是中国所独有而为世界其他国

家所无的。”[1]

三大类“辉煌的乡土建筑”，在哪里存在得最多、最集中呢？答案是江南。北方的某些地区，寺庙建筑比较发达，但是宗族力量远远比不上南方，所以北方的祠堂比较少见，建筑规模和等级也要逊色得多。南方除江南之外的一些地方，比如岭南、闽南等，宗族势力不亚于江南，但是在科举和文教事业上就要差个档次。就地区而言，江南是最能代表传统时代的中国的。

整个江南地区都完整保留下来在现实中无法实现，退而求其次，是否存在一个比江南地区小的空间单元，足以担得起“古典中国”之名呢？

如果有的话，这个空间单元最小也得是县，不能比县再小了。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一直是中国的基本体制。在传统社会，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一个农业超级大国的统治管理。皇帝派官员分赴全国各地，代表他行使治理之权。这些官员里，通常品级最低的是知县，俗称“七品芝麻官”。知县以下，尽管还有八品和九品，但是权力上就差远了。基本上，知县就是个“土皇帝”，他对县内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有裁决权。这些权力在很多时候只是名义上的，其实际工作压力比不上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们，因为很多事情都由宗族、乡绅按乡规民约宗法规范解决了，根本进不到衙门里头。

在建筑配置上，县城内设有县衙，其地位就相当于京城里的皇宫。县城内设文庙、学宫，是全国最高教育部门——国子监分设到地方的机构；城隍庙是掌管阴间的地方“衙门”（城隍的最高长官不在都城，而是在泰山）。县城内或城门外设有集市、商铺进行物资交易，还会有鼓楼、关帝庙、真武庙、社稷坛等公共建筑。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共建筑，加起来有几十上百个，它们是传统社会里公共生活的载体和见证。

1　陈志华．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 [M]// 文物建筑保护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98-103.



松阳县黄家大院天井（李君洁　摄）



松阳县叶村乡横坑村（任明龙　摄）

在县城之外、县域之内，还有若干集镇和几十至几百个村落。村落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但是有一部分生活生产物资，比如铁制农具、布匹、食盐、瓷器等，仍需到集镇或县城去购买，农民生产的富余农产品，也要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个县，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完整的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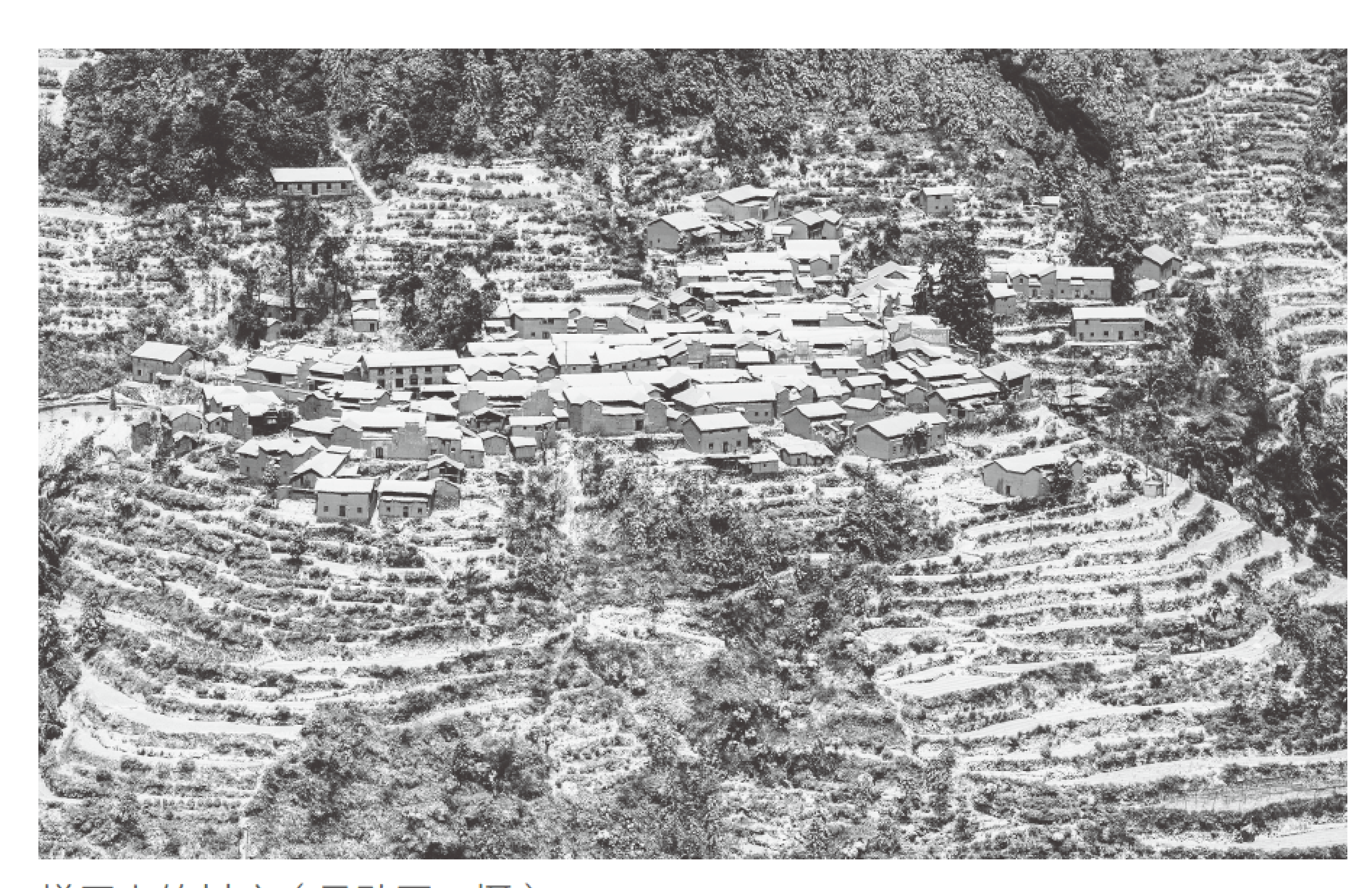
所以，“古典中国”至少以县为单位，而且县城要保存得相对完整，县域内要有一定数量的保留相对完整的传统村落。用这个条件一框，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地方就比较有限了，因为绝大多数县城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都已经“沦陷”，而村落保留数量较多的县份也是不多的。

为什么是松阳？

松阳是符合“古典中国”条件的。

首先，它最大的优势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有几十上百个。这些村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平地村和山地村。平地村分布在瓯江上游松荫溪两侧的松古盆地内，以界首、吴弄和山下阳为代表，其建筑质量在浙江省内亦属上乘。

松古盆地是浙西南山区最大的盆地，面积约 285 平方千米，地势平坦，农业条件优越，以县域 20% 的土地面积出产了全县 90% 的水稻。不过，由于交通相对便利，松阳的平地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大部分已经消失，只有少数得以幸存。



梯田上的村庄（吕劲天　摄）

山地村的保存程度要远远好于平地村，松阳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大部分属于山地村。能有如此大量的村落得以保留，除了交通相对不便的因素外，松阳县领导的及时觉悟是最主要原因。山地村的经济水平和建造水平总体上不及平地村，但是它们借助山形地势和溪流林石的复杂

多变，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面貌。山坡高差所造就的可视性又使得这些村落呈现出丰富的立体景观。诸如呈回、横坑、官岭、球坑等规模较大的山地村，其层层叠叠如多级瀑布的壮观景象，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松阳的传统村落，除有数量较多的民居之外，一般都会有祠堂和庙宇，还有一个园林式的水口（即村口）。祠堂、庙宇和水口，堪称松阳村落的“标配”（实际上这也是江南地区村落常有的配置）。祠堂是宗族组织和儒家观念的体现，是连接上层政治的桥梁。庙宇则是地方信仰的载体，对底层民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松阳所在的瓯江流域，历史上属于百越之地，盛行巫神崇拜。在接受中原传来的儒家观念之后，这里的巫神崇拜在逐渐规范化和正统化之时，依然保留了底层信仰的特色，神灵繁多，祭祀庞杂。

水口园林则是文人和乡野的结合。几棵参天老树，一条蜿蜒小溪，再配上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可能再加上一两个规模或大或小的庙宇、祠堂，一切看似浑然天成，实则经过精心布置，还各不一样。如果不是受过长期的古典文化浸淫，同时又对家乡山水发自内心地喜爱，是不可能“设计”出这些美妙的艺术品的。

其次，松阳有一新一老两个县城。新县城即现在的县城——西屏镇，保存得相当好。西屏镇的规模不大，没有城墙，从县城的典型性来说略有缺憾。不过，西屏镇内，以南直街为核心的历史街区，面积超过了 1 平方千米。除大片传统民居和商铺之外，街上保留有 12 座宗祠和文庙、武庙（即汤兰公所）、城隍庙、天后宫、药王庙、瑞洗夫人庙等建筑。城外还有一座建于北宋的延庆寺塔。松阳县建置始于公元 199 年，西屏镇是唐贞元年间才成为县治所在地的。在此之前，松阳县城位于现在的古市镇。古市至今仍是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镇内以横街、三角坛为中心，三百米长的街道上聚集了一百多家店铺，商业规模只比县城稍逊。



松阳县西屏镇老街（李君洁　摄）

再次，松阳的古镇和古村里，不乏装饰水平很高的民居和公共建筑。建筑装饰主要表现为木雕、砖雕和石雕，是建造工艺水平的体现，也是文化艺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松荫溪流域与瓯江下游的温州之间，自古就有贸易往来。在十九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之后，沿海进口的工业产品和内陆的土特产之间形成了更为强烈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商业的带动下，松古盆地的村落经济发达，建造水平相当高，与浙中、浙西的村落相比也毫不逊色。松阳的山地村，虽然水稻产量不高，但是盛产木材、竹材、蔬菜等物产，有的地方还曾经出产过银矿。这些物资和松古盆地的水稻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同时也是瓯江物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松阳的文教事业。在传统时代的中国，判断一个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最直接的指标是科举成绩。在长达 1300 多年的科举历史中，松阳一共诞生了 96 名进士，其中包括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和明代“一门双进士”詹雨、詹宝。这份成绩，放在江南地区不算突出，远远比不上苏州、杭州这些“状元盛地”，但就全国来看，无疑又是比较先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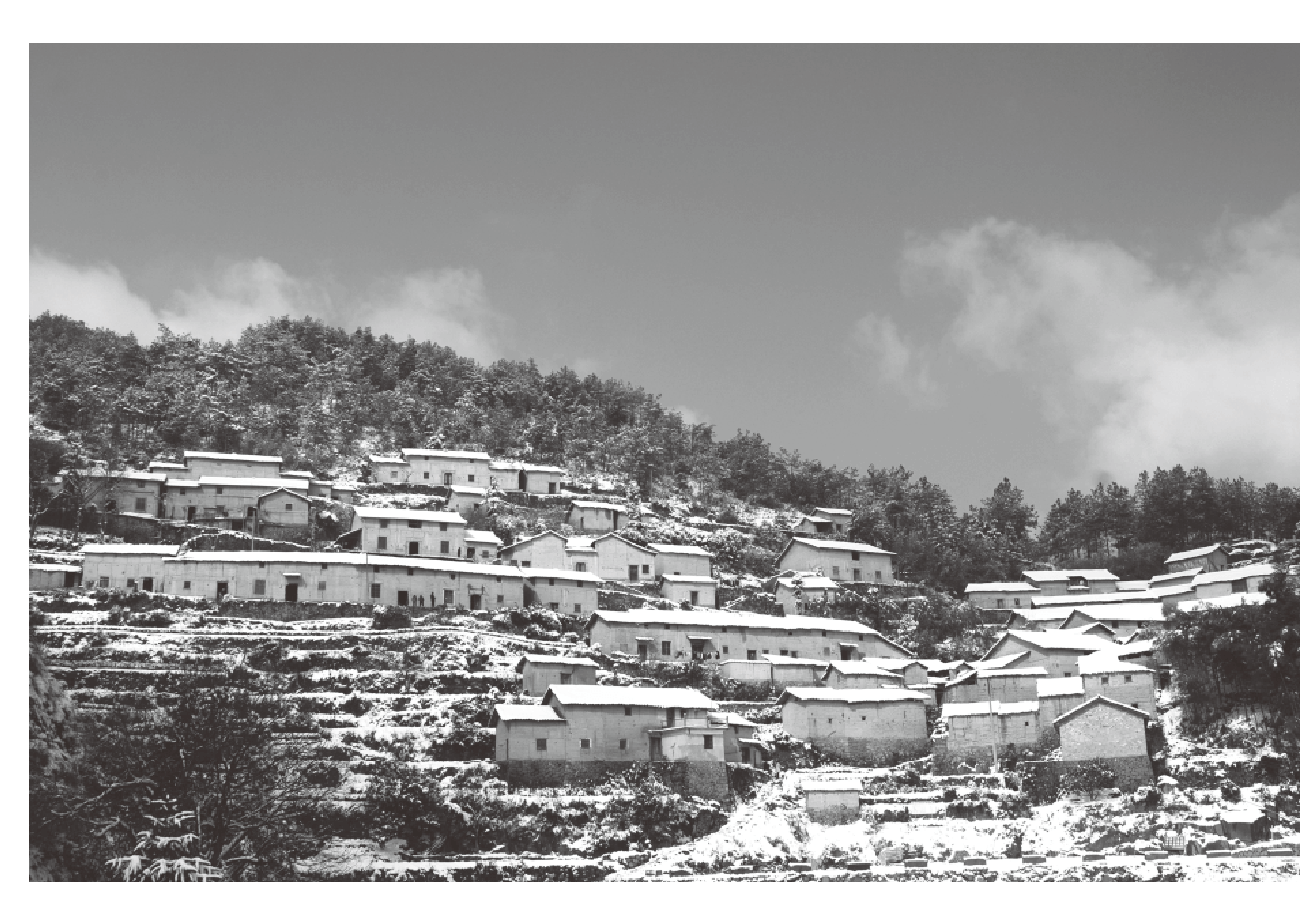
除进士之外，松阳还出过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比如唐代被称为“国师”的道家叶法善，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的张玉娘。清末科



黄家大院内的木雕（牛腿）（李君洁　摄）

举取消，松阳又是较早出现留学生的地方之一。界首村的刘德怀于 1903 年留学日本，是松阳第一个留洋学生，在日本期间还加入了同盟会。他 1905 年在家乡倡办震东女子学堂，是丽水地区第一所女子学校。

总的说来，松阳在“古典中国”的代表性上虽然比不上江南核心地区的县份，但要素和空间是齐备的。假如时光倒流十几年，“古典中国”的桂冠一定轮不到松阳来戴。但是现在，江南核心地区的传统村镇大多消失殆尽，松阳反而成了“一号种子选手”。



樟溪乡黄田村（夏晓芳　摄）

松阳之外

除松阳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称得上“古典中国”的呢？

列入名录的中国传统村落，目前总数是 2555 个。以县为单位，拥有传统村落的总数前十名里，贵州就占了五个——黎平、雷山、台江、

从江和剑河。从村落保存的完整度来看，贵州这几个县很可能是优于松阳的。但是，这些村庄地处西南大山里，儒家文化未能完全渗透、浸润到这些地方，而较低的经济水平也无法支撑起一定规模的多种类型且质量较高的建筑，难以用来代表“古典中国”。除了民居之外，这里的村落少有祠堂、庙宇、书院之类的公共建筑，说明聚落的发育程度较低。

前十名的县份，云南也占有三席——腾冲、建水和玉龙。应该说，云南这三个县在“古典中国”上的竞争力，比贵州那五个县要强得多。玉龙是纳西族自治县，2003 年由原丽江县分出，另一半就是现在的古城区。所以，应该拿 2003 年之前的丽江县来做样本。丽江县有丽江古城，保存完整，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县境之内，也有几十上百个完好的传统村落；历史上，丽江的统治者早就主动接受了汉族文化。不过，丽江毕竟地处边陲，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汉文化的影响终究有限。我们曾经去调研过一个保存极为完整、规模也相当可观的古村，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难以了解到村落的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村民连在这里住了多少代人都记不清楚。

建水和腾冲，都是汉族为主的县。腾冲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有 57 个，比松阳还多。腾冲在历史上是著名的“玉城”，是缅甸玉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和主要加工地。依靠着玉器贸易加工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物资交流，腾冲也曾经是较为富庶之地。不过，腾冲县城在抗日战争期间饱受战火摧残，几近无存，所以在“古典中国”的要素上有较大缺憾。

建水靠近“锡都”个旧，历史上有很多靠挖矿而致富的人家，从而造就了众多分布于城市和乡间的优质四合院。建水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有 23 个，虽不及松阳一半，但也在同一量级上。建水县城也保存有比较好的老街。建水文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可以说，建水和松阳是水平最接近的两个县。住建部将它们同时列为第一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是有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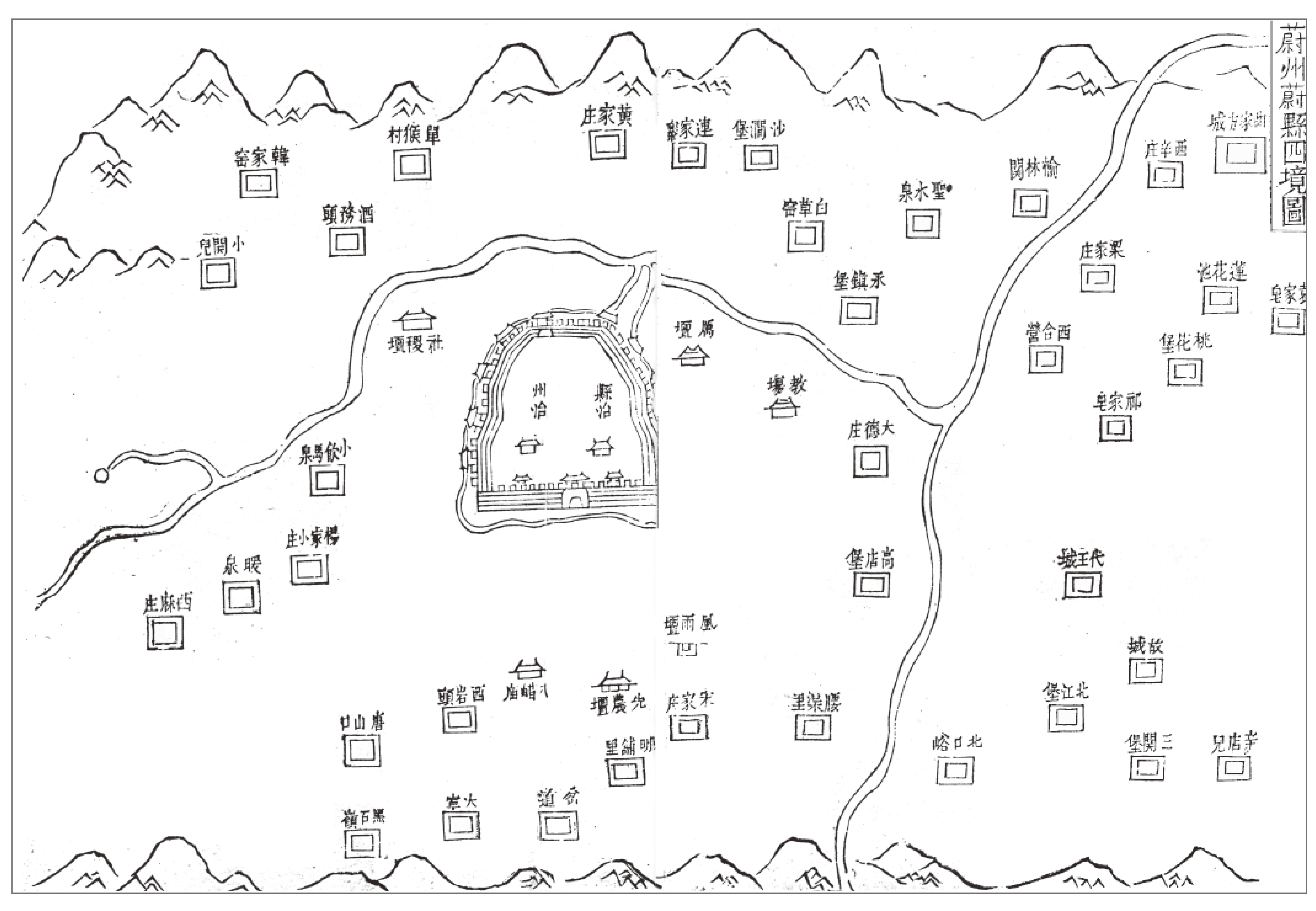


建水县团山村（李君洁　摄）

除了贵州和云南，我们能想到的其他地方，还包括河北的蔚县、安徽的黟县和江西的婺源。河北蔚县，在北京以西约 200 千米，位于内外两道长城之间。因为经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蔚县的城市和乡村都是以防御性为首要考虑的城堡型聚落，有“八百村堡”之称。县城是大城堡，村落是小城堡。集镇由若干个临近的城堡组合而成，城堡之间有贸易市场和街道。进入清代之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对抗大大减弱，聚落的防御性让位于生产生活需要。随着交通贸易的发展，蔚县城乡的公共建筑，尤其是庙宇大大增加。蔚县县城留有一定规模的历史街区和数量不少的历史建筑，城墙的局部也幸存至今。“八百村堡”尽管大多面临荒废，但并未消失。从历史遗存的独特性和丰富度而言，蔚县不亚于松阳。蔚县的短板，一是祠堂太少，二是城市和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不够优美。

安徽的黟县和江西的婺源，都是古徽州的地盘。黟县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有 25 个，全国排第八，其中的宏村、西递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婺源县的传统村落有 19 个，总量未入前十。徽商是中国第一大商帮，徽州的村

子在建设质量上也是全国一流的，在这点上松阳真没法跟黟县、婺源相提并论。不过，黟县和婺源有两个弱点，降低了其在“古典中国”上的代表性。一是两地的县城保留状况都不好，二是徽州的理学力量过于强盛，导致这里的泛神崇拜受到压制，庙宇建筑不发达。



蔚州城及周边村堡图（光绪版《蔚州志》）

以上关于不同县的比较，仅限于个人的主观认识，难免偏颇。古人云，爱屋及乌。由于我两年里对松阳的关注比其他地方多，也势必影响到价值判断。不过，比较法有个好处，就是让不同对象的特殊性得到凸显，从而加深理解。在从“古典中国”的角度梳理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遗产之后，我本人对松阳的认识也比以前更加清晰了。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在松阳感悟“古典中国”[J]. 瞭望. 2015（43）：57−59。）

第三节

哈尼梯田：极致景观，极致利用

世界遗产的评判规则，不是美不美，而是要看项目本身的突出价值性（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以下简称 OUV）。哈尼梯田的 OUV 在哪里？答曰：四素同构。早在 2002 年，国家文物局关于哈尼梯田的价值评估文件就已经指出，森林、村寨、梯田和水系形成的“四素同构”是哈尼梯田的核心价值所在。梯田是由人开垦的，开垦梯田的人生活在村寨里。村民们利用森林里涵养的水分，解决了生活所需，也通过兴修水利来灌溉梯田。而梯田所产出的水稻，则养活了勤劳的农民。这整套系统，体现了“四素同构”的生态意义。

然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梯田，它们大多存在着由森林、村寨、梯田和水系形成的“四素同构”现象。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1995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菲律宾伊富高梯田。伊富高梯田是第一个以梯田名义来申请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如果没有伊富高梯田，我们也很可能想不到哈尼梯田可以申遗，因为这种遗产形式和我们所熟知的以建筑、考古遗迹为主的文化遗产实在相差甚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要感谢伊富高梯田的。不过，在此时此刻，它也是一个最让我们挠头的问题。如

果不能证明哈尼梯田和伊富高梯田有足够的文化差别，就很难证明哈尼梯田的 OUV，也就很难通过世界遗产组织的评审。



哈尼梯田（罗德胤　摄）

中国的遗产专家们不得不重新观察和思考他们本已非常熟悉的哈尼梯田。比较研究是一种很好的认识方法，眼睛只盯着自己看，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了哈尼梯田和伊富高梯田的一些不同之处。比如，哈尼梯田的田埂是土质的，伊富高梯田的田埂是石头垒砌的。再如，哈尼梯田的坡度总的说来比伊富高梯田要缓一些。又如，哈尼梯田的田埂长度普遍比伊富高梯田更长，这使得哈尼梯田看上去要更为壮观——在海拔 600 ~ 2000 米，满眼都是梯田，树林很少；而伊富高梯田更多地呈现为分散的垂直条带状——沿着一条溪水，由上至下，田埂的宽度大致相等；在条带状梯田之间有大面积的树林。

为什么哈尼梯田没有形成条带状呢？答案是条件允许的所有山坡，都被哈尼族（以及附近的彝族、傣族、壮族和汉族等）开成了梯田。不是梯田的地方，要么是低海拔的干热地带，太过干旱，没法种水稻；要

么是高海拔的湿冷地带，温度太低，积温不够，也没法种水稻；中间也有一些坡度太陡的地方，没法开辟成梯田，但是一定要种上有利于固土护坡的树木。

如此大面积开发的梯田，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的一种可持续的“极致利用”。“不极致利用”的梯田，规模也可能是庞大的——就比如伊富高梯田，但是这些梯田里的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村寨的分布也比较分散，发育程度也较低。生活在哈尼梯田的人们，通过高强度的劳动和高智慧的安排，将土地承载力发挥到了极限，所以这里的村寨在数量、层级和类型上都远超过一般的梯田环境。

工序、水牛和家谱

抓住“极致利用”和“集体凝聚力”这两个要点之后，遗产专家们对哈尼梯田的种种现象又有了新的理解。

首先是哈尼梯田的精耕细作体系。水稻种植的工序大致为：农历一月底撒秧；二月份第二次犁田和第一次耙土；三月底插秧，插秧前十天左右第三次犁田，并再一次耙土；四月份插秧并开始田间管理；八月下旬开始收割稻谷；十月份稻谷收割完毕，修整梯田打田埂，犁第一遍田并放田水；其中插秧、收割这两个工序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需邻里、亲戚帮工。哈尼梯田的劳作强度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不少男人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脸皱纹，看上去有五十多岁。

再如哈尼族在葬礼上杀牛的现象。在农业社会，耕牛是很重要的。依靠精耕细作而开展农业的哈尼人，耕牛对于他们而言就更具有特殊意义。精耕细作，就是要对土地进行极致利用。出于对耕牛有强烈的依赖，哈尼人不只把牛当作生产工具，还视其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伙伴。

他们不忍心将耕牛置于户外，而让它和自己一起“住”进了家里。哈尼族民居，俗称蘑菇房，一层养牛，二层住人。也正是因为哈尼人与耕牛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不仅今生今世与耕牛相依，还将耕牛视为下辈子也不可或缺的伙伴。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也不忘带上这位“朋友”，尽管是以今天的我们看来比较残忍的一种方式。

按照哈尼人的规矩，葬礼上宰杀的牛除了一头是自家的外，其余均来自和主家有姻亲关系的家庭。如果去世的老人有四个儿女，而且他们都已经成家，那就意味着主家会得到四头水牛。可以想象，这将是一场多么盛大的宴会。参与分享牛肉的人，包括本村所有的家庭（因为每个家庭都会派人来帮工），也包括所有送牛来参加葬礼的外村人。于是，一场葬礼就演变成几个村寨之间的联谊会。这种联谊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把一件悲哀的事情转化为带有娱乐性质的事件，让逝者的灵魂得到安抚的同时也让生者暂时忘却劳作的艰苦；另一方面，它加强了村寨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种种矛盾而引发的争斗，同时也有效地增进了跨越村寨范围的大集体协作——这一点对于梯田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大规模的梯田开垦和灌溉，离不开大范围的集体合作。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理解在哈尼族两大节日之一的苦扎扎节上，为什么一定要宰杀一头水牛，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动物。因为只有在梯田里勤劳耕作的水牛，才担得起如此重任。

再看哈尼族特有的“家谱”。生活在元江南岸的哈尼族，因为长期与中原文化隔绝，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一辈子从事农业，所以学习成本很高的文字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没有文字，何来家谱？哈尼人的办法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摩匹。摩匹，通俗而言即巫师，他们掌握着哈尼族各种祭祀仪式的知识。摩匹都是世袭的，成为摩匹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记性好，从小就由父亲训练背诵许多在祭祀仪式上要用到的长歌。除此之外，摩匹还有一项责任：背诵村里几十户人家的祖先谱系。家谱是祖先崇拜的体现，汉

族人的祖先崇拜发达，因而派生出宗祠、族谱、族田等事物。哈尼族人背诵家谱的行为，是否受到了汉族人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是强化集体凝聚力的一种表现，也是一个途径。记录家谱这件事，对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可谓轻而易举，但对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就相当的不容易。摩匹背诵家谱这种特殊的现象，究其根源，是哈尼族人对自然“极致利用”的需要。

苦扎扎、昂玛突和集体凝聚力

苦扎扎和昂玛突，是哈尼族的两大节日。它们可以说是让哈尼族人获得高度集体凝聚力的精神机制。申遗地的哈尼族寨子，多选址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腰上，寨子上方有森林，下方有梯田。在村寨与森林之间，哈尼族人会选择一处小树林，作为护卫整座寨子的寨神林，并在神林中选择一棵健康、笔直而且多籽的树做寨神树。村民们对寨神林和寨神树不仅要精心维护，还每年在神林里举办一次昂玛突节（也称二月节）。而在村寨子和梯田之间，哈尼族人会选择一块相对平坦的场地，作为每年举办苦扎扎节（也称六月节）的磨秋场。二月节和六月节，是哈尼族人最隆重的两个节日。

寨神林和磨秋场，正是哈尼族寨子里最重要的两个空间节点，它们一个指向上方的森林，一个指向下方的梯田，在空间上、精神上将村民与其生存环境联系起来。

寨神林和磨秋场都算不上建筑，但是它们都在聚落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我们在汉族地区已经形成的经验来看，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太正常”的。很多汉族地区（比如浙江、江西、广东等省）的村落里，重要的元素常是大型的祠堂或庙宇。这些祠堂或庙宇在建筑规模和装饰水平上，

都要远胜过普通民宅，这样才能凸显出它们的重要地位。非壮丽，无以重威。但是，在元阳县的哈尼族聚落里，最重要的元素居然是连建筑都算不上的寨神林和磨秋场。这让我们产生了好奇：哈尼人依靠什么来凸显并维持寨神林和磨秋场的特殊地位呢？

答案是祭祀。信仰万物有灵的哈尼族人，有着丰富繁杂的节日祭祀活动，他们一年之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过节。哈尼有一句谚语：“汉人读书不止，哈尼打卦不停。”打卦，经常是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节日在形成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性上是毋庸置疑的。比如，春节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过的节日。每当春节临近，在各大交通枢纽都能见到回家心切的拥挤人群。能不能换个时间回家呢？那样既可以避开高峰期，还多半能省一些钱。但是大多数人会回答：不行。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回家，我们才能见到最多的亲人。更因为如果不回家，我们将不得不忍受被排除在节日氛围之外的孤独——一种能将心灵绞杀的孤独。从小到大，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到这个时候就和家人在屋里吃着丰盛的晚餐，还一边听着门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几乎可以这么说，过不过春节，已经成为判断是不是中国人的标准。

昂玛突和苦扎扎就是哈尼族人的“春节”。哈尼族原先也有自己的新年，很早以前，当哈尼人还在采用自己的历法的时候，他们的岁首是在汉族人的十月份。后来哈尼人的历法被汉族历法取代，这个节日就被称为十月节或十月年。如今在很多哈尼族居住的地方，十月节依然是重要的，会摆起长街宴。不过，在申遗地范围内，十月节已经退化，远不及昂玛突和苦扎扎重要了。

昂玛突、苦扎扎又是和春节不一样的。春节有很强的时间性——每年都必须是固定的那天，但空间性较弱。或者换个说法，春节的空间性是泛指的，而不指具体的地点，它可以是每个家庭，无论在何处。而昂玛突和苦扎扎，不但时间性很强，其空间性也很强——一定是在哈尼族寨子的寨

神林和磨秋场。



哈尼村寨位于森林和梯田之间，其上方有寨神林，下方有磨秋场（孙娜　摄）

对应着昂玛突和苦扎扎的二元祭祀，哈尼族村寨形成了一个空间节点的系统。最重要的两个空间节点——寨神林和磨秋场，分别位于村寨的上方和下方。哈尼族村寨的范围，上不超出寨神林，下不越过磨秋场。这两个节点界定了村寨的上、下边界。此外，哈尼族村寨没有实体的寨墙，但有树林作为“自然的”边界，同时以树寨门作为村口标志。在哈尼人的观念中，寨门以内是人的世界，寨门以外就是鬼魂的世界。许多村寨最初的水井，也是在寨子边上的。所以，通过定时而且反复地对寨神林、磨秋场、寨门、水井等大小节点的祭祀，就等于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起一个空间节点系统。这是用一种非建筑的手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建构起寨子的空间结构。

昂玛突、苦扎扎和春节还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它们在祭祀仪式上的繁

琐性。繁琐的仪式，除了构建起意识形态上的聚落空间结构外，还说明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和严肃态度。而人们之所以要重视和严肃，是因为在共同应对艰苦环境时，需要形成一种集体凝聚力，以完成个体无法实现的任务。这种集体凝聚力，不仅让个体联合起来形成了合力，还以互相激励、互相模仿的方式提高了个体的耐受力。昂玛突和苦扎扎的祭祀仪式上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围绕本村寨的安全与兴旺而展开的。这里头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村民们一丝不苟地执行前人传下的祭祀礼仪的过程，也是个人融于集体的过程。

依靠着高度发达的集体凝聚力，哈尼族人终于将大地“雕刻”成了梯田。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哈尼梯田：极致景观，极致利用 [J]. 世界遗产. 2014（9）：42-47. ）

第四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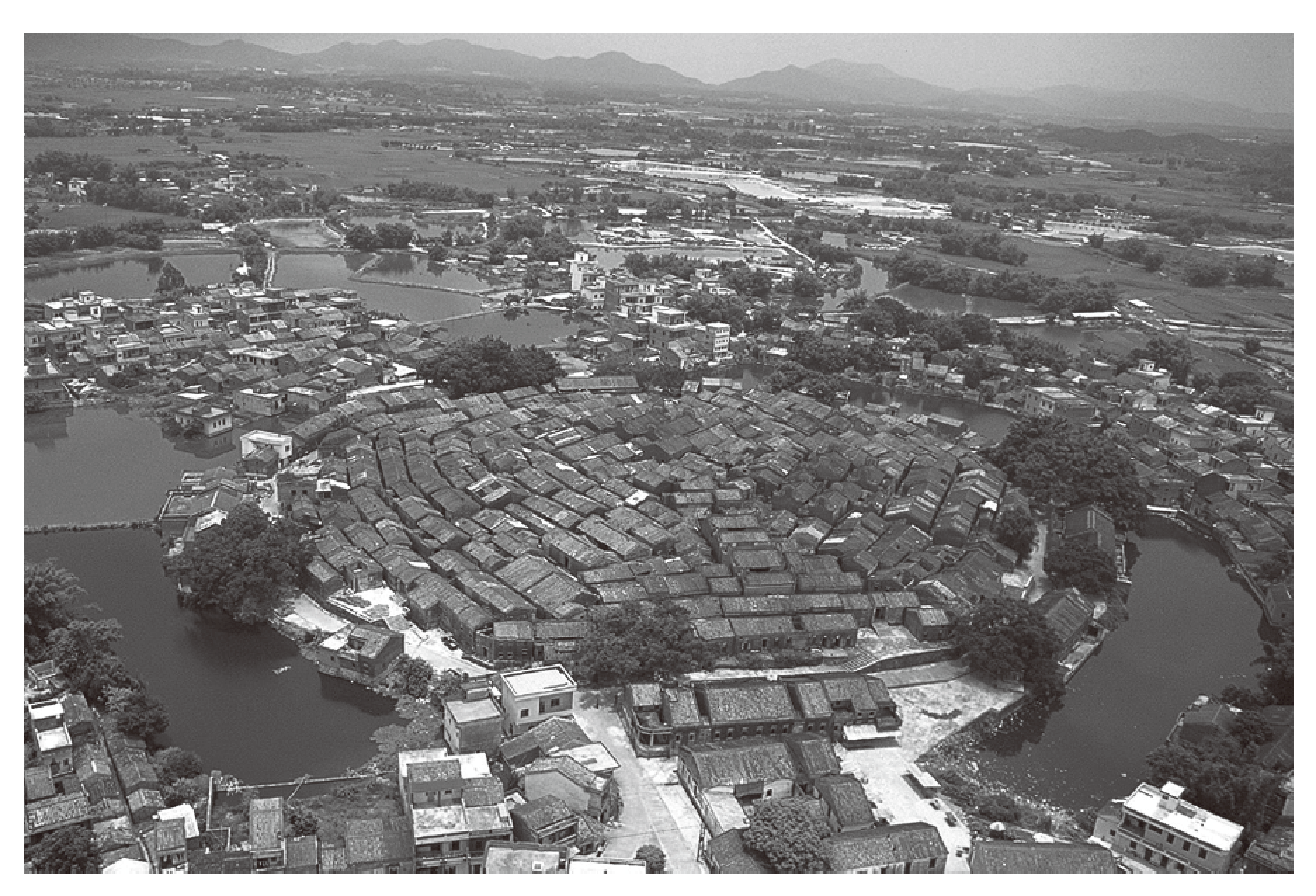
黎槎“八卦村”：与洪水共生

近年来以“八卦”为名，或者说以“八卦”出名的村子，应当首推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八卦村”。诸葛村原先就叫诸葛村，和八卦没什么关系。根据长期从事诸葛村保护事业的陈志华教授的回忆，诸葛村之所以改名叫诸葛八卦村，是因为十几年前某领导提出了“旅游就是要虚中生实、无中生有”的主张。诸葛村本身的村落形态，也确实有点八卦的模样——中间一个大水塘，向外辐射出十一条巷道（注意：不是八条）。诸葛村的这种形态，再加上经过小说演义而为人熟知的诸葛亮八卦阵，化身为“诸葛八卦村”似乎就顺理成章了。现在从杭州开车去诸葛村，在高速路上就能看见大大的“诸葛八卦村”标志牌。

黎槎村的“八卦”

广东省高要市回龙镇的黎槎村，大概是第二个称为“八卦村”的。黎槎村成村于南宋，初时为周姓人居住，明永乐年间苏、蔡两姓族人从南雄珠玑巷迁至此处，逐渐发展为大姓。村子总平面呈圆形，直径约 200 米。

村子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月牙形大水塘。在两片水塘之间，村落有道路与周边相连。黎槎村民按宗族和房派分片居住，分为十个里或坊，苏、蔡两姓各占一半。每个里、坊开一坊门，门外有台阶通往低处的环村路。民居中间错落分布着 18 个祖堂。坊门外，分布有 9 个酒堂。酒堂旁边有古榕树及小广场、古井等公共设施。



黎槎村鸟瞰（徐晓东　摄）

从形态上看，黎槎村可以说比诸葛村更像八卦：第一，它的轮廓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圆形；第二，它的住宅是一排排的，横向布置，和构成八卦图案的一个个“—”或“--”很接近。

旅游部门也很好地利用并发展了黎槎村的八卦形态。在村中心的空地上，有一个八卦形的石坛。游客们来到这里，导游都会动员大家在这个八卦坛上正着走三圈，再反着走三圈，说是可以消灾祈福，升官发财。这个八卦坛显然是新修的，因为它做得太真实、太具体，从而太缺乏意象，不符合我们古人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的思维特点。旅游部门挂在八卦坛旁边的标识牌，也泄露了“天机”。这块牌子明明白白地说了：此处原有几棵古树。



黎槎村（罗德胤　根据高要市政府提供的地图绘制）

古树就对了！南方的村子，大多讲究风水，尤其看重背后的靠山。靠山上要有树林，叫风水林。黎槎村的地形中间比四周略高，中间的树林就是村子的风水林。

黎槎村的洪水

黎槎村的建筑为什么是一排排的，从中间向外拓展呢？这就要说到它的地理环境了。黎槎村所在的区域，地势平坦、水网密布，中间有珠江第一大支流西江穿流而过。除西江干流外，这里还有新兴江、宋隆河等多条支流。高要市回龙镇的村庄大都是水塘面积多过田地的。丰沛的水源和平

坦的地势，造成水患频发。在 1975 年建成宋隆河大堤之前，这里几乎年年发生水灾，水位经常到达各里坊门的屋檐。

经常遭水灾的黎槎村，很多人家都备有一艘木船，一旦涨水就划船到附近较高处的“牛围屋”去避难。“槎”字，就是木筏子的意思。村民们传说，水灾时只有屋顶露出水面，就像一片片筏子，所以村子就叫“黎槎”。

对于洪水，黎槎村民除了随时做好避难准备外，他们在村落结构和建造技术上也有独特的应对方式。首先，黎槎村先民选择了排屋这种建筑形式，因为它平行于洪水所形成的岸线。由此，黎槎村也就形成了一排排建筑逐渐内缩的村落形态。这种村落形态在广府地区是特殊的。广府村落普遍采用“梳式”布局，其特点是三间两廊的小三合院民居前后相连，如同糖葫芦串，每串“糖葫芦串”之间是笔直的巷道，“糖葫芦串”的前端多为祠堂或书院等公共建筑。可见，梳式布局是垂直于洪水的岸线的。

如果采用梳式布局，那就意味着位于前排的建筑比后排的更易于遭水淹。采用横向布局的排屋，虽然并不能解决被水淹的问题，但它可以解决公平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让村民们在洪水面前人人平等。要理解这一点，还要结合黎槎村特殊的居住方式。

住宅极小化

黎槎村的住宅极为狭小，房间多在 5 ~ 6 平方米。凡是到黎槎村参观的人，无不为这么狭小的房屋感到惊讶。和其他广府村落一样，黎槎村以核心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不过，黎槎村的住宅在使用方式上却相当特殊——家庭功能被打散到一个个小房间里，几乎每一个房间都对应着一项

功能，而且这些房间的分布极为分散。比如现任村支书蔡赞源回忆他小时候的住房：祖堂（仁和里上厅）的两间廊房给祖母住，一间卧室，一间厨房；祖堂下方的一排房屋中有两间房，一间是爸妈住，另一间给他和兄弟们住；再下方的一排房屋中又有两间房，一间是爸妈的厨房，另一间给兄弟们住；在仁和里的坊门之外的左手侧，还有两间房，一间是柴房，另一间是牛棚；房屋总计有八间。蔡支书说，他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是属于比较差的，有的人家有十几间房，分布得也很分散。



祖堂一般为三间两廊式布局（罗德胤　摄）

黎槎村民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的居住方式，和洪水有关。房间的面积小而统一，就具备了极高的适应性——每一个房间都可以随时转为卧室、厨房、柴房、牛栏或猪圈。因为每一家人都是既有高处的房间，也有低处的房间，所以在部分房屋被洪水淹没之后，仍有其他房屋可以继续使用。这样既解决了公平性的问题，又使得主要功能房屋尽量不受洪水影响。当然，这种交叉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在客观上增加了村民的交往机会，这有利

于保持家族或整个村集体的团结和凝聚力。同时，这也体现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房屋的面积、位置、朝向等都差异不大，家庭经济状况只体现在房间的数目上。超强的宗族集体凝聚力，是靠抹平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来获得的。

解决了公平性的问题还不够，还得解决技术问题。黎槎村至少有一半的房子是经常被水淹的。如果这些建筑没有很好的耐水性，就得经常重建，这无疑是极不方便的。黎槎村的建筑全部为青砖木构体系。青砖的耐水性较好，而且青砖的粘结和嵌缝材料是用石灰和桐油舂制的。在古代，这是一种用来密封木船的板缝的材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泡水后的坍塌危险。

祠堂的分化

根据住宅各项功能的重要性不同，黎槎村民们做了防洪位置上的区分。同样的思维也用在了祠堂建筑上。黎槎村的祠堂，祭祀和聚会功能是分开的，演变成为祖堂和酒堂两类建筑。祠堂演化为祖堂和酒堂，在黎槎村所在的回龙镇很普遍，但在全国的传统村落中则是很少见的。我们认为，这种分化也是源于洪水。越高的地方，遭受水灾的机会就越低。黎槎村所在的凤岗山，面积十分有限，住宅是天天要用到的，应该尽量往高里放。祠堂的祭祀空间，也就是祖堂，因为事关神圣，也要往高里放。于是，祠堂的宴饮空间就只好分离出来，放到低处，也就是外围去了。这就是酒堂。酒堂的面积也比较大，一般由三间的厨房和 5 ~ 7 间厅堂组成，有的酒堂还设有雅间。如果把酒堂放到高处，那就要牺牲很多户人家了，不划算。将厨房放到村子围墙之外较为空旷的地方，也减少了村内建筑遭受火灾的概率。



祖堂内的神龛将观音摆在中间，其两侧分别为财神和文曲星，再在两侧放祖先牌位（罗德胤　摄）



酒堂（罗德胤　摄）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孙娜. 黎槎“八卦村”：与洪水共生 [J]. 南方建筑，2014（1）：30–33.）

参考文献

[1] 蔡静文. 古村黎槎（手抄本）。
[2] 陈志华，李秋香. 诸葛村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 郑力鹏. 为什么要研究传统建筑防灾 [J]. 南方建筑，2008（6）.
[4] 高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要县志 [M]. 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1996.
[5] 周彝馨，李晓峰. 移民聚落社会伦理关系适应性研究——以广东高要地区“八卦”形态聚落为例 [J]. 建筑学报，2011（11）：6–10.
[6] 陆琦. 广东民居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7] 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肇庆市志 [M]. 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1996.

第五节

兴宁赏灯与围龙屋

2012 年 10 月，笔者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之邀，作为专家组成员对广东省兴宁市申请“中国围龙屋之乡”和“中国花灯之乡”进行了实地考察。

兴宁的围龙屋

兴宁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是纯客家县，而且是客家人聚居区的腹地。根据 2009 年兴宁市政府组织的摸底调查，境内有传统民居近 4000 座，其中围龙屋 2400 多座。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对这些围龙屋逐一核实的，但是从申请材料提供的详细清单和考察途中随处所见的一栋栋围龙屋来看，我们宁愿相信这一调查数据的真实性。现如今，愿意为文化遗产下大力气做调查的地方政府并不多见。即使是从鼓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也要对这一行为表示大大的支持和声援。

围龙屋是一种形制特殊的客家民居。它的平面一般呈椭圆形，由堂屋、横屋、围屋组成，前有禾坪、水塘，后有风水林。水塘、堂屋、化胎、龙

厅、风水林形成中轴线，也构成了围龙屋的祖宗崇拜空间序列。堂屋之后，龙厅之间，被围龙所包围的部分称为“化胎”，中间略鼓，向前左右三个方向下斜的曲面体，形如怀胎的母体。围龙屋的规模可大可小，小的仅两堂、两横、一围龙，中型的为三堂、两横、一或两围，大型的可以到四至八横、二至三围龙。

围龙屋的建筑以一层为多见，少数二层，这与福建土楼多为四五层是有很大差别的。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土楼位于客家人与闽南人的交界地带，历史上有更多的民系冲突，使得防御性成为建房时压倒性的考虑因素。而围龙屋位于客家人的腹地，不存在严重的民系冲突，所以不需要过多考虑防御性。



刁坊镇公路 225 沿线围龙屋线（来自 Google earth）

申报材料里总结兴宁围龙屋的特点是数量多、密度大；围龙屋主要集中在梅州市区域的兴宁、梅县和五华，而兴宁又是这三个县（市）中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地区。比如叶塘镇河西村的一对刘姓父子，就建有大夫第、磐安围、善庆楼、凤祥围等六个围龙屋。罗岗镇白水村刘鸿山父子共建有八个客家围屋。又如刁坊镇，沿公路 225 线不到三千米，就有刁萃丰、罗

永兴、黄宏昌、义隆围等十多座大型围龙屋。新陂镇上长岭不到一平方千米，就有新华楼等九个围龙屋。据卫星电子地图，福兴街道神光山前 2.53 平方千米范围内，有 52 座围龙屋；宁中镇李和美屋附近 2.53 平方千米有 44 座围龙屋。

两千多座围龙屋是什么概念呢？做一个很粗略的估算：假设一个围龙屋平均能住 100 人，那总数就是 20 多万人。兴宁市现在的人口有 110 多万，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时只有三四十万。兴宁的围龙屋都是 1949 年前建造的。也就是说，从人口数量来推测，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新中国成立前的围龙屋是大部分都留存至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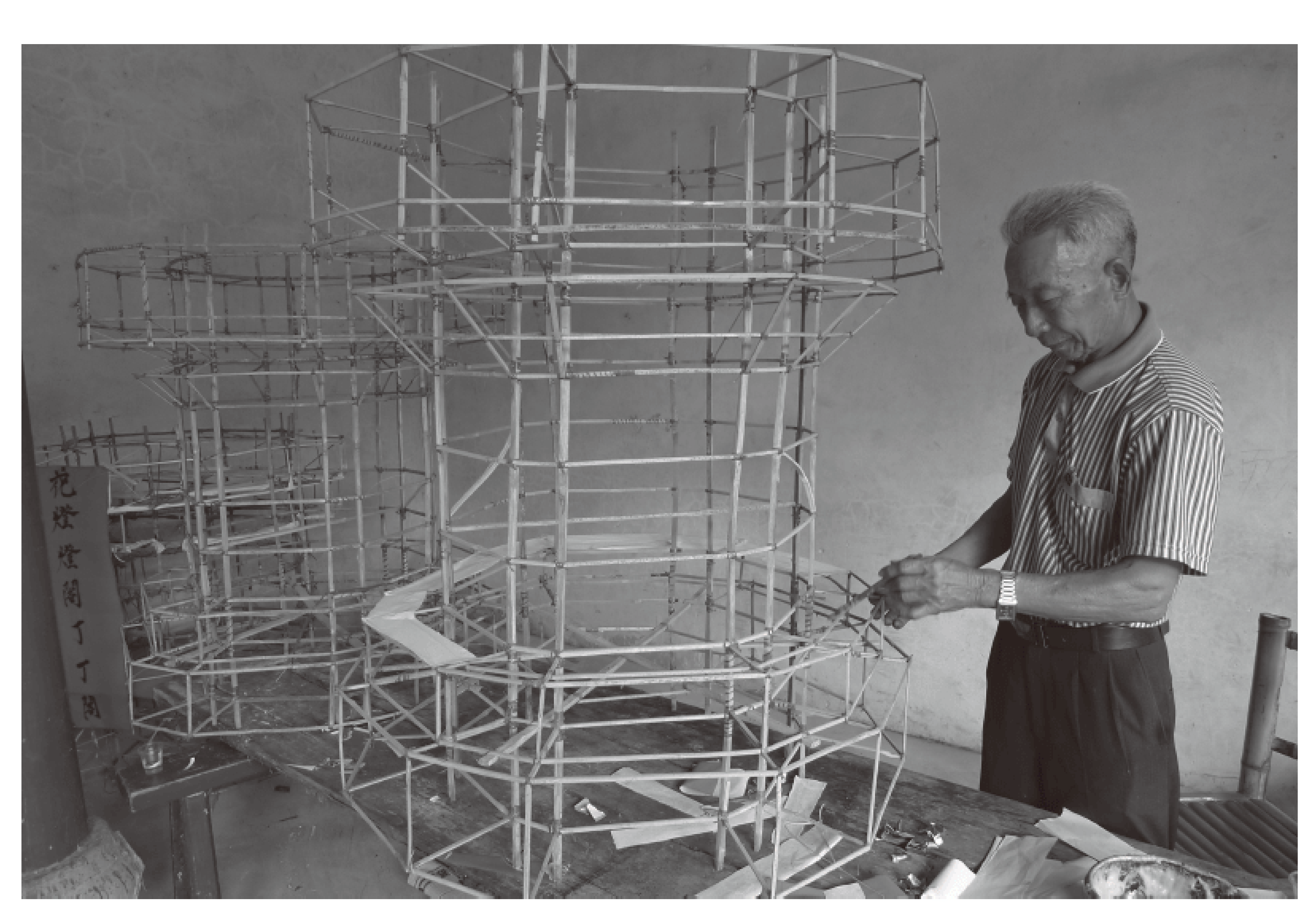
为什么兴宁会有这么多的围龙屋保留了下来？这是一个让专家们感到有意思甚至觉得有些困惑的现象。在城镇化浪潮如火如荼，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纷纷被夷平的大背影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兴宁评不评得上“围龙屋之乡”是没有影响的。光凭围龙屋的数量，兴宁就够格了。

兴宁的赏灯

接下来要考评兴宁的花灯。兴宁有赏灯的习俗，在每年的正月初八到十九举行，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过除夕和正月初一。花灯由专业艺人手工制作，分地区有不同的类型，如六角花灯、走马灯、观音灯、宝盖灯，现在还有艺人四十多人。

在旧时，赏灯是由族内灯会理事负责主持的，各项活动支出则由当年有新丁的家庭缴纳。赏灯的第一道程序是请花灯，即上街买花灯。兴宁的花灯制作精致，用竹篾做骨架，外面贴剪纸图样。买回的花灯，由族中两位未婚的青壮年男子抬回祖屋。抬花灯的竹竿用红纸缠绕，有象征吉祥、

节节高之意。同时，族人组成花灯护送队，沿路大放鞭炮，并有锣鼓队、龙灯舞狮队一路相随。花灯队伍经过的人家，屋主也要燃放鞭炮，同沾喜气。花灯接回祖屋的祖公厅，族人已悉数到场，再举行“升灯”仪式（旧为油灯，现改为电灯）。花灯上要挂上象征男丁的灯带，当年有几个男丁出生就挂多少条灯带，并放上利市、葱蒜、柏树等吉祥物（现多数只放利市），再挑上祖厅中的灯梁（通常为外金柱位置）。升灯时鞭炮齐鸣，龙灯狮子队一直绕花灯舞动。挂好花灯后也要在祖屋门前晒坪处举行舞龙舞狮表演。晚上灯会在祖屋办席，有的围屋还延请民间艺人和剧团进行表压。每家派男丁参加，并有赏灯、猜灯谜、猜马、烧烟火、放孔明灯等活动。族人众多的大围屋，几百盏孔明灯同时升空，场面蔚为壮观。当天中午时分，各家宴请亲友，有新丁的人家，亲友临门，带来贺喜之礼（亲友送礼必包括两样，一是串炮礼花，二是新丁穿戴的衣帽），更是充满喜庆气氛。



艺人在扎花灯骨架（罗德胤　摄）

上元节赏灯的习俗在中国很普遍，并且由来已久。“正月十五闹元宵”这句俗语，也点出了元宵节的重点是在娱乐。元宵节一过，也就表示年节结束。在客家地区，赏灯还有另一层意思。客家话里“灯”“丁”同音，“赏”“上”

同音。“丁”即男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是最被看重的。客家人作为后来族群，就更加重视男丁的繁衍。所以，赏灯，在当地直接被称作“上丁”，它的第一指向是生殖崇拜和男性崇拜。在客家人聚居的很多地区，都有过元宵节和挂灯的习俗。但是在兴宁，这种习俗又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在春节的一系列活动中，它成为超越除夕和初一的一个节日。



将花灯挂在大梁上，意为“上丁”（罗德胤　摄）

赏灯的习俗如此特殊，而且留存至今，还有那么多的花灯类型和手艺人。所以，兴宁也毫无疑问是符合“花灯之乡”的评选条件的。于是，在2012年年底，兴宁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时授予了“中国围龙屋之乡”和“中国花灯之乡”两个称号。中国民协举办民间文艺之乡的评选已有些年头了，但同一地点又同时被授予两个称号却是罕见的。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另有玄机？这是兴宁又一个让专家们感到有趣的现象。

围龙屋与赏灯的耦合

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是，赏灯的灯是一定要挂在围龙屋的上厅里的，不能换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围龙屋也是有强烈的生殖意味的——围

龙屋的化胎，形如怀胎的母体，明显指向了生殖崇拜。在这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赏灯习俗，和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围龙屋，形成了高度的耦合关系。



磐安围化胎（周丽娜　摄）

这种耦合关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兴宁的地理说起。兴宁境内有宁江河穿过，形成了一个盆地。这是广东省面积最大的盆地之一，地形平整、气候适宜，农业条件十分优越。因此，兴宁的农业开发非常早，也比较发达。另外，兴宁地处客家腹地，社会一直安定，少有战争侵扰。这一优势是其他客家地区所没有的：客家南部如惠州、深圳，与广府人、潮州人犬牙交错；东部如龙岩，与闽南人争接；西部如韶关，也与广府人杂处；北部如赣州，则与汉族的主流相邻。可以说，兴宁是客家聚居地里少有的宜居、利于繁衍的福地。

因为农业条件和社会治安比较好，兴宁这个宜居之地可能早在明中叶

就已经达到田地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多余的人口面临就业的压力，而农作物生长的季节性，使得农业出现了农忙和农闲的季节变化，这又使得农闲时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就业的问题，不少兴宁人开始搞起了商业。兴宁地处粤东北，毗邻赣东南、闽西南，交通便利，是该地域与广州、潮汕等沿海地区经济往来的门户。南方沿海也以兴宁为中转站，与粤赣闽边境发展贸易往来。明末清初时兴宁城已经成为盐埠，年转销潮盐达六七百万斤；鸦片战争后，销往粤赣闽边的舶来品大多通过兴宁转销，而这一地区的粮食山货等农畜产品，也是经兴宁转销沿海。

大约从清中期开始，兴宁人就到周边地区做买卖，小商贩日益增多。据《兴宁县志》载："商贾大猎肆，小负贩，经日营营，作客多贸易于川口湖湘间。"在广东东江、西江、北江、韩江一带市镇，兴宁的小商贩很多；甚至赣粤湖湘各省的僻远圩场，也不乏兴宁贾人的踪迹。"无兴不成市"之说确非虚言。

不过，兴宁人从事的都是相当初级的商业，规模大多很小。有人形容兴宁人是"一条裤带一担货笼，走遍天下"。很多人在十二三岁的年纪就捧着篾制小箩盖，盛着针线、头绳棉纱、笔墨纸簿等去各地圩场贩卖；或者用自制的麦芽糖换取农家零散的鸡毛等，收集起来再转卖给做鸡毛掸子的。他们依靠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养活了一家老小。

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就逐渐形成了鼓励外出谋生的观念。那些老死乡间，不敢外出谋生的人，常被人讥笑为"守灶公角"或"臭牛骚"（即驾牛耕地）。清末《兴宁乡土志》载，全县"户约二万四千五百有奇"，其中从事农业的 10 万余人，织布等手工业者 5 万余，经商贩运者 4 万余。而 1946 年县政府人口调查，兴宁常住人口 38 万多人，其中靠内外经商或从事小商小贩为生的有 10 万余人，占四分之一强。

这样的小生意，过年过节正是忙碌的时候。兴宁的生意人都不舍得放过这个赚钱的黄金时间，他们要忙到正月初五之后才会启程返乡。春节是

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最重视的节日。过春节时，通常是亲戚们各家轮流过的。除夕、初一是自家团圆，初二之后要走亲访友。在很多地方，哪天到哪个亲戚家都有固定的安排。到元宵节这个“终点”，又是自家人一起过了。

兴宁的生意人，除夕到初五那几天是在外面过的。这个春节就等于没过，得补！怎么补呢？用元宵节来补。于是，兴宁的赏灯是分散在正月初八到十九的十天里的。各围龙屋是一个赏灯的小群体，“老屋家”的赏灯时间必定在“新屋家”之后，所有新屋家的住户也有资格参加老屋家的赏灯活动。也就是说，兴宁的元宵节与春节被“合并”而且拉长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春节和元宵节。

围龙屋的祖厅多为三至五进、面宽三间的布局，用于祭祖、红白事摆酒等。这是围屋的核心和精神中心，也是主要的公共空间。时至今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客家人逐渐搬出围屋搬上楼房，一些公共功能也有了替代的场所。比如结婚可以选择在高级酒楼，白事也可以选择自家的客厅或殡仪馆。唯有赏灯仪式，必须在祖厅举行，没有其他场所能替代。



焚香祭祀（罗德胤　摄）

兴宁有很多人定居在外地甚至国外。这些人生了儿子之后，不管多远，也多半要按惯例回老家去赏一次灯，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作者之一的罗德胤，是出生在海南岛，但祖籍是兴宁的客家人，年幼时因为经济条件的缘故，长辈们有探亲钱而无摆酒钱，只好一次次地把赏灯的任务拖后，以至于老家的亲戚们总是问我们家几时可以“赏老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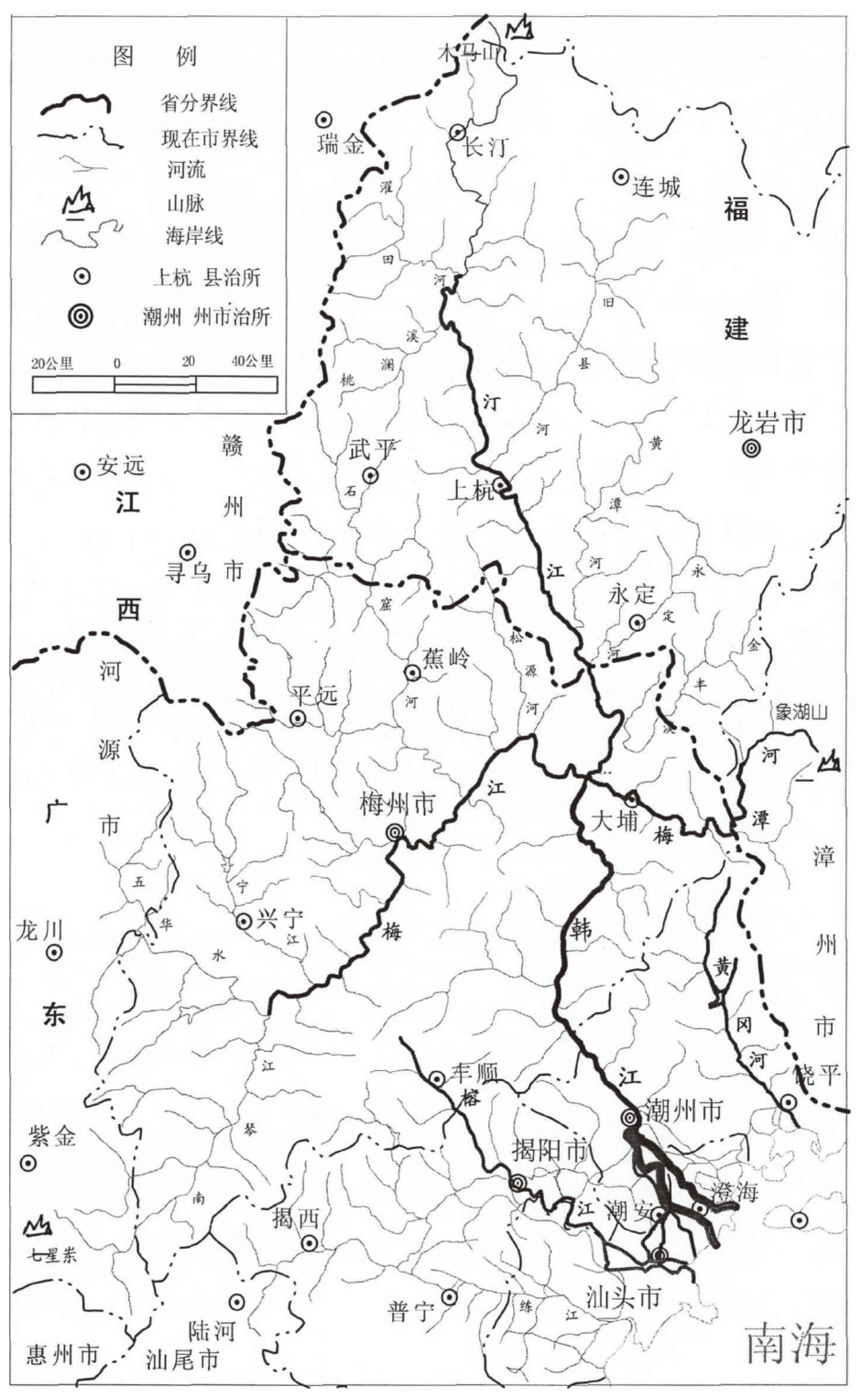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孙娜. 兴宁赏灯 非遗拯救了传统建筑 [J]. 文化月刊，2013（11）:30–35。）

第六节

韩江上游客家传统村落的分类研究

梅州几乎可以算作一个纯客家地区，同时又是个侨乡。清末以来，越来越严重的耕地不足迫使梅州的客家人下南洋寻找生活的出路。这两个因素对梅州的传统村落和乡土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闽、赣、粤三省交界这一带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然而由于五岭的阻隔，在各地定居的客家人并无频繁的往来，这也使得福建、江西和广东的客家乡土建筑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点。

梅州地处韩江上游，对水路交通的依赖，使得梅州同潮汕地区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梅州下南洋，一般从松口圩镇坐船沿梅潭河顺流而下（梅州到汕头的水路途径之一），在三河坝汇入韩江，到达汕梅州盛产的各种山货和木材也通过韩江运到下游的潮汕地区进行交换，潮汕地区的私盐和一些外来物产则逆流而上，到梅州地区销售。这种人和物的交流、交换使得梅州与潮汕地区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为两地文化的相互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



韩江全流域图（周丽娜 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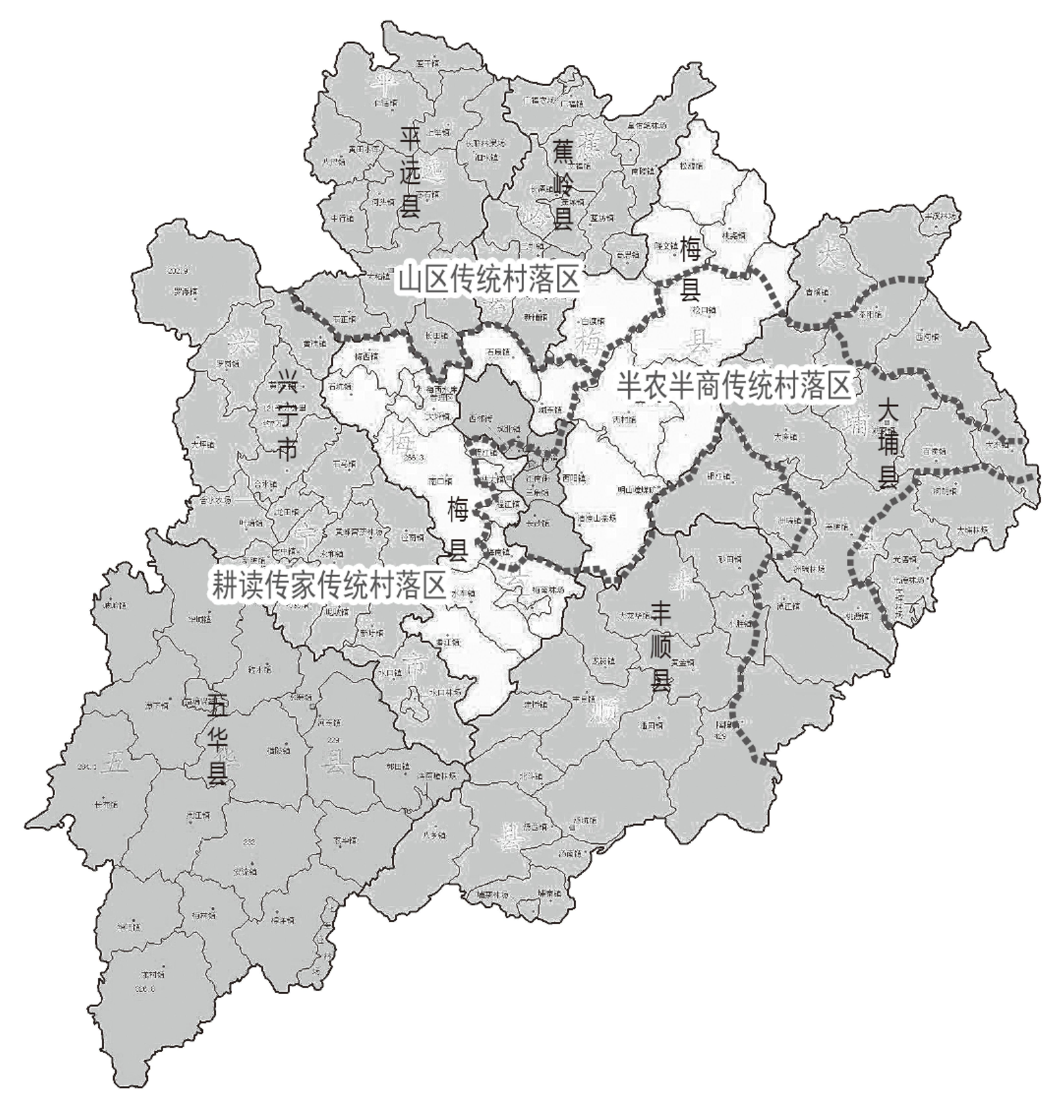
梅州地区的客家传统村落以围龙屋为最显著的特点。围龙屋的占地规模很大，由几十个至上百个房间组成，它是大家族集体聚居的集合型住宅，中轴线上布置有堂屋，是祭祖的地方，两侧布置横屋，是居住用房。围龙屋前面有半月形水塘，堂屋后有半圆形、隆起的“化胎”，化胎后面有马蹄形的围屋，围屋后有风水林。围龙屋的个体完整性很强，它们彼此不相邻，保持着较大的距离，屋与屋之间是农田，没有街巷空间。这种松散的格局形成了开阔的村落景观特点。

清末，大规模的下南洋活动和与潮汕地区频繁的物资交换，都对梅州地区的客家传统村落格局和建筑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深度，视村落与水运码头的区位远近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紧邻水运码头的村落受到商业文明的影响较大，村民除了从事传统的农业劳动外，也有大量经商和下南洋的，这些人的思想开放度高，带回了大量外来的建筑风格。同时，由于土地资源有限，这些村落空间也逐渐从松散向密集化发展。离水运码头有一定距离，且地势平坦的村落，大多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农耕生活。这些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耕作优势，是客家传统村落格局发育最完整的片区。梅州地区还分布着大量的山区，在这些交通不便的山区里也存在着大量客家村落，这些传统村落受地形所限，大多沿等高线布局，分布十分狭长，乡土建筑的质量也不高。

水运码头周边的传统村落

梅江、梅潭河和汀江这三条河流是韩江上游主要的支流，它们在大埔县三河镇汇合后称为韩江。沿着这三条主要的支流和韩江干流，曾经分布着一些客家人下南洋的大码头，如松口镇的火船码头、三河镇汇城码头和大麻码头。繁忙的贸易商品往来影响了码头周边的村落，这三条河流两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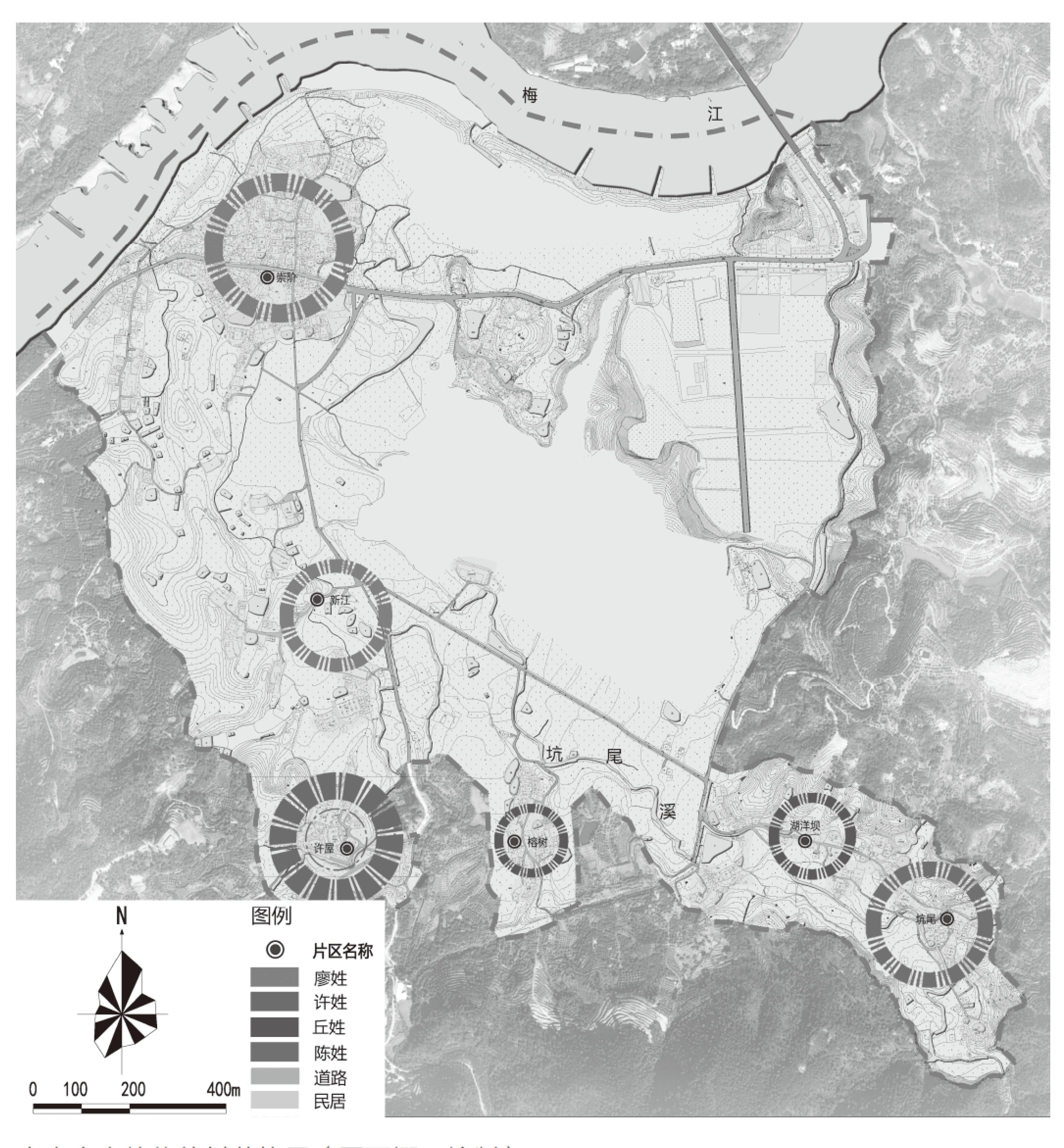
的传统村落除了从事传统农业外，也有大量村民从事商业活动，可以说这些传统村落是梅州地区较早逐渐摆脱农业束缚，开始萌发商业文明的村庄。这些传统村落大多分布在河道沿岸的滩涂平地上，具有多姓氏杂居的族群特点。受到商业文明的影响，这些村庄既保留了客家人重视家族传承的特点，又对外来姓氏和外来文化具有较高的接纳度。反映在村落物质空间的聚居形式上，常常是一个不大的村落有着七八个，乃至十几个姓氏。这些



梅州传统村落分类（周丽娜　改绘）

不同的家族混居在一起，在物质空间上没有明确的家族划分，客家传统村落以家族聚居的聚落特点在这里的体现十分微弱。

在建筑单体特征上，这些半农半商村落的传统建筑逐渐向小而精致发展，这也体现出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这些村庄从传统客家的大家族聚居向小家族独立生活转变，建筑遗存以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为主。传统客家建筑遗存以堂横屋和围龙屋为主，堂横屋一般是三堂两横的形式，围龙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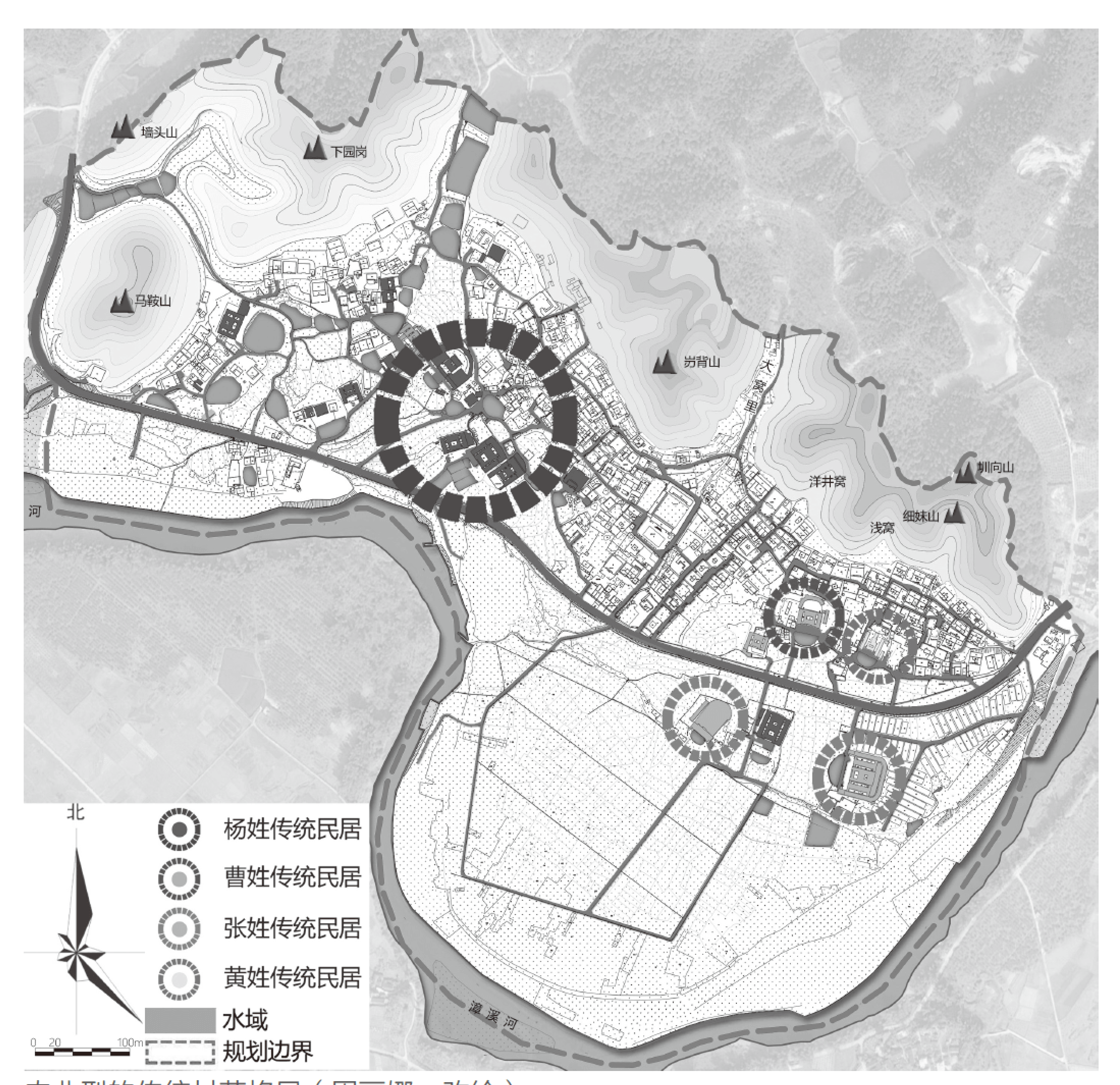
半农半商的传统村落格局（周丽娜　绘制）

常有三堂两横一围龙和三堂四横一围龙两种平面形式。民国时期的建筑遗存大多为南洋建筑风格，装饰题材和建筑材料都源自东南亚地区，这些南洋建筑大多是下南洋的华侨发达后回家乡建设的。这些传统村落除了建筑遗存以外，还留下了许多当时村民从事商业活动的见证。例如在大黄村，不长的河岸线上分布着 3 个规模不大的码头，每个码头都有一对河伯公婆保佑村民往来经商旅途平安，在较大的一个码头上还有一座民国时期修建的凉亭供在此等候渡船的村民休息。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半农半商的传统村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村民虽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但已经不需要靠天吃饭，以韩江为依托的商业文明对村庄的聚居形式、单体建筑的特征，以及构筑物要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业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

以耕读传家为特点的梅州传统村落是梅州地区分布最为广泛的一种传统村落类型。耕读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乡村文化，在梅州地区得到了极好的传承和体现，在这些传统村落极为重视教育，至今仍有在村里极有影响力的乡贤。这些以耕读传家为特点的乡村大多分布在农业相对发达的平原地区，这里虽不是航运干线，但水网密集为对外交通和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优越的农业条件为读书取士造就了物质基础。这些传统村落大多还遗存着清代传下来的夹杆石，上面记录着村里的读书人获得功名的情况。

这些以耕读传家为特点的村落保留了客家人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最典型的村落形态特点。以大埔县北塘村为例，该村主要有四个姓氏：杨姓、张姓、曹姓、黄姓，这四个姓氏虽然同处一村，却有各自的家族领地，虽无实体边界，由于家族血缘形成的无形边界却十分清晰。在聚落形态上，这类传统村落一般以每个姓氏最老的围龙屋为发展核心，各个姓氏



农业型的传统村落格局（周丽娜　改绘）

沿围龙屋外围呈扇形扩展。仍以北塘村为例，最早在该村定居的曹姓老屋继述堂建于明代，它前有禾平和半月形水塘，继述堂东西两侧和背后陆续建起了后世子孙的房舍。稍晚一些搬来北塘村的杨氏就更为明显，最早的志事堂和它周边的谦受堂、济美楼都是清代建筑，再向外围一点的崇德堂、继志堂等则是民国时期修建的，在这一圈层以外，分布着更晚时期的一些传统建筑，它们体量较早期建筑小一些，逐渐向山坡上发展最终形成了如今的村落形态。最初是围绕一个或几个发展核心为中心的组团式发展，随着家族的壮大，逐渐形成了沿等高线或河道带状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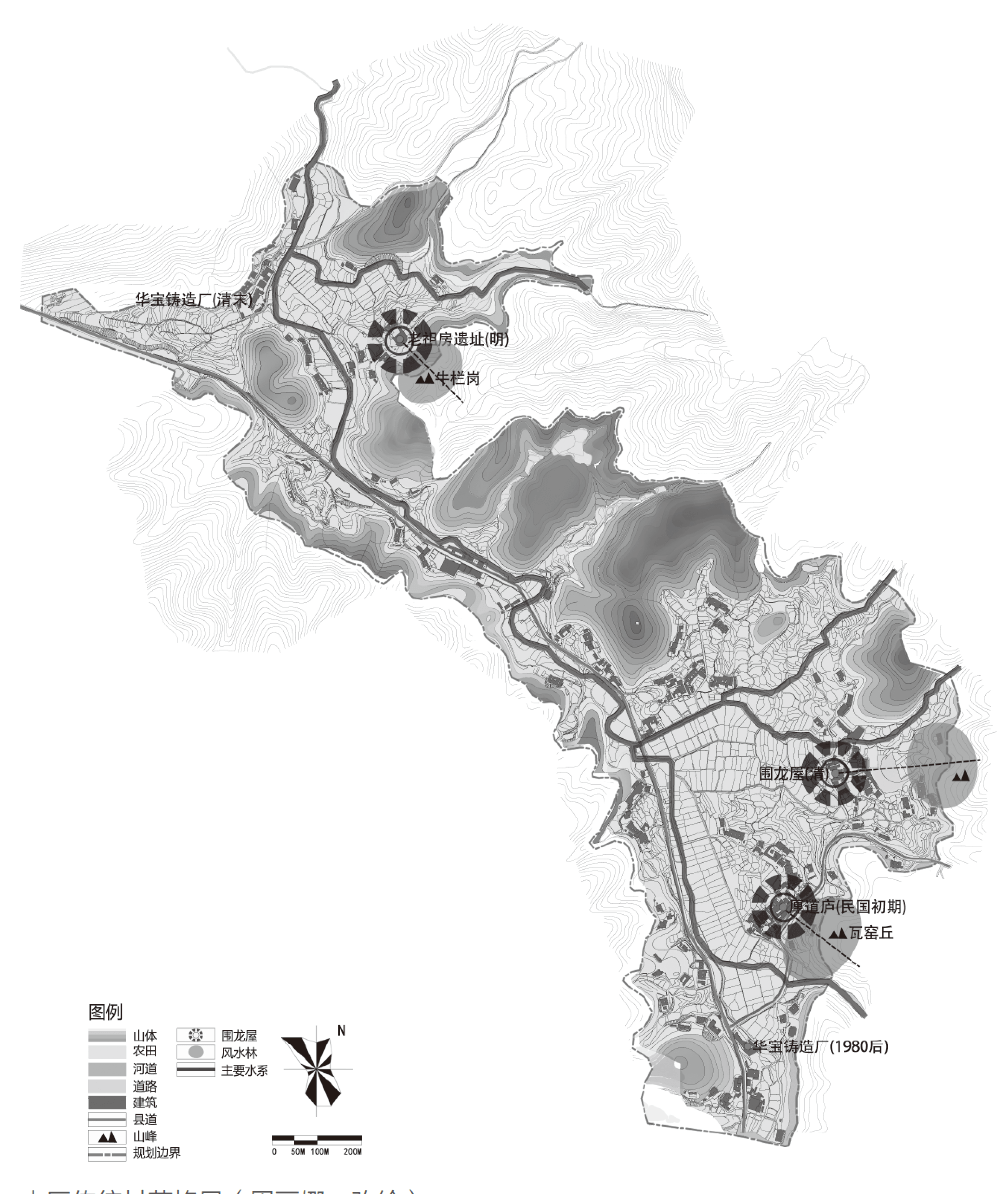
的形态，为优先发展农业，最平坦富饶的土地一般作为农田，房屋则建在靠近山脚的缓坡上，一般最老的祖屋位置最佳，后世子孙的房屋在祖屋周边向山坡上发展。这些布局特点体现了客家人重视农业耕作，尊重祖先、重视家族与血脉传承的特点。

在建筑单体特征上，这些以耕读传家为特点的梅州传统村落大多保留了梅州地区最为传统的围龙屋。早期的围龙屋举高较低、房屋建筑质量较差，清代中晚期的围龙屋则变得高大明亮，规模也较大，常常出现两三层围龙，例如兴宁上长岭村的乌坭围、梅县侨乡村的兰馨堂。在装饰特点上，位于不同文化区域的村落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大埔县传统围龙屋的主要木构件上出现了潮汕文化中海洋主题的装饰符号，而兴宁地区的传统围龙屋则较为质朴、较少装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除了传统的围龙屋以外这些村子还存在南洋建筑。梅州作为典型的侨乡，华侨发达后回乡建房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除了带回南洋的建筑材料，还带回来南洋建筑风格。然而，与商业发到地区的南洋建筑不同，这些农耕文化发达地区的南洋建筑更多地保留了客家传统建筑的特点，尤其是在平面布局上，基本采用了堂横屋和枕头屋两种形式，仅在装饰母题上采用了南洋的形式。这里的人们靠辛勤的农业劳动换来了富足的生活，他们强烈地依附并热爱着自己的土地，这种对于土地极高的依赖性使得他们对客家文化中重视家族传承、尊重祖先的传统认同度角极高。这些文化上的特点反映到物质空间，就表现为大规模的家族聚居、规模宏大的围龙屋或围楼。

山区的传统村落

梅州的大地理呈北高南低的走势，由于五岭的阻隔，在地理空间上与

中原地区显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梅州北部大部分为山区，这些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缺少耕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虽有河流水网，但大多不能通航，起伏的地形也使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十分困难，因此历来便是经济落后地区。这些传统村落虽然处于韩江流域范围，但是由于水网不发达，常常



山区传统村落格局（周丽娜　改绘）

是翻山越岭、靠肩扛手挑到较远的码头下南洋或进行商品交换。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多靠出卖体力为生，例如平远县的纤夫至今在梅州的老人口里都十分著名。这些山区的传统村落分布在梅州北部，除具有梅州本土客家特点外，部分村落还表现出赣闽客家村落的建筑特点，在蕉岭和大埔县都出现了三四层的夯土围楼，其中以大埔县的花萼楼最为著名。在文化特点上，它们表现出更为原始的客家文化特点，从目前的建筑遗存看，这些客家村落是梅州地区最为依赖家族力量的。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村落分布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需要凝聚家族的集体力量最终才能战胜自然，顽强地生存下去。

在聚落形态上，山区的村落一般呈狭长的带状形态，常常是一个村落绵延几千米，这种形态是与自然妥协的结果。这些传统村落除了遵从地形分布外，还表现出家族聚居的特点，虽然由于地形的限制，很难出现大规模的血缘聚落，家族还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表现出了聚居的趋势。在建筑单体特征上，山区的梅州传统村落表现出比较单纯的客家传统建筑特征，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类型上主要有围龙屋、堂横屋、杠屋和枕头屋，根据村庄所在的地形不同，建筑规模差异较大，然而大部分传统建筑都以实用为主、较少装饰、风格质朴。综上所述，梅州北部山区的客家传统村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保持了较早期梅州客家村落的特点，可以说是早期客家村落的典型。

结语

本文将梅州的传统村落划分成三种类型，基本上是循着韩江为线索，按照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梅州传统的行政区划进行划分的。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分类方式并非完美。比如，每个片区的交界地带都会存在一些难以明确归类的传统村落。对于这些传统村落，我们需要加强它们

与两边腹地的典型村落对比研究，这不但会使各自特点都更为突显，也会使梅州地区的传统村落研究更加完善。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对梅州的传统村落进行分类比较研究，便于我们深入了解梅州客家村落之间的差异。

（本文发表于：周丽娜，罗德胤. 韩江上游客家传统村落的分类研究[J]. 南方建筑，2016（1）. ）

第七节

观前：三个小村，三种职业

观前村位于福建省浦城县，是闽江上游的一个码头。由观前村逆流北上 23 千米，就到了县城南浦镇。由南浦镇的码头再北上转入旱路，就进入了仙霞古道。仙霞古道全长约 120 千米，是古时沟通浙闽两省的一条交通要道。

钱塘江水系和闽江水系都是我国重要的水系，在古代它们分别是浙江省和福建省的交通命脉。钱塘江水系孕育的钱塘江流域，和闽江水系孕育的闽江流域，又是我国两大富庶的农业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有相当程度的互补性。以泉州为代表的福建海港，和以宁波为代表的浙江海港，自唐朝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钱塘江水系和闽江水系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那就是仙霞岭。它是钱塘江和闽江的分水岭。跨越仙霞岭而沟通浙闽两个富庶的经济区的旱路，就是仙霞古道。

位于江山城关镇南 7.5 千米处的清湖码头，和浦城县城南浦镇的南浦溪码头，是仙霞古道的起点和终点，因为它们是钱塘江和闽江水运的起讫点。从钱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运载着江南出产或转运的物资，源源不断

地驶入江山港，这些物资在清湖码头卸下，转成旱路，连同江山本地物产，由挑夫肩挑，或被运到清湖南面仙霞岭山区各集镇，又或运到更南面的福建浦城，在那里的码头再下南浦溪，入闽江水系。而从福建各地经闽江运抵浦城码头的物资，连同许多浦城本地物产，也由挑夫肩挑，翻越仙霞岭，除部分供应沿途集镇外，其余都运到清湖码头，再沿江而下，抵达钱塘江中、下游各地。

仙霞古道在为浙闽两地交流创造条件的同时，沿途也诞生了一批富有特色的码头、集镇和村庄。从清湖码头到浦城南浦镇，行人一般须两三天，挑夫则要四五天。仙霞岭路的运输业，不但给农闲的农民们提供了挣钱的机会，也刺激了沿途各集镇和某些村落，甚至某些庙宇的商业发展。江山的清湖、石门[1]、峡口、廿八都和浦城、渔梁、仙阳、南浦等地，在为过往客商及挑夫提供食宿与交易场所的同时，也结合各自的自然及社会条件，成长为较大型的集镇或商业性聚落。沿途的一些村落内，或因仙霞岭路穿村而过，或因从仙霞岭路上分出的运输支线穿村而过，也形成了规模比集镇小、但却远胜于一般农业村落的商业街道。途中的一些庙宇，也很善于“因势利导”——它们在满足过往客商和挑担者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时，也为自己谋得发展良机。清湖南面约 7 千米的昭明村的保乡殿[2]，占地面积约 600 平方米，但神灵大多集中在面积约 100 平方米的正殿内[3]，其余面积全部用于经营茶馆。枫岭关旁的关帝庙，中堂东南侧有面积达 50 余平方米的厨房和餐厅，常为路人提供膳食。五显岭上的五显庙（后亦称吉祥寺），除中间有五显大殿和大雄宝殿并列外，其东侧有两层共二十二间

1　石门街距离清湖镇约 8 千米，从清湖出发的挑担者，常在这里吃午饭。

2　门前有溪，溪上有桥，名“昭明桥”，为仙霞古道必经之处。据清同治版《江山县志 · 卷一 · 桥渡》，该桥创建于宋代，多次重修。

3　根据现在村民贴的神灵牌位，正殿内的神灵有“原始诸佛”、观音（及童男童女）、关羽（及关平、周仓）、地藏、如来、韦陀、魁圣和叶氏凤姑，正殿之外的神灵只有 1 位，即跨院内的松子娘娘。

的居室，既是僧房，也是供“挂单”[1]或旅客借宿的客房。

由于南浦溪季节性暴涨暴落的山区溪流特征，闽江船只在一年当中只有部分时段能够溯江达到南浦镇。在其他时段内，它们只能行至南浦镇南面约 23 千米处的观前码头，在那里将货物卸下，之后或者转为旱路，或者分批装入载重量较小的竹筏上，运至南浦镇，再起岸北上仙霞古道。可以说，是南浦镇和观前码头，共同形成了闽江航运和仙霞古道旱路的转运线。

观前村的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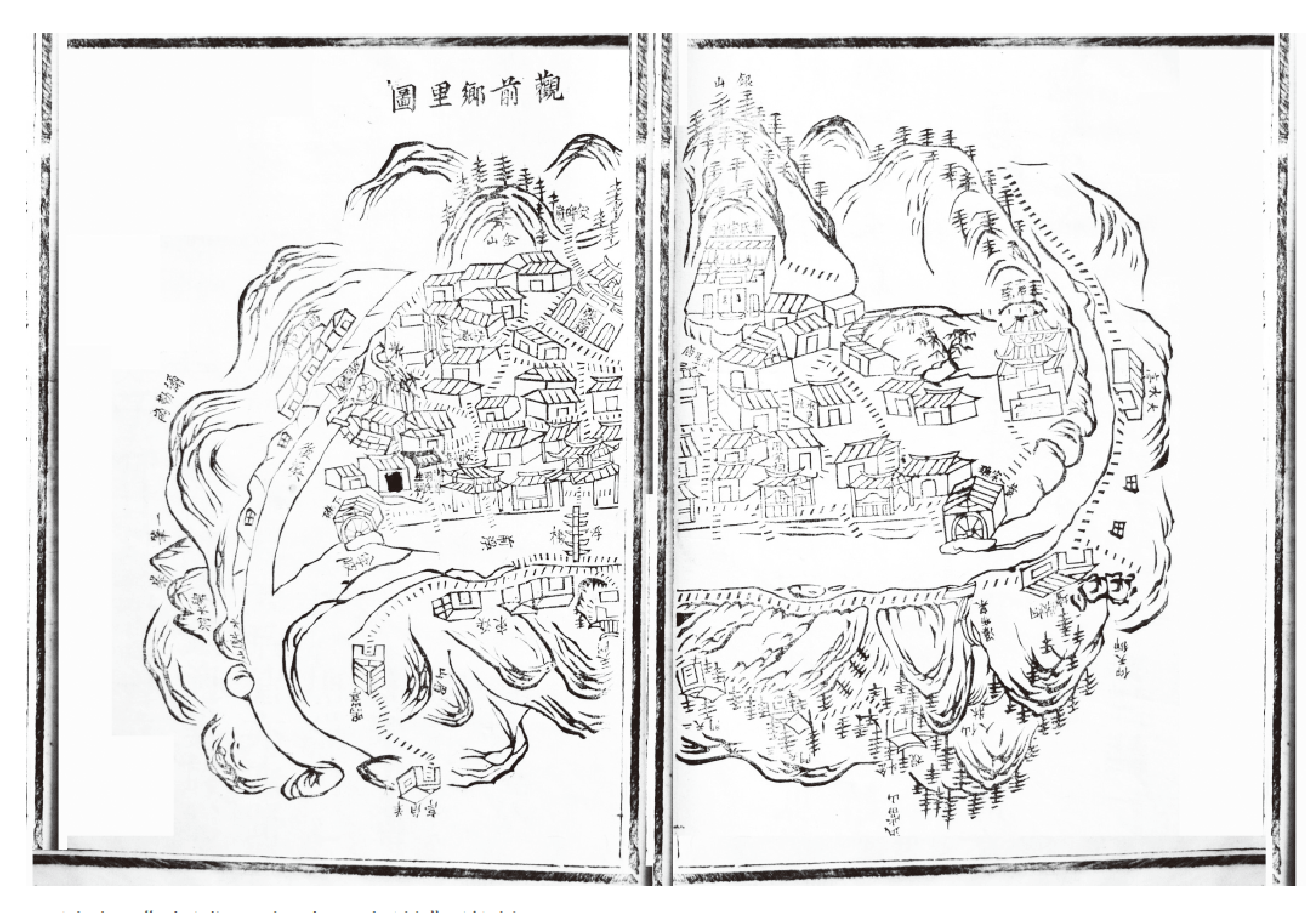
与江山的清湖、峡口和廿八都不同，浦城的观前不是集镇，而是一个村庄。它坐落于南浦溪的西北岸，东西向宽约 180 米，南北向长约 650 米，占地面积约 12 公顷，目前人口约 790 户，3300 余人。[2]村落与东南方的金斗山隔溪相望，金斗山上建有一座金斗观，观前村因此得名。

观前村所在的地理环境，并不适于农业耕种。村落四周山林较多，耕地较少，而且大多分布在距离村庄十里之外，种地者每天花在往返路上的时间，就要四五个小时。粮食产量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当地人常说：“一年粮食，半年吃完。”观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人烟密集的村落，靠的不是农业，而主要是南浦溪的航运业。在观前村的南面，临江溪汇入南浦溪。二水合流，使南浦溪的水量大增，溪面宽度由 100 米左右增至将近 200 米，更利于行船和放排。在观前村的溪岸设置码头，供船只和竹筏停靠，成为顺理成章的天然之选。

据《浦城县志》载：“1951 年观前码头上有木帆船 92 艘，竹排

1　非本寺僧人在寺内寄居，称为“挂单”。但有时佛教信徒来寺内居住一段时间，也称“挂单”。

2　人口与耕地数据得自《浦城县志》（1994 年版，第 123 页）。如果算上四周的山地和田地，观前村的总占地面积约 30 平方千米。



同治版《南浦眉山叶氏宗谱》卷首图

151 张。”[1] 这个数据和观前村老船工徐保弟（生于 1936 年）的回忆有些出入。据徐保弟估计，1950 年前后观前村拥有船只的家庭有 100 多户；以每户有一艘船计，也有 100 多艘，还不包括那些临时停靠的过路船。

即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观前码头的转运业也可能未见衰退。作为闽江北源的一个规模较大的码头，观前是战争后方重要的物资转运地。1939 年至 1947 年，国民党政府在观前设立“水陆联运站”，它使得观前的水陆转运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而且，按照当时的政策，凡参加联运站工作的劳动力，可免予服兵役（时称“抓壮丁”），所以相比于其他地方，观前人口、尤其是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是比较少的，甚至还吸引了部分外地人举家迁入观前（他们指望在加入联运站之后，可以不被“抓壮丁”）。

观前码头的兴盛一直持续到 1958 年赛（岐）浦（城）公路修通。在那以后，汽车取代船只和竹筏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观前也不复往日的辉煌。

1　蒋仁．浦城县志 [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123.

人们常以“三山秀丽、二水交流”来形容观前村。这八个字既描述了它的地理环境，也概括了它的村落结构。“二水”即南浦溪与临江溪，这是观前村码头转运功能得以开展的前提。“三山”指的是观前村西面的三座小山，由南至北分别称作金山、银山和龟山。相比于四周的其他山岭，“三山”的海拔较低，坡度较缓，是方圆十里之内可供建房的少数地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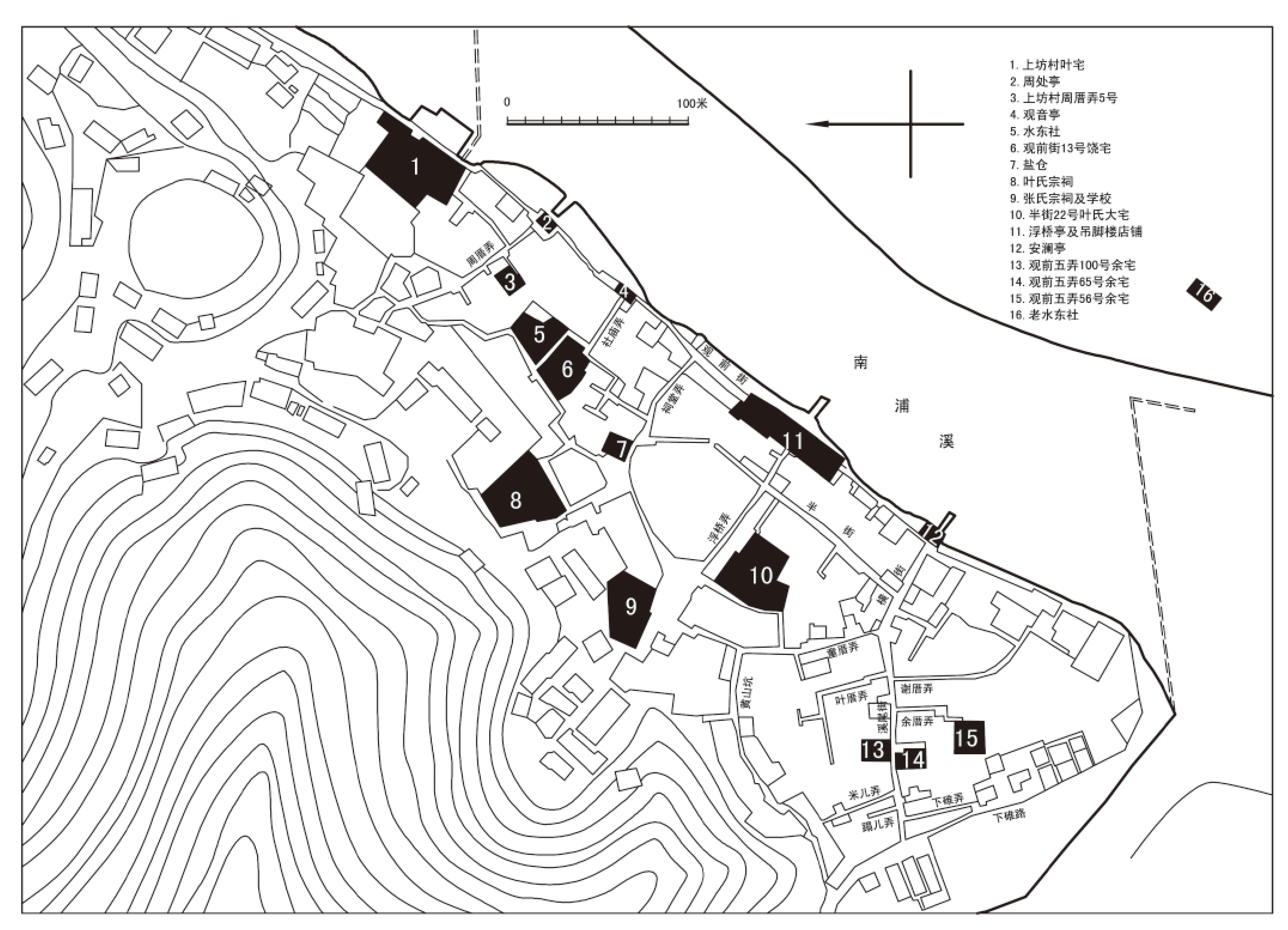


观前村（罗德胤　摄）

观前村的结构

观前村由上坊（北）、中坊和下坊（南）三个规模相当的小村组成，它们分别倚靠着龟山、银山和金山。三个小村目前的人口各约 300 户，1000 余人。从现状看，三个小村已紧密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在历史上，它们可能是相互之间有一定距离的三个团块。三个团块之内，分别居住着以周姓、张姓和谢姓为主的居民。这三个姓氏的宗祠，也分布在各自的团块之内。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外姓居民陆续迁入，尤其是叶姓人自后塘遭毁而迁居观前之后，三村之间的边界才变得模糊。叶姓

居民主要居住在中坊村内，叶氏宗祠则坐落在上坊村内西南侧的山腰上。



观前村总图（编号为测绘建筑）（张琳　绘制）

因“二水交流”而产生的水旱转运功能，是影响观前村结构布局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它决定了观前村码头和商业街道的分布。观前的码头有八处，六处分布在南浦溪的西岸。最重要的码头，是中坊村内的浮桥西码头。浮桥是观前居民与外界沟通的重要交通设施。浮桥西码头在充当观前村居民对外交通出入口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船只、竹筏装卸货物的主要码头。

观前村的商业街市，也正是以浮桥西码头为原点而生长起来的。商铺大部分分布在中坊村的前街两侧，以浮桥亭为中心，沿溪岸向两边各延伸40米至90米。与前街垂直并交汇于安澜亭的横街，以及横街之后的溪尾弄，也有一些商铺。



观前街现状（罗德胤 摄）

前街是观前村内最长、最重要的一条街巷，北至龟山脚下的天后宫，南至下坊村南端的饶家水碓，全长约 750 米。在前街上，分布着三座凉亭和一座浮桥亭。它们活泼而开放的建筑形式，与村内其他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浮桥西码头上的浮桥亭，高高耸立，堪称观前村的标志性建筑。凉亭的高度与建筑形制不及浮桥亭，但亭内设有宽大的坐凳，供村民们乘凉、闲聊，是观前村的社交中心。

中坊村内，前街的沿溪一侧是吊脚楼店铺，现存有 21 间，总长 60 余米。在码头繁华时期，这些吊脚楼以杂货店、饭店和豆腐酒店为主。吊脚楼的建筑优雅美观，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溪岸，这样更高处的坡地就可以用来建造住宅、祠堂和庙宇等建筑。在洪水暴涨的时候，吊脚楼的墙板、门板等构件都可以临时拆卸，以便水流通过而不将木结构推倒。吊脚楼店铺的“临时性”，既反映了当地居民在建筑技术上的灵巧构思，也说明观前码头的商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同样是坐落于溪边的清湖镇，其店铺就没有采用吊脚楼的建筑形式，而是选择了“板门店”或“墙门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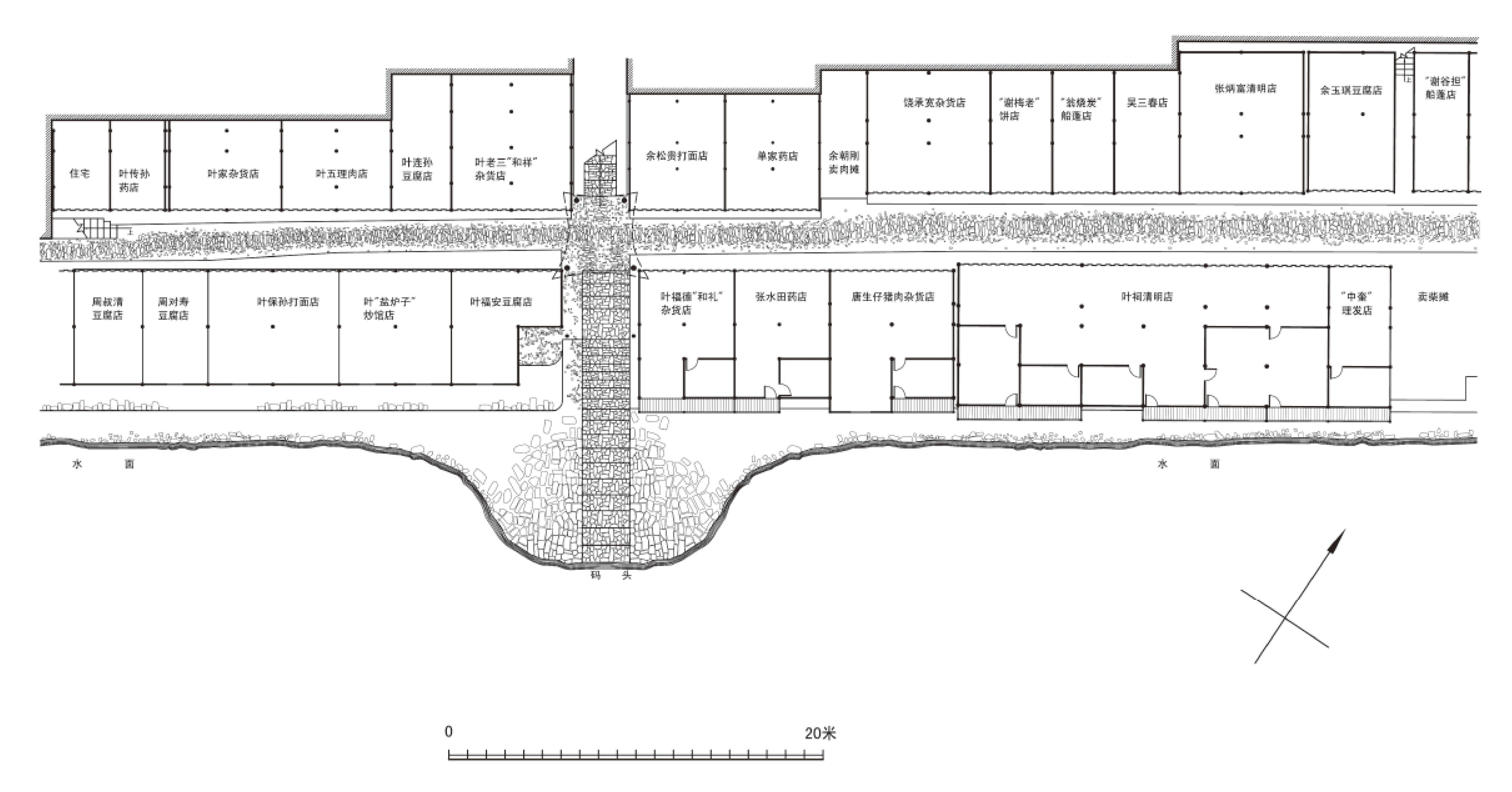
“板门店”的质量较低，“墙门店”的质量较高，两者都属于固定的建筑，不同于随时可拆卸的吊脚楼；而且，“墙门店”都分布在距离溪岸较远的上街，它们在防洪上受到的关照已超过一般住宅。



位于南浦城东郊的万安浮桥，现仍在使用（罗德胤　摄）

从中间贯穿中坊村、并与前街平行的“半街”，是观前村内另一条比较重要的横向街巷。与前街和半街垂直的巷道，主要的有五条，由南至北依次是横街（连着溪尾弄）、童厝弄、浮桥弄、祠堂弄和社庙弄。观前村人将村内的主要街巷和码头总结为“七街七埠头”。

观前村村民的主要构成成分，却不是农民，而是船工、排工、渔户、商人、手工业者、挑夫等“非农业人口”。观前村的“职业分布地图”大致上是这样的：南面的下坊村，最靠近临江溪与南浦溪交汇处，居民以船工为主；北面的上坊村，距离临江溪与南浦溪交汇处最远，居民以排工为主；商人、手工艺人和挑夫，则主要居住在交通便利的中坊村。渔户和纯农业户的数量较少，前者分散在中坊村和下坊村，后者在三个小村内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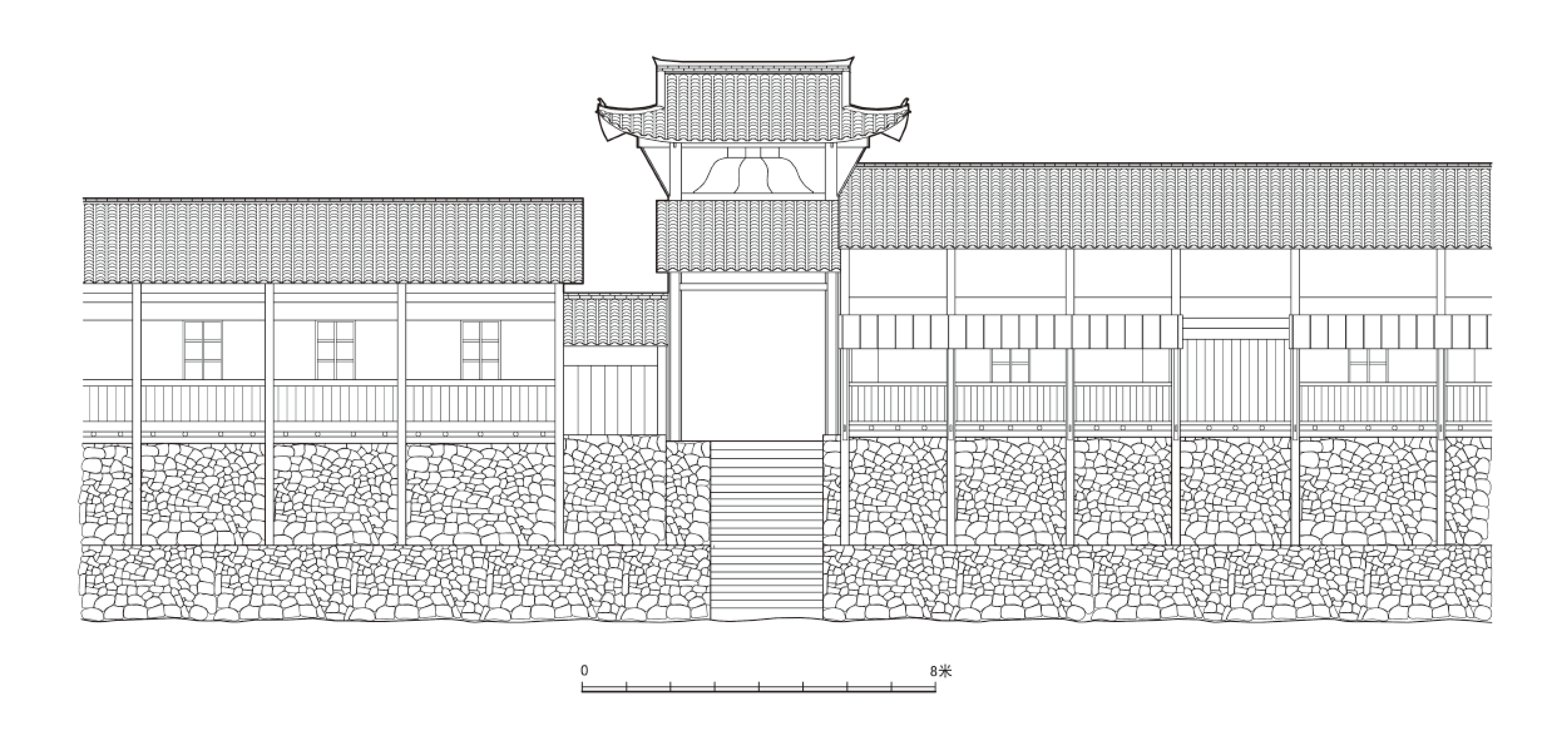


观前吊脚楼店铺及浮桥亭平面（张琳 绘制）

叶家杂货店 街道 叶"盐炉子"炒货店

0 7米

观前吊脚楼店铺剖面及浮桥亭侧立面（张琳 绘制）



观前浮桥亭正立面及吊脚楼店铺沿河立面（张琳　绘制）

观前村的建筑

从经济实力来说，商人是最富有的，其次是船工，再次是渔户、排工、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最差的是挑夫和雇工。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在住宅建筑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比如：观前村内的四座“大厝”，曾经都属于经商的主力叶姓人；家境较好的商人或船工的住宅，在格扇门、格扇窗、厅堂梁架和外墙面青砖数量上，都要强于一般人家；位于交埠岭的几十幢住宅，主人大多是贫穷的肩挑汉，它们的建筑质量也明显不及其他人家的住宅。

不过，总的说来，观前村的大部分住宅在外观和内部结构上是极为相似的，似乎没有哪一家明显好过别人家。它们都用大卵石做墙基，都以装饰很少的木梁柱做承重结构，都用大面积裸露、少部分贴青砖的高夯土墙做围护结构，都用青板瓦覆盖着进深较大的双坡顶。住宅建筑的差别性不大，反映出村民贫富分化的程度还不是很明显。



雨中的观前街巷（罗德胤 摄）

村民们似乎更愿意将钱财投入到祠堂和庙宇这两类公共建筑。祠堂和庙宇是观前村内质量最好的一批建筑，它们也体现了观前村高于一般农业村落的经济实力。祠堂有四座，即周、张、谢、叶“四大姓”的宗祠。庙宇有关帝庙、妈祖庙、水吉庙和水东社（上坊村）。祠堂和庙宇都位于位置较高的山坡上，远离水患。它们在建筑形制上也大体接近，都是由大门、戏台、正堂和两层厢廊等基本元素构成的四合院。

祠堂的建筑质量远胜于住宅，反映出观前旧时有较强的宗族力量。村里至今流传着民国年间一个名叫叶坤生的“惯偷”被他父亲以宗族的名义活埋的故事。为了保证宗族集体活动的正常开展，每个祠堂都有田地、山场或店铺等形式的祀产，称为“清明田”或“清明店”，因为清明节是祭祖的日子。浮桥亭北面的七间吊脚楼店铺，就是叶氏宗祠的清明店，由叶家四个房派轮值管理。

观前是一个杂姓聚居的村落。为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还需要一个超越于各宗族之上的公权力。“联首”为此应运而生。顾名思义，“联首”即

各宗祠的“联合首领”，由村内最有威望的人担任。清末民初时，有一位名叫“铃子伯”的联首，为了本村与曹村的田地纠纷，曾经率领几十人聚集在县衙门口，催促县官审理案件。

观前村内的庙宇，其建筑形制和祠堂类似。不同的是它们供奉的对象，祠堂供祖先，庙宇供神灵。部分庙宇供奉的神灵，体现了观前和“水”之间的密切关系。妈祖庙供奉的是林默娘，她被尊称为“妈祖娘娘”，原先是航海者的保护神，后演化为福建人的保护神。在闽江及其支流上从事航运业的船工和排工们，尤其信仰妈祖神。水吉庙内供奉的是张巡，他在安史之乱中因死守睢阳而殉唐，成为官方祀典中之神，后来又因清王朝加封为“显佑安澜之神”而演化成水神，兼有防疫、禳灾、驱魔等多项职能。

不在观前村内、但与观前村有紧密联系的庙宇，近的有老水东社庙和观音阁，远的有金斗观、轮藏寺和高阳峰庙等形制较高的佛寺和道观。老水东社位于南浦溪东岸，是一幢形式简单的夯土建筑。观音阁位于村西面，今观前小学一带。金斗观在观前村对岸的小武当山上，轮藏寺在村北的“轮藏金山”上，高阳峰庙在村东北方的高阳峰上，这三座庙宇分别由观前的周姓、张姓和叶姓人出资建造。

祠堂和庙宇还有一点是相似的，它们都承载着观前的公共文化功能。这尤其表现在演戏和庙会上。观前村内的八座祠堂和庙宇，无一例外都有戏台，它们不但在节日祭祀活动中上演戏曲节目，平时也经常有“拦路戏”（即将途经观前码头的戏班“拦截”下来，唱三天戏之后才让离开）。庙会是一个地域内的居民共同参与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以祭祀为基础，兼有经济、社交、集会、娱乐等功能。观前村民经常参加的庙会，一年里有八次，分别是上坊村水东社庙庙会、金斗观庙会、轮藏寺庙会、太平桥观音庙[1]庙会、妈祖庙庙会、关帝庙庙会、下官亭观音庙[2]庙会和水吉庙庙会。为数众多的

1　太平桥是位于观前村北面约 5 千米的一座廊桥，其内设龛供观音像。

2　下坊村的下官亭内也设龛供观音像。

祠堂和庙宇，织成了一张覆盖观前社会生活的网。

结语

观前村因特殊的闽江上游水运而生。她的选址和结构都很不同于一般的农耕型村落。

在选址上，观前村是利用了闽江上游的季节落差。闽江上游的季节落差太大，使得竹筏运输业有了生存机会。竹筏的运载量只有一吨左右，远小于船；但是竹筏的吃水也比船要浅得多，在冬季浅水期时比船要好用。南浦镇到观前村的这段水路，正好适合吃水浅的竹筏在冬季跑运输，所以在观前村就形成了一个船和竹筏转运的码头。

在村落结构上，观前村也是从水运“生长”而来的。上坊村的村民都撑竹筏跑上游，下坊村的村民都撑船跑下游，中坊村的村民则就地经商或从事挑担业，就此形成完整的互相支撑的产业链条。

（本文取自：罗德胤. 观前码头 [M]. 上海：三联书店，2009. ）

第八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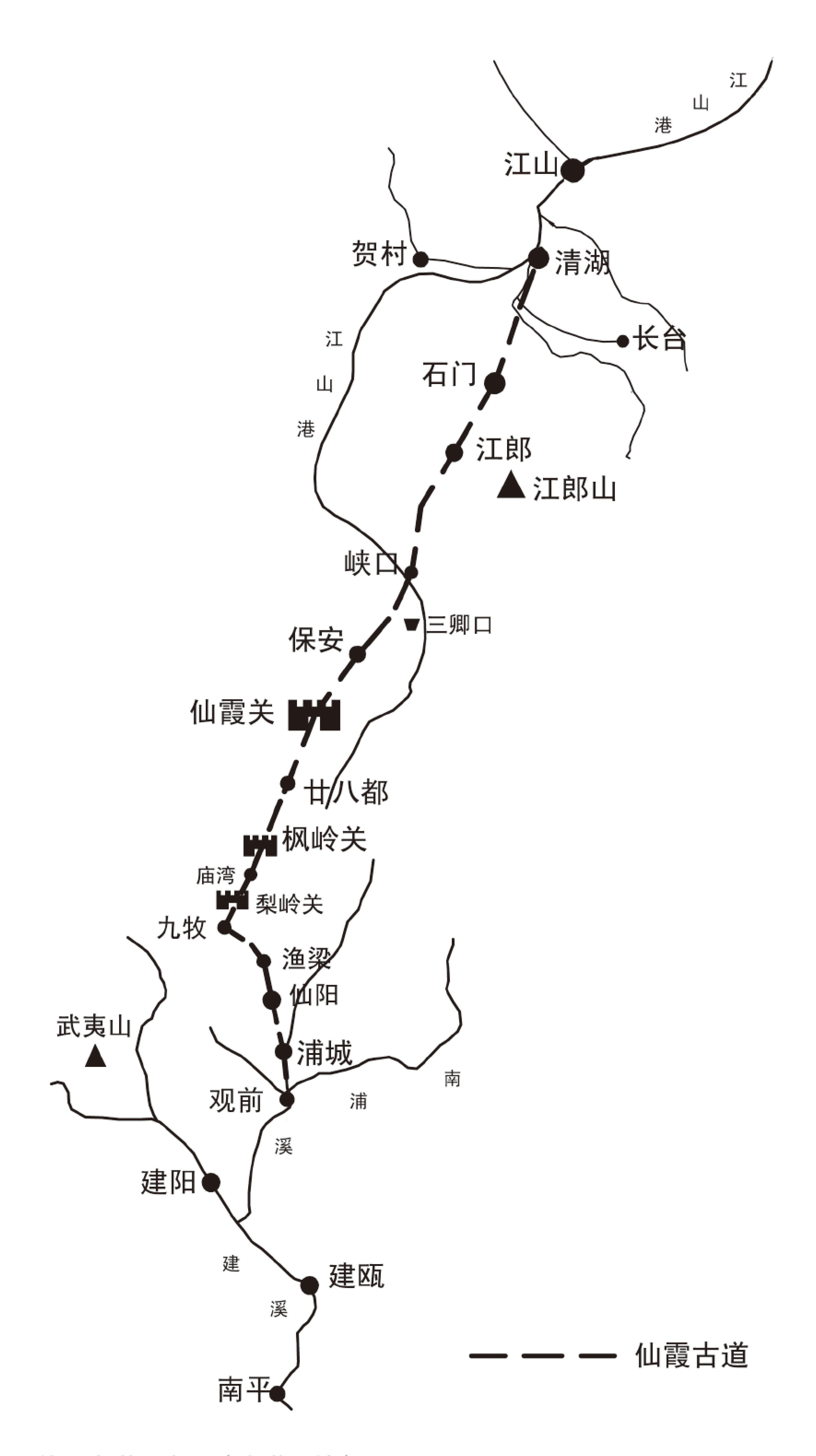
清湖码头：文献与田野的互动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1] 这种将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可谓影响深远。对乡土建筑研究而言，这种方法在协调田野调查和文献研读之关系上也很有意义。本文以对仙霞古道上的重镇清湖码头的调研过程为例，说明在乡土建筑考察工作中如何应用此研究方法。

初步调查与资料分析

对仙霞古道做初步调查之后，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仙霞古道是连接钱塘江和闽江这两大水系的一条旱路。钱塘江和闽江被仙霞岭隔开，跨

1　王国维．国史新证：老清华讲义 [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江山港
江山
贺村
清湖
长台
江山港
石门
江郎
江郎山
峡口
三卿口
保安
仙霞关
廿八都
枫岭关
庙湾
梨岭关
九牧
渔梁
仙阳
武夷山
浦城
南浦
观前
溪
建阳
建溪
建瓯
南平
仙霞古道

仙霞古道示意图（张琳 绘）

越仙霞岭而沟通两头的是一条 120 千米长的旱路，这就是仙霞古道。在这条路上，曾经有无数的挑夫来来往往。他们出发和停留的地方，就形成了仙霞古道上的四大集镇：浙江江山的清湖镇、峡口镇、廿八都镇和福建浦城的南浦镇。在这些集镇之间的路段上，还散布着若干村落和庙宇，它们和仙霞古道上的运输业也有着密切关系。

仙霞古道在历史上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只看仙霞古道本身，是不能明了的。为探求答案，我们需要将仙霞古道放到全国的交通地理格局来考量。



江山市在浙江省的位置图（罗德胤　改绘）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黄河、长江、珠江、钱塘江和闽江等重要河流都自西向东流淌。古人有很多诗句都提到这一点，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滚滚长江东逝水”“人生自古长恨水长东”等。在以船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中国古代，东西向交流原本也比南北向交流要方便得多。从秦朝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致力于打通南北。打通的方式，要么是修人工渠，要么是修旱路：秦始皇修通灵渠，沟通长江与珠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其成为中国交通的南北大动脉；唐初张九龄修通大庾岭，连接起珠江和赣江，从而使南北大动脉一直延伸到岭南的广州；在南宋，跨越仙霞岭的道路也修通，这使“钱塘江—仙霞路—闽江”成为沟通南北的一条小动脉。仙霞古道沿线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和江南制造业的发达息息相关。江南地区的出口商品，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条古道运往福建海港的。

分析至此，一个疑问出现了：江南地区也临海，为什么不直接出口呢？

带着问题继续查找资料，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古代中国对海上交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容忍到排斥的过程。早在两宋时期，尽管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相当发达，但或许是出于某种防备需要，赵氏王朝对浙闽两省的海运是区别对待的。浙江距离中央政府较近（南宋时的首都临安就在浙江境内），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朝廷对其海上运输的控制较严。福建距离中央政府较远，而且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对内交通不畅而对外交通便利，故其海运受朝廷控制较少。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1]

明清两朝的大部分时间，都实行较为严格的海禁政策。晚明时任江浙

1 吴自牧著，张社国、符均校注. 梦粱录 [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184-185.

督抚的王在晋（？—1643 年）就规定：“照闽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闽，俱限温福分界沙埕[1]地方换船，此向来通行之禁也。”[2]这是在知道无法杜绝福建人从事海上贸易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弃卒保车”之举。由于浙江海运受阻，内陆的仙霞古道便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进一步的调研与阅读

在对古代中国的出口问题有了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再转入田野调查，对仙霞古道做进一步的研究。



清湖镇区现状照片（罗德胤　摄）

仙霞古道的北起点——钱塘江上游的清湖码头，在调查之初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在现场，“看不见一只船，也看不见河滩。几处幸存下来的码头石阶，只偶尔有居民到此浣洗衣裳，根本没有要装卸的货物。河岸上

1　港口名。

2　（明）王在晋. 越镌 [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04，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刻本：483.

的老建筑，也多半改成了两三层甚至更高的楼房。从旁边的心航山上往下看，清湖基本上就是个已经半现代化了的普通集镇，和我国南方地区的很多小镇并无两样。”[1]

但是，从历史文献上看，清湖码头是曾经有过相当辉煌的岁月的。同治版《江山县志》载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蒋光彦九清桥碑记》说：“闽以南，大江以西，估客行商转毂入越，系此地上下。闽荐绅大夫宦游他郡国，及四方之宦闽者，或不道信州，间道梨关，水税舟，而陆税车，清湖亦一要会也。”[2] 顾祖禹（1631—1692）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说道：“清湖镇为闽浙要会，闽行者自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道光年间的清湖码头，已经是“十里城南路，舟车此地纷”。[3]

带着历史的信息再回到现实，我们发现，尽管改变程度较大，清湖码头（镇）的现状还是在几个侧面反映了它曾经的辉煌。

首先是镇的规模。一个镇的规模，通常是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清湖码头的镇区人口有3600人，占地达20公顷，有两横两竖四条主要街道。

其次是历史建筑。清湖码头还保留有为数不少的历史建筑，包括祠堂、庙宇、店铺、住宅等。只有经济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才会出现数量大而种类多的建筑。

再次是具体的商业业态。根据笔者对镇上老人的采访，可总结出镇上商业与运输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1）14个码头：其中有3个专门的码头——盐码头、百货码头和竹木码头，码头的数量和分工说明运输业很发达。

（2）15家过载厂：意味着仓储业很发达。

（3）7家造船厂：表明船运业很发达。

1 罗德胤. 清湖码头[M]. 上海：三联书店，2009.
2 （清）朱宝慈，等. 江山县志·卷之一·舆地·附七·桥渡[M]. 同治十二年（1873年）.
3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4316.



清湖码头现状平面图（孙娜　绘）



清湖码头商业街历史业态调查图（罗德胤 绘）

（4）23家茶馆：说明搬运工很多。搬运工在等活儿的时候，要找个茶馆休息，久而久之茶馆就成了搬运业务的中介处。搬运工在茶馆里等活，要用搬运工的人也会到茶馆来找工人，雇佣双方都已达成默契。

（5）11个祠堂：交通发达，人来人往，于是形成杂姓混居的局面，所以有很多家祠堂。

（6）2个会馆：包括福建会馆和绍兴、江西商人合建的会馆，这说明清湖码头某些商业已经形成地缘和业缘联合的体系。

解释“矛盾”

在对店铺做普查和统计之后，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出现了：仙霞古道既然是江南出口商品的重要通道，为何在清湖码头竟连一间丝绸店都没有呢？要知道，生丝和丝绸不只是我国出口物资的大宗，也是重要的国民生活物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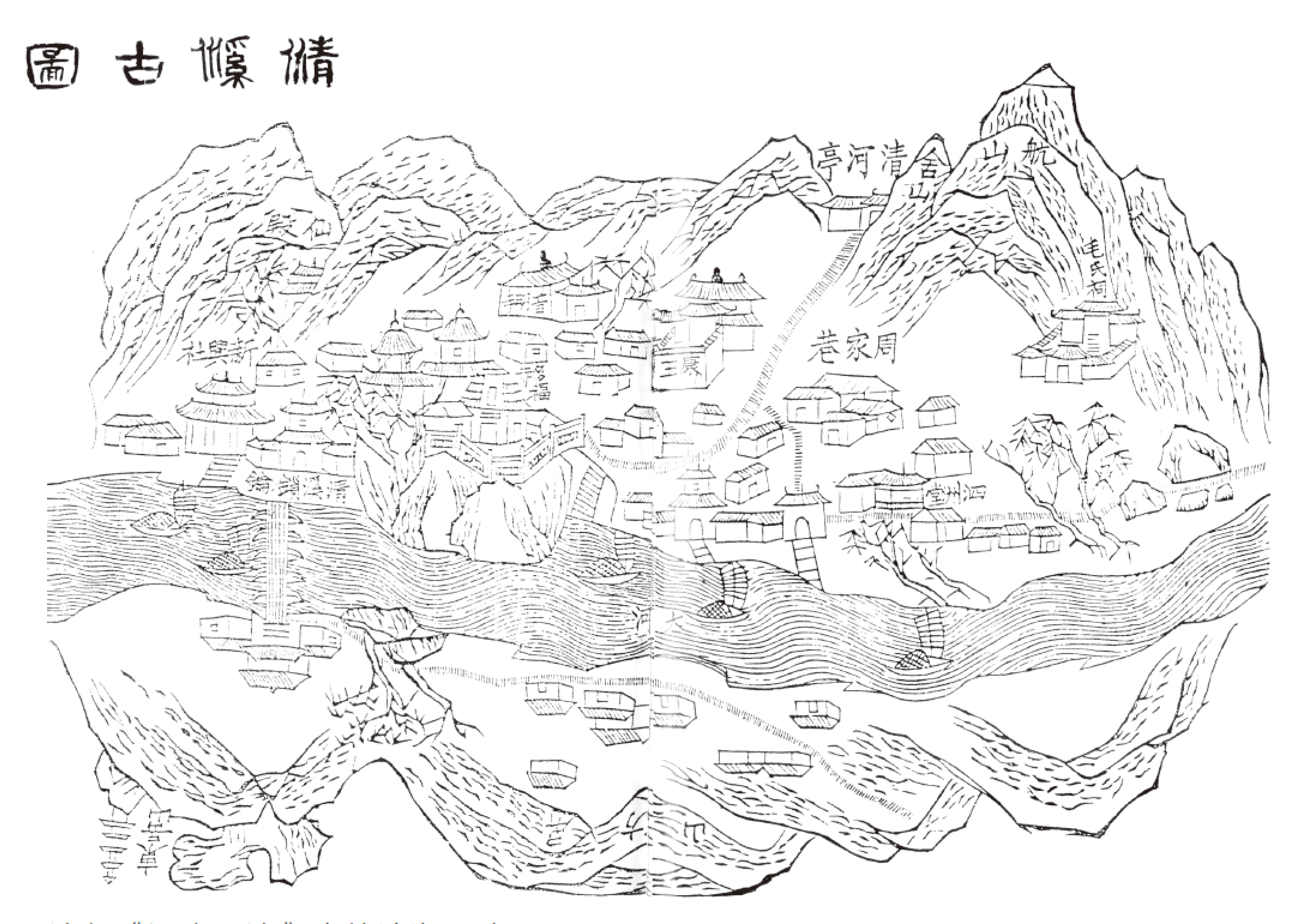
文献研读解释了这个“矛盾”。中国的丝绸出口从五口通商之后，就逐渐没落，在国际贸易中被荷兰丝绸所替代，原因是荷兰用机器生产丝绸的技术发展成熟，其丝绸质量不比中国的手工丝绸差，但产量大得多，价格也更低。到1900年前后，中国生丝的国际市场也被日本取代。在丝绸和生丝的国际市场都被夺走之后，中国江南的丝绸业也就衰败下来，所以我们在清湖码头连一间丝绸店都没调查到。

在研读五口通商文献的过程中，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五口通商之后，海禁解除，江浙的出口物资可以直接运往海外，在此背景下，清湖码头还有何作用呢？

综合分析文献和清湖码头的店铺调查，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晚清至民国时期沿海地区的近代化，为清湖码头得以维持活力提供了一个契机。内

1　清湖有不少布店（最多时可能有20余家），但没有专门的丝绸店。布店里也只卖少量的丝绸。

陆山区出产的各种山货，是沿海地区需要的；沿海地区工业生产出的布匹等货物，也是内陆山区需要的；两者形成了互补的经济关系。清湖码头，就此转型为仙霞岭山区的一个贸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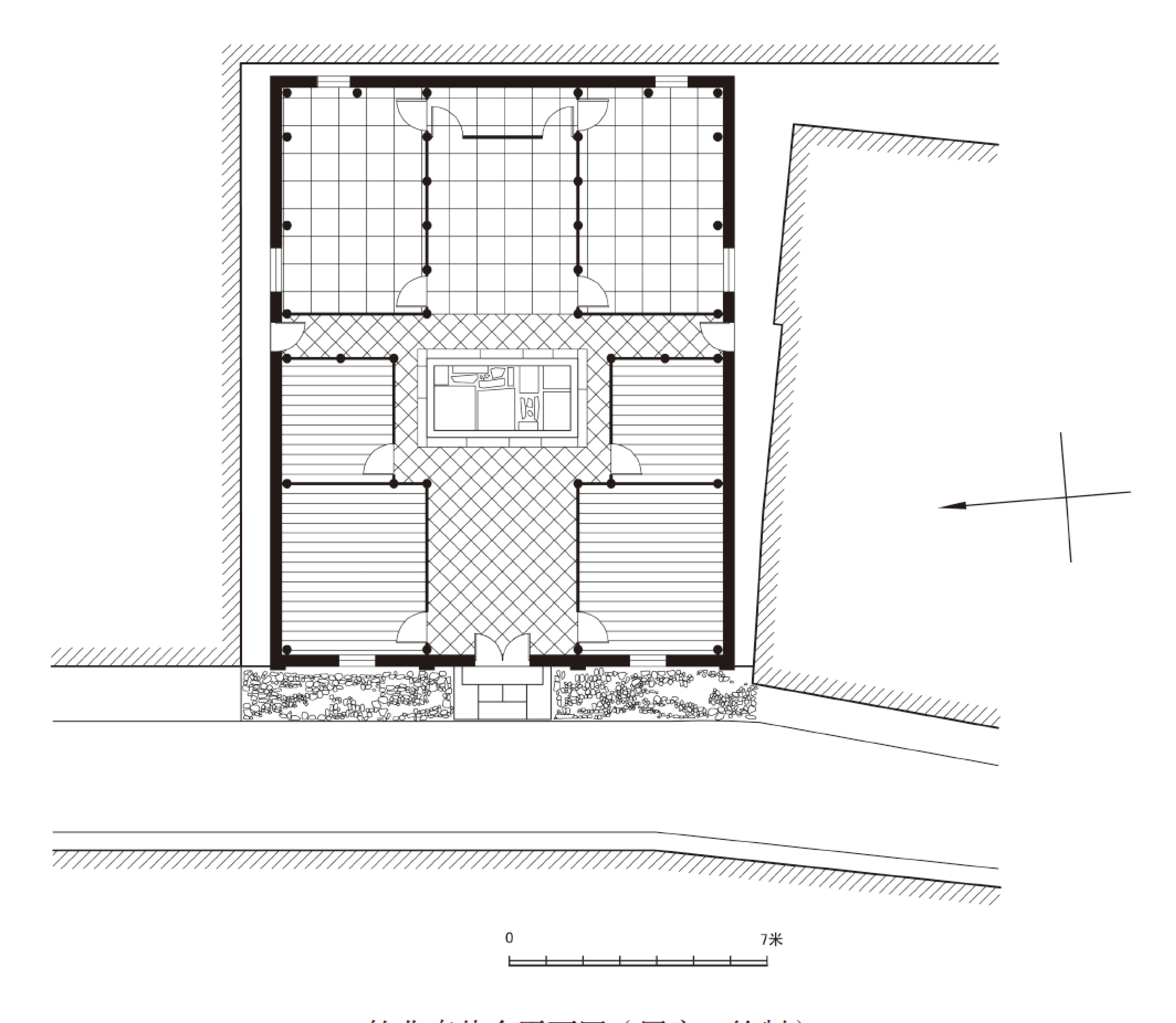


同治版《江山县治》中的清湖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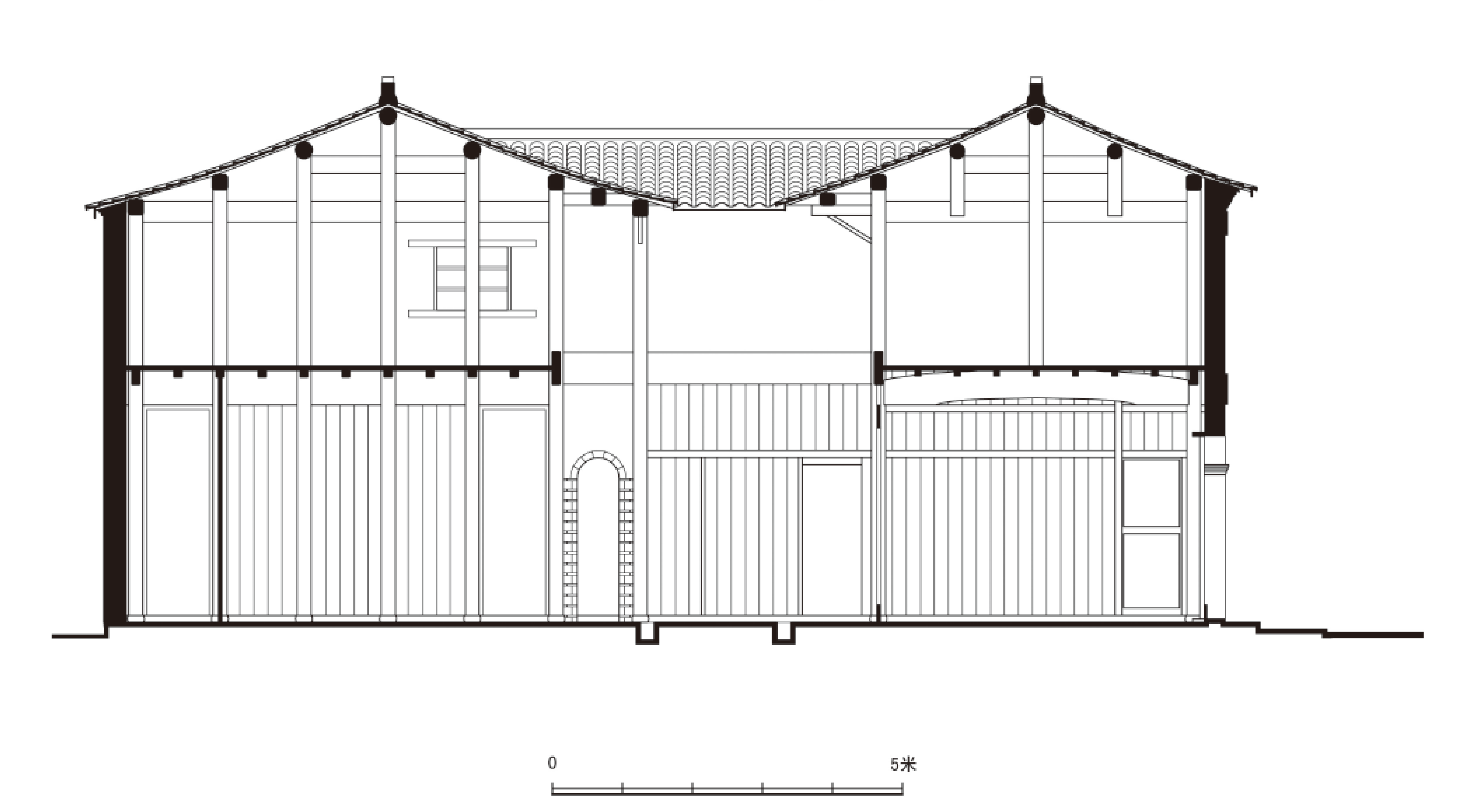
田野调查也支持了上述判断。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的清湖码头，食盐、厂布和南货是比较大的行业，它们都是从沿海地区运到清湖码头的，而小猪、米蛋、酱油、桐油、土纸等物资，则从清湖码头运往沿海地区。食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行业。清湖码头曾经有三大盐仓——鲍兆泰、继和与恒兴，都是老字号，共用一个盐码头。鲍兆泰盐仓的建筑留存至今。

解决了丝绸和盐业的问题，业态统计结果中又有新的“矛盾”出现。当地曾有 7 家大油蜡行，以经营桐油为主，规模都不小。为何桐油也会成为大产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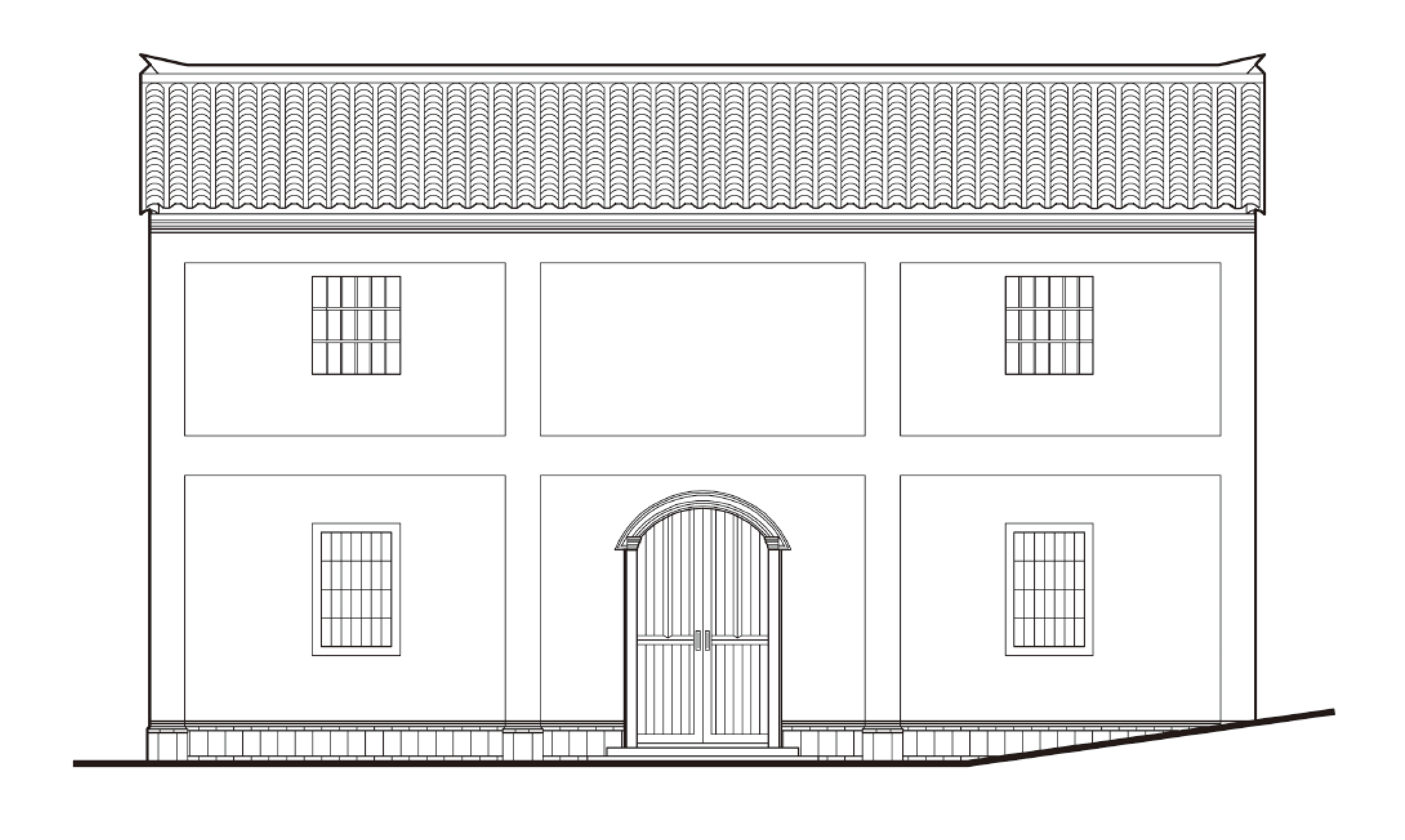
带着问题回到文献。1937 年的一则记载说：“考最近三年我国桐油



鲍兆泰盐仓平面图（周实　绘制）



鲍兆泰盐仓剖面图（周实　绘制）





鲍兆泰盐仓立面图（周实　绘制）

出口数字……跃居首位，取代昔日丝茶出口之盛况。”[1]1948 年来自美国的一份报告则称：1937 年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生产桐油的国家。

民国时期的学者黄其慧在《湖南桐油产销概述》一文中对国产桐油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我国以农业立国，桐植物之栽培，历史至为悠久……惟海禁未开之前，仅能行销国内，以供人民用之需。迨至马哥孛罗返国著《东方见闻录》载及我国涂船油灰之佳妙，欧西人士始知有此物。逮后输入欧洲，任科学之研究。桐油之为用，乃渐为外人所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桐油被采用为飞机、电气、化学及其他特种工业之原料。据美国工业中，约计八百五十种，皆利赖之，每年自我国输入桐油百余万担，尚不敷用，因需用之日广，外销量乃骤增，遂蔚为我国出口货物之大宗”“自世界大战以来，因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竞扩军备，对于桐油之需用，其量尤为激增。”[2]

1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四川省之桐油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　黄其慧．湖南桐油产销概述 [J]．湖南经济，1946(1).

回到田野调查，可以发现清湖的桐油行在桐油经销中起的作用，是将山区出产的桐油收集起来，送往浙江海港。为保证收购来的桐油合格，连万油蜡行和中孚油蜡行还专门购买了德国进口的质量检验机。

结语

总结以上对清湖码头的调查和研究经历，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利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将乡土建筑的现场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其好处在于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如果现场与文献是统一的，就可以做进一步的阐述；如果现场与文献出现“矛盾”，就要解释“矛盾”，这可能恰恰是让研究得以深入的途径。对学术研究而言，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尹璐. 文献与田野的互动——以清湖码头的调查与研究为例 [J]. 世界建筑. 2011（1）：116-119. ）

第九节
三卿口古窑村

三卿口窑村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自然村落，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带。从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而言，这里曾经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中心之一。在窑村的东面，浙江的越窑和龙泉窑都曾辉煌一时。唐朝诗人陆龟蒙有诗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的就是越州[1]生产的瓷器。越窑衰落以后，龙泉窑继之而起，借宋室南迁和海外贸易之利，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在窑村的西北，则有江西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是自明代以来中国瓷器的主流产品。宋应星曾在《天工开物》中说：“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2]

窑村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个狭小盆地内，面积约 6.5 公顷，即使连上四周的山林环境，村落总面积也不过 20 公顷，目前常住人口仅 100 余人。窑村现属浙江省江山市峡口镇管辖，“三卿口”原是个乡的名称，1992 年实行“撤乡并镇”，三卿口乡和王村乡以及峡口镇合并成了现在的峡口镇。

1　当时辖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
2　[明] 宋应星著，钟广言注释 . 天工开物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196.



《黄氏族谱》中的窑村地图

“窑村”作为正式村名，始见于清代中叶。民国年间编的《须江[1]黄氏族谱》中有两篇分别写于咸丰九年（1859 年）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的《谱序》，说明窑村之名不晚于咸丰九年。1956 年实行合作化之后，窑村成立“江山县三卿口瓷器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本是经济组织，1958 年人民公社化之后，“政经”合一，“瓷器生产合作社”也成了村名。不过，这个名称太长，不好记，当地人习惯称其为“碗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碗厂生产的粗瓷受到龙泉瓷等精瓷的排挤，失去市场。1997 年，碗厂停产。

窑村的特点体现在三处。

第一，窑村是一个手工业村。中国的乡土聚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体系，其中除了农业村庄外，还有数量不多、作用却不可忽略的商业集镇、

1　即今浙江江山市。

手工业村等其他类型的聚落。要全面反映中国的乡土社会，就必须考察乡土聚落的不同类型，三卿口窑村，正好为我们研究手工业类型的聚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二，窑村的完整性。在窑村内，与居民生活和生产相关的各种资源、建筑和设施，包括瓷土矿、柴山、溪流、住宅、祠堂、社庙、道路、水碓、作坊、瓷窑、窑公庙等，大部分保存完好。这些元素对于我们真实而全面地了解传统手工业村的生产生活状况，是必不可少的。而它们能够如此完整地在一个村落内保存下来，也十分罕见。



江南山林里的三卿口古窑村（罗德胤 摄）

第三，窑村与仙霞古道的关系。仙霞古道是钱塘江水系和闽江水系的旱路连接带，窑村在位置上与之紧靠，可使其陶瓷产品北上运输到江山、衢州和金华各地，南下运输到福建浦城等地，往西则运输到江西邻县，从而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销售网络。这层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代的乡土聚落往往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与外界毫无关联的孤立单元。研

究乡土聚落，除了考察其内部的诸种因素外，还必须将其置身于一个较大的、与其密切相关的地理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其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和历程。

村史

窑村黄氏世代排行依次用正、大、学、礼、兴、永、乐、地、久、祥、名等字。关于黄姓的祖先，《须江窑村黄氏族谱》中两篇《谱序》均有记载：

咸丰《谱序》明确提到黄氏祖先迁来此地的目的：“开窑创业”。

黄氏祖先选中此地的原因，《谱序》中只提到“山明水秀，可以生理”八个字。而以现今眼光来考量，黄氏选择在此开窑烧瓷，应有以下理由：

其一，原料。烧制陶瓷少不了陶瓷原料——高岭土。众所周知，陶瓷分陶器和瓷器两种。陶器的胎料是普通的黏土，其烧成温度一般在 900℃左右，表面不上釉或只上低温釉；瓷器胎料则是瓷土，即高岭土，其烧成温度在 1300℃左右，表面施釉。窑村生产的陶瓷属于粗瓷。在窑村南面山坡上，有采泥（石）场，是窑工世代采集陶瓷原料之处。窑村的石料因高岭土含量较低，杂质较多，只能用来做粗瓷。

其二，动力。北方地区的烧瓷业，常用牛力来磨碎石料。在南方山区，雨量充沛，又有山坡高差，溪流湍急，天然水力利用起来十分方便。窑村内有两条溪流，其中流量较大的一条，就被村民们用来把粗石料粉碎成细泥。其做法是，以水流带动水碓房外的水毂轮，水毂轮再带动木碓臂，木碓臂举着碓头，对碓臼内的石料反复敲打，直至粉碎成“面粉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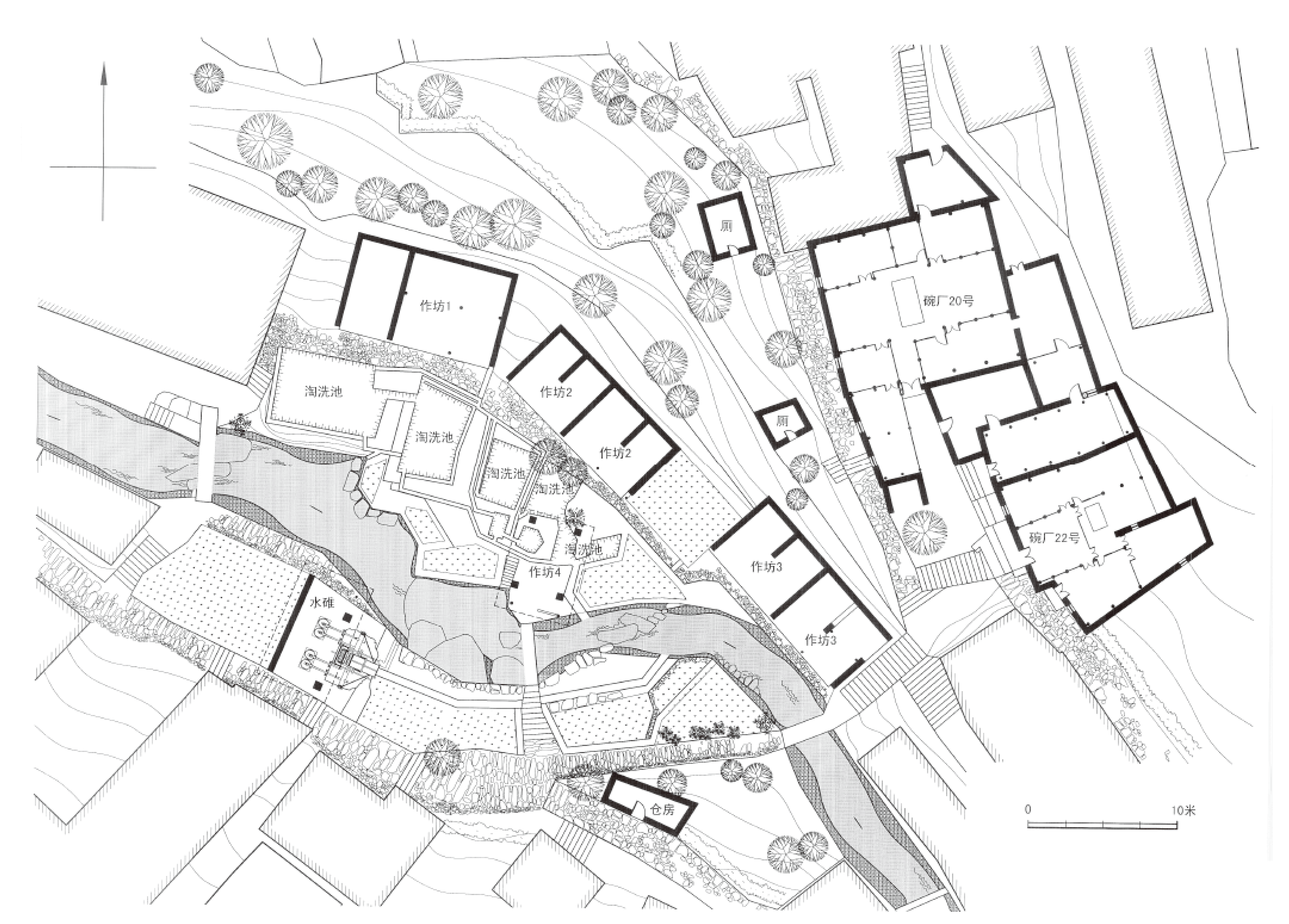
其三，燃料。烧制陶瓷需耗费大量燃料，窑村所处为丘陵山地，木材充足，可解决燃料问题。据生于 1924 年的老窑工黄地法说，合作化时期修建的位于西面山坡上的大龙窑，一次烧窑需费木柴 2 万多斤，以前用的

窑规模小得多，但一次也要消耗大约 1 万斤木柴。

其四，销售渠道。窑村的销售得益于浙闽交通线上的仙霞古道。

其五，农田。旧时窑村的陶瓷烧制水平也低（只能生产几种粗瓷碗和瓶），其市场需求也小，窑村的居民光靠这一行并不足以保证生计，他们还需要自己生产粮食，因此，一定面积的农田仍是必不可少的。

据黄地板（生于 1925 年）和黄忠益（生于 1929 年）等老人说，窑村历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破坏是在 1942 年，“日本兵把大部分房子都烧光了”。没被日本人的大火烧毁的房子只有五处：黄氏祠堂、社庙、碗厂 56 号（在村东面山腰较高处）、碗厂 22 号和碗厂 20 号南半部（均在村东面山坡上）。



窑村局部平面图（尚晋　秦达闻　测绘）

1942 年之后，被烧毁的房屋大部分在原址上重建。按村民们自己的说法，建筑材料和做法“都是老的，夯土墙，木柱子，坡屋顶”。这些房

屋连同烈火中幸存的几幢老房子，一直被原样保存到现在。

建筑

窑村的建筑在以精雕细刻著称的浙江乡土建筑中，可以说是最为朴实无华的。除了黄氏祠堂内有稍微繁复的雕梁画栋之外，别的建筑，包括社庙和住宅，都是夯土墙加木构瓦顶，只有个别建筑有少量装饰。

虽然在造型上和装饰上都貌不惊人，窑村的建筑在色彩上却几乎可用“热烈”二字来形容，因为很多夯土墙都直接外露着大面积的土黄色，而屋顶的板瓦也是红黑相间——瓦本是红色，但或因烟熏，或因气候潮湿而起苔，部分变成了黑色。从山坡高处俯瞰整个村落，只见绿荫丛中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红、黄色块，这和浙皖地区粉墙黛瓦的素描风格比起来，又可谓别有一番气象。

窑村的建筑有祠堂、庙宇、住宅、作坊、瓷窑等类型。它们建造于山坡上或山脚下，以坡地上开辟出的平地作为地基，形成大小不等、参差跌落且朝向不完全一致的建筑群。这其中，祠堂和住宅以三合院或四合院为主，庙宇、作坊和瓷窑则都是不成院的单栋建筑。

住宅有几十座，大多只有一个天井，少数连天井都没有。住宅的建筑层数和高度是介于一层和两层之间，其屋脊高度稍逊于祠堂，在 6 米左右。说住宅的层数在一层与二层之间，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住宅的厅堂尽管空间高敞，地面与屋瓦之间却不设楼板；第二，住宅卧室上虽加设木楼板而多出一层“楼棚”，但并不能算作完全的二层，因其空间相对较矮，并不用于居住，而是用来堆放粮食、瓷器、农具等，和在炎炎夏季充当隔热层，以及在冬天起保温作用。祠堂和住宅均以木构为承重，以夯土墙作围护，夯土墙内的房间划分则用木隔墙。


溪边是作坊，高处是住宅（罗德胤　摄）

住宅中的厨房亦值得注意，它有两个特点：一是面积大，窑村住宅里的厨房，面积大都有 30 ~ 40 平方米，比卧室或厅堂都要大多了；二是直接与室外连通，从厨房走到室外，少则一个门，多则两个甚至三个门，这些门再加上通往厅堂、卧室的另一个门，足以使得厨房成为住宅内部的一个交通枢纽。厨房大而且交通便利，是因为在这里除了每天的烧饭做菜外，还要时常腌咸菜、做豆腐或者酿老酒等。在这个角度上讲，厨房又是个家庭作坊。

住宅除了居住功能外，还要考虑陶瓷产品的存放。作坊内虽然也有存放空间，但多是临时的，长久放置并不安全。不过，我们目前在窑村内只发现碗厂 56 号一户住宅带有专门的陶瓷产品库房，其余住宅都是利用二层阁楼，或平时不常用的厅堂、卧室等作为陶瓷产品的存放地。

（1）黄氏祠堂

根据民国年间所编的《须江黄氏族谱》可知黄氏祠堂始建于光绪五年

（1879 年），完工于光绪六年（1880 年）。

在旧时的血缘村落，对聚族而居的村民而言，祠堂就是家族的象征。窑村的黄氏祠堂，是整个窑村内规模最大、形式最华丽的建筑。它位于村子东北方水口的溪东岸，坐北朝南，有坐镇水口的作用，其东面是毛竹与大树密布的“袖田山”，即族谱中的“阳龙山”。

古卿窑三村口祠堂的修建是重要的家族公共事件。据《须江黄氏族谱》载《祠堂记》，修建祠堂的费用，本打算从碗窑的产出中抽取一定比例累积而就，但积攒了五六年仍只有“大钱百外之数”，远不够用，最后不得不动员整个家族，有钱出钱（“劝捐”），有力出力（“派丁”），才将祠堂建成。由此推测，碗窑确实没有给黄氏家族带来高额的经济利益，因为修建祠堂共集资“五百有余千”，远远超出此前若干年的窑捐总和。此外，就合族共建祠堂这件事而言，也说明窑村的居民在宗族观念上和一般纯农业血缘村落的村民并无差别。

祠堂由两进院落构成。由南至北，分别是大门、戏台、中堂和后堂，其东侧紧靠山坡还有一间厨房。除了南侧开大门和西侧开小门外，祠堂四面均用厚厚的夯土墙封得严严实实。从村口走来，只能看见山坡下临溪而立的白色墙面，和层层跌落的马头山墙。墙封得严实，从功能上来说是有利于防火，黄氏祠堂在 1942 年的大火中得以幸存，也许正是得益于此。和村内住宅一样，祠堂的墙体也用夯土的，不同之处是表面全部刷上了白灰，这和住宅大多裸露黄色的夯土墙形成了鲜明对比。

北面第二进院落的天井是一个窄长条形，宽及建筑的通面宽，进深仅 1.2 米。此天井东西两侧无厢房，南面是中堂的后墙，北面则是后堂。祠堂东侧紧靠山坡的厨房，单坡顶，室内面积有 20 多平方米。祠堂厨房的功能是作为祭祖时“备撰”之用，在每年一度的“迎菩萨”活动中，各家杀猪后都要送 15 斤猪肉到这里，煮熟供全体黄姓族员享用。



关锁水口的祠堂（左）和社庙（右）（罗德胤 摄）

（2）社庙

社庙的正式名称是“陈德公王庙”，它位于黄氏祠堂的西南方，坐西朝东。祠堂和社庙隔溪相望，共同起到关锁水口的作用。据黄地法说，袖田山上的窑公庙被毁之后，居民们烧窑前改到社庙来上香，上香的时候口念“请窑公菩萨保佑烧好窑，没有烧坏的碗”。因瓷窑行业的祖师爷是太上老君，故其常受到烧窑者的崇拜。但这里的村民们似乎只晓得“窑公菩萨”，而不知道太上老君。

社庙的建筑规模极小，平面尺寸只有约 5 米见方，屋顶为硬山式。其南、北、西三面为砖墙围合，墙体材料已大部分改换成红砖。社庙的建筑装饰较少，只在正立面上额枋与门框之间有“步步紧”门楣。

社庙内有神台，高 1 米，台上原先供奉有三座神像，现在神像已无，居民们每年在后墙上贴红纸牌位并虔诚进香。根据这些红纸牌位上所写，当中是“安奉坐镇水口陈德公王位”，其北侧是“安奉本境三清三圣大王位”，其南侧是“安奉本境兴旺土地公婆位”和“先传后教何叶二位夫人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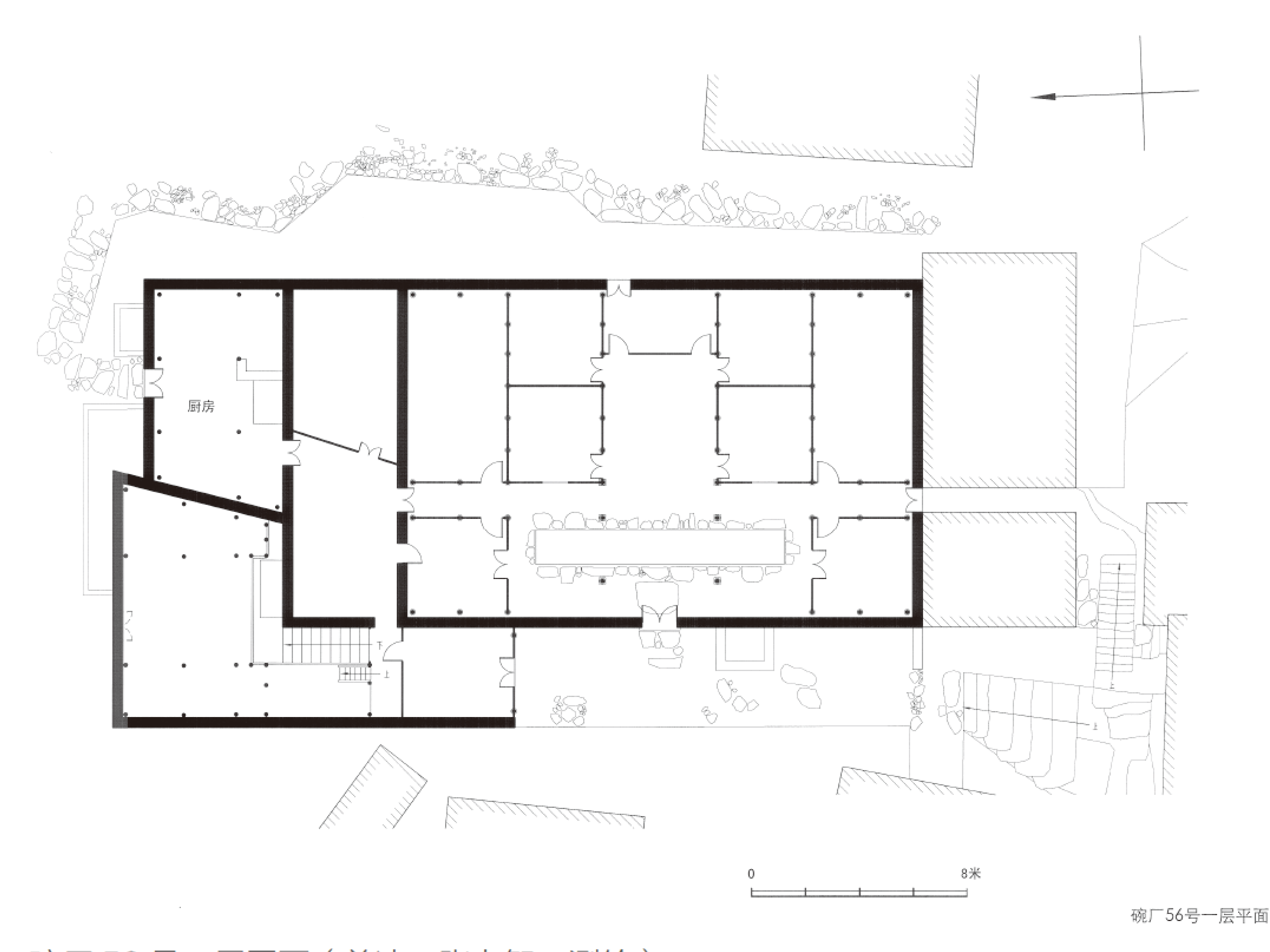
社庙（尚晋　摄）

（3）碗厂 56 号住宅

碗厂 56 号位于东面山坡的一个陡坎上，距离大溪较远而距离小溪更近。它原为窑村唯一富农黄乐吉的住宅，土改后分给了几家人，如今属于 6 家人所有，其中包括黄乐吉的儿子黄洪寿。

该住宅又被当地人称作“新屋”，尽管它其实是碗厂屈指可数的年岁在 60 载以上的老房子之一。1942 年，日本侵略军攻打仙霞关失败，撤回江山县城时路过此地，一把火将当时村里的大部分建筑都烧光，“新屋”是少数幸存者之一。

“新屋”坐东朝西，由主屋、厨房和库房三部分构成，主屋为三合院形式，天井东面是厅堂和堂屋。主屋北侧是一间过道兼库房，再往北则是厨房。厨房西面是两层库房。



碗厂 56 号一层平面（姜冰、张力智　测绘）

（4）窑

黄氏居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修建的窑，据黄地法和黄忠益等老人说，总共有 3 处。最老的窑位于黄氏祠堂东侧的柚田山上，这在民国年间编族谱的地形图上可见。“碗窑”本是全村黄姓公用，后来因为两兄弟不和而“打官司”，一怒之下各自修了一座窑，老窑从此谁也不让用，久而久之就荒废了。这兄弟不和事件，据黄地法说，发生在他父亲黄乐朝（1897—1965 年）年轻时。推算起来，该事件应该发生在 20 世纪 10 年代。兄弟俩新修的窑，一个在村落的东南，今碗厂 24 号附近的溪东北岸，属于上房派的，只给上房派的人用，叫“上房窑”[1]，另一个在村中心的溪东北岸，属于下房派的，只给下房派的人用，叫“下房窑”。

1　关于上房和下房之分，被采访的村民们均表示不知道起于何时，而家谱中也未提及。就“兄弟不和”事件来看，房派之分当在民国初年以前就已形成。而从旧时“五代分房”的习俗来推测，房派之分在“永”字辈，即黄乐朝的父亲一辈。

然而这两座窑的使用时间并不长。1956 年开始合作化，两年之后一座新龙窑建成。据黄地广说，相比于新窑，老窑生产出的陶瓷“质量差，太粗糙”，所以被淘汰了。



建于 1962 年的大龙窑和大作坊（罗德胤　摄）

合作化之后修建的新龙窑，位于村中心的溪西南岸。这个龙窑一次出窑能有一万件陶瓷，大部分是碗，也有少量的瓶和酒杯。不过，它“没用几年，还常坏常修”，并且随着碗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它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需要。1962 年，又一座新的龙窑于村落西面山腰上建成。这座新的龙窑是专门请了邻县著名的中国瓷“龙泉瓷”产地龙泉县的师傅来帮忙修建的。“龙泉师傅”帮着修建的龙窑，规模要比窑村原来的瓷窑大得多，沿山坡依次跌落，总长度达 35 米，一次出窑有 2 万多件陶瓷，主要是碗、瓶、酒杯等种类，偶尔还包括一些请工艺师傅专门设计的动物、菩萨像等艺术品。“龙泉师傅”不仅指导碗厂工人修大龙窑，还教会他们如何装窑和烧窑，因为这么大规模的龙窑在碗厂历史上属头一遭，工人们没有足够的经验。

和大龙窑修建的同时，在其南面紧挨着还修建了大约 300 平方米的作坊，专供上釉、画花等工序的操作，以及陶坯送入炉前的晾干。这座大龙窑投入生产之后，1958 年修建的旧龙窑也被废弃，它所在的位置上于 1973 年兴建了一座面宽五间的厂房，这座龙窑从此消失。大龙窑一直用到 1997 年碗厂停产之前，其建筑被保存至今。

（5）作坊

作坊有大作坊和小作坊两类。大作坊出现在合作化之后，其典型实例就是大龙窑南面的作坊。小作坊包括合作化之前的家庭式作坊和合作化之后的小型作坊，其典型实例如碗厂 20 号住宅西面桥边的作坊，此作坊的主要功能是“拉坯”“上釉”和“画花”。建筑使用双坡瓦顶（旧时为草顶），三面围合，西面敞开，按承重墙来分是两间，但按工作单元分则是四间（如果是在合作化之前，最多可供四家人同时工作）。其通面宽 12.4 米，进深 4.9 米，墙体材料是夯土墙，擦条直接架在山墙上，承接双坡瓦顶的重量。每一个工作单元的面宽是 3 米多一点，两间加起来正好是木擦条的合适跨度，所以承重墙之间的跨度是两个工作单元的宽度。每两面承重墙之间，中间再设半隔墙（平面上由后墙至屋脊下），划分成两个工作单元。隔墙与承重墙之间，在不同高度上共设有六对木梁，这些木梁上面搁上木板就可以作为盛放和晾干陶坯的支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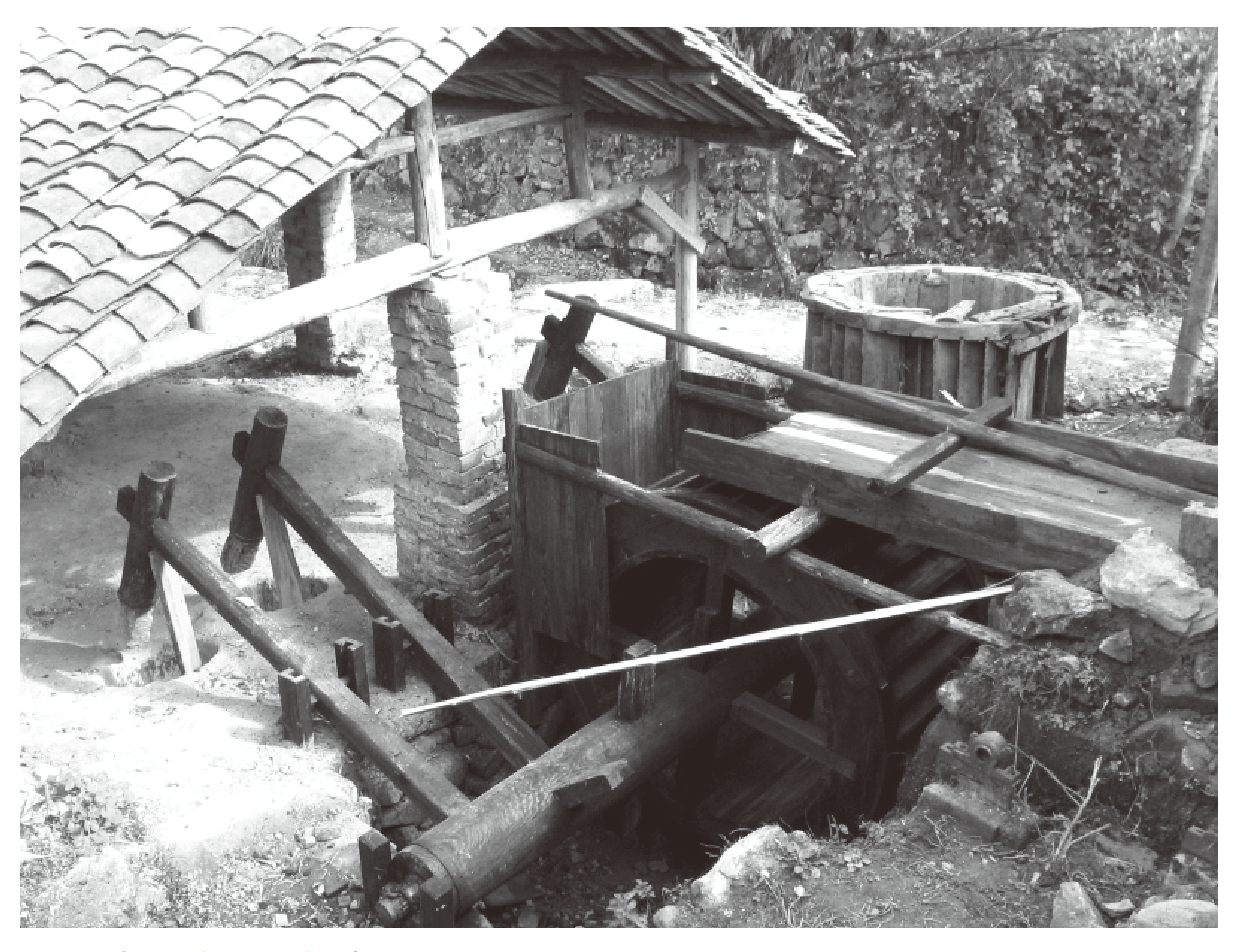
作坊也可用木柱或砖柱承重而不设围护墙，这样可形成两面、三面甚至四面开敞的形象。

（6）水碓

水碓在水碓作坊内，它已成为窑村景观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大溪两侧的卵石路径，是村内最重要的两条道路。在每条道路的两侧，分别是矗立在卵石墙基上高高的住宅黄土墙，和沿溪点缀着的、距离或近或远、一座接一座的作坊和水碓。

水轮一般靠近水碓房，或一部分在水碓房内。水碓房即“碎泥”作坊，

从采泥场采集来的碎石料就被送到这里，加工成面粉状的“碎泥”。水碓房为双坡顶的木构简易房，它至少有一面开敞，以便水毂轮局部放在其屋檐内。水碓的主要构件有 6 项：石碓臼、石碓头、碓臂、碓刹（拨杆）、碓轴和水毂轮。臂、刹和轴都是木制，水毂轮也全用木材制作。每个水碓各配有个 4 石碓臼和 4 个石碓头，石碓臼用来盛放石料，石碓头用来敲打、粉碎石料。每个石碓头各连着一根碓臂，碓臂则由碓轴上伸出的碓刹控制起落。碓刹即水毂轮的轮轴。



水碓（罗德胤　摄）

（7）泥塘

泥塘位于拉坯作坊附近，经过水碓粉碎后的熟泥，被运到这里，经过“洗泥”的工序，成为“精泥”，就可以转移到拉坯作坊内用来制作陶坯了。泥塘由粗洗池、细洗池和沉淀池三部分组成，中间用砖壁隔开，粗、细洗池各 1 米见方，沉淀池约 2 米见方，合起来是个宽 2 米、长 3 米的矩形。粗洗池和沉淀池的深度约 60 厘米，细洗池的深度约 1 米。合作化以前的泥塘和作坊都是小型的、散落的，反映了陶瓷生产的家庭特征，一般

一个家庭拥有一组泥塘。泥塘和作坊分布于水碓的就近之处，它们占据着最靠近溪流的低地，住宅只好让位，修建在位置稍高的山腰位置上。当然，这也同时兼顾防洪的要求。

结语

中国古代村落，大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血缘性；二是农耕性。三卿口窑村在血缘性这一点上是与它们一致的。从清代前期开基祖人住此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已超过半个世纪的今天，窑村的居民都是由同一祖先传下的黄姓成员。到今天，黄姓在窑村已传至第十一代，而在其鼎盛时期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村落人口一度达到 300 人。

三卿口窑村与其他血缘村落的区别在于，它是以手工业为主的特征取代了农耕特征。农业耕作一般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烧窑尽管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陶坯加工、制作和陶瓷成品的销售，但在装窑和烧窑这两个关键环节上却必须采用全村合作、所有村民共用一两个瓷窑的集体生产方式，因为独立承担烧窑所需的大量燃料对于每一个家庭而言成本都太高，而一个家庭的陶坯制作能力也远不足以充分发挥一次烧窑的容量。

根据族谱记载，黄氏开基祖来到三卿口窑村，就是要“开窑创业”。这说明，黄氏祖先是带着手艺而来，并且来到这里就是要发挥其“技术专长”。因此，在村落的选址、布局以及房屋建造上，都结合烧窑手工艺来考虑。在选址上，和一般村落着眼于农业耕地不同，窑村更注重于为烧窑提供自然条件，比如瓷土矿、燃料（柴山）、水利等；在布局上，瓷窑、作坊、水碓等都是普通农业村落所没有的生产设施，它们的位置分布需符合生产的需要在房屋建设上，村内的各类建筑，包括祠堂、庙宇、住宅以及满足生产需要的不同构筑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瓷窑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

在这些条件都满足之后，窑村的窑工们还必须解决一个手工业生产不得不面临的关键问题——销售。农业村落的农耕生产旨在满足自家日常需要，因此村民们最关心当地的气候好坏，较少考虑村落以外的世界。而以手工业生产为生的窑村则与此不同，窑工们生产的大量商品陶瓷，如果不能销售给其他村落或城镇的人们，就不能转化为用以购买粮食与日用品的货币，他们也就无法生存。

总而言之，三卿口窑村已不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村落，其亦工亦农的生产性质，早已将自己的命运（至少部分地）交给了因连接浙、闽、赣三地而形成的“仙霞古道经济带”。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三卿口古窑村[J]. 建筑史，2009（1）：135-147. ）

参考文献

[1]［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释 . 天工开物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

[2] 李家治，邓泽群，张志刚，等 . 浙江江山泥釉黑陶及原始瓷的研究 [M]// 李家治，等著 . 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56-59.

[3] 江山市文化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领导小组，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 江山文化资源荟萃，2005.

[4] 浙江省江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江山览胜（《江山文史资料》第八辑），1988.

[5] 须江黄氏族谱（民国年间刊本）.

第十节
蔚县的“八百村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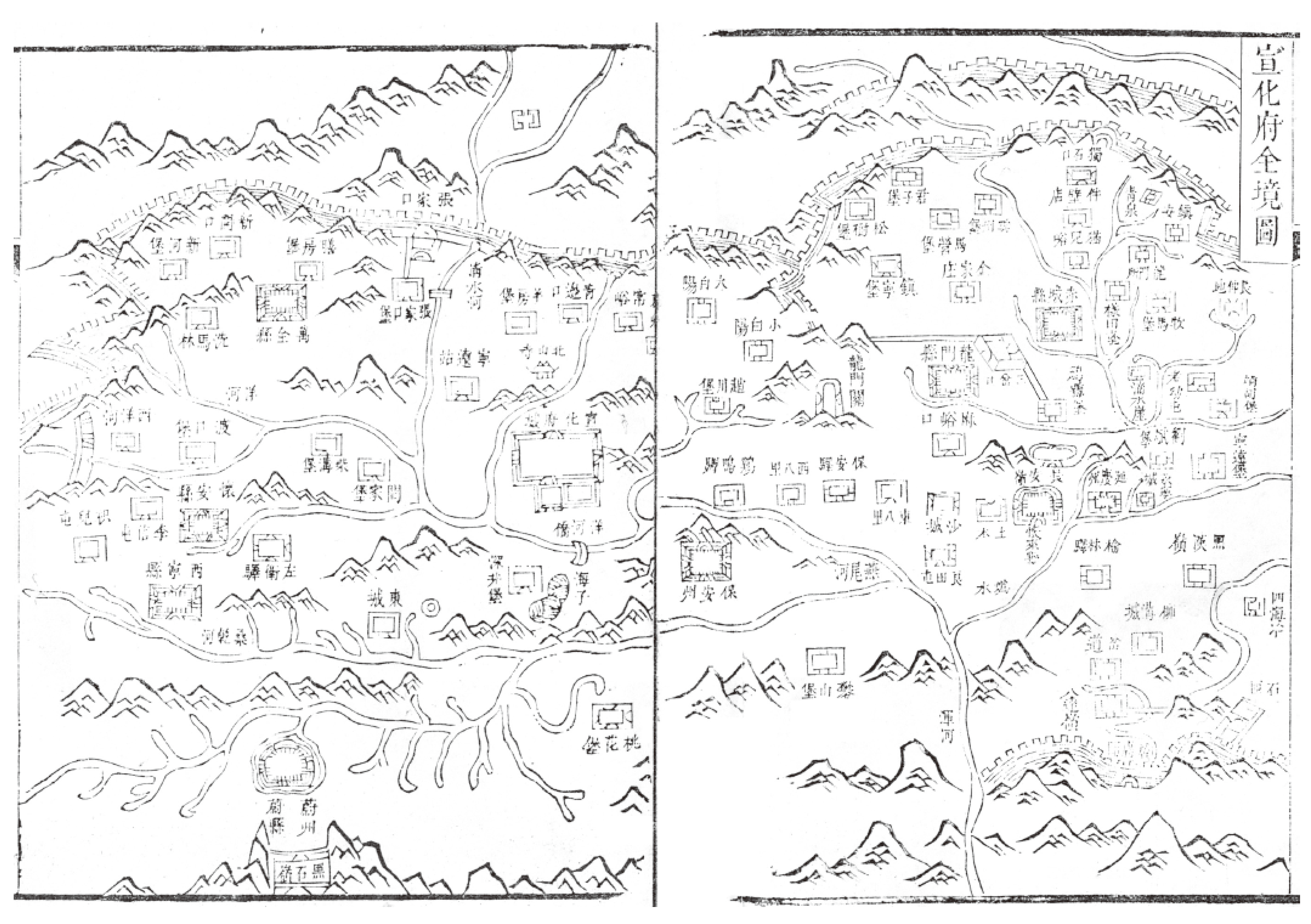
蔚县位于北京西面约 240 千米处，介于张北高原（俗称“坝上”）和华北平原之间，属河北省张家口。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历史上的军事地位，有“京师肘腋，宣大喉襟”之称[1]。明代将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总叙》中曾说过：“若夫北方原野，地形既殊，虏马动以数万，驰如风雨，进不能止。”从张北高原到华北平原所呈现出来的逐级跌落的三级台地，非常适于骑兵驱驰，古代游牧民族的骑兵队伍，就曾经不止一次由此挥师南下，直逼华北平原。为了抵抗骁勇彪悍的游牧民族骑兵队伍，中原王朝往往不得不在其北部边境广修防御工事（长城即是最著名的产物）。在明代，尤其是永乐定都北京以后，由于京师靠近边境而时刻面临鞑虏、瓦剌等北方民族的威胁，防御工事的修建就尤显迫切而重要。

蔚县地区大量城堡的修建，正以此为时代背景。其位置正好在二级台地上和内外长城之间，西有雁门关，东有紫荆关和倒马关，北面则是由宣化、榆林和大同连成的军事防卫线。它既是中原王朝一处关隘和边防后勤基地，又是极易遭受游牧民族骑兵队伍掳掠的前沿地带。

这一军事特点也决定着蔚县境内城堡的类型：既有官方斥资修建的大

1　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杨百之. 重修蔚州城楼记. 蔚州志（光绪丁丑版）· 卷十 · 金石志（下）.

型城堡（“官堡”），又有大量民间自修的小型城堡（“民堡”），还有原先是民堡后来又被改造成官堡的城堡。城堡的数量很多，根据县博物馆馆员贾晓所介绍，有“村村皆堡”和“八百城堡”之称。尽管在最近的几十年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毁坏甚多，但根据 1985 年进行文物普查时的统计，县域内仍保存城堡将近 300 座，最近的调查统计则表明，大约有 150 座城堡得以留存。[1]



宣化府志（全境图）

城堡修建的原因

（1）九边

边防紧迫是明代大批城堡修建的直接原因。朱元璋将元蒙势力驱逐出

1　蔚县人民政府．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做好文物保护工作，2001 年 7 月 3 日．

大都并令其退居塞北的过程可谓一帆风顺，但若想进一步将其根除则殊为困难。明洪武五年（1372 年），徐达曾率兵出雁门关与元兵作战，遭袭大败。此后鉴于北元势力尚强，朱元璋遂制定“来则御之，去则勿追”[1] 的军事策略。这一策略是基于现实状况而制定的，符合实际，但也相当被动。蒙古骑兵随时可能反扑，中原部队就不得不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于是，修筑城堡、恢复长城就成为边关将领的首要任务。与徐达在怀柔修复慕田峪长城大约是在同一时期，“卫所指挥怀远将军”周房也在“周围以里计者七”的蔚州旧址上修复城墙，并创建城楼[2]。在修城的过程中，由于砖的需求量大，且十分迫切，不得不将南门西侧的南安寺拆除（唯南安寺塔得以保存），将其砖材用于建城。这便是蔚州志中记载的“周房建城用砖，寺废惟塔存”。[3]

根据乾隆版《宣化府志・卷八・城堡志》中的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宣府地区修建的府、县级城堡除蔚州之外还有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的怀安县城和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的万全县城。另外还扩建了两座城堡：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的宣化府城和永乐二十年（1422 年）的怀来县城。

大批城堡的修建或修复为明朝军队的防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明军进一步出塞北伐做好了准备。事实上，明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策略，在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也正是以积极进攻为主的，直至英宗（1424—1464 年在位）“土木之变”以后才沦为消极抵抗。[4] 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1410—1424 年），明成祖朱棣曾先后五次亲征漠北，给蒙古诸部以沉重的打击。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纠纷和斗争远未就此而结束，一旦出现气候恶化或水草不敷等因素，游牧民族的骑兵便只有南

1 明太祖实录. 卷 78:3.

2 杨百之. 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重修蔚州城楼记. 蔚州志（光绪丁丑版）· 卷十 · 志八 · 金石志（下）.

3 蔚州志（光绪丁丑版）· 卷五 · 地理志（下）.

4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军事史（第四卷）· 兵法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227.

下劫掠粮食和财物以维持生存。而为了防止和抵御随时存在的游牧骑兵的威胁，明王朝只有继续扩大其边防建设，“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1]到明中期，终于形成著名的“九边”[2]之制。

（2）屯军

城堡的修筑还和明太祖朱元璋首倡而其后历代君主遵行不悖的“屯军”政策密切相关。

朱元璋的边境政策，初为“边民内徙”，后为“以军实边”。明初徐达出兵雁门关失败后，朱元璋为根除蒙古部众在该地的群众基础，决定将雁北一带的居民迁往长城以内，“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3]，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4]。这给边塞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雁北地区作为明朝的边防重镇，大量士兵常年戍守，又远离中原产粮区，如果没有当地后勤支持势必难以维持。明初的蔚州城，甫经战乱之灾，“城中道尽暴骼，满目纵横，尘肆凋敝，粟竭殚”[5]。拿这样破败的卫戍之所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显然难以胜任，解决问题的出路即为“寓兵于农”的军屯政策。洪武八年（1375 年），“中书省臣奏山西大同都卫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顷，岁收粟豆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余石”[6]，成绩可谓不菲。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开始，朱元璋逐渐扩展大同一带的军屯规模。今蔚县宋家庄的苏氏开基祖苏镇，以威武将军职人籍蔚县宋家庄[7]；蔚县暖泉镇北官堡的刘氏

1 [明] 魏焕 . 皇明九边考 · 镇戍通考.

2 [明] 魏焕 . 皇明九边考 · 镇戍通考：“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

3 今安徽凤阳。

4 明太祖实录 · 卷八五：1516.

5 杨融 . 明洪武十年（1377 年）创建鼓楼记 . 蔚州志（光绪丁丑版）· 卷十 · 志八 · 金石志（下）.

6 明太祖实录 · 卷九六：1653.

7 宋家庄苏氏祠堂清同治四年（1865 年）碑.

坟谱则记载，其祖先为“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之大柳树村人，洪武年间始迁蔚郡，卜居城西暖泉村”[1]，以迁徙时间来推测，很可能也是因屯军而到此地的。

然而大量士兵囤积于边境，却并不见得时时都能派上用场。实际上，北方少数民族骑兵一般也只是在因气候恶化等因素导致其日用不敷时，才会以掠夺粮食与财物为主要目的而冒险南侵，其余大多数时间内明朝的边关将士都是处于备战状态。在此背景下，屯军逐渐演变为以耕地为主而守备为次。这种转变显然得到了官方的首肯，或者可以说就是官方所采取的措施，《明太祖实录》记载：“上以山西大同、蔚、朔、雁门诸卫军士月给粮饷，有司役民转输，艰苦不胜，遂命各卫止留军士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以息转输之劳。”[2]额定人数五千六百人的卫所，只留下一千人进行守备，其余四千六百人都去耕田。用今天的话说，是实行“就地军转民”了[3]，成为一种特殊的农业生产方式。

屯田政策并不止于为军队解决粮饷。乾隆版《蔚县志·武备志》中记载，明景泰元年（1450 年）“其近紫荆关树木已令蔚州出给，告示禁约，居民不许砍伐，仍听差人巡禁，敢有犯者，拿送蔚州治罪”。这是将蔚州视为军事前线的后勤保障基地了。

与此同时，屯军的耕守方式也不可能不对当地居民产生影响。出于自守的需要，边境及其附近的居民们开始以自发的方式修建城堡[4]，“有警

1 刘氏坟谱，现存北官堡内居民刘喜金家中。但坟谱称刘氏源自洪洞县大柳树村是不可靠的，因大多家谱或坟谱都有同样的叙述，大柳树村不可能迁出如此多的人口（据估计可上百万）。后文中仍出现有家谱或坟谱记载其家族来自洪洞的文字，只将其列出，不再赘述。

2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3377.

3 这种“就地军转民”的方式并不是将军丁彻底转成平民，因为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而且军丁世袭（一人从军，一家即永远为军户，轮流出丁，至期返卫）。

4 从蔚州志和宣化府志中不止一次出现的“原民堡，土筑”等字眼来看，明代确实存在民间自修城堡的现象。

则入城堡，无事则耕，且种且守”[1]。明朝官府对于民间自修城堡自然持鼓励态度，而且也可能参与某些城堡的修建过程，因为这符合朱元璋“与其养兵以困民，易若使民力耕而自卫”[2]的主张。魏焕在《皇明九边考·经略总考》中就明确表示：“或百十家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筑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以为守，少者徙以附焉。”把边境的百姓发动起来修建大小不等的城堡，还要将许多零散的住户迁徙到就近的城堡之中，必定牵扯到诸多繁杂的组织工作，若非官府出面筹划协调难以顺利完成。对于一些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民堡，官府也会出资将其改造为官堡，比如蔚县东部的桃花堡（已毁），“原民堡，土筑，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设防守，万历十二年（1584 年）砖瓷”[3]。另外还有乾隆版《宣化府志·城堡志》中提到的赤城县滴水崖堡、伴壁店堡、样田堡等实例。

蔚县城堡的形制

既为城堡，防御性无疑为其最重要的特征，蔚县古时的居民们也正是靠着坚固高耸的堡墙的庇护，才得以多次免遭游牧民族骑兵的洗劫与土匪山贼的杀戮。

一般来说，官堡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修建的规模也比较大。如蔚州城，其周长“七里十三步”[4]——相当于现在的 4400 米左右。而民堡的规模就小多了，其平面大多近似于方形，边长 100 米左右，少数规模较大的，边长可超过 200 米（如暖泉镇西古堡，边长约 210 米。加上

1　[明]魏焕.皇明九边考·经略总考.

2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O：3225.

3　宣化府志（乾隆版）·卷八·城堡志.

4　蔚州志（光绪丁丑版）·卷六·建置志.

两个瓮城，周长约 1050 米[1]），而规模小的，边长只有四五十米（如水涧子西堡）。有的城堡，原先是民堡，因为所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后来又被改造成官堡了。蔚县东部的桃花堡（今毁），就是从民堡改造成官堡的一个实例，其周长“五百九十五丈”[2]——大约相当于现在的 1860 米，比州城小，但也比一般民间自修的城堡大。

城堡通常都有着相当严谨的规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圈土墙套一批住宅。相反，建筑类型十分多样。撇开官修的蔚州城不说，就是民间自修的城堡，在形制大致统一的前提下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大多数城堡的平面接近方形，堡墙为夯土垒筑，仅在城门附近的外墙铺砖，城堡当中有一条南北轴线的大街（当地称为“正街”），沿途分布戏台、城门、庙宇等建筑（后加的公共建筑，一般分布在各城堡的城门之外），最北端则大都为真武庙。这些戏台、庙宇等公共建筑反映了城堡内居民丰富的生活内容。

（1）选址

城堡的选址要考虑充分利用原有之地形。蔚县地处壶流河盆地，壶流河发源于与蔚县西部接壤的山西广灵县，由西向东流经蔚县县境，其南部为大山，北部为丘陵，除壶流河两岸为河滩平地之外，南北两面接近山丘处大多为“冲沟”（裂隙地形的俗称）。修筑在冲沟旁边的城堡，必定选择在靠近冲沟的台地之处。最理想的位置是城堡后方及左或右的一方为较深的冲沟，冲沟内常有雨水、山洪或泉水汇聚而成的水面，既是城堡内居民的生活用水来源，也是天然的护城河；其余两面则留有余地，以供耕作。修筑在河滩平地上的城堡，虽无冲沟可供依托，但仍然会尽量选择在

1　据暖泉一些人（如 72 岁的张德奎老先生）称，西古堡是官堡 . 但在乾隆版《宣化府志》和乾隆版《蔚县志》以及后来的光绪版《蔚州志》中均无暖泉城堡修筑的记载。考虑到暖泉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不排除官府出资协助修建城堡的可能性。此处暂且将其视为民间自修的城堡。

2　宣化府志（乾隆版）· 卷八 · 城堡志 .



西古堡南瓮城城门

北高南低的坡地上（尽管坡度可能很小），向阳而避风。有的城堡还会沿堡墙挖掘沟渠，形成一道小型护城河，以增加入侵者的进攻难度。此外，由于河滩地的城堡大都距离州城较近，交通便利，或人烟较盛，村落分布较密，遇到敌人入侵时也有利于州城官兵或就近村落城堡的居民前来救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河滩地形不利于防守的缺陷。乾隆版《蔚县志・卷二十二・故家》中记载：顺治年间，由于一股土匪作乱，“桃花、白乐一带日被焚掠，村人大恐”，此时一位名为裕良的人“率家丁，集里壮，分守要害”，与土匪相持两日两夜，一直等到“兵备道祝恩信统马步兵至”，“贼党始解散，村人得安然无恙”。

（2）互为犄角

对付入侵者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若干个城堡就近修筑，形成一个小型城堡群，各城堡之间互成犄角之势，一旦其中某个城堡遭袭，其余城堡的居民可赶来支援，对入侵者实行前后夹击。当年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若不是预先收服李应和擒住扈三娘，使祝家庄丧失李家庄和扈家庄的策应，恐怕再攻打几次也未必能成功。如果翻开 1937 年杨震亚绘制的蔚县八大集镇街巷略图[1]，可以发现八大集镇中除了县城和桃花堡是比较大型的城堡外，暖泉镇、代王城镇、北水泉镇、吉家庄镇、白乐镇五个集镇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城堡，西合营镇的城堡最少，也有两个。暖泉镇的三个城堡分别是西古堡、北官堡和中小堡，其中西古堡位于暖泉镇的西南角，中小堡在其东面，与之并排，两者之间仅一巷之隔，而北官堡则位于西古堡和中小堡的东北方，距离中小堡大约五百米。除八大集镇外，也不乏几座民堡相互临近、互为支援的实例。如涌泉庄的水涧子三堡，西小堡位于最西边，西堡在其东面，两者隔一道沟堑相望，东堡则位于西堡的东北方，距离也大约是 500 米。

1 现存蔚县地名办公室。

（3）瓮城

瓮城又名“月城”，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用来屏蔽城门的小城，其功能是用于增强城池的防御层次。守军出城时，先关住瓮城外门而开城门，待欲出之军齐集瓮城内时，再关城门而开瓮城外门，守军出外门时城门是关闭的，可防止敌人乘隙冲击城门。收兵或退兵时，也是两道城门不同时开启，在瓮城内暂储退兵，以免敌兵冲门。北宋大学士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前集 · 守城》中记载：“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由“偏开一门”可知，瓮城城门与大城门的朝向一般呈 90° 交角，其好处是：即使敌军攻破瓮城城门，进攻路线也受到阻隔，须绕弯之后再进攻大城门。这一方面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另一方面瓮城顶上的守军可以借此居高临下从四面围攻敌人。所谓“瓮中捉鳖”，就是对瓮城最生动的描述。

瓮城的另一个作用是防洪，其原理与防御敌军进攻的方式类似。一方面，瓮城可让城门免受洪水直接侵袭；另一方面，瓮城的大门偏于一侧，也使得洪水即使冲入瓮城也由直线冲击转为瓮城涡流，大大减轻对城门的冲击。

具备瓮城的城堡一般规模都比较大。蔚县境内现存的城堡，目前只发现蔚州城和暖泉镇的西古堡有瓮城。蔚州城原有东、西、南三座瓮城，分别叫做东关、西关、南关，现在三座瓮城的城墙均已无存，但由护城河环绕所形成的地基轮廓仍清晰可见。三座瓮城中，规模最大的是南关瓮城，根据光绪版《蔚州志》的记载：“东关城周二里二百一十步，西关城周一里三百三十四步，南关城周三里二百七十步。”[1] 从 1987 年测绘的蔚县地形图上测量南关城基址，东西走向的宽度大约为 150 米，南北走向的长度大约为 70 米。暖泉镇的西古堡，南北端各有瓮城一座，其城墙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北瓮城位于北门外，其东西走向的宽度为 43 米，南北走

1　蔚州志（光绪丁丑版）· 卷六 · 建置志 .

向的深度为 48 米，瓮城上原有庙宇和城楼，但毁坏严重，只剩灵侯庙（也即北城门楼）的残迹。南瓮城位于南门外，其东西走向的宽度为 48 米，南北走向的深度为 28 米，瓮城上的庙宇和城楼大部分留存，并在近年得到修护。两座瓮城的城门均朝东开，分别与北门、南门成直角。

（4）城门

城门既是城堡保障设施中最薄弱的环节，又是一城之“门脸”。城门越多，越不利于防守，因此城门的数量必须尽量少，而且一般都把持进出城堡的主要干道。拿蔚州城来说，其周长 4.4 千米，面积 1.6 平方千米，只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各设一道城门，分别控制蔚州城内三条最主要的干道。而蔚县境内民间自修的村落型城堡，边长仅 100 米上下，面积为 1 ~ 2 公顷，除少数开两门外多数只开一道堡门，堡内居民不管远近，进出都须走此门。

出于防御功能的考虑，城门往往不直接暴露在广阔的旷野之中，而城门之外的空间也必逼狭而不利于入侵者的进攻。除了前面所说的瓮城可以将城门完全屏蔽在内之外，不具备瓮城的城堡则多半在正对城门之外、距离城门 8 ~ 10m 处修有庙宇或戏台，使得城门“半遮半掩”，也使得进出道路多了几番周折。宋家庄乡的上苏庄，可谓其中楷模。首先，因为城堡之南为一深沟，不便于开门，其堡门便改设在西侧；其次，西侧堡门并不正对西边堡外的马路，而是将城堡之西墙南段向外推出约 4 米，使城门朝北而开；再次，城门之外设一戏台，坐南朝北，背朝城门，面朝西边过来的马路。总而言之，行人在经过关帝庙、五道庙等庙宇后，仍须绕到戏台背后方能看见城门。这充分反映了建造者的煞费苦心。

在具体的建筑处理上，城门既要造型美观而形象突出，又必须十分重视坚固性。由于是在夯土墙或砖包夯土墙的城墙上开门，城门一般以发砖券的形式形成门洞，其宽度和高度根据城堡规模而有所区别。规模较大的城堡如蔚州城，现存的城门只有南城门一座，其门洞拱顶高 5 米，宽 4.5

米。规模较小的城堡则是大量的民堡，其堡门门洞宽约 3 米，门洞拱顶高度则一般略大于门洞宽度。暖泉镇西古堡，连两座瓮城门在内共有四座城门，门洞的宽度从 2.2 米到 3.1 米不等，门洞的高度介于 3 米与 3.7 米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座城门的尺度由南而北依次递减，这和防御功能也是相吻合的。

蔚州城是官堡，其城墙高度约为 12 米，民堡的堡墙高度不及官堡，却也有七八米。西古堡的瓮城城墙比堡墙还高出几米，达到 10 米左右。显然，相对于城墙的高度而言，门洞的尺度往往显得不够醒目，也不够美观。解决此问题的方法通常有三：一为建城楼，二为立照壁，三为券门外立面上添加匾额、叠涩、门簪等装饰性因素。蔚县城堡除了上述三种方法均采用之外，还有一个极富地方特色的做法，即在券门外立面的城墙上部添加仿木构的“砖作垂花门”。尤其是在一些城门洞高度较低而城墙又较高的城堡中，“砖作垂花门”往往作为砖券券门与木构城楼之间的过渡性装饰元素。

最后来看大门本身。大门由两扇门板组成，民堡大门每一扇宽约 1.5 米，高 3 余米（蔚州城的大门现已无存），由大约 10 块长条木板拼就，一侧安装门轴，置于“轴碗”上，控制大门开启闭合。城门洞的地面中间通常安放一块石头，谓之“将军石”，起“把门”作用。另外，现存的城堡大门还表明，门板原先都外包铁皮，如水涧子东堡和上苏庄的堡门门板，外侧表面满布钉眼，就是铁皮脱落后留下的痕迹。如今，虽然完整的包铁皮城堡大门已较少见到，但一些新建的住宅还往往喜欢用新式的包铁皮门，这在县城里就有好几家。

（5）真武庙

蔚县城堡大多不在北侧城墙开城门，北侧的正中位置一般筑高台，台上修建真武庙，“以镇浮浇之风”。[1] 真武庙正对城堡中轴的“正街”，作为主街尽端的结束点。

1　水涧子西小堡真武庙内的残碑。



从真武庙看北方城正街

真武大帝是道教神仙，司职北方，因北方五行属水，故真武也是管水的天神。用管水的天神坐镇城堡，可防止水灾和火灾（水灾危害百姓生活，火灾威胁木构建筑）。明代永乐皇帝早年以皇子身份督军北平，并由此而南下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其间多有假借真武大帝名义之处，因此登基后对真武大帝尤为崇奉。永乐十年（1412 年），明成祖命隆平侯张信率军夫二十余万大建武当山宫观，使武当山的香火达到鼎盛。武当山真武阁的建筑选址与空间序列之营造手法，更是成为宗教建筑中的典范。

蔚县的城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武当山在平原上的翻版。除州城外，大多数城堡在北端用一组或几组台地来强调真武庙在村落空间序列上的高潮地位。如北方城的真武庙下，有三层台地，最上一层台地部分突出于北面的堡墙。由正街登上三层台地的台阶，由下至上分别为 7 步、13 步、23 步三段。再如水涧子东堡的真武庙，整个庙宇分成前后两个台地，前一个台地与正街之间由 7 步台阶相连，台阶之上紧接着就是一道院门，过此院门后，有 31 步台阶通往正殿，使正殿凌驾于城堡内所有住宅建筑之上。



水涧子东堡真武庙



从阎家寨城门看真武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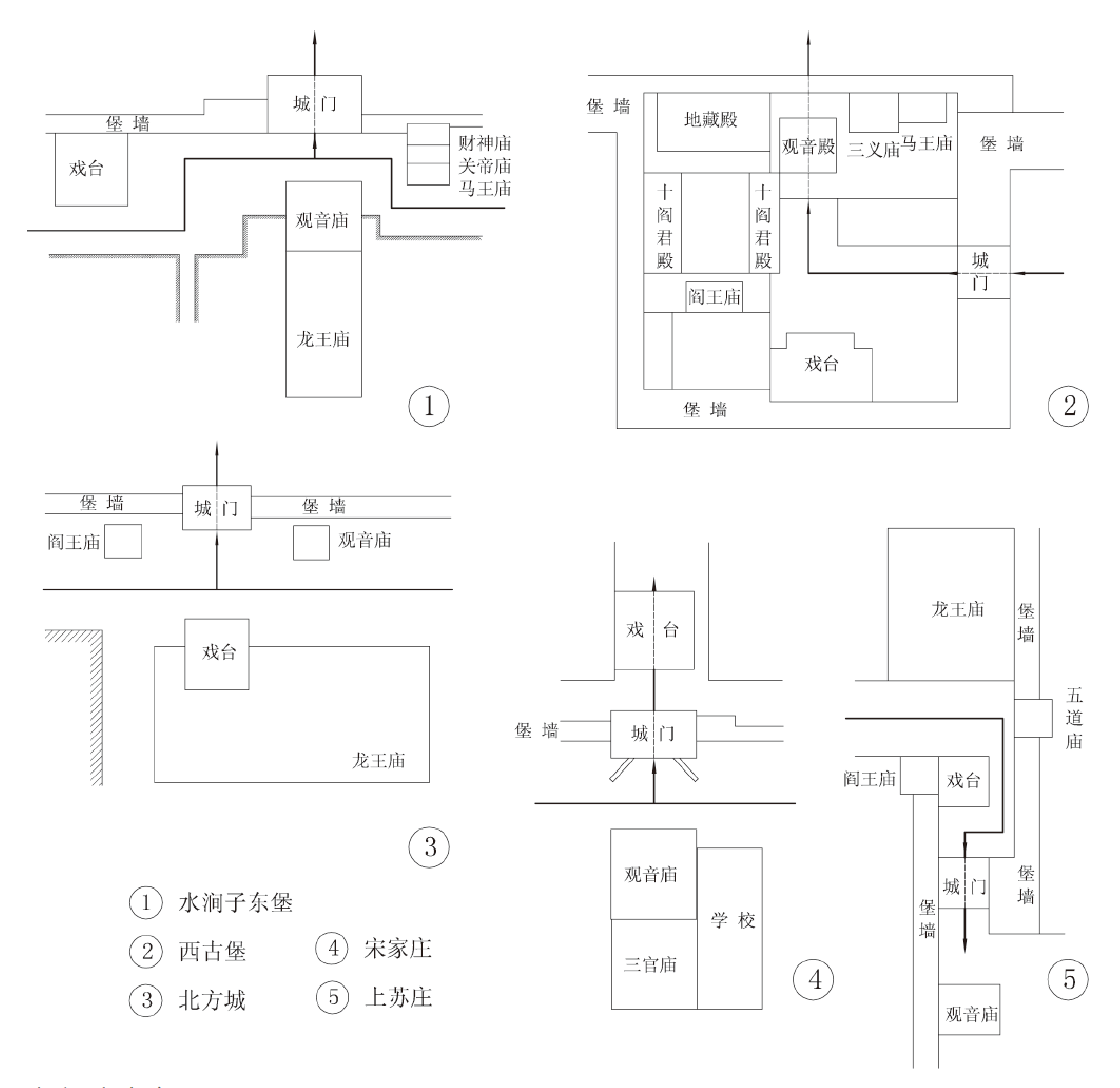
坐镇城堡北方的真武庙，也起着重要的军事作用。真武庙通常矗立在城墙之上，此处可瞭敌，可防御，可指挥，军事地位非同一般，不亚于城

堡的南门城楼。南门城楼和真武庙，一南一北，一前一后，共同组成城堡的军事枢纽。

真武庙还有着不容小觑的艺术作用。真武庙在城堡的北端高起之后，与南门城楼共同形成城堡中轴线上南北两端的标志物。从旷野中望去，平缓绵长的堡墙两端，各有一座高起的建筑，在构图上显得完整而平衡。可以想象，如果只有南门城楼而北端无真武庙作为结束，总是个缺憾。与此同时，进入城门的行人抬头即可望见北方雄伟高峻的真武庙，这在视觉心理上也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

不过，也有少数城堡在其最北端放置的并不是真武庙。蔚州城有真武庙，但不在最北端，而在城之西北方，位于最北端的是靖边楼（即玉皇阁）。这和靖边楼的建造年代较早且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有关。靖边楼是在明洪武十年（1377 年）和蔚州城墙同时修筑的，从它的名称就能看出，当时的修建目的旨在军事防御，所以“卫所指挥”周房将军把它建筑在突出于蔚州城北方、同时也是蔚州城（包括城内与城外附近）地势最高的一块台地上。后来真武大帝受崇，蔚州也修建真武庙时，靖边楼作为蔚州之象征早已深入人心，其地位不可动摇，于是真武庙也只好另觅他处，不得不偏于西北一隅了。暖泉镇的北官堡，于城堡南北轴线北端修马王庙，马王庙的东北方另起一高台，台上筑玉皇阁。大酒务头堡，真武庙位于城堡中心，北端为三官庙。上苏庄，其最北端为三义庙，供奉桃园结义的刘备、关羽和张飞，为的是强调杂姓村落里“异姓兄弟亲逾骨肉”[1]。西陈家涧北端，由低到高、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龙厅（平时不供奉龙王爷塑像，只在求雨时将其抬至此处，使其观南门外戏台上的戏曲表演）、真武庙和玉皇阁三座庙宇。也许这最能体现龙王爷、真武大帝和玉皇大帝这三位神明在村民心目中的座次了。

1 上苏庄三义庙内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重修三义庙碑记》。



堡门庙宇布局

（6）公共建筑群

真武庙、玉皇阁、三官庙和三义庙等庙宇都属于公共建筑，而蔚县城堡里的公共建筑却远不止这些。一般而言，修建于城门附近的建筑还可以有戏台、观音殿、龙王庙、文昌阁、关帝庙、马王庙、财神庙、地藏寺、五道庙、影壁等。蔚县城堡的形制是统一的，但城门附近戏台、庙宇等公共建筑的修筑和配置却差异甚大。它们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即使组合相同又会因村民喜好与地势不同而在布局和规模上有所差别。所以，各城堡城门附近的公共建筑在实际修建中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



西古堡总平面

蔚县城堡的公共建筑自明代就有。[1] 修城堡的同时自然也要修城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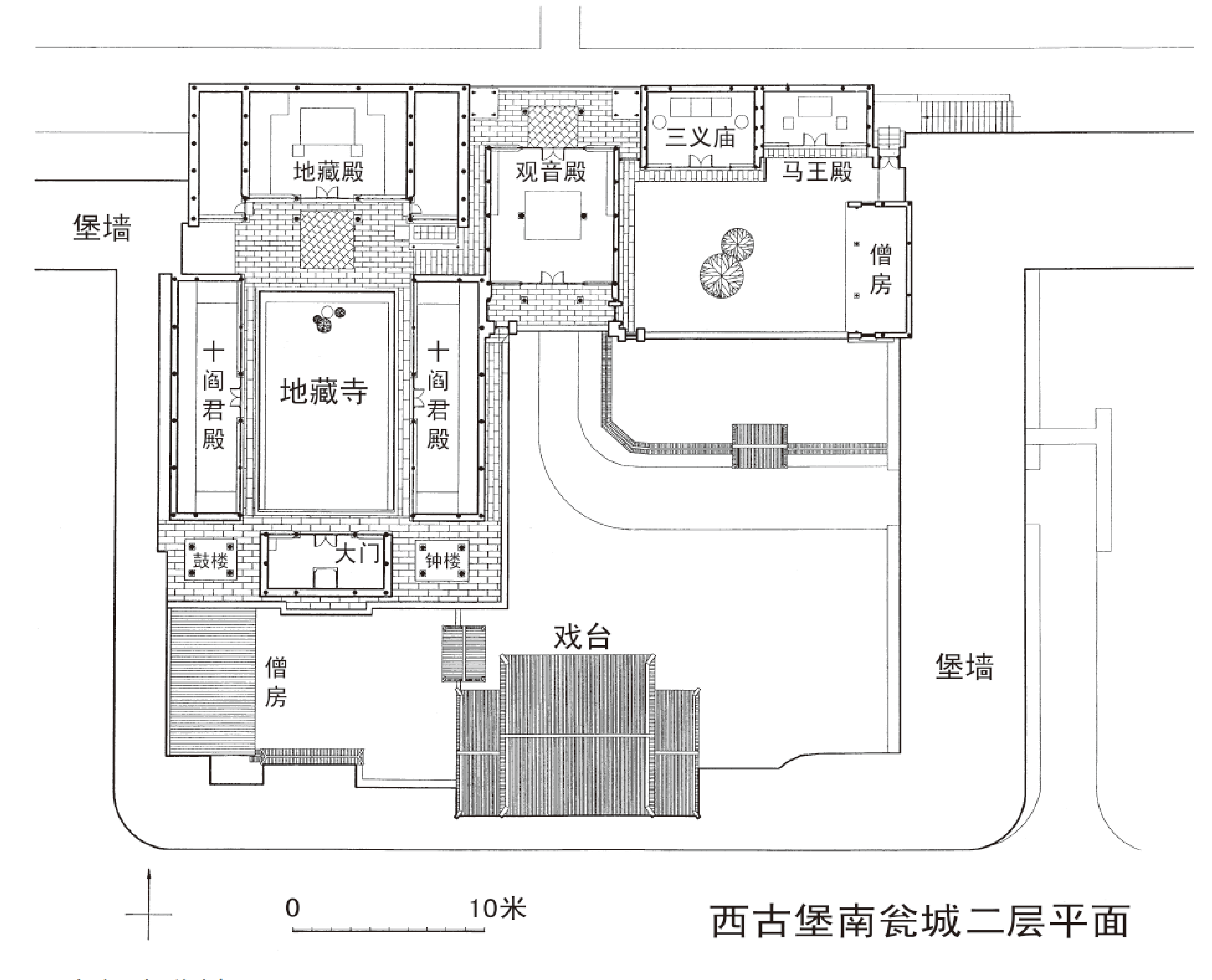
1　在明代修筑城堡以前，蔚州城已出现释迦寺、南安寺等庙宇，但乡村中的建筑则难以考察。此处只讨论周房修蔚州城墙以后蔚县境内出现的各类公共建筑。

而城楼往往又可兼作庙宇。蔚州城的东、西、南三座城楼和北侧的玉皇阁（即靖边楼），就是周房将军于明洪武十年（1377 年）修建的。水涧子西堡的三官庙，根据现立于庙内耳房的乾隆十九年（1754 年）重修碑记，则是“万历年间监生吴公荷重修”。还有数量可观的真武庙，根据它们和城堡的位置关系来看，很可能在城堡修建之时就已是规划之内的重要建筑了。就此而言，明代修筑的公共建筑，往往与军事防御功能密切相关。之所以北方的真武庙或者玉皇阁要“高厚峻整”[1]，还是因为它们具有登高瞭敌的作用。

入清以后，满族以游牧民族入关一统天下，曾经困扰中原王朝的边塞问题不复在蔚县出现，蔚县城堡之防御性也逐渐为当地居民们所淡忘和忽视。同时，由于康熙、乾隆年间全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壶流河盆地又兼有南通华北大地、北连塞外草原的交通枢纽之利，终于给久经战乱、饱受困苦的蔚县带来了一次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又促成了城堡建筑的建设高潮。不过，此次建设高潮，不仅仅是修墙筑寨，更多的是体现在原城堡正门外添加大量庙宇、戏台等公共建筑上。在安全得到基本保证之后，乡民们便开始用各种宗教和文化来提高和丰富他们的生活了。在城门之外，他们或增加、或修复了庙宇、戏台或者店铺。如暖泉镇的西古堡，就在瓮城内修建了地藏寺、观音殿、三义庙、马王庙四座庙宇和一座戏台。

即使在这个时候，城堡的防御功能也仍然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游牧民族的骑兵虽然不再南下剿掠，北山和南山上仍不时有土匪下山洗劫。通过对暖泉三堡、水涧子三堡、北方城、宋家庄等地居民的调查和采访可以知道，一直到 1948 年以前，各个村落城堡的居民仍然保持着堡内居住、堡外耕作和天黑即关堡门的习俗。换句话说，1948 年以前城堡内的居民，只有在坚壁高墙、堡门紧闭的城堡内才会感到真正的安全，尽管他们在城堡外的市场上获得了

1　嘉靖十七年（1538 年）杨百之. 重修蔚州城楼记. 蔚州志（光绪丁丑版）· 卷十 · 金石志（下）.



西古堡南瓮城二层平面

财富和生活用品，又在城堡外的戏台下得到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结语

蔚县的城堡村落群堪称中国古代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类型。说它特殊，是因为数量如此庞大，同时又如此集中地反映军事防御特征的村落实属罕见。或许在明清时期的雁北地区，或者在范围更大的山西、河北省境内，这种城堡型村落是颇为常见的，但能够批量留存至今的，目前却只剩蔚县了，即使在邻近的阳原、怀来、涿鹿、广灵等地，尽管不乏个别实例留存（如怀来的鸡鸣驿），但在数量上是不能与前者相比的。而说它重要，则是由于它十分突出地反映了在明代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民

族和以游牧文化为主导的北方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流状况，这完全符合《威尼斯宪章》关于“历史文物建筑”的定义——“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1]，也完全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六条标准中的第二至第五条。[2]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蔚县城堡村落群考察 [M]// 建筑史. 第 22 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清] 庆之金纂，蔚州志（光绪丁丑版）.

[2]《明太祖实录》卷 78，卷 85，卷 96，卷 220，卷 231.

[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 中国军事史（第四卷）[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4][明] 魏焕 . 皇明九边考.

[5] 蔚县暖泉镇北官堡刘氏坟谱.

[6][清] 王者辅纂 . 宣化府志（乾隆八年版）.

1　陈志华先生翻译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1964 年 5 月 31 日于威尼斯）中的原文。

2　这五条标准分别是：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城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见证；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可作为传统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摘自“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2003 年 9 月 29 日，http;//www.wenbao.net/html/xinxi/a010.htm。

第十一节

琼库什台：牧业因何成聚落

琼库什台是新疆伊犁地区特克斯县的一个村落，于 2010 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该村距离县城 90 千米，是一个有 300 多户、1700 多人的牧业村，居民以哈萨克族为主。牧民的生活是“逐水草而居”，怎么会形成一个聚居的村落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于 2014 年秋天进行了一次现场考察。



俯瞰琼库什台（范秉乾　摄）

路途所见

从特克斯县城到琼库什台的道路，大部分是砂土路，车程 3 个多小时。这段路的前半程，两边的风景是属于干旱或半干旱的，衰草连天，一片肃杀的深秋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唐朝塞外诗人的诗句。偶尔也能见到村庄，土坯垒成的房屋，零零散散，村子周围是收割之后的麦田或玉米地。也有种向日葵的，面积相当大，另有一番壮观的气魄。最令人惊奇的是新疆建设兵团正在草原上改造的麦田，每隔一两百米挖一条垂直于公路的、长长的深沟。沟挖得深，是为了在冻土层以下铺水管，好在夏天为小麦浇水而在冬天又不至于冻裂。小麦也是草的一种，所以这里将会出现一个特殊的人工草原。

越野车行走在天山山脉的西端。我们队伍里有北大地理系的硕士刘业成，他从专业角度给我们普及了天山的知识：天山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山脉，它在形成之后又被抬升，因此形成了台地上有无数山头、台地之间有深谷的地貌。深谷里有河流，在这一片干旱地区，沿着河流就形成了绿洲；绿洲里有人家，就形成了村落。这些村子，都是农牧兼营的，也就是说，既种粮食，也养牛羊。所以，我们在路上不时地邂逅牛群，也经常看见在山坡上吃草的羊群。

在离开特克斯县城约 30 千米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一个山谷里的绿洲，里面有一个叫“克孜库拉”的村子。近年来因为“退耕还林”，村子附近沿着河边出现了一大片杨树林，郁郁葱葱，和四周山坡上的黄土衰草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我们的司机师傅叶尔肯说，这个村子原先确实是有一些杨树的，但远不及现在这么多，因为退耕还林的政策大大鼓励了村民种树，才促成这一大片杨树林的出现。这又是另一种人工景观了。杨树能适应干旱寒冷的气候，稍微给点水就能长到几十米高。杨树多了，对村子是有好处的，可以挡风，还能快速地恢复生态植被（这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尤

其有用），又能作建材和造纸原料。这些年我国通过大力推广，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工种植杨树最多的国家。

克孜库拉村是当地原住民的村子，房屋修建得比较零散，不太成规矩。我们沿途还看见了另一类村子，是属于新疆建设兵团的。它们都被冠以几师几团几连的称号，房屋修建得整整齐齐，形同矩阵，连屋顶的颜色都是统一的红色。叶尔肯说，我们去往琼库什台村的道路，绕山而建一共有 90 道 180° 的大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缓坡。兵团的队员们不仅要种地、养羊、放牛、牧马，还要负责修路。果然，我们在路上有好几次看见挖掘机在平整因滑坡毁坏的路段，这都是兵团队员的劳动了。

车子离开县城大约两个小时的时候，窗外飘起了小雨，路旁的景观也发生了变化。草开始变多了，而且变绿了。过了一会儿，甚至出现了树林。除了杨树，更多的是松树和杉树。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发生这么大的植被变化，多半是海拔发生变化所导致的。我们车上的表盘有海拔计，上面指到 1800 米，比特克斯县城的海拔大概高了 800 米。

按照地理常识，同一地区的海拔变化会导致立体气候，进而导致植物种类的立体分布。通常在低的地方是阔叶林，往高处走会变成针叶林，再高会是高山草甸，继而是不长草或半长草的荒原，最高处将是雪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布，是因为随着海拔升高，温度会降低，植物生长所需要的积温也相应减少。然而，这条路上看见的植被，和我脑子里的“常识”是不符的。为什么这里低处是半长草的荒地，而较高的地方会是草地和树林呢？原因是湿度。当湿度成为变量时，结果也要重新“计算”。从特克斯县城出发两小时，经过的基本上是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只有 400 毫米左右，而且日照充足，蒸发量很大，所以只有河谷绿洲才会有小面积绿植被，其他地方都是荒原。当海拔升高到 1800 米以上时，因为气温降低，湿气遇冷凝结，形成雨或雪，降落在高山区，使得这里的气候变得湿润，植被也变好了。

牧区的村庄和建筑

这里的村子也和之前看见的农村或兵团村是迥然不同的。建筑材料，是最明显的区别。低山区村子的房屋都是用土坯垒成墙体的，而这里的是原木垒成墙体的，当地叫“木楞房”。这一点其实也好理解，低山处因为干旱，缺少木材，多的是黄土，所以用土做建材。高山处有树林，砍伐木头比打土坯更省事，用木材建房是一个自然选择。另一个差别是房屋之间的距离。低山处的村子，尽管房屋也算不上密集，但相互之间总还是靠近的。但高山区的村子，房屋之间都隔着几十甚至上百米远，这就很难称其为聚落了。



牧民的冬季房屋（范秉乾　摄）

村落的结构发生变化，是因为产业不同了。低山区的村子是农牧兼营的，而高山区的村子是纯牧业的。牧民不用种地，但是每家都养了几匹马和上百头牛羊，需要大面积草场，所以每家都有不小的地盘，房屋自然就相隔得远。草场又是分冬季和夏季的。为了放牧，牧民们在冬季草场和夏季草场分别建一座房，这又加剧了聚落内部的离散性。不过，这种依傍山林的牧业区，和草原的牧业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草原上没有树林，所以

那里的牧民们只好住在毡房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蒙古包。这里有树林，人们便伐木建房。毡房的流动性比木楞房更强，所以相比于毡房里的人们，木楞房的主人已经具有较为明显的定居特点了。



牧民的夏季房屋（范秉乾　摄）

尽管建筑材料和聚落结构有很大差别，但低山区和高山区的村子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屋顶都是平的。低山区用平顶，是因为气候干旱，降雨少，不用建坡顶来排雨，而且平顶还能晒粮食。高山区也用平顶，说明这里的降雨虽然增加了，但是幅度不大，用略带斜度的平顶就可以排雨。同样是平顶，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低山区的平顶因为主人务农，需要晒粮食，上面要保持平整。高山区的平顶，因为主人不务农，不需要晒粮食，所以上面就覆土种草。叶尔肯说，屋顶上的草是牧民们特意种的，草根长起来之后，可以将屋顶的土粘结，这样就不怕冬天的大风了；如果屋顶的土没粘牢，大风就可能把整个屋顶都掀了。

是平顶就要防止雨水渗漏。低山区土坯房的平顶，是通过每年都要夯实和修补屋顶土层来解决渗水的。高山区木楞房的平顶，现在是在种草的土下面垫一层塑料布，好阻挡雨水下渗。在塑料布出现之前，牧民们是在屋顶上铺设油布作为隔水层。

琼库什台之美

我们在一个山腰台地上，看见了山脚下的琼库什台村。它静静地坐落在山谷里，依傍着琼库什台河。两边的山上，顶部是皑皑的雪山，雪山下面有密密的松树林。在松树林下面，沿着几条山坡之间的隙地，是雪水融化而形成的小溪。小溪在不同的高程上汇入琼库什台河，而在小溪两旁，因为水量充足，形成了几条斜带状的松树林，其中一条还伸进了村子里面，将村子划分成南北两部分。在村子上方和带状松树林之间，是高山草甸。紧贴着村子下方，沿河也形成了一片带状树林。这一片树林比较宽，里边的树种也比较多样，除了松树之外，还有杨树和一些较矮的树种。



琼库什台河（范秉乾　摄）

在我看来，琼库什台的美是缘于它在生态上的原始与多样。说它原始，是因为它大体上处于一个现代化之风尚未刮到的世界。牧民们在过着传统的放牧生活：出行主要靠骑马，食物和衣服主要取自牛羊，住房是用附近山林里的松树建造的。简而言之，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它得以保存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哈萨克族牧民世界。



骑马是牧民们基本的出行方式（范秉乾 摄）

说它多样，是因为它兼有雪山、森林和草原的景观特点。纯草原的景观，无疑是壮观的，但是未免单调。纯森林的景观，也许是深邃的，但会失于变化。如果只有雪山，也难以让人久看不厌。琼库什台的美妙之处就是它把这三者融于一体，而且利用溪流将它们相互穿插，彼此渗透，组合成一幅完美的画卷。

因校成村

在欣赏这世外桃源的美景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问题。相比于我们之前看到的牧业村，我们眼前的琼库什台村的房屋是相当密集的。同样是牧业，为什么那些村子没有形成聚落，而这里却成为聚落了呢？一定有某个特殊的因素导致了这种聚落形态的产生。如果是只有牧业，人们是没有必要住得相互靠近的。

塞尔江老师的村庄规划文本里为我们提供一个线索：1920 年两个部

落的百户长商议，建起第一座小学，使该村的孩子们开始接受最初的基础教育。

塞老师文本里说的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学校，位于琼库什台村的北端。最早的校舍是什么样，今天是看不到了。可以猜想，它应该是和普通牧民家的木楞房相似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上学”对于牧民们来说是个相当新鲜的事，只有少数人家不厌其烦地每天骑着马把孩子送到学校里来。现存的校舍有4座房屋，其中有木楞房，也有砖房，砖房的体量都比木楞房大。更重要的差别，是校舍的窗子都比较大，因为采光是决定上课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2011年，政府在距离这里以南约1.5千米处，新建一个质量更好、规模更大的学校，之后这处学校也废弃了。

从校舍的建筑演变看，近百年来学校的规模是在变大的。这说明学生的数量在增加，也说明牧民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和我们一起来做调研的新疆大学研究生祖丽也说，哈萨克族对于教育是真重视，他们愿意努力为孩子们读书创造出更好的条件。根据祖丽自己观察到的一个粗略印象，新疆大学这些年招的民族班里，可能一小半都是哈萨克族的学生。这个比例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在新疆，哈萨克族的人口为135万人，只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1%左右。

天天骑马送孩子来上学是件麻烦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有，那就是建第三个家。前文说过，牧民们为了解决放牧的季节问题，分别在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各建一个家。现在，为了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有的牧民干脆建了第三个家——让妻子和孩子住在学校附近，丈夫还是夏天去夏季牧场，冬天去冬季牧场。我们不知道是哪家人第一个建起了这第三个家，从现在的规模看，到2000年左右应该有大约一百户人家这么做了。

琼库什台之所以成村，居然是因为一所小学！这一现象是极有趣味的。不过这也让我们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琼库什台，算不算一个传统村落呢？在哈萨克牧区，学校应该属于一个现代性的因素。因为这个现代性的因素，

琼库什台才发展成为一个聚落。不过，除了这一点之外，琼库什台其他方面是保持传统的，包括房屋的形式与材料、牧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与节庆习俗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大体上是属于传统范畴的。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琼库什台是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村落。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我们传统村落的内涵。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范秉乾. 琼库什台：牧业因何成聚落. 村落遗产（工作通讯），2013（1）。）

第十二节

湖心坝：小花生引起大变化

湖心坝，地处粤北的一个客家村落，位于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的江尾镇内，南距县城龙仙镇约 13 千米。湖心坝是个单姓血缘村，村民姓沈。村内现存 30 余座围屋和围楼。

据族谱记载，沈氏祖先于明正统年间从福建迁到翁源。翁源在南北朝时就已立县，是广东省最早设立的县份之一，在岭南属于开发较早的地方。翁源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气温 20.3℃，年平均降雨量达 1788 毫米，是很适于农业生产的地方。县内有滃江贯穿全境，汇入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北江，对整个流域也起到很好的滋润作用。湖心坝位于翁源中部丘陵区，这里水源充足，更是农作物产量较高之地，如今水稻亩产可达 730 公斤，比县平均亩产要高出 100 公斤。

湖心坝所在之处，是一个四周有低矮丘陵环绕的小盆地，中间有一条名叫仁川河的小河穿流而过。按传统农业村落的选址规律，在小盆地里建村以山脚位置为佳，因为盆地中间要留给农业，而山腰又距离耕地太远，同时坡度过陡的地方也不便于建房。对湖心坝而言，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盆地中间因为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致使土质松软；这种土地

用来种水稻都过于湿软，建房就更不合适了。据老人们说，沈氏刚来之时，湖心坝这里一到下雨就被水淹。初来乍到的沈氏之所以没有选择在山脚立基，而是选择了盆地中央，是因为山脚的位置都已经让其他先来的姓氏占据，他们不得不选在盆地中央来落脚。



仁川河（罗德胤　摄）

在盆地中间建村，正是湖心坝之所以叫湖心坝的原因。同时它也说明，当时沈氏还是一支弱小的姓氏，其家族成员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能求得生存。其实这也是很多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客家人因此而形成一个特点：聚族而居，并且形成大型的、住祠合一的集体聚居住宅。诸如赣南的围屋、闽西的土楼、广东梅州的围龙屋和四角楼等，都属此类。湖心坝沈姓最初的住宅，也是个大型集体住宅，即平面呈半圆形的长安围。长安围始建于明天顺(1457—1464 年)，坐西向东，占地约 10000 平方米。围屋内的住房尺度小而且私密性差，从居住舒适性而言是相当不理想的，但是它便于形成较强的凝聚力，这对新移民的立足是有利的。



祠堂（孙娜　摄）

定居湖心坝之后，沈氏为了改善不理想的生存和生产条件，花了大力气来兴建水利设施。比如今天我们看见的宽度有 10 米左右的仁川河，原先只是一条小溪，是沈氏族人深挖疏通并拓宽的。此外他们还陆续修建了老虎坝陂、鸭嫲陂、河背陂、石龙头陂等防洪堤。

建村之初的湖心坝沈氏，和我们现在看见的沈姓家族是很不一样的。沈姓如今是江尾镇最大的两个姓氏之一，与张姓分庭抗礼。生存条件并不理想的沈姓，是依靠什么发展成为大家族的呢？答案是花生。前文已经说过，翁源县是一个农业条件很好的地方。这里除了盛产水稻之外，还出产甘蔗、水果、蔬菜、花生等农副产品。也许是穷则思变的原因，沈姓人家大概从清前期开始做起了收购花生和加工花生油的产业。

清前期时，随着广东省内的商业发展，翁源县的商业集镇和圩市也大大增加了。江尾镇水路可借滃江下珠江，旱路可经粤赣陆路进入江西，加上本地及周边乡镇盛产粮食，于是形成了以粮食及农副产品输出为主的商业形态。湖心坝沈氏，就专门从事花生购销和榨油业。村中老人们都说，解放前湖心坝是“家家收花生”。沈氏鼎盛时期在江尾街上开有 18 家榨油坊，几乎垄断全镇的榨油业。据老家是县城龙仙镇联群村的陈德道先生回忆说：“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村有一位嫁到湖心坝的媳妇，头年结婚，第二年就回联群村来收花生了。”这个例子说明，湖心坝沈氏在花生购销与榨油业上，是全民动员男女皆参与的，也是有很强的历史传统的。

通过花生购销和榨油业，沈氏大大改善了经济条件。同时，由于生产方式从粮食种植转变为粮食购销与加工，也使得他们的村落和住宅产生了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有条件的人家都纷纷离开老祖屋，在外面建房。这导致整个村落的发展脱离了大家族集体聚居的特点，转向家庭小集体式。除长安围外，湖心坝现存还有 31 座围屋或围楼，另外有 27 座已经坍塌毁坏。

这些围屋（楼）都分布在长安围的南面，密密匝匝，首尾相连。湖心坝冬季盛行北风，仁川河又是从北向南在村子西面流过，所以后建的围屋都位于长安围的下风口和下游。据村民们说，湖心坝的北风是相当强的，从风水上叫做“煞气很重”。长安围的东侧原先建有一座炮楼，就因为受不住“煞气”，最终倒塌。从这个角度来说，湖心坝的家庭小集体式围屋虽然都脱离了老祖屋，但都在老祖屋的庇护之下。



长安围（孙娜　摄）

变化之二，是在家庭商业经营方式和观念的影响下，这些家庭小集体式住宅尽管在平面上都是合院式，但在具体的外观形态上则表现得五花八门、精彩纷呈。比如村南边的修本楼（俗称四方楼），建于清代，建筑面积约 1800 平方米，是一座平面呈“回”字形的围楼，中间为公祠，四角建三层角楼，角楼之间是 8 米高的围墙。再如位于长安围南侧的外翰第，由沈人纪建于清光绪前期，占地约 1000 平方米，平面轮廓呈曲尺形，其厅堂面积甚小，且不在中央位置上，而是位于北隅。再如对门楼，由围楼与围屋两部分组成，围楼的镬耳形风火墙显示其受到珠江下游广府文化的

影响。又如村西南边的曲尺楼，建于清代，坐北向南，建筑面积约 400 平方米，其平面形状如一把“丁”字尺。[1]



修本楼（孙娜　摄）

在湖心坝附近，有另一个保存很好的客家村落，即江尾镇另一大姓氏张姓的蒕茅围。蒕茅围是一座占地达 23000 平方米的大型围屋，始建于明初，平面轮廓呈圆形，当地俗称“八卦围”，里面最多时曾居住着 300 多户人家。湖心坝和蒕茅围是对比鲜明而且相映成趣的：蒕茅围张氏始终都在一个围屋里繁衍发展，而湖心坝沈姓则在其发展的中点上发生了突变。导致这一突变发生的原因，是小小的花生。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孙娜．湖心坝：小花生引起大变化．村落遗产（工作通讯），2013（1）。）

1　此段文字参考了：罗胜奇，沈学文主编．《翁源 · 文物志》，2012：78-86.



第二章

激活人心

第一节

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

中国传统村落评选，在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各进行了一次，三批入选的村落，分别为 646 个、915 个和 994 个，总数为 2555 个，评选由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发起并组织。

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和之前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有很大区别：后者是两三年评选一次，每次入选的村落在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可谓精挑细选；前者是一两年一次，每次入选的村落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其中难免有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出现。

为什么传统村落的评选要如此“激进”？原因在于：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城镇化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严重滞后的历史阶段，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又加剧了乡村文化遗产的破坏速度——如果不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保存尚可的传统村落纳入保护范围，那么大多数传统村落将很可能在受到社会关注之前，就已经遭到破坏并消失殆尽。

关于第三批评选

2012 年 4 月开始传统村落调查之后，经过县、市、省住建部门的逐级申报，四部局组织专家评审，2012 年 10 月评选出第一批 646 个传统村落的名单（含 169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013 年 7 月又评选出第二批 915 个传统村落。

第三批传统村落的评审会于 2014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由于前两批传统村落评选打下的基础，也由于受中央财政支持的鼓舞，各地在第三批传统村落的申报上表现得空前积极，总计有 4548 个村落参加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评审。

从评审结果看，全国一共有 994 个村落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三批总计 2555 个。这个数字和专家们 2013 年年底的估计大致相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管理部门对于全国传统村落的总体状况是基本掌握的。

还有一些地方由于申报积极性不高或申报材料不充分等原因，导致部分保存较好的传统村落没能列入名录。比较明显的，如广东的大埔县、饶平县，山西的泽州县、阳城县，湖南的凤凰县等。

从省份来分析，在第三批评选中，云南、贵州延续了它们的“霸主”地位，分别有 208 个和 134 个村落入选，使得两省传统村落的总数分别达到了 502 个和 426 个。这两个省份入选的传统村落数量之多，已经占到全国总数的 1/3 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使得留存状况较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传统村落的申报工作主要由住建系统的村镇部门承担，这一部门的工作繁杂，人力紧张，传统村落申报只是他们众多工作项目中的一项，而且是对专业性要求较高的一项。要把几百上千份的申报材料收集、整理、寄送并且录入到数据库，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若非足够重视，根本无法完成。

浙江是第三批评选的另一大“赢家”，有 87 个村落入选，使其三批总数达到 176 个。浙江在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领先，传统村落的家底极为丰厚。不过，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相对滞后，一度成为传统村落破坏的“重灾区”。20 世纪 90 年代，浙江省内完整的古村仍随处可见，但到 2007 年国家文物局开展乡土建筑普查后的一两年，该省文物专家甚至得出了“在浙江全省已经找不出一个新的完整古村落”的结论。就在这一谷底时刻，浙江的文化底蕴发挥了作用。有关部门先后在安吉、德清、桐庐、松阳、龙泉等地开展乡村建设和古村度假，从市场的角度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农民的观念，使他们不再认为传统民居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而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浙江的传统村落在破坏最严重之际迎来了一个保护的高潮，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把真实性和完整性放在首位

据统计，我国的行政村约有 68 万个。自然村的数量官方没有统计，一般估计是 300 万～ 400 万个。如果时光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这几百万个村落都属于传统村落，但是现在它们大部分都已经遭到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毁坏。

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历史之悠久，保留下百分之一的传统村落是毫不为过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最古老、最持久的文明之一而应该有的历史责任。百分之一就是三四万个传统村落。

考虑到此前已经形成的严重破坏，和政府工作的程序性以及基层技术人员的不足，几年之内把三四万个村落列入保护范围将会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退而求其次，先把目标定在千分之一或许是比较现实的。千分之一就是三四千个，这正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目标。

近两年来，政府主管部门和专家委员会、工作组共同研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和《指导意见》，都把真实性和完整性放在了首要位置。



贵州黎平县黄岗村俯瞰（李青儒　摄）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性权威文件，即1964年颁布的《威尼斯宪章》，对于真实性有着明确规定，重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村落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在面对一个不完整的村落时，我们需要把残缺的部分补全，才能让人完整地了解它的各方面信息，然而重建那部分的真实性又难以做到完全可靠。这个问题在目前我国的传统村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与此同时，传统村落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是很不平均的。作为排头兵的云南、贵州两省，在前三批中国传统村落里占了近三分之一，其中贵州的黎平一个县就多达90个，超过了大多数的省份。而在一些省份，如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入选名录的传统村落屈指可数。可见，就全局性和整体性而言，传统村落在开展工作之初就已经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为了让传统村落的分布尽量覆盖全国范围，评审时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弹性策略，

在经济发达地区或传统村落破坏已经很严重的地区降低标准。这么一来，反而使得不完整传统村落的数量有所增加。

在面对这些数量可观的“不完整”传统村落时，该怎么办？国际上通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是否还适用？完全按照《威尼斯宪章》，可能会使工作陷入僵局，因为无论做什么，都会面临“是否完全可靠”的质疑。这时候，我们参考和遵循了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1994 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和 1999 年的《乡土建筑宪章》。

《奈良真实性文件》是专门讨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的文件。它重申了《威尼斯宪章》真实性原则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出：“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真实性判断必须联系更大量的信息来源，包括形式和设计、材料和质地、用途和功能、传统和技艺、位置和设置、精神和感情，以及其他内外部因素。”这为重建开了一道小门。如果重建有比较可靠的依据，而且可以展现更多的历史信息，那就不必完全排斥。

《乡土建筑宪章》则强调了传统建筑工艺的重要性：“与乡土性有关的传统建筑体系和工艺技术对乡土性的表现至为重要，也是修复和复原这些建筑物的关键。这些技术应该被保留、记录，并在教育和训练中传授给下一代的工匠和建造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对于一栋不具备纪念意义的乡土建筑，它本身的重要性或许比不上建造它的技术。由是，《乡土建筑宪章》从理论上为乡土建筑的重建做了进一步的“松绑”。如果传统上村民就是用这种技术，一代接一代地建造着他们的建筑，我们又何必把这个传统截断呢？

当然，这种重建还是要以真实性为前提的。重建多少，哪个地方重建，重建时如何提高舒适度，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2014 年四部局的《指导意见》对于修复是这么规定的：“重点修复传统建筑集中连片区”“禁止没有依据的重建和仿制”。这是从综合展现传统村落整体的历史信息出发而设定的原则。

一村一档

要求所有入选名录的传统村落都建立档案，并且对档案的内容和格式做出详细规定，是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指导委员会、政府主管部门和工作组在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评选结束之后不久就达成的共识。

评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之前，四部局在《传统村落登记表》中已经要求提交村落选址、自然环境、街巷格局、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信息。《指导意见》（2012 年）也要求“对已登记的传统村落进行补充调查，完善村落信息档案”。这些信息对于评审专家们判别一个村落是否够格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但是对于完整记录一个传统村落的历史信息，却远远不够。四部局在《关于做好 2013 年传统村落补充调查和推荐上报工作的通知》中正式提出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要求和填写体例。

档案工作之所以很重要、必须做，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入选名录的传统村落数量大，但它们目前都还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一点和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村不同。另外，直至 2014 年 3 月之前，国家财政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上没有资金投入。既无法律地位，又无资金保障，这些传统村落在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是否能保得下来，谁都没把握。这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保不住实体，留下尽量多的历史信息是第一步。

第二，档案是科学研究的基石。最近住建部村镇司在组织编写《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的过程中也发现，当要求按统一的体例和条目来撰写时，有的民居类型就出现了缺项，各省的研究基础和实力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分化，不少地方甚至在最基本的信息上都还是缺失的。对所有入选名录的传统村落要求编写完整的档案，将在极大程度上推进科学研究的工作。

第三，编写档案有利于辨别传统村落的真伪。传统村落的真伪性问题，在中央财政决定资助之后变得更加突出和敏感。把国家的钱投给了本不应

上榜的村子，无疑是极大的浪费。怎么辨别真伪？最直接的办法是派专家到现场核实，这一条已经在执行。在档案里，由于是要求每个条目的每个要素都要提交照片和空间定位，所以一定会让村落“原形毕露”。

不只是保护，更是保护与发展

四部局联合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全称是“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把保护和发展放在一起考虑，是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定下的基调。为什么要同时考虑保护和发展呢？这是基于两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状况。

第一，传统村落量大面广，保护的成本非常高。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是可以由国家或地方财政负担的，因为其数量不大，价值得到社会公认，并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文化财富，而国家目前也确实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承担它们的保护成本。传统村落的数量达到几千个，每个村落里又有数量不少的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其保护成本总体上是要高于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而且，这些历史建筑或传统建筑就单个的文化价值而言，是要明显低于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就产权主体而言，大部分又属于居民私有财产，所以不适于让政府财政来承担其全部的保护成本。

第二，大部分传统村落是活态的。我们在做保护工作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居民的生活、生产问题。目前已经有不少传统村落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要想避免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甚至实现村落复兴，发展的问题必须要解决。2012 年四部局的《指导意见》专门就改善村落生产生活条件指出：“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和村民改善生活意愿之间的关系，在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优先安排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积极引导居民开展传统建筑节能改造和功能提升，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人居环境品质。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和发挥

传统文化遗产资源价值，在延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村民收入。”

2014 年四部局的《指导意见》也专门就传统村落生活的延续性提出：“注重经济发展的延续性，提高村民收入，让村民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实现安居乐业。注重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传承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传统技艺。注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严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度开发。”

兼顾保护和发展，给规划专业人员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大的挑战。同时解决保护问题和发展问题，比单纯地解决保护问题要牵涉更多的方面。这需要从业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和完善。

村民主体与旅游开发

近年来乡村旅游、古村旅游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热点。关于旅游给村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时见诸报道。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新闻，说某某古村被某个开发商承包了，准备进行大手笔的旅游开发。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主动对村民做动迁工作，以便为开发商创造“更好”的经营条件。

由于上述现象，在保护领域里也出现了反对在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的声音。实际上，旅游本身并没有错，是我们对旅游的理解出了偏差。所谓“吃、住、行、游、购、娱”，是肤浅而狭隘的。旅游还有更为本质的作用，那就是学习和体验。作为“维系着中华文化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的传统村落，它们的文化意义是最不应被我们忽视的。

如何让城市人体验到传统村落的文化？首先，就是这种文化不能沦为纯表演性质。它应该是村民生活自身的一部分。村落的非物质文化，比如传统的年节庆典和日常生活，要设法维持和尊重，因为它们是作为主体的

村民继续留在本村的精神支撑。即使是“吃、住、行、游、购、娱”，也是可以做得有文化的，而且只有当它们做得有文化时，才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需要有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需要对村民进行培训。还有特色手工艺，很多农具和生活用具在现代生活里已经很少用到了，它们应该展览在乡村博物馆里，供人学习；同时也不妨适当改造，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调整其尺寸和用途，成为艺术品，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应该承认，在如何让传统村落获得保护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依然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未来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要解决的难题也有很多。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在目前阶段“现代化了的传统村落”是极度稀缺而又存在巨大社会需求的产品。谁能在这条路上比别人先迈进一步，谁就有可能占得鳌头。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传统村落评选为何要更“激进”[J]. 瞭望. 2015（7-8）. ）

第二节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步入关键期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史。传统村落是这一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正如冯骥才先生在《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一文中所说：“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基本处在农耕文明时期。村落是我们农耕生活遥远的源头与根据地，至今至少一半中国人还在这种农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在历史上，当城市出现之后，精英文化随之诞生，可是最能体现民众精神本质与气质的民间文化一直活生生存在于村落里。”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深刻认识传统村落的功能》一文中也指出：“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家，中国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会将其作为重要议题。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除了对三农问题保持一贯的重视之外，还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特别要求：“制定专门规划，启

动专项工程，加大力度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域元素的传统村落和民居。”这份一号文件说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已经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

在传统村落得到中央政府和学术界重视的同时，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中国的高速城镇化。2011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51.27% 之后，标志着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很多农村面临着日益凋敝和衰败的局面。随着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民的经济生产方式转变为非农业为主，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农业土地闲置的现象。在农民以外出打工等形式提高了收入水平后，改善居住水平的意愿空前强烈，乡村建筑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拆旧建新成为普遍行为，这导致流传千年的传统村落面临极大威胁。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事不宜迟。

传统村落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

提高农村的居住生活标准，使其达到甚至超过现代社会的基本水平，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传统村落获得保护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2003 年以来，浙江在全省农村开展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取得明显成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总结浙江省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各地开展新农村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划先行、完善机制，突出重点、统筹协调，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根据习近平的指示精神，中央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浙江经验，并组织召开现场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会议专门作出批示强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承载了亿万农民的新期待。各地区、有关部门要从实际出发，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突出农村特色，弘扬传统文化，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在浙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让农民过上高品质的现代生活，又要切实加强传统文化特别是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

201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在安徽等省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战略部署中，“坚持传统村落保护，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认识到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

切实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

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仍然把传统村落列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提出：“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抓紧把有历史文化等价值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列入保护名录，切实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财政部随后在 2014 年 3 月宣布：中央财政将用三年时间，集中投入 114 亿元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这是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传统村落保护拨付资金，也可以说是对中央一号文件的响应。

2014 年先后公布了两批受财政支持的传统村落名单，分别有 327 个和 273 个村落上榜，令人欣喜。同时，如何把保护落到实处令人深思。近

年来，我们在农村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因惠农政策而带来的“建设性破坏”行为。比如，在老的石板路上铺上了水泥，把全村的房子统一用石灰刷白，在危旧房改造的名义下将老房子拆除，甚至以节约用地为名，将一些还有不少传统文化遗存的村子迁村并点。

为了防止因本次财政支持而造成类似的破坏现象，以住建部为牵头单位的部门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召集专家讨论和研究后，制订并公布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四部局《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传统村落保护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用 3 年时间，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

《指导意见》在重申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等原则的同时，强调了农村生活设施改善和村民主体地位的问题，提出：“整治和完善村内道路、供水、垃圾和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完善消防、防灾避险等必要的安全设施。整治文化遗产周边、公共场地、河塘沟渠等公共环境”“注重经济发展的延续性，提高村民收入，让村民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实现安居乐业。注重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传承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传统技艺。注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严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度开发”。

它明确了传统村落名录的退出机制：“村落文化遗产发生较严重破坏时，省级四部门应向村落所在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濒危警示通报。破坏情况严重并经四部局认定不再符合中国传统村落入选条件的，四部局将该村落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予以除名并进行通报”。同时提出要合理而综合地利用文化遗产，“挖掘社会、情感价值，延续和拓展使用功能。挖掘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开展研究和教育实践活动。挖掘经济价值，发展传统特色产业和旅游”。

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活态保护”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内容，所有工作要围绕如何让传统村落的主人即村民继续生活在村中，并且发自内心地支持保护工作。

把更多承载了传统文化的村落纳入保护体系

传统村落，或中国传统村落，是近几年才正式形成的概念和体系。此前，人们对传统村落的一般称呼是古村落。在文物保护领域，又有历史文化名村、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乡土建筑等概念。

在中国传统村落概念提出之前，已经有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村落遗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古村落、中国景观村落四个村落遗产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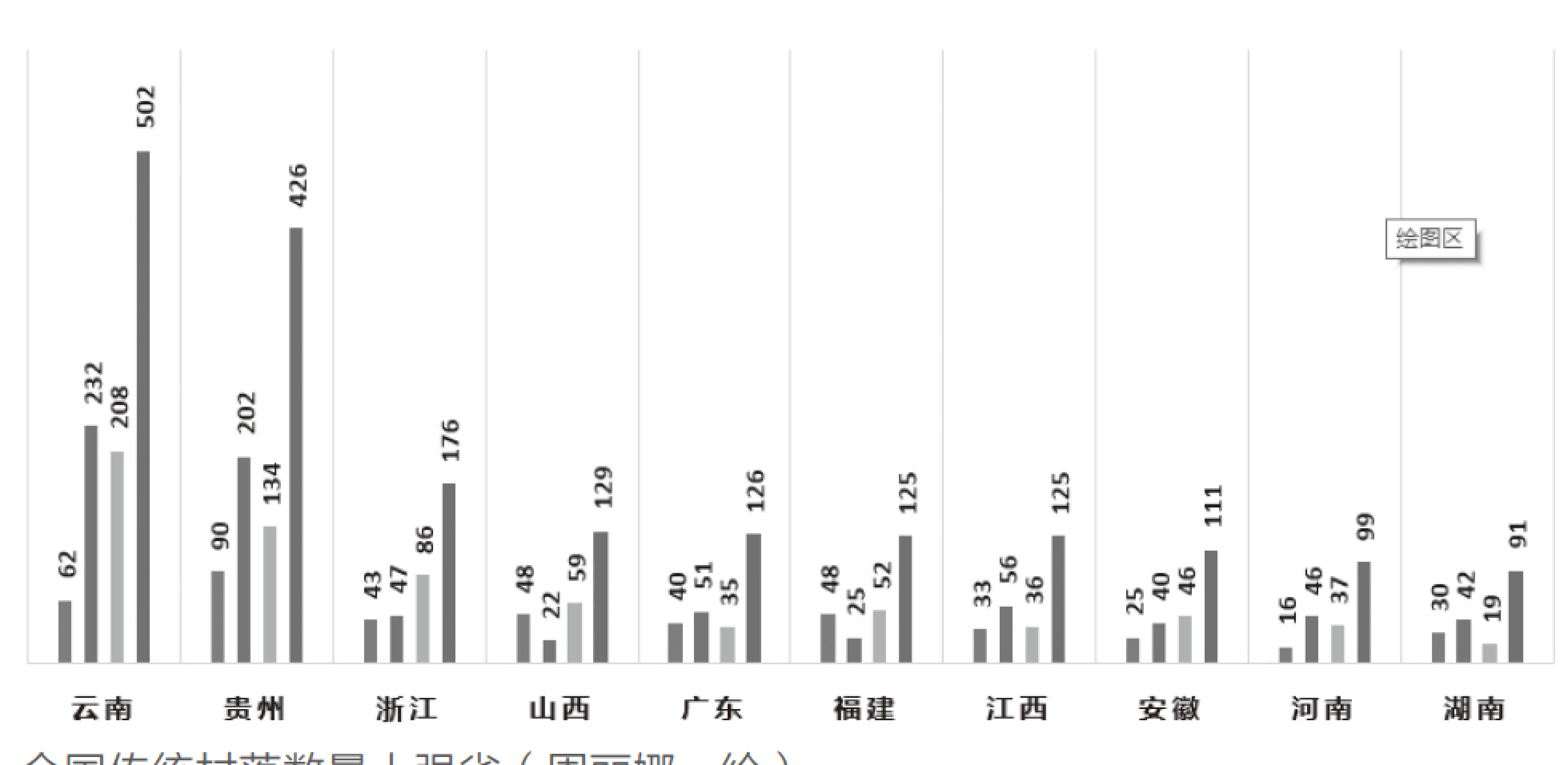
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村落遗产，主要是以某个村内的古建筑群为名义而公布的，比如安徽黟县宏村古建筑群、浙江兰溪市诸葛村古建筑群等。此类国宝级“村（寨）古建筑群”有几十项。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评选标准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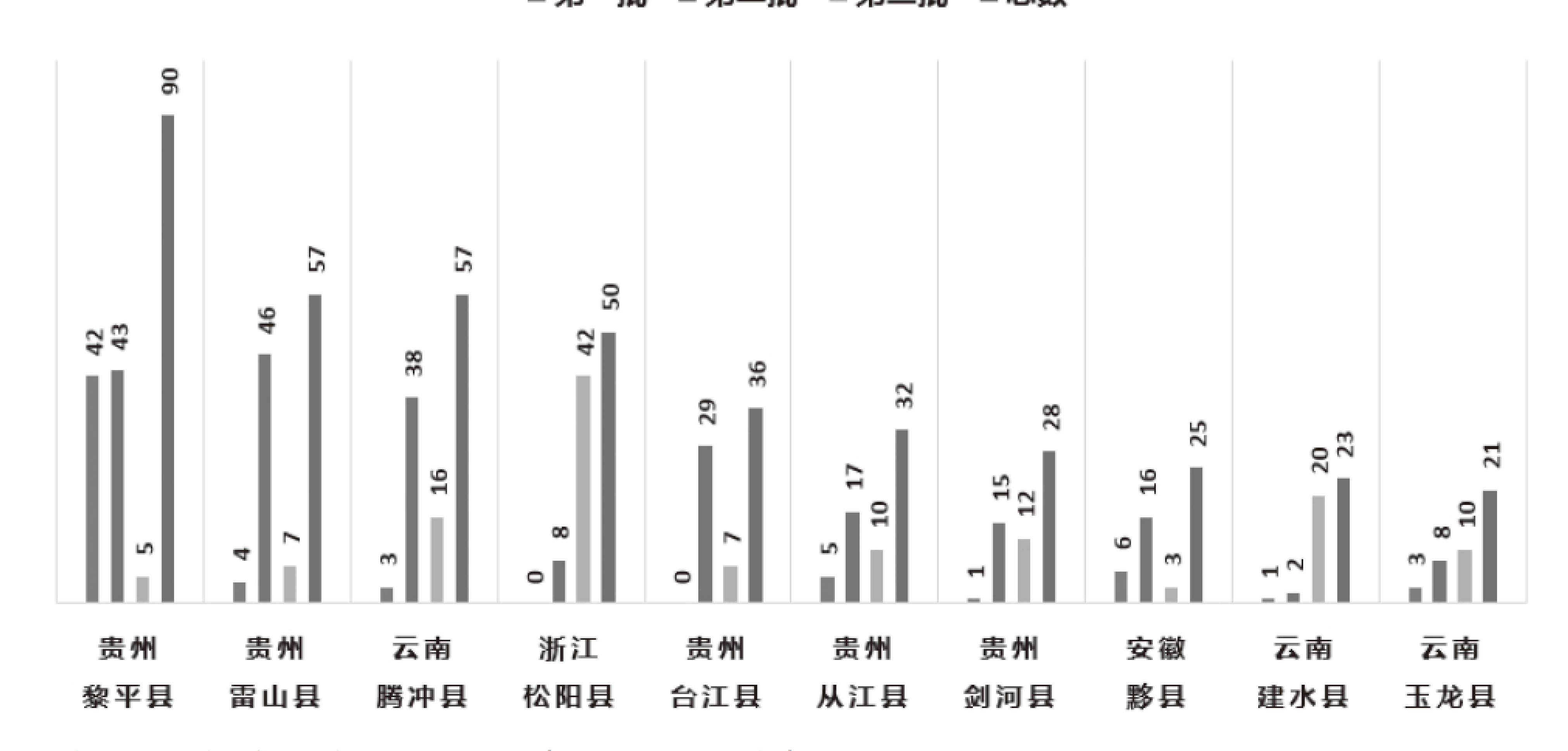
中国古村落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中国民协”）评定，各省民协负责相关古村落的评选组织工作。民协经常以学术会议的方式，组织建筑学和民俗学的专家们一起来探讨古村落的文化价值与保护方式。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负责“中国景观村落”的评选和挂牌。该委员会是隶属于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从 2007 年开始举办“中国景观村落”评选活动。

2012 年 4 月，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发起了传统村落调查。四部局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全国传统村落数量十强省（周丽娜　绘）



全国传统村落数量十强县（周丽娜　绘）

传统村落和古村落从名称上反映这两个词汇各有侧重。古村落强调的是时间，传统村落强调的是性质。一个形成年代不久的村落，如果它较多地延续了传统社会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传统村落，但可能不应该说它是古村落。四部局在开展调查之初用传统村落来代替古村落，是为了把更多承载了传统文化的村落纳入调查和保护体系。

保护观念缺失和遗产破坏的深层次原因

不少传统村落的保存状况堪忧。传统村落破坏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受到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严重冲击。不过只要对比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甚至非洲、中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就可以发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保护观念不普及。

导致观念缺失和遗产破坏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消解了传统乡村文化原有的自信；二是近三十年来大批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使得城市文化严重侵蚀了乡村文化；三是政府为严格保护耕地而制定的宅基地政策，让大部分有能力建房的农民不得不选择拆旧建新。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乡村旅游市场也走向兴旺，这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提高国民认识传统村落的价值、增加传统村落的村民收入等。不过，在那些旅游先行而保护未跟上的地方，传统村落因旅游开发不当而遭到严重破坏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传统村落与传统集镇之间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晰。这其中有历史原因，比如有的曾经作为镇的聚落，现在已经演化成村，而有的曾经作为村的聚落，已经发展成镇。也有极少数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被选入了传统村落名录。严格说来，镇与村在属性上是有区别的。不过，由于目前尚无与传统村落名录对应的“传统集镇名录”，而历史文化名村和历史文化名镇却早

已并存，所以一些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为争取“国字号”头衔，就加入了申请国家级传统村落的行列。专家们对此类申请项目存在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应该严格区分镇与村，二是认为为了扩大遗产保护范围，并且鼓励基层积极申报，宜将申报镇以辖区内某个村的名义列入传统村落名录。

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制度尚不完善的现状，住建部主管部门组织了具有探索意义的独立调查活动。2013 年 10 月，有志愿者反映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浙江省泰顺县下桥村正面临严重的建设性破坏的威胁。住建部主管部门在第一时间选派专家赴现场进行了考察和取证，并撰写了专项调查报告。依据此报告，启动是否让该村进入名录的退出机制。

源自于民间的风气

将遗产保护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的做法，在欧洲已经有半个世纪左右的尝试和发展，成为新兴的但又相当成熟的产业。浙江、上海长期以来的人文积累，使得这里的民众较快地接受了源自欧洲的乡村遗产保护观念，从而最先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乡村度假风。

这股源自于民间的风气，经过部分城市精英的引领和提倡后，反过头来又对地方政府的保护工作产生了推动。应该说，地方政府对于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原本就是负有责任的，来自上级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始终存在，只是一直苦于手中握有的资源有限，无法应对量大面广的保护对象。

现在，当一种保护原则可以得到遵守、市场上又可以获得回报时，一些地方政府就会立刻给予响应。在商业营销和政府宣传的双重推动下，这股风气已经从浙江、上海扩散至周边省份甚至更远。如今在浙江的莫干山和桐庐县，不时可以看到从省外来考察取经的人士。



浙江德清莫干山“西坡 29 号”民宿小院（范秉乾　摄）

在豫南鄂北的大别山地区，民间组织“绿十字”在该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相当成功的乡村建设实践，其中最受关注的案例就是信阳郝堂村的保护，通过将该村的土坯房改造成画室和茶室的做法，在当地树立起“老房子更值钱”的观念，从而让遗产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在信阳市的新县开展了全县域范围的乡村建设，仍然延续了保护与利用传统建筑的方式。在此影响之下，新县政府在传统村落的申报和保护上十分积极，目前该县国家级的传统村落已经达到八个。“绿十字”还在湖北省广水县的桃源村推行这样的保护模式，项目开展仅一年即被列入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实践证明，与社会力量合作推行传统村落保护，大有可为。

拿出更令人信服的成绩单

2015 年传统村落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期待和关注。

首先是如何开展第四批传统村落的评选？一方面，在总数达到 2555

个之后，主管部门面临着巨大的保护和监管压力。另一方面，各地申报传统村落的积极性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而且在某些传统村落资源丰富的地方也确实存在着数量不小的“漏网之鱼”。到底是继续放开、大口吸纳，还是收紧口袋、小幅推进，需要认真思考。

其次是前两批财政支持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需要观察，更需要总结这一过程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央财政投入传统村落的 114 亿，是从原先已经有的农村环境保护、“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及美丽乡村建设、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补助地方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5 个专项，按照“宜分则分、宜合则合”的原则，投向传统村落的。传统村落名录是由住建部牵头的七个部局共同公布和管理的，但是上述五个专项走的都不是住建系统，而是环保、农业、文化等部门，所以在资金使用的问题上就需要住建部门与这几个部门进行协商，甚至需要县级、市级和省级地方政府出面协调。

三是传统村落示范县的工作如何开展？ 2014 年年底住建部公布了第一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浙江松阳和云南建水。这两个县都以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有 50 个和 25 个）、县领导对传统村落高度重视著称，也都在传统村落的地方政策和实践工作上有一些实质性的推进。不过，要想真正坐稳“示范县”的宝座，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这两个地方还需要拿出更令人信服的成绩单才行。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孙娜.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步入关键期 [J]. 瞭望，2015（15）。）

第三节

村落保护：关键在于激活人心

传统村落的保护目前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法律地位缺失、管理机制不完善、保护资金匮乏、技术手段不到位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表象，其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遗产观念尤其是乡村遗产观念的不普及。在大多数农村，村民们依然普遍认为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是落后贫穷的象征，不认同它们存在的价值，所以要将其拆除。政府和专业人士要去保护，就会跟村民产生冲突，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和机制问题。

作为观念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应该得到保护的这种社会观念，源起于欧洲。而即使在欧洲，很长的时期内这种观念也只是在少数人之中得到共识。陈志华先生曾指出“早期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觉醒都是政治的、宗教的、情感的和审美的，文物建筑保护作为一门专业科学是从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探索的”“文物

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它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原则逐渐科学化的过程，是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到20世纪中叶《威尼斯宪章》的诞生才告成熟的。这情况说明，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是一项很高等的文化活动，它的意识化和科学化需要整个社会的文明达到很高的水平。”[1]

遗产观念在欧洲真正实现大众化，大约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当时欧洲正经历“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众多历史街区开始构成严重威胁。遗产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协会组织通过与大众媒体联合，发起广泛而持续的宣传、辩论，终于使文化遗产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也使得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的巨大成本实现了全社会共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使得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强制性。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也越来越成熟并受到重视。

反观我国的情况，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而言，我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并不比欧洲国家滞后多少。我们在1961年就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同年颁布了《文物保护暂行条例》。1981年，第一部《文物保护法》颁行。1982年，启动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乡村遗产保护领域，我国于2003年就启动了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至今已有27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文物部门通过普查，将位于乡村中的41万处文物点登记在册。2012年由国家四部局联合成立了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并每年评选一次国家级传统村落，至今已评出三批共2555处传统村落。

对于传统村落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政府高层也早有认识。前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深刻认识传统村落的功能》中就指出：“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家，中国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传统村

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2]

然而，与中央政府的积极推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基层政府和社会民众对遗产保护的疏离、冷漠甚至抵触。和几十年前的欧洲一样，我国现在正经历着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农村空心化。和当年的欧洲不同的是：我国很多农民过的是候鸟式生活——平时在城里打工，春节回乡过年；年轻时在城里打工，中年后返乡务农。这种候鸟式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农村的衰败速度，但也给乡村遗产保护带来了麻烦。在城里打工挣钱的农民，将拥有城里那样的楼房视为人生最高理想。而实现梦想的前提，就是把老房子拆除，因为我国严格实行着基本农田保护和一户一宅的政策。于是，我们就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见到了那些“丑陋的火柴盒”。

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农民们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愿望，自然无可厚非。实现愿望的方式是不是只有拆旧建新呢？在我国，这种方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放眼那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业已成熟的国家，我们就会对这种“理所当然”产生怀疑。在欧洲，很多外表古朴的老房子，室内却不乏舒适方便的生活设施。什么是现代化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洁净和方便。具体说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厨卫要现代化，二是要有良好的采光和隔声，三是人均面积要达到一定标准。而这几个条件和房子的新旧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说到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的保护，通常第一件想到的事是资金短缺。传统民居修缮需要钱，把质量较高的历史建筑征收下来做陈列馆需要钱，陈列馆的日常维护和运营也需要钱。再单看传统民居这一项，其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似乎不管多少资金投进去都瞬间不见了踪影。如此高成本的事情，怎么可能实现呢？

农村其实并不缺钱。如果真的缺钱，就不可能盖起那么多的火柴盒小

洋楼！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里两三百平方米、三四层高的楼房并不鲜见，甚至相当普遍。在欧洲，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更愿意把钱投入在老房子的维修和利用上。而在我国，人们把钱主要投入到了新房的建设上。文化遗产在不同社会有不同命运，这首先是观念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的问题。

观念的问题，要从观念来解决。跟村民们做宣传、讲道理是必要的，但常常没有很好的效果。最重要也最可行的方式，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源，和专业机构、社会组织通力合作，建立起一批示范村或示范点，引导村民认识到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并非贫穷落后的象征，而是更有文化品味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村民的观念，最终实现村落保护的成本由全社会共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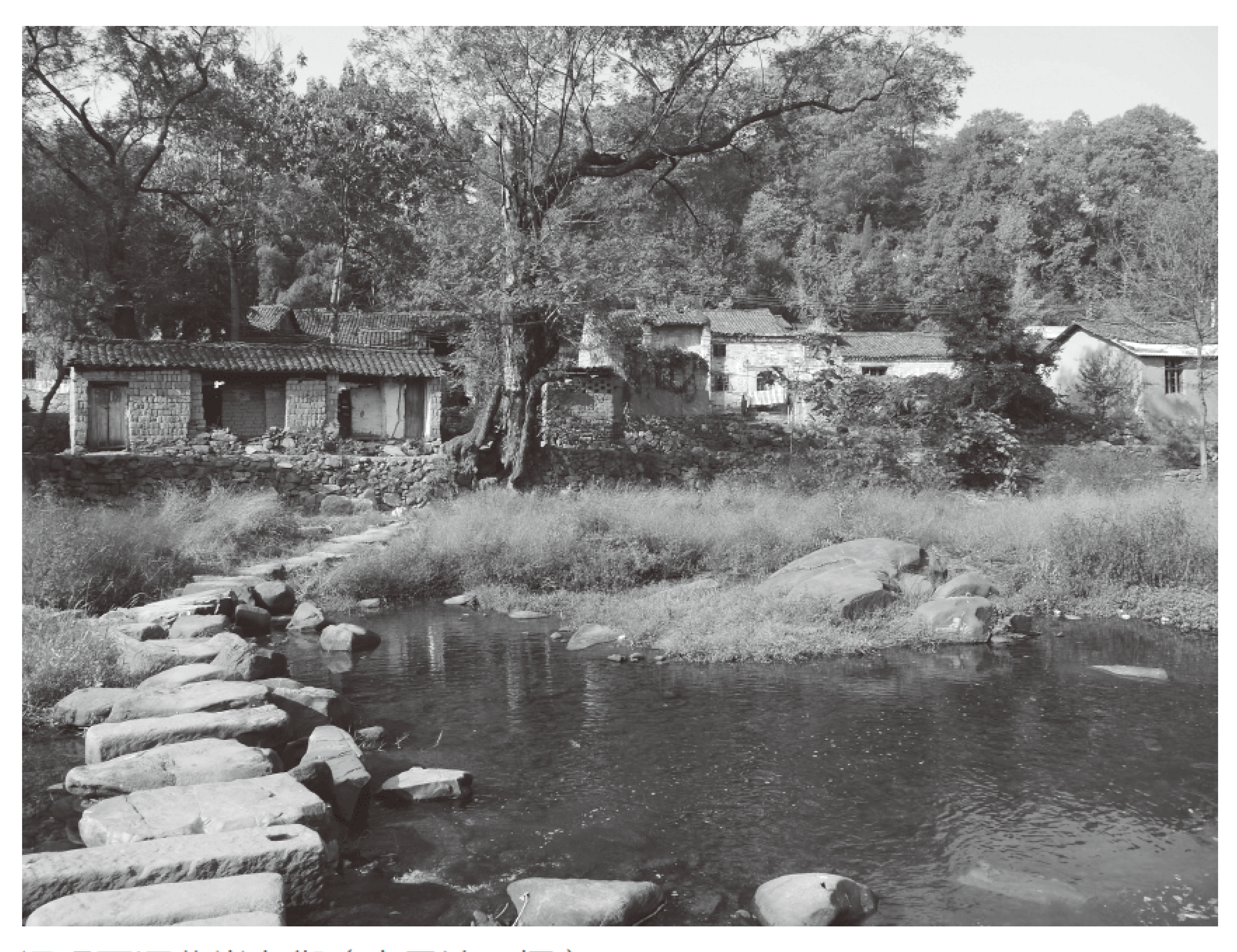
各村要有示范建筑

目前国家级传统村落的数量是 2555 个。我们建议在每个传统村落里，由政府筹集或募集资金，与高水平的设计机构合作，对三处左右的传统民居或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和内部改造，使其符合现代化的用途。

示范点的选择可以是以下三类：公共建筑、公益建筑和时尚建筑。

首先看公共建筑，比如大会堂、民俗博物馆、村民中心等。此类建筑能聚拢人心，激发地方文化自豪感，让村落重新找回集体凝聚力。空心化，是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当下农村的一个词汇。其实很多所谓空心化的村落，并非真正的空心化，而是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小孩和妇女依旧生活其中。春节期间，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乡，让村子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恢复了活力。我们认为，导致这些村庄空心化的首要原因并不是人的离开，而是公共生活的缺失。

在传统社会，村庄是由宗族首领或乡绅集团进行管理的，有比较发达的公权力，也有较为扎实的集体经济基础，从而产生了丰富的公共生活。管理村庄的族长或乡绅，文化水平比较高，其中不乏有功名者或退休回乡的官员。他们不但在村庄事务上有很大的话语权，还可能亲自参与到村落的规划和公共建筑的建设中。今天还能看到的那些美得令人赞叹的徽州古村、山西古村、广府古村，在历史上无不是经过了“能人”的规划。



远观西河北岸老街（李君洁　摄）

如今，村里的“能人”们大都进城谋发展去了，至少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回到家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庄公共生活的终结。我们在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西河村做规划时，就遇到这样一件事。西河村的大湾村（包括西河村的几个自然村），是一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山村。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将村子分成南北两部分。北边是老村，南边是新村，各有几十户。南边的新村里，有一组靠着河边的建筑，是 20 世纪 60 年代建的粮库，由两个体量较大的粮仓和一排九间的宿舍及一幢管理用房组成。这样的建筑，就

风貌而言是与老村子不大协调的，可以考虑拆除。不过，规划设计团队经过几轮讨论后提出：这样一组存在了几十年的建筑，本身就已成为村落历史和记忆的一部分，最好是留下不拆。问题是，粮库早就不再用来存放粮食了，留下又能做什么呢？于是，设计人员设法对这组建筑进行功能改造：两个粮仓，体量都比较大，一个当粮油博物馆，主要用来展览土法榨油以及当地的各种农具，另一个当村民活动中心；一排宿舍，由于太宽，从河对岸看过来严重遮挡视线，所以拆除一半，另一半改造成餐厅；至于管理用房，自然就成为厨房了。



粮油博物馆南立面（陈龙　摄）

关于村民活动中心的设想，在设计阶段时还比较笼统，只是想到村里一年到头，总得开一两次会，而在平时，让老人们在这里打打牌也不错。就在设计人员为改造的建筑做最后装修时，一位看热闹的老村民来问施工队，他儿子下个月要结婚，婚宴可否在这里举行（因为这里地方够宽敞）。这或许是很不经意的一问，但也是意义非同寻常的一问。办婚宴自然是到县城里的酒楼最显气派。这位老村民之所以来问村民中心，可能是想省钱，也可能是觉得在自己的村里办更有意义，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出于哪种考虑，都让我们的设计人员意识到，这个看似空心化的小山

村：尽管青壮年都已外出打工，但是村民们对于公共生活的需求仍然潜力巨大。2014 年国庆节，在西河村的村民中心果然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后来这里又相继举办了一些其他公共活动，包括大别山区的处级干部培训班。由于这一系列的公共活动，西河村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西河博物馆与村民中心，也于 2014 年 12 月获得了由《世界建筑》杂志组织评选的 WAACA 社会公平奖优胜奖[1]。

再看公益建筑，比如小型书屋、小型学校或幼儿园等。前文已经说过，空心化的村子，仍有不少的老人、小孩和妇女在其中生活。和青壮年相比，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尤其是小孩，“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之一。对于农村里的这些弱势群体，我们作为设计人员能做点什么呢？一个直观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些专门的空间，让不同的群体有公共活动的地方，一方面帮助村庄恢复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志愿者的到来提供场所。中央美术学院的傅伟老师，为西藏昌都地区然乌镇的来古村设计过一个冰川公益客栈。这个客栈是为背包客服务的，它同时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出售虫草，其收益用于资助当地的一所希望小学。因为其公益性质，这个客栈特别受背包客们青睐。

第三类是时尚建筑，比如咖啡馆、茶馆、小型餐厅、小型客栈等。此类建筑为城市游客来到农村提供了逗留场所，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收入。时尚建筑最好是带有一些反差意味的建筑，让人一眼就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亮点形成后，可以在短时期内积聚起一定的人气，这对于改变村民观念又是大有好处的。

浙江省桐庐县的荻浦村，有一个“文革”时期建造的集体牛栏，建筑质量不高，室内空间也低矮难用，但是主持村庄改造的干部和设计人员并没有将其一拆了之，而是别出心裁地改造成了一家咖啡馆，使其成为该村旅游业的一个亮点。这个“牛栏咖啡”，尽管有人批评是为了迎合城市白

1　该项目的主创设计师是中央美术学院何崴副教授。

领的小资趣味，但是它的存在是有几方面的积极意义的。第一，它使得村庄内乡土与传统的分量不再继续降低。荻浦村是一个典型的半新半旧的村子，质量高的古建筑不少，新建的小洋楼也相当多，另外还有质量一般或较差的传统建筑。包括牛栏、猪圈、土坯房等，其数量有几十至百处。如果将这些质量一般或较差的传统建筑全部拆除，那么整个村子里传统建筑的比例将极低，届时荻浦村能否被称为传统村落都将是个问题。“牛栏咖啡”出现后，村民们不再拆除这些建筑了，而是想办法把它们利用起来。第二，尽管改变了用途，不再养牛，但是它作为牛栏的历史得到了记录，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个建筑身上见证到一个真实的牛栏，而不仅仅是从历史照片和老人回忆。第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牛、猪等大型牲畜在农业生产环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才会产生牛栏、猪圈这类专门为它们而建的“建筑”。留下牛栏猪圈，对于后人认识完整的农村传统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荻浦村牛栏茶吧（王斐　摄）

以上讲到的三类示范建筑，最好由高水平的设计师来设计。高水平的设计师，大多对于地方建筑文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另外，高水平的设计

师本身就具有广告效应。对于示范点的实施，一定要有足够的组织保障和可靠的技术队伍并在一年内完成。示范点完成后，利用新媒体广泛宣传，使其迅速形成品牌效应，成为激发村落活力的“引爆点”，由此达到快速扭转村民观念的目的。

各地要有示范村

建议每个省选择若干个传统村落（传统村落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可以考虑每个地级市甚至每个县），由政府筹集启动资金，推进村落保护与发展工程。这些工程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方面，在做好保护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利用两年时间完成道路、上下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和河道、巷路、绿化等景观工程。“软件”方面，由政府募集资金或担保贷款，注资到村委会或合作社，购买或长期租用村内闲置的旧房、农田和山林，进行有计划的规模种植和改造经营，盘活并壮大资产，使村集体拥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在此基础上，制订适用于本村的社保福利政策，实现全村共同富裕。

之所以要明确提出两年内完成硬件建设，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主管领导（尤其是县级领导）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两年时间的项目可以实现在其任期内完成。按中国目前的行政特点，基层项目在跨领导任期时可能存在较大的变数，而乡村建设首先是一个人心工程，其间一旦出现进程缓慢或停滞，就会让人信心动摇，从而可能造成前期投入“打水漂”。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的郝堂村，是这几年国内村落保护和乡村建设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主持该规划的孙君先生是个画家，长期从事环境保护和乡村建设的工作。多年的乡村经验和不受规划专业限制的灵活思维，使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农村衰败与空心化的根本原因是村庄集体的涣散。他

到郝堂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村庄规划，也不是建筑设计，而是垃圾分类。孙君的垃圾分类方法很简单：垃圾分为干湿两类，湿垃圾是厨余垃圾，回归土地当养料，干垃圾是纸张、瓶罐等，由保洁员收集后卖到废品站，可抵部分工资。通过垃圾分类，孙君先生在郝堂村实现了环保目的，也考验了村干部的执行力。而村干部，就是让村庄重新找回集体凝聚力的最重要也是唯一可依赖的力量。



郝堂三号院（李君洁　摄）

孙君在郝堂村做的第二件事，是规划村庄产业。郝堂位于信阳，而信阳有著名的茶叶——信阳毛尖。“郝堂茶人家”，就是孙君为郝堂村做的产业定位。这与前期做的垃圾分类又是密切相关的。垃圾分类之后，郝堂村实现了“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环境整洁，种的茶叶也是有机环保的，价格自此上涨十倍，而且还在持续上涨。在产业问题解决后，郝堂村基本上实现了让村民安居乐业。

第三件事才是规划和设计。清理河道，修护卵石驳岸，广植树木，将百亩农田改造成荷花塘，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村庄的整体景观。在建筑方面，首先是说服村组长家对瓷砖小洋楼进行改造。房子改完之后，外观好

看了，住起来也更舒服了。其他村民们见了，彻底放下疑虑，纷纷要求对自家房子做改造。然后是建议村委会用 3000 元租下一幢荒废了十几年的土坯房，花费了 18 万元对其进行重新装修，变成了画室兼茶室（现在这里的主要用途是接待从各地来参观的游客喝茶），此后村里的老房子也都免遭被拆除的命运。

“还权于村两委”是孙君乡村工作的一个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对于目前的国情是具有针对性的。他在《农道》一书里说道：“上访是目前乡村基层领导最头痛的事，上访的原因有一些是因为政府和管理越位了，政府在替代村干部做事”“绿十字做很多工作就是把说服工作还权于村干部，这种权力的归还是增进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3]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由村支书牵头，村民自发组成了保护组织，从各方募集资金：维修、管理古建筑；村集体利用旅游收入补贴村民，资助经济困难的村民维修房屋，赢得了村民的普遍支持。村民只有在古村落保护和发展中受益，才会认识到文化遗产是宝贵的发展资源，才会真心实意地保护文化遗产，实现对古村落的自觉保护、自主管理和自身受益。

相比于“硬件”建设，村庄的“软件”更难把握，但其作为本质性因素是更为重要的。软件建设的最终目的，是重建缺失已久的村庄集体凝聚力。在过去，村庄凝聚力靠的是宗族和乡绅。而在当下，村庄凝聚力靠的是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村落保护要有守有攻

传统村落是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类遗产”[4]。对待这“另一类遗产”，我们要有不同于前两类遗产的保护策略。

村落保护如同一支足球队的共同协作：划定保护区、制订保护措施是后卫，遏制住破坏势头；改善基础设施和完善景观面貌是中场，为发展做准备；几个好的改造案例是前锋，只靠防守终究要输球，前锋进球才能最终赢得比赛。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村落保护：关键在于激活人心 [J]. 新建筑，2015（1）。）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 . 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理念和方法论的形成 [M]// 陈志华，文物建筑保护文集 . 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1-17.

[2] 仇保兴 . 深刻认识传统村落的功能 [N]. 人民日报，2012-11-29 (7).

[3] 孙君 . 农道——没有捷径可走的新农村之路 [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4] 冯骥才 .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N]. 人民日报，2012-12-7(24).

第四节

让乡村遗产回归百姓生活

乡村遗产的主体是村民。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目前大多数村民还不能认同保护理念。房子是村民的，而主张保护的是遗产专家。作为乡村遗产主要构成部分的传统民居，大部分已被拆除，剩下的也多半被放弃。有些村民还住在老房子里，并不是出于对文化的自觉爱护，而是因为能力有限、无法改变现状，所以不得不将就。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加入到保护的行列，有的地方政府也开始积极展开保护行动，这是让人欣喜的状况。最近几年，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七部门共同开展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和保护工作，到今年年中被列入名录的传统村落总数有望超过 4000 个。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对保护工作的关注度和积极性，从而使乡村遗产被快速破坏的情势得到了遏制。不过，这些现象或举措还主要限于非村民的范畴。我国的乡村遗产，包括更大范围的文化遗产，还需要设法实现更广泛的大众化，要实现“全民认同、全民共享”[1]“要使公众真正意识到遗产就在自己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2]。“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与专家的层面上，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如果人们不知自己拥有的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我们为谁保护呢？而且这种保护也没有保证，

损坏会随时发生。所以接下来一项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3]

被放弃的乡村遗产

如果站在村民的角度，放弃乡村遗产其实是个理性选择。首先看功能。大部分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的基础设施是缺乏的，或者水平很低的。很多地方的民居房间很小，小到甚至只有几平方米，比如云南元阳县的哈尼族民居，卧室只有 3 平方米左右，有门洞却无门板，完全谈不上隐私保护。但凡是用木板做隔墙的民居，隔声效果普遍较差。南方的民居，通常保温隔热的效果都不太好（尤其是屋面）；北方的民居，在冬天则常有在室内外穿行的问题。这些功能上的缺陷，如果不设法解决，是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其次看经济。在传统社会，人力不值钱，农忙的时候干农活，农闲的时候一家建房、全村帮忙，不需要花钱，只要花力气就行。然而这种方式在现在不行了。出去打工一天能挣 200 元钱，那么请邻居来盖房子，一天也得给这么多钱。现在已经是工业化社会，用非工业化的方式来建房子，就会是一件成本比较高的事情。第三是技术原因。有的传统工艺已经失传，没法用传统的技术来建房了。第四是社会原因，现代家庭越来越小型化，这与传统时期以复合家庭或大家族为主的状况很不一样。很多传统民居是为大家庭设计的，改成小家庭住就显得不适合。第五是产权的限制。欧洲的国家（比如法国）也经历过乡村荒废的过程，但现在很多都又“活”过来了，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民们纷纷去乡下买第二居所，花几万欧元就把整个房子买下，周末去住一住。要住就得修缮维护，很多老房子就此得到保留，没花国家一分钱。第六，我们说的乡村遗产，大多数是建筑，为继续使用而维修改造的成本一般都

不低。买水泥砖头的钱不能省，雇工人的钱也不能省。唯一能省的规划设计费只占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基本上无关痛痒。要想大规模保护乡村文化遗产，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不可能的。这些年，我国对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在保护上也下了大力气。仅仅是国家文物局，一年就投入几百个亿的资金，跟十年前完全不是一个水平。不过，这只是在国家层面，到省级、县级就差远了。全国的县保单位有十万多个，大多数县级财政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微乎其微。



元阳哈尼民居狭小低矮的室内空间（罗德胤 摄）

遗产保护是件高难度的事。但是，当我们跳出中国、放眼全世界（尤其是欧洲）时就会发现，虽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就能通过保护留下这么多的文化遗产。欧洲的遗产保护之所以成功，除了保护理论和技术成熟这样的表面原因之外，还有如下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文化遗产与国家认同。欧洲人较早就有了民族危机感。这种现代国家的意识，大概是从 18 世纪开始的。中国自从秦始皇消灭六国、加

强中央集权之后，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统一的，少有被他国消灭的危机感（两宋是个例外，近年来关于两宋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感的研究也是个热门话题）。相比之下，欧洲的各个小国就不一样了，互相打打杀杀，竞争很激烈，所以就有很强的民族危机感。民族危机感促使他们在两方面加强保护措施：一是保证国土的安全，因此必须划清国界，使本国领土不受侵犯；另外是保证文化的安全。本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不能被别的国家、民族同化的，不然失去自身文化特色的本民族就变成别的民族了，因此会从国家层面来研究、挖掘、保护甚至推广自己的文化艺术，包括建筑、民俗、音乐、服饰、饮食等。

以英国为例。生活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著名建筑理论家拉斯金，热衷于复兴哥特风格和手工艺传统，他的这一主张对建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对英国民众普遍接受维多利亚风格起到了推动作用。所谓维多利亚风格，就是一种综合了之前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等建筑形式并结合了当时工业化生产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新建筑风格。一些工业建筑，比如伦敦著名的塔桥，也采用了维多利亚风格。移民到新大陆的英国人，把这种建筑风格也带了过去。哈佛大学的主教堂就是维多利亚盛期风格的。美国大量的郊区住宅，直到现在仍沿用维多利亚式。这股风甚至刮到了中国。从浙江萧山机场到杭州城里的高速路两边，密密麻麻排满了当地农民建的小洋楼，全都采用了简化的维多利亚屋顶。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会欣然接受英国的维多利亚风格？原因值得我们好好考察。笔者的解释是，当某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特别强盛的时候，就会对别的民族产生影响力。

其次是文化遗产与个体尊重。欧洲社会把遗产保护和对个体的尊重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一点是我们不太关注甚至忽视的。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很不一样。从物质上说，是基础设施的差别——我们有水管、电、火车、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古人却没有这些东西。从精神上说，现代与传统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个体的普遍尊重。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一个人从出生

开始，他的社会地位基本上就确定了，很难改变。中国发明了科举制，让优秀的贫苦子弟有了一条路去实现身份的跃迁，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不过这条路相对于数量庞大的人口，仍然太窄，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还是很低的。在欧洲社会，大概从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人生而平等”[4]的观点开始，尊重个体的观念就逐渐被大众接受。人与人之间，可以有职业、性别、年龄的区别，但是基本权利是一样的，人格上也是平等的。

这种尊重个体的思想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极大地鼓励了普通人去努力工作，因为大家都相信通过奋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若人人都努力向上，整个社会自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推动了创新。创新思维不会来自于集体，只会来自于个体。一切有原创力的想法，都是从某个人的大脑里出现的。不过，集体在推动创新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一是可以集合更多聪明的大脑，让他们互相启发从而加快灵感的出现；二是在创新思维出现之后，组织团队开展大规模实验，以推动新产品的研发。从 17 世纪开始到现在，人类生产力迅速提高，这几百年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之前的 200 万年。

之所以能实现如此巨大的飞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普及，同时社会制度对个体自由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大。

平等自由的思想，跟遗产保护有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关系很大。首先是教育，教育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所谓教育的时间维度，就是个体为了实现自由要付出时间去学习和成长。传统社会里只有少数人需要接受长时间的教育，这部分人会成为社会精英，然后去统治和管理其他群体。而在现代社会，大部分人的受教育时间都是相当长的——3 岁上幼儿园，高中毕业就将近 20 岁了，大学本科毕业是 23 岁左右——学习时间整整 20 年。还有的人会一直读到博士，过了古人说的而立之年才开始走上工作岗位。这些年的发展趋势又表明，作为一个现代人，要想不被社会淘汰，唯一的办法就是终身学习。边工作边学习是常态，工作和

学习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所谓教育的空间维度，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就是俗话说的“见多识广”。那么，去见什么、识什么？其实主要是文化遗产。世界各地能够作为文化遗产而被保留下来的东西，无一不承载了人类的重要知识，或见证了人类的重要历史，它们都值得去观察学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谓躬行，原意是说要自己亲身实践才能学得扎实，不过如果理解为要自己去实地观察和体验，也并不为错。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成就和他的旅行范围通常有着密切关系。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却能做出大成就的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极为少见。大多数人要靠多走、多看、多积累，才能做到触类旁通，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

自由平等思想和遗产保护的第二层关系，涉及我们如何理性地看待遗产本身的短板。学过近现代建筑史的人都知道，现代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 1929 年巴塞罗那世博会上出现了密斯设计的德国馆。这座位于会场边角之地的临时建筑，以平面的自由和空间的流动标示了自身的存在。几十年过去了，当时风风光光的、位于会场中轴线端头的仿古典主义风格的世博会主馆几乎不再被人提及，而小小的德国馆却仍被学建筑的学生们在课堂上顶礼膜拜。德国馆的流动空间和现代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恰好暗合并产生共鸣。从此之后，流动空间成为很多现代建筑师们的常备武器，而普通人也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种追求平等自由的精神暗示。

理性看待遗产的短板

遗产诞生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对个体尊重的缺失，自然也会反映在遗产上。比如中国的很多传统建筑和传统家具，因为深受皇权制度与儒家思想影响，都特别讲究等级秩序，还时刻提醒使用者正襟危坐，这就容易

与现代人追求舒适和摆脱约束的愿望产生矛盾。不过遗产的这个短板，在过去并没有很明显地显现出来。如今，文化遗产就是那些值得我们保护并且留传给下一代的物质实体或知识技能。按照 1964 年的《威尼斯宪章》，文物建筑应该“一点不走样”地保护并且流传下去。对于纪念碑式的文物建筑，采用这一标准是应该的，而且也基本上是可行的，因为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供人们参观学习。既然是参观学习，就不必考虑居住办公这些现实问题，那么这些建筑当然是越真实越好，外加的东西也越少越好。另外，在公众眼里，参观学习此类建筑还属于“好行为”，经常有此行为的年轻人也会被视为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这样的社会心理会促使政府和社团将资金持续投入到遗产保护之中，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外延，大量乡土类、非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也被视为应该保护的对象。对于这一类数量庞大、文化价值明显不及纪念碑式建筑的遗产，要想全部做到“一点不走样”就很难了。首先是修缮的成本，也许会高到全社会不愿意承担。一个社会用于遗产保护的成本取决于它的经济水平，也取决于它的全体成员对遗产保护的认知水平。不要以为遗产保护只是政府的责任，它同时是（甚至更是）公民的责任。政府的钱其实也是纳税人给的，如果纳税人都认为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要低于很多其他事情（比如教育、医疗、国防、环保、铁路、航空、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这些事情的紧迫性似乎永远都会超过遗产保护），那么政府也很难为遗产保护拨付高额的保护资金。其次，即使修缮成本的问题能解决，维护的成本也无从落实。维护成本之所以会成为一大难题，是因为很多乡村遗产的文化价值达不到让很多人来参观学习的水平，从而无法形成像纪念碑式建筑那样的良性循环。不能靠参观学习，那靠什么呢？只能是使用——继续居住、改造成餐饮场所，或者其他适合的功能。到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发现，遗产本身的短板可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缺少管线设施、采光不足、通风不畅、隔声不好、保温不良等问题，可以通过技

术手段来解决（但或多或少伴随着真实性损失）。等这些问题解决之后，除了那些特别有传统文化情怀的人，一般人还是不喜欢住在这样的房屋里。为什么？一是因为普通人的文化自觉还没达到相应的水平，二是因为这样的房屋通常缺乏空间的流动性，让人觉得不自由，不愿意长待。为了让人愿意长待，还需要允许甚至鼓励在传统的建筑里进行局部和相对少量的改造，从而将空间流动这个属于现代社会的精神元素融入进去。



法国卢瓦尔河畔 Turquant 村由窑洞改造的餐厅（罗德胤　摄）

新美学普及了遗产观念

在传统建筑里实现空间流动，是一个充满挑战同时又充满机会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把隔墙都打掉就是实现了空间流动，而是要充分地评估遗产本体各部分的价值、文化重要性和结构安全性，并结合将要实现的功能，选择真实性损失最小而空间效益最大的方案。这里说的空间效益最大，既包括室内布局和家具摆放所形成的空间流动性与多样性，也包括室内空间

与室外环境之间的互动。如何把握真实性损失与空间效益之间的关系，很难给出一个清晰且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需要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方案。不过，有两个大致的原则应该是成立的。一是要区分纪念性空间和日常性空间。乡村遗产里也会有纪念性空间，尤其是在我国。在传统时代纪念性空间经常用于举办各种仪式，比如祠堂、庙宇和大型民居的厅堂。纪念性空间带有很强的传统文化气氛，不可改变。而日常性空间，则主要用于实现各种日常生活功能，既然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改变，那么日常性空间也就有必要做出相应调整。有的民居，即使不用于举办仪式，也有其他重要的价值，比如有很多精雕细刻的装饰，或者是名人故居，或者在这里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就要按纪念性空间来处理，因为此类民居的文化价值已经等同于纪念性空间。二是主体结构和外观材料的改变程度要尽量小。若采光严重不足，增加窗户或扩大部分窗户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尽量选择在不靠近主街巷的立面进行改进。不得不走电线和外挂空调时，也同样需要小心处理。室内太矮不好用，一般而言略微增加高度是可以的，但是增加层数就不可接受了。石灰墙面、一般的门窗和一般的梁柱，因为属于非永久材料，是可以用相同材料更换的，但不宜刻意做旧。

有时候，为了节省成本、提高安全性和加大采光效果或观景效果，还有必要引入钢板、玻璃等现代建筑材料。这种新旧并置的策略，最初或许是为节约成本或满足安全需要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但是经过设计师的反复试验之后，在某些时候居然会显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对于设计行业而言，是一股代表着改革或变异的力量，虽然依旧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已弥足珍贵。对普通人而言，它就像是时尚界的偶像明星，让很多原先不关心、不喜欢文化遗产的人，从此爱上了文化遗产。遗产保护理论的建立，靠的是专家学者，但是若论将遗产保护观念推向大众，专家学者所起的作用可能远比不上偶像明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社交的扁平化和低成本化，这种明星的带动作用会被进一步放大。



广东省梅州市雁洋镇松坪村围龙屋，围龙屋内的纪念性空间，应当完整保护（孙娜 摄）

在目前的中国，新旧并置的美学或许还具有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很多传统建筑已经与民众的生活相脱离。比如“破四旧”中，神像被打掉，和尚道士被迫还俗，祭祀神灵的仪式也被视为落后的迷信活动而被禁止，从而导致大量神庙荒废。现在如果有哪位专家说在某地发现了一座年代久远、价值很高的庙宇建筑，那么保护的责任多半会落在当地政府头上。可以想象，假如这个庙宇一直在被当地民众使用，那么保护的成本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使用中解决了，这个时候政府和专家要考虑的就不是保不保护的问题，而是怎么保护的问题（防止火灾、防止虫蛀、防止村民们为扩大规模而将其改建为混凝土式庙宇等）。欧洲大量的教堂，其实就是这样被保留下来的。市民们每个周末都要到教堂做礼拜，教堂因而成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哪天主教说教堂年代久了需要维修，大伙自然踊跃捐款。又比如一些传统民居被村民们放弃，除了文章开头讲到的功能问题之外，其实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村民们在进城打工看到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之后，认定水泥混凝土的楼房才是“更体面”

的生活象征，所以挣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拆旧建新。在此背景下，直接让村民继续使用传统建筑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而新美学所带来的冲击作用，借助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营造出“传统更体面”的社会舆论，甚至有可能将这种舆论转化为市民和村民都认同的社会观念。

结语：开放与自爱

文化遗产与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有密切联系，这事关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乡村在精神文化上的价值“有必要反复强调”“处在重要历史阶段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总体的奋斗目标是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文化复兴是否成功”[5]。住建部牵头颁布的文件——《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也指出“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文化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1]。文化遗产也和公民个体的教育成长、平等自由有密切联系，这事关所有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创造力的开发。近期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就突出了民众及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强调文物古迹的保护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并指出公众的关注是全社会文物古迹保护意识提高的反映，是文物古迹的社会价值的体现[6]。当文化遗产和国家、个体都产生密切关系之后，遗产就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国家和民众都可以从中受益的财富。由此，遗产保护就实现了大众化。大众化使得遗产保护的成本由全社会均摊，从而让大规模的保护成为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的乡村遗产，很多事情就是有意义而且可以产生实效的。比如，很多地方的传统节庆应该恢复，让它们成为地缘认

1　参见：冯骥才先生在2016年6月22日浙江义乌举行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同的纽带，这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大有好处；传统节庆期间，最好还能发掘并恢复与节庆活动相配套的传统服饰、传统饮食、传统建筑、传统手工艺品等，从而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系统。对于当下成为热门现象的民宿（只要是在非纪念碑式建筑上做的尝试），不妨多一些宽容，因为正是这些项目，探索了传统建筑实现空间流动的可行性。对于咖啡馆之类的“西方文化”进驻乡村，也不妨怀抱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心态。一个村子，咖啡馆开得再多也就那么几家，因为市场需要多样性，会自动把多余的淘汰。咖啡馆的本质并不是咖啡，而是作为空间流动性的先锋，扮演着试探和引领的角色。星巴克的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就是因为敏锐地发现了城市白领工作者在办公室和家庭这两端都缺乏自由舒适的工作与社交环境这一机遇，才致力于打造“第三空间”，最终成就了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企业。舒尔茨打造星巴克的策略，是在氛围上努力营造与顾客之间的情感联系，在空间上设法创造空间的流动性和多样性。咖啡馆（而不是咖啡）满足的是人性的内在需求，在这点上不分西方和东方，也不分市民和村民。

中国是乡村遗产最丰富的国家，但我们的乡村遗产保护事业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特别需要开放而理性的心态。几年前，笔者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考察学习，负责接待的一位规划局技术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技术员前天晚上还西装革履地和我们共赴晚宴，第二天一早做正式报告时却换上了一身巴伐利亚的传统服装——不只是一件外套，而是从头到脚的一整套，包括帽子、靴子、袜子、皮带这些配件。我很佩服这位规划局技术员在不同场合下选择服装时所拿捏的度。在国际社交场合，他穿的是国际服装，这样有利于和大家自由地交流；而在做报告的场合，他是台上“演员”，我们是台下“观众”，所以他穿得特殊一些，也不会让人感觉突兀，反而因为看见他对“表演”的重视而会加倍认真地听讲。这位萨尔斯堡技术员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巴伐利亚民族是一个对世界友好

开放的民族，也是一个极度珍爱本民族文化的民族。在这里，开放与自爱，不仅不矛盾，还互相支撑。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让乡村遗产回归百姓生活 [J]. 新建筑. 2016（4）：18-22. ）

参考文献

[1] 罗德胤 . 村落保护：关键在于激活人心 [J]. 新建筑，2015（1）：23-27.
[2] 郭旃 . 全民参与：公众化的遗产保护趋势 [J]. 世界遗产，2013（4）：18.
[3] 冯骥才 .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J]. 民间文化论坛，2013（1）：7-12.
[4] 洛克 . 论政府两篇 [M]. 赵伯英 , 译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5] 陈志华 .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 [J]. 世界建筑，1986（3）：13-14.
[6] 李华东 . 乡村的未来和乡村价值 [J]. 建筑学报，2013（12）：1-3.
[7]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S].2004.

第五节

村落保护的大众化和产业化

村落保护要大众化，这是个容易被忽视，但又不难理解的问题。首先，村落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部分，近年来这项事业的一大趋势就是大众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表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宗旨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对话，和平发展，减轻贫困，最终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1]。《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近期颁布的修订版中，也强调和突出了民众及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强调文物古迹的保护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全社会应当共享文物古迹保护的成果，并规定公众的关注是全社会文物古迹保护意识提高的反映，是文物古迹社会价值的体现。[2] 其次，面对中国乡村的现实情况，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能让基层政府官员和村民接受遗产保护的观念，从而停止目前仍广泛存在的拆除老房子的行为。再次，遗产保护通常是成本比较高的事情，在量大面广的乡村遗产领域更是如此。[3] 乡村遗产的保护成本，

1　吕舟．面对挑战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J]．世界建筑，2014（12）.

2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2004 年.

3　举例来说，2014 年中央财政决定给每个中国传统村落 300 万元的资金（总额为 114 亿元），被认为是超常规的一笔巨款，但实际上 300 万元也就大概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村子所需保护资金的 1/10 左右。

政府应该有义务承担一部分，但是大部分还是要社会承担。所谓社会承担，包括各种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的捐款，也包括民众、业主自发的保护行为。其实政府承担的那部分成本，从根本上说也是来源于社会的，因为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给的。政府能够拿出多少资金用于遗产保护，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纳税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认识水平。最后，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表示乡村遗产真正进入到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当乡村遗产和社会民众之间具有经济、文化、政治、心理上的一系列紧密关系时，保护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村落保护要产业化，又是什么原因呢？最近这些年，由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产业化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但笔者在此仍然要强调：产业化之所以重要而且必要，是因为它是实现村落保护大众化的最主要途径。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要先对产业这一概念进行梳理。

何谓产业？

《新华字典》关于产业的定义有三个：①指私人财产，如田地、房屋、作坊等；②生产事业；③特指现代工业生产部门。本文所说的产业，是指其中的第二类“生产事业”。同时笔者要强调的是，既然是生产，就有使用（或消费）与之相配，所以产业是包括从生产到使用，也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循环过程。

产业有初级形态和高级形态之分。初级形态的产业，只有生产和使用两端。生产者提供产品，使用者购买产品，生产者将资金投入再生产，如此循环。高级形态的产业，是由生产、推广、使用和研发四个环节构成的。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在经过推广之后再到达使用者之手；使用者购买产

品的资金，有一部分进到研发环节，以便设计出质量更高或品种更多的产品。随着规模的扩大，产业会从初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这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推广环节是需要成本的，为什么生产者愿意支付这个成本呢？因为推广有利于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从而提高产品的销售量或者使用者对产品更高价格的接受度（前者还有利于降低产品单价，这又会进一步提高销售量）。研发也是需要成本的，为什么生产者也愿意支付这个成本呢？因为研发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为扩大知名度和信誉度打下真实的基础，或者干脆设计出新的替代产品，从而维持本机构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在生产—推广—使用—研发—生产的产业循环过程中，产品也在使用者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它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除了实体性的东西之外，产品还可以表现为非实体性的，比如服务和品牌。 随着产业的升级，后两种的比重会逐渐增大。相应的，在使用端也不只有用掉或吃掉的东西，还包括体验这种主要表现为心理感受的东西。推广的手段，在产业初期可能只是简单地喊喊口号，后来就会设法采用一些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广告，还可能会运用一些看似不是广告的手段，比如展览、教育、公益活动等。在研发的投入上，越成熟的产业通常越大。

作为产业的文化事业

不可否认，产业是一个经济意味很强的词汇，跟我们所关心的村落保护似乎是不相干的。然而，只要依循“生产—使用”和“供给—需求”的思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文化现象其实也符合产业逻辑。比如宗教信仰，它的“产品”是精神慰藉，生产者是教宗、主教、教士等宗教人士，使用者是信徒。一个宗教之所以能产生而且发展，正是因为它的“产品”符合了民众的精

神需求，而且又通过传教等“推广活动”扩大其受众面。值得注意的是，信徒们对于宗教所提供的“产品”，表面上是无关经济利益的，但实际上却可能有相当强大的经济流。欧洲各大城市里矗立起的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教堂，如果没有信徒们的无私奉献，根本不可能建造得起来。而这些在建筑形制上臻于完善的大教堂，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堂音乐、教堂绘画、教堂雕刻等一整套教堂艺术，又恰恰是宗教人士与艺术家们长期“研发”的成果，它们反过头来又在极大程度上加强了宗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文化和经济互为推动，共同提高。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宗教信仰可以不依赖经济活动而存在，但它依然符合“生产—使用”的产业化逻辑。笔者曾经在世界遗产地之一的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族梯田做过调研，这里的哈尼族寨子普遍有一种信仰，叫“寨神林崇拜”。寨子的选址多位于海拔 1000 多米的山腰上，上方有森林，下方有水稻梯田。在村寨与森林之间，哈尼人会选择一处小树林，作为护卫整座寨子的寨神林。每年春耕之前，村民们会在寨神林里举办隆重的“昂玛突”。昂玛突持续 3 ~ 5 天，其间伴随着十分繁琐的祭祀仪式。这个现象在外人看来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当我们把它和哈尼族的生活环境放在一起时，答案就显而易见了。哈尼族生活在红河南岸的哀牢山中，他们可能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接受了汉族的水稻耕作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山地梯田上。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是很少的。依靠着十分有限的工具，哈尼人将森林一点点开垦成梯田。梯田的开垦耕作相当艰苦，山区的生存环境也比较恶劣。面对这些困难，无组织的个体是应付不来的，需要将个体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并且以互相激励、互相模仿的方式提高个体的耐受力，才能克服。昂玛突的出现和存在，从多个方面迎合了这一目的：它让人们在开始新一轮艰苦劳作之前有短暂的放松；它让所有寨子、所有家庭和所有个体在同一时间过统一的节日，实现了地缘认同和民族认同；祭祀仪式中对村寨首领的高度尊重和每家平均分食猪

肉的行为，确保了集体内部的团结。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哈尼族人自己“生产”出了寨神林崇拜，以实现他们将个体凝成集体并适应其生活环境的“需求”。依靠着高度发达的集体凝聚力和超强的个体耐受力，哈尼人将大地“雕刻”成了壮美的梯田。在这个过程中，寨神林信仰所提供的“产品”对于哈尼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极为关键的，尽管它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分化出专业的宗教团体，也没有发展出恢弘的宗教建筑。

产业化的逻辑，更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社会里的文化事业。大部分成功的或者说能够存在至今的产业和事业，都会在市场上形成自我循环。这一点很好理解——如果不能形成自我循环，早就因为断粮而遭淘汰了。但也有些文化事业，似乎是不能在市场上形成自我循环，但又存活下来了的。比如博物馆和大学。

博物馆是和文化遗产有着较高重合度的一个行业。分析博物馆业，对于我们的乡村遗产保护必定有比较强的参考意义。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原因，笔者有机会参观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不管是拥有丰富藏品的大型馆还是有着特殊藏品的小型馆，其展陈环境之优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建成和运营一个好的博物馆，投入是相当不菲的。仅靠门票收入显然不可能收回成本，何况有的博物馆连门票都免收。一般说来，博物馆要靠政府或社会机构的公益性投入来维持。问题来了，为什么政府或社会机构会愿意做这样的“亏本”买卖呢？这种行为似乎和产业化的思维是毫无关联的。笔者认为，这种表面上的不关联，恰恰是一个社会的产业化发展成熟的标志。博物馆里收藏的东西，都是具有高文化价值的。它们对于培养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很重要，其效益不是直接表现为市场价值，而是体现为间接的和更长久的方式。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不仅其个人的生活品质较高，创造性也更强，从而可以为社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社会之所以不断发展，正是因为民众的知识和文化在一代代积累。为了实现博物馆的这项功能，就需要在它和市场之间设立一个缓冲池，让全社会

产生的财富有一部分进到这个缓冲池里，同时让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来支配和使用这笔财富，以便让博物馆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文化作用和社会效应。



西河村粮油博物馆（陈龙　摄）

在缓冲池的产业，也包括其他产业中一些不必直接面对市场的环节，其从业者有可能在主观感受上是“市场免疫”的。这是因为，产业从初级往高级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其规模变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分工不断细分、同时又互相配合的过程。每一项分工，又可能演化分一门新的产业。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随着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信息量越来越大，以至于没有哪个人能把所有环节的知识都掌握。如果一个产业是成熟的，每个环节的工人只要掌握好自己那部分工作就行，各个工种之间不会有冲突，甚至整个产业与上下游产业之间也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在这种良性关系中，大部分人只需关心自己即可，只需要少数处于领导或开拓地位的人去盘算整个产业的经济账。

如果一个产业是不成熟的，各个工种之间就可能会出现矛盾，与上下游产业之间也会互相抵牾。这种现象在产业跃迁的过程中最为明显。所谓

产业跃迁，是指一个产业从一个较低级状态跳跃到一个较高级状态。累积式和渐进式的产业发展，各个环节是逐步向前推进的，相互之间的适应性会比较好。而跃迁式的发展，需要产业中的某个环节作为龙头，大幅提升到一个更高级状态，此时其他环节仍习惯于旧的运作方式，在相互配合上就会出现脱节。跃迁式的产业发展，经常出现在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有交流的时候。在文化产业领域，这种现象又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不发达经济体在引入某项文化事业的时候，可能会只看到它的文化表现，而意识不到深藏在它身后的产业驱动逻辑。身负文化使命的人，在道德上又常常是具有先天优势的，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贬低经济行为。

还以博物馆为例。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整体认识到位，也由于和上下游产业之间的连环带动，博物馆作为一个产业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发现博物馆这种建筑很重要时，也会设法在自己国家里建起博物馆。不过，正如我们目前在国内所看到的，这些博物馆大多门可罗雀。其原因就是博物馆业光有建筑不够，还得有善于运营博物馆的人，以及民众在周末节假时“使用”博物馆的行为习惯。如何让发展中国家的博物馆也发挥出作用？要派人到发达国家去学习如何运营博物馆，或者直接把发达国家的博物馆专业人员请来当馆长；与此同时，还得通过广告、讲座、事件策划等宣传推广手段，培养起民众参观博物馆的习惯。当然，所有这些举措都不可能是免费的，都在一步步增加博物馆的产业成本。尤其是培养民众使用博物馆的习惯，那简直是比修建博物馆还要难得上一百倍之事。主管部门很快就会发现，对博物馆的初期甚至中期的投资都是效益甚微的，因为根本就没多少人来参观。在这个节骨眼上，博物馆的投资者和运营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停止输血还是继续补血？如果停止输血，前期投入就打了水漂。如果继续补血，又要补到何时才是头？缺乏远见或能力的主管者，会选择停止输血来降低成本，还可能会以批评民众文化素质低的方式来推脱责任。而有眼光、有能力的主管者，则会选

择继续博物馆的投入，因为他们对博物馆的产业规律有足够的了解，坚信好的博物馆一定会受到民众的喜欢。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会清醒地认识到，博物馆的软件（包括设计、推广和营运）和硬件（包括建筑、藏品）同样重要，在成本上它们也应该有相应的平衡。

作为产业的村落保护

用产业化的思维来看待我国的村落保护，我们或许会得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第一，村落保护的性质和博物馆、大学教育是类似的，都属于“缓冲池”里的产业，不应该直接面对市场。直接面对市场的产业，评价标准是容易掌握的，只要看它挣不挣钱就行了。不直接面对市场的产业，在效益评估上就会有些麻烦。有一些统计方法可以使用或参考，比如博物馆或遗产地的年客流量、大学的报考人数等。不过，任何数据都有片面性，要想评价一个非市场化产业的效益，除了多增加几个维度的指标做参考之外，最可靠的办法还是看社会口碑，最根本的途径则是培养起有行业自律的专业或学术团体。由于社会口碑和专业团体的形成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对于发展博物馆、大学、遗产保护这些文化事业要有足够的耐心，要做好长期培育的准备。

第二，不直接面对市场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市场。市场是个容易让人联想起庸俗化的词，我们可以换一个中性的词汇——使用者。文化事业可以不直接面对市场，但绝不能忽视它的使用者。谁是文化事业的使用者？答案是社会民众。这是一个最基本，但却容易被专业人员忽视的问题。遗产保护作为一个行业或专业，是最近几十年才引入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进入我国的时间较早，但从其概念拓展到遗产保护则在国际上也是比较晚

的事）。和博物馆一样，遗产保护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不但学科本身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技术规范，社会民众的认知度也很高。遗产保护这门学科在进入我国之后，也和博物馆一样，出现了“单兵突进”的现象。不少专业人员对理论和技术的掌握都是到位的，甚至和国际接轨都没问题，但是他们不太关心这个专业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也不了解这个专业和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互动衔接。这种专业本位思想，放在一个成熟的产业里是没问题的，而且还是产业成熟的标志。但是在一个不成熟的产业里，如果所有的专业人员都只考虑本专业，就会有很大问题。我们需要有人去思考：村落保护，如何才能让作为使用者的社会民众接受？如何才能“使公众真正意识到遗产就在自己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1]？

第三，从产业也就是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村落保护，我们会发现：作为产品，我国的乡村遗产基本上还属于“半成品”。在村民即村落保护的产权所有者兼使用者的眼中，乡村遗产主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民居大部分都已年久失修，材料老化，很多还有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之后，一些设施如上下水管、洁净厨卫等已经成为基本生活用品，而这些在传统村落里还很不完善。这样的“半成品”，自然是无法让村民们喜欢的。

如果是在开展旅游业的传统村落，从使用者即参观游客的角度来说，这些村落确实具备了作为产品的一些要素，比如数量不少的传统建筑和风景优美的田园景观，而且也的确有一些村落依靠着这些优势成为旅游热门景点，不过显然大部分传统村落仅靠这些是不够的，因为它们通常有以下缺陷：①传统风貌不完整——总有一些对整体风貌造成破坏的新建筑；②餐饮住宿不舒适——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对乡村目前的吃住条件经常是难以接受的；③消费单一——缺少让人觉得物有所值的产品和服务（门票基本上是大幅拉低

1　郭旃．全民参与——公众化的遗产保护趋势 [J]．世界遗产，2013（8）．

印象分的，而不时出现的“宰客”行为更是让人深恶痛绝），更别说能给人以惊喜的体验。这样的“半成品”，自然也是无法让参观者接受的。



桃园村农家乐改造（孙娜　摄）

抛开村民的实际生活和旅游观光业，即便从纯粹的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村落保护在自身的研究和阐释系统上也极不完善。为数众多的传统村落，只有很少一部分有学者去做过调查或记录，进行过人类学研究或建筑测绘等深度专业工作的村落案例就更少。“每个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但没有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们就很快消遁于无。”[1]没有调查和研究，就挖掘不出村落的文化价值，更无从谈起让参观者学习、了解和喜欢上乡村文化遗产。

第四，从宏观的市场需求和社会心理来判断，我国的乡村旅游业是已经起步而且潜力巨大的。“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新领域显示出‘生命’初始的无限生机。由于客源市场与供给市场的双向需求，无论哪种区位类型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旅游经济的附加改变了农村单一经济的

1　冯骥才．为紧急保护古村落再进一言 [Z]．中国艺术报，2014-4-13.

结构，起到了兴一处旅游富一方百姓的目的。”[1]城市越发达，乡村环境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就越明显，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很多发达国家的乡村旅游开展得不错的原因。

乡村旅游中，乡村遗产旅游无疑又是龙头。尽管近年来旅游业的开展给一些传统村落的真实性造成了损伤，但也有学者指出，“旅游带来的影响只是给传统村落换了一套衣裳，身体本身没有变，而一些地方的撤村并镇和新农村运动，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了传统村庄。”[2]面对乡村旅游，我们要做的不是将其取消，而是要吸取这些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思考如何改进。

非遗产类的村落，并非不能搞乡村旅游，但是先天条件比遗产类村落差远了，需要后天做很大努力才能弥补。作为一个农业文明源远流长的大国，我国在乡村遗产旅游上可以说是根基牢固、传统深厚的。旅游讲究差异化，但这种差异化又是以拥有某种共性为前提的。完全差异化的旅游，可能会让人无所适从。习总书记提倡的乡愁，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文化认同，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正在往越来越城市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拥有一个共同的乡村文化记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于 2012 年评出第一批之后，迅速得到专业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其后每年评出一批，现在总计已达 2555 个村落上榜。社会关注度高，是传统村落从财政部拿到 114 亿元资金支持的一个重要背景。

从实际效果看，乡村遗产旅游不仅给古村居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之间的接触，可以最快速地改变村民们看不起自家老房子的观念。从这一点来说，乡村旅游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落保护大众化的目的。

第五，面对广阔的乡村遗产市场需求，目前我们能提供的成熟产品是

1 王兵．从中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对比看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 [J]．旅游学刊，1999（3）.
2 吴必虎．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机遇 [Z]．中国旅游报，2014-2-12.


桃园村知青公社（孙娜　摄）

很少的。乡村旅游绝不只是简单的吃两顿饭，而是可以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国家旅游局提倡的“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字真言，至少对于乡村遗产而言是过于简单的，不过即使是按六字真言，也是可以做得有文化的，而且只有当它们做得有文化时，才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里头需要有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需要对村民进行培训。饮食的改进，要往无公害和有机的方向发展。居住的改善，除了一般的民居住房要进入现代化的厨卫设施之外，不妨多一些高端的民宿。特色手工艺也大可挖掘，很多农具和农产品在现代生活里已经很少用到了，它们应该展览在乡村博物馆里，供人学习；同时也不妨适当改造，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调整其尺寸和用途，成为艺术品，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在六字真言之外，旅游还有更为本质的作用，那就是学习和体验。城市里的人，为什么要去乡村旅游呢？不否认它有放松精神，让人暂时摆脱工作压力的功能。但是，作为“维系着中华文化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1]的传统村落，它们的文化意义是最不应被我们忽视的内容。

第六，乡村遗产的成熟产品少，表面上看是钱的原因——把“半成品”变成“成品”需要一笔不小的投入，实际上则是价值观在起作用——大多数地方政府和村民都乐于拆旧建新，而不是把钱投入到修缮和改造旧建筑上。而之所以有这样的价值观，又和文化遗产的专业本位思想有关。我们没有认识到文化遗产是一个产业，不觉得有必要去向它的使用者做营销推广，也不觉得有必要去和上下游产业进行衔接和互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尤其是村落保护，当务之急就是要补营销推广的课。我们需要让村民和全社会理解乡村遗产是有价值的观念，需要让上下游产业的专业人员授受真实性、最小干预、可识别性等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与专家的层面上，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如果人们不知自己拥有的文化的

1　四部局．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



桃园村叁味咖啡（孙娜　摄）

价值，不认同，不热爱，我们为谁保护呢？而且这种保护也没有保证，损坏会随时发生。所以接下来一项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就像在阿尔卑斯山地区那几个国家的山民家里，他们人人都会对来访的客人自豪地大谈家乡的山水花鸟和祖辈留下来的一砖一瓦，还穿上民族服装唱支山歌欢迎你。”[1]

营销推广是比较通俗的说法，换个高级点的说法，叫文化创意产业。不错，好的营销绝不能是简单粗暴的训导说教，而是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或事件。发现和设计好的故事、事件，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有创意的宣传是成本不高的，但是培养有创意的人才则是高成本的事。除了加大教育投入和改进教育方式之外，别无他法。在如何降低成本方面，前文讲到的哈尼族寨神林崇拜其实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在教育不发达（哈尼族传统上连文字都没有）、几乎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寨神林崇拜普及至上百万人。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说到底，还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当下需求并挖掘潜在需求。

结语

我国乡村遗产需求量大而成熟产品稀缺的现状，其实是为先行者提供了绝好的市场良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实践案例的增加，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但可以探索总结出系统的技术经验，也一定能培育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完整乡村遗产产业。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村落保护的大众化和产业化 [M]// 旅游规划与设计（第 17 期）. 2015（9）：8–17。）

1 出自冯骥才在 2013 年 1 月的民间文化论坛上的演讲《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第六节
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四个样本

本文探讨最近观察到的四个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方式。第一个是浙江松阳的方式；第二个是河南新县西河村的方式；第三个是在广东梅州桥溪村看到的景区方式。一般而言我们不主张乡村采取景区模式，但是通过对桥溪村的观察，发现也不能完全否定。第四个是田园东方在江苏无锡阳山镇做的一个案例。这是一种地产模式，遗产保护通常会和房地产保持距离，因为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强。但是在阳山我们发现，资本除了追求逐利性也会追求持续性。当资本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有的想法也会和遗产保护不谋而合。

观念与技术

在开始讨论四个样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观念和技术。

目前的乡村，仍然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这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很难一下扭转。而且我们国家还有一个规定——农村土地的

产权不可以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估计短期之内不会变更。温铁军先生的现代化成本转嫁理论，在中国社会有很强的现实支撑。一百年来，我们每一次大的社会危机都是靠乡村来消化的。发达国家的危机靠的是往发展中国家转嫁，中国被转嫁得最多。我们无法往外转嫁了，只有往内部转，导致我们现在环境污染很严重，社会矛盾也很突出。农村土地产权事关社会稳定，短期之内难以改变。欧洲是通过产权更替来实现乡村遗产保护。欧洲的城市化率很高，95% 以上都是市民。乡村空心化之后，大量农房空置，附近的市民就到乡下买一栋房子，几万欧元搞定。周末经常来修一修，修好之后再时不常来度个假，很多老房子就这样保下来了。因为成本不高，门槛低，所以有很大的市场。而进入市场的人多了之后，又逐渐推高了乡村房价，老房子因此有了资产保值的作用。

中国可以这样吗？也许可以探讨。毕竟有恒产才有恒心，租房的心态总是不同于买房。有的地方已经在做试验了，比如黄山市。不过这是一件敏感的事情，目前看来至少不会大规模开展。不能靠城里人买，那就只能让村民自己保了。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家都看到的，大多数村民并不愿意保。怎么办呢？在实践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经验也有教训。首先，不要以为把老房子修好就是保护了。老房子的保护成本主要分两部分，第一是修缮，第二是维护。维护的成本经常要高于修缮，修缮是一次性的，维护是长期的，这可能是国家文物局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怎么降低维护成本呢？让村民住在里面，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村民住在村里，住在老房子里。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的，也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擅长的。然而，当我们把好房子修好之后，村民其实还是不愿意住在里面的。为什么？因为观念没有解决。村民们依然认为，小洋楼那样的新房子才是打了翻身仗的象征。十年打工挣钱，一朝盖起洋房，这是当下农村普遍的现象。我们现在有个口号，叫“改造一个老房，拯救一个古村”，就是针对这个情况而提的。老房子改造完了以后，让城里人住进去。只有让村民看见

老房子是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象征，才可以从价值观上实现扭转。我们的规划设计，都是为了改变观念而做的。只要让村民意识到小洋楼并不高于老民居，你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事件，包括湖南高椅村儿童书屋和民宿，目的都是让小洋楼和老房子在村民的心目中掉个位置。这是我自己做乡村规划的逻辑。我去观察别人做的案例，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怎么样才能改变观念？尤其是怎么样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观念改变？这里头不光要考虑资金成本，更得考虑沟通成本——说教通常都会失败，示范相对容易成功。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乡村做规划，尤其是落地实施的规划，最好先想好要做的事情和目的，再给它配硬件。所有的硬件改造都是要花钱的，而乡村的资金通常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明确目的就开干，就会做很多无用功，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就会导致政府和村民都丧失信心。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想好了要策划一个事件，再围绕这个事件优先处理相关的硬件，那这个事件做成的概率就比较高，就会产生效益。这种效益可能综合的，可以体现为经济效益，也可以体现为社会效益。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太在意产生了多大的经济收益，而在意这件事做了之后，当地的老百姓是否支持。一旦获得老百姓的广泛支持，社会就会宣传。社会一宣传，上级部门就会认可。通常我们的做法是：针对一个村子，先分析它的资源特色，然后思考有什么样的事件，可以相对低成本地产生出综合效益（包括经济、社会、话题性和推广性等方面的考量）。这需要不同学科的碰撞。

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乡村逻辑：用技术来实现事件，用事件来改变观念。下面我回到开始讲的四种方式。

松阳样本

浙江的松阳县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上百个传统村落，光是国家级的

就有 50 个。这 50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和我们的积极推动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希望松阳得到比较高的荣誉，这样可以激励当地的保护积极性。在住建部公布第三批传统村落之后，当地干部的保护意识就基本上调动起来了。在此之前，松阳的传统村落保护更多地体现在少数领导的认识上，和全县的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当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单公布之后，局面就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是个别领导的个人意志，而是全县干部的普遍认识。这个时候大家不再讨论保不保的问题，而是怎么保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讨论：松阳的传统村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在当时，我自己想的还是整村的规划设计和落地实施，也就是将比较多的钱投在一个村里面，让它成为全县其他村子学习的榜样。但是，王峻县长采用的是点位策略，就是把资金分散到十几村子，每个村子只做少量的项目。为了这十几个点位，他率团去考察了国内做得好的案例，然后亲自上门请一些高水平设计师到松阳做项目，还给予比较高的经费补贴。我们作为最早一批进入松阳的规划设计者，得到了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我本人负责规划的平田村，邀请到几位知名的设计师，包括许懋彦、王维仁、徐甜甜、何崴、张昕和李海鸿，加入了设计团队。高水平且各有特色的设计师，让平田项目在短时期内就获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业主和地方政府的信心。莫干山颐园的设计师夏雨清老师，被王县长请来松阳。他在县城的老街上选了一个点，设计并运营了一家格调相当高的杂货店（名为“山中杂记”）。这家杂货店建成后，也很快就受到了业内的关注。

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松阳已经形成了十来个在业内有影响的点位，有的是民宿项目，有的是博物馆项目。这种类似于网红的项目，用小资金投入换得相当高的知名度。当然，并不是每个点位都一定能扶持得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成功率为 30% ~ 40%。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点位带动的方式确实使得松阳整体的知名度大大提高，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得以在松阳集聚。这是松阳的模式。



松阳平田村民宿——木香草堂（建筑师：许懋彦、李海虹）（李君洁　摄）

西河样本

河南新县的西河村，走的是一条比较传统的路径，就是将比较多的资源集中在一个村里面。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依然是可行的，但要求村干部和村里的领头人积极配合。如果不配合，项目失败的概率就很高。我们非常幸运，西河的村干部和“新乡贤”以及镇里的领导都比较得力。经过两年的时间，西河村也成为业内比较认可、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村落。

乡村规划在落地实施的时候，要尽量回避大的矛盾。比如说拆除风貌不谐调的新房子，这是规划师容易有的冲动。村里的房屋有好有坏，有的对风貌影响很严重，作为设计师就自然而然想去给它修正一下。但是，这件事情的风险指数是相当高的，因为你一旦动房子，老百姓可能会和你产生很大的冲突，然后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新房子再难看，我们也尽量先不动它，而是先动景观。景观这个事情大家都不会反对，有利于让项目顺利地开展起来。



从西河大桥上看村落（孙娜　摄）

我们也拆了一栋新房子，因为这栋房子位置太关键，把整条老街都挡住了，不拆就完全无法体现传统风貌。拆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那栋房子要拆，本来就是在我们规划中的，但是我们不能跟村民说它不符合规划，所以要拆。这个时候人类学就起了大作用。这栋房子建在祠堂的前面，严重影响了村子的风水——确实是这样，用孙君老师的话说，就是“难怪村里几十年都没有出一个科级干部”。风水的说法让这家主人承受了全村人给他的心理压力，所以拆除就比较顺利。这是一个小经验。

景观的主要工程完成之后，村子就有基本的旅游业了。乡村旅游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策略。村民对自家环境经常是熟视无睹甚至麻木的，让城里人喜欢上村子，是让村民重新关注和爱护自己的村子的一个路径。这大概也是人之本性，完全不靠别人认同就能自爱的人是极少的。我们做乡村旅游并不一定要挣钱，而是希望用城乡的交流去激发和提高村民的文化自信。



河道景观——亲水活力区施工现场图（李君洁　摄）

景观工程之后，我们开始做房子的改造。有两个选择：改民居还是改

公建？我们原来以为民居会比较好改，因为规模小，投资低，技术难度也相对小一些。但事实恰恰相反，民居改不改，光谈判就花了一年。一个院子的户主有好几家人，意见很难达成一致。这边民居改造的主意还没有确定，那边公共建筑已经改完了，就是何崴老师设计的西河粮油博物馆。虽然投资比较高一点，大概 150 万元，但是产权清晰，好操作。公家的房子，县长开个会就拍板。博物馆建成之后，知名建筑师是很起作用的，不仅是认真设计，还努力宣传。西河粮油博物馆在落成当年就拿到了 WA 奖，后来又拿到了一系列其他的奖。这些奖项对村子知名度的提高也有推动，客流量有进一步提高。

博物馆建好之后，还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发现，游客来了之后在村里逗留的时间还是很短，因为村子规模小，逛一会儿就逛完了。博物馆是有名，但运营不是很理想，毕竟是缺少专业运营的人。怎么办呢？开个咖啡馆试试吧。我们说服了村里的合作社，花了 8 万元开了一家咖啡馆。试运营之后，效果不错，游客待得住了。这样产生了两个效果。第一，他得吃午饭，于是村里的农家乐一下就开展起来了，村民们得到收益。第二，有话题，在这里喝茶喝咖啡的人，回去跟亲朋好友宣传。咖啡馆是去年八月底开张的，到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一天来了一两万人，成为信阳地区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规划，并不是在规划文本里把第一步动作都设计清楚的，而是方向定了之后允许有试错的过程。

桥溪样本

广东省梅州市的桥溪村，是第一批国家传统村落。大概在一年多以前，这里正在大规模地搞建设，做了不少城市景观工程。我们对这种做法是很担心的，所以最近专门去做了重访。这次去看了之后，发现城市化景观的

问题确实存在，这是它的缺点，但是它的操作方式也为我们展示了事情的另一面。在村里做建设的机构叫宝丽华集团，旗下有一个度假酒店，叫雁南飞。宝丽华集团在桥溪村投了 1.3 个亿，做河道景观和民居整治，又用比较高的资金补偿把影响整体风貌的小洋楼从村民手中买过来，然后全部拆掉，手笔不可谓不大。这些工程结束之后，村子开始卖门票，50 元一张，去年门票收入有 500 多万元。这笔钱宝丽华集团一分不要，全都给了村里。“桥溪村景区”的人员工资和日常维护，大概要花掉其中的六成。剩下的钱是这么分配的：首先，凡是户籍人口每人分 3000 元；第二，村里所有的老房子各给一笔钱，条件是房子要留着，而且打扫干净；第三，村里有三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再单独拨一笔钱，条件是每天开门迎客，供人参观。

据村支书说，村民们对宝丽华集团是很支持的。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个方式。我们不禁要问，宝丽华集团图什么呢？难道一个企业真的有那么高的保护觉悟？通过和村支书的交谈，我们了解到其中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桥溪村在雁南飞度假村的上游，村民们开农家乐对酒店的水源造成了污染。为了解决污染，宝丽华集团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把村子“买”了，要么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也许经过一番盘算之后，宝丽华认为把村子买了更划算。所谓“买”，并不是真正的买断，而是掏一笔重金，将污染户搬迁到山下。与此同时，宝丽华集团也意识到，将村子纳入其大景区范围，也就让住店的客人多了一个参观的去处，从而延长了在度假村的住宿时间，也有利于增加入住率。这么一来，前期的投入就获得了回报，集团的资产也扩大了，可谓一石多鸟。这是桥溪村的方式，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种特殊的景区模式。

阳山样本

阳山是无锡郊区的一个镇，这里有一个村子，按照几年前的规划，应

该是被拆除的，因为要开发一个别墅房地产项目。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叫张诚，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是我们的同行，也有乡村遗产的情怀。张诚先生到了现场，发现这个村子拆得只剩七个老房子了，就马上联系当地政府说，这七个房子全部要留下，由他来考虑怎么结合进房地产项目。张诚先生的最初设想是，留下这七个老房子，和新建的售楼处一起组成别墅的公共区。这几年房地产的形势下滑，别墅的销售情况并不很理想，但是售楼处公共区却相当受欢迎。那些老房子有改成咖啡馆的，有改成餐厅的，有改成书吧的，配上周围已经有的大片桃林，俨然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农业休闲园。张诚先生也顺势调整了销售策略，把另外几个老房子改造成了豪华套房，又加建了一个有几十间客房的乡村酒店（建筑风格也模仿了老房子），再把售楼处也改成了酒店的大堂。经过此番调整，阳山项目从一个别墅地产变成了一个很有格调的乡村度假酒店，一部分别墅也编入成为分散式客房。张诚先生的硕士论文就是写乡村综合体的，这个项目让他的实践跟理论有了结合的机会。他把阳山项目总结为“新田园主义”，其理论根源是 100 多年前英国人霍华德的“花园城市”。

我认为把花园城市的理论应用到乡村，有可能是成立的，因为它恰好符合了中国社会一只脚已经踏入中产阶级社会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肩负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这是北上广深大多数上班族的常态。在这个时候，人会渴望去一个舒适而放松的地方，可以暂时地脱离办公室和家庭。星巴克这样的商业，就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它是专门为中产阶级打造的“第三空间”。在这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待着，或者工作，或者聊天，又或者看书发呆，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同时，工作效率也得到提高。乡村综合体也一样，它可以成为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空间。星巴克利用的是日常时间，可能是在下班和回家之间的那半个小时。乡村综合体利用的是周末两天，是时段较长的缓冲。乡村综合体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服务，也为乡村谋得利益。这也是一种方式，显然不是所有村子都可以这么做，但至少一部分村子可以。

结语

以上四种方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或观察所得，难免带有一点主观色彩的思考。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是这样的：每个案例都有它的特殊之处，也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决不能简单模仿，但是看得多了，通过互相比较分析，对我们自己做实践还是会有不少启发的。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四个样本. “规划中国”微信公众号，2016 年 8 月 22 日。）

第七节
乡村遗产与现代生活

欧洲的乡村风貌保存好，最大的原因不是官员的水平有多高，而是普通民众已接受传统风貌，觉得自家的房子就该是这样。我们生活在好看的风景里面，就应该用传统风貌的房子来搭配。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居住的，我现在也还是这样居住。哪位邻居想更改，我还不允许。这是对传统的认可和接受，在欧洲是普遍的观念。一百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欧洲在工业化过程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做传统手工业的力量，这些人要保护传统手工业之美。两种力量并行，等到欧洲工业化完成之后，很多人回过头来反思工业化的弊端时发现，当初幸好没有把手工业传统中断了。所以他们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

中国的问题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速度很快，用 30 年的时间要完成别人差不多用 200 年完成的事，来不及去考虑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手工业传统没有人去关注，等到有少部分人觉醒，发现手工业传统的价值的时候，就发现已很难保护。工业化像一个巨大的火车头向前推进，而他们的力量很小，难以阻挡。



英国草苫屋顶民居（覃江义　摄）

传统离开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当年“破四旧”的时候，把许多“迷信”的东西、信仰的东西都打掉了。但是许多公共建筑就依赖于所谓的“四旧”，如果没有了“四旧”，生活中也就不需要这些建筑了。

欧洲的教堂为什么那么多，保存得那么好？因为人们天天都在使用，周末还有重要仪式，它们成为所有市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损坏的时候，人们就会去维修，神父会组织大家捐款。民众自己就解决了维修的问题。

可是在中国，当初是政府不让烧香拜佛和祭拜祖先的，这些东西已经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被拿掉了。现在要保护传统建筑，老百姓会问，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国家说要保护，那就国家掏钱吧。大量的庙宇、祠堂就这样被丢掉了，它们离开了公众的日常生活，没有了存在的依据。

最大的问题在于，许多传统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消失了。这导致许多遗产的维护成本很高，因为我们无法把遗产维护成本摊薄到每个人头上，只能由少部分人、少部分机构来承担。只有使用，才能实现日常的维护管理。不让用，老百姓就不会投钱进去。

乡村中有三股力量在碰撞

行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一个乡村里，可能有三股力量在工作。遗产保护是一股力量，建筑设计是一股力量，旅游度假是一股力量。三股力量相互关联，往往是谁先进场，就听谁的。当同一个村子里有三股力量进来时，大家就得坐下来谈判。这是好事情，大家诉求不同，行业标准不同，能不能达成共识，能不能找到折衷方案？这需要探索。探索得好，就会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各退一步，都不会完全消失，甚至互相支撑、互相加强。最好能找到相互促进的合作方式，各取所需，共同进步。

做遗产保护的人，长处在于对保护原则、技术，以及对传统的研究和掌握，但是经常会不考虑市场。可是保护总是有成本的，成本从哪里出？如果只考虑投入，不考虑回报，显然是不行的。搞旅游的人，很明白旅游市场如何做，有很好的市场思维，但是可能不知道保护的底线在哪里。他们会考虑市场利益最大化，会思考符合旅游需要的产品，但是可能会损伤文化资源的本底价值，从长远来看它的市场也是损失巨大的。做设计的人，长处是善于安排功能和提高美学，但也往往会忽视保护的底线。

遗产保护是一个特别专门的行业。如果没有认真学习过，基本上一出手就会犯错误。很多行业是有可逆性的，可以试错，不行就换一个方法，找到对的方法为止。遗产保护一犯错，东西就毁了，具有不可逆性。这也是做保护的人非常着急的原因，因为它不允许犯错误。

乡建与保护合流的趋势

这种合流是市场推动的。市场发展到这个阶段，使得各种力量必须要碰撞。这种趋势更多出现在非文保单位的领域。

这个趋势是最近一两年才明显的。之前基本上大家各说各话，板块划分清晰。但是现在出现了工作对象上的融合，逼着大家就一个问题坐下来讨论。我认为这是很有益的状态。从技术环节来说，搞建筑设计的人，搞遗产保护的人，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为什么大家现在愿意坐下来谈？有时候是被逼出来的。浙江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拿莫干山来说，山上是别墅区，有老的民国别墅，但山下做得更好，因为是非文保单位，给了建筑师发挥的空间。他们会去想，哪些可以改造，哪些不可以改造。尤其是受过遗产方面训练的建筑师，会去认真琢磨，如何既把遗产的特性保留下来，又能实现设计的理念，还满足功能需求。

在这方面，我很佩服朱盛萱先生。他有乡村情怀，做到大设计公司的高管，就想在乡村做点事情。本来打算以公司的名义拿下一个乡村，做度假村项目，但是让公司的财务计算回报率之后，发现算不清楚，因为市场没有做起来，完全不知道回报前景。可是他又特别想做这件事，就决定自己做。自己当甲方，自己当设计师，还要自己做度假村运营。这就逼着他把不同的行业糅到一块，在一个大脑里转，反复琢磨。三个角色合在一块，这个行业就探索出一条路了。遗产的基本标准在哪里，要守住；建筑设计的空间美学在哪里，要追求；这两个还要符合未来的酒店管理运营。朱盛萱先生做了一个度假村，起名“清境原舍”，是用老的乡村校舍改造的，背靠茶园，面朝竹海，里头住着随性舒适，外边看着赏心悦目。清境原舍这几年运营下来，市场效果不错，顾客口碑很好，现在设计行业也开始关注和认可朱胜萱先生了。



莫干山山中小筑（王斐　摄）

莫干山还有一个项目，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名叫“山中小筑”的度假酒店，它的主体部分是一栋三层的现代小楼，挺有设计感。三层楼的旁边，留下一个土坯房。楼房和土坯房之间，做成了游泳池。我是一个对游泳运动毫无兴趣的人，但是看见这个夹在新楼老房之间的湛蓝水面时，顿时就有跳下去游两下的冲动。新旧并置所产生的美学，竟然如此有冲击力！

乡村旅游正在形成趋势

乡村旅游是近几年中国出现的一个大现象，一个社会趋势。首先出现在上海、杭州一带，这与这个区域的自然山水禀赋有关系，还与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有关系，作为国际大都会，就会接触到国际上的新潮流。而乡村旅游恰好是国际上存在发展几十年的产业模式。

国际上乡村旅游至少开展了半个世纪了，“农家乐”也是起源于欧洲。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英国有许多 bed and breakfast（BB），就是在一些老城镇里面，家庭主妇腾出一间屋子，提供早餐，接待外来游客。慢慢地这种形式多了之后，就开始专业化运营，专门搞一批房子做小型酒店，于是这个产业就开始升级。进而开始有五星级酒店进场，现在有些已经很高级了，在乡村里甚至有了超五星级酒店。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出现了，比如莫干山的裸心谷等，就是高端民宿，这已经和 BB 不是一个概念了，但源头是来自于 BB。

商业与文化结合，创造了灿烂的乡村遗产

这个渊源其实很早，许多人都忘记了。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农业文明多么发达，创造出许多璀璨的文化遗产，除了故宫之外，还有各地的一些大院民居、祠堂庙宇，许多质量很高。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大部分质量高的文化遗产都是依靠商业来支撑的。



山西乔家大院（李青儒　摄）

比如山西的那些大院，是由晋商建造的。如果脱离了商业，他们还是居住在窑洞里，和陕北一样。他们之所以能够建起有砖花、木雕的大院，都是晋商的功劳。徽派建筑也一样，如果没有徽商从全国赚到钱，寄回家，老家的房子也会与草房子差不多。最近我们在胶东发现了一些好的传统村落，为什么那里会有好的古村呢？这是鲁商的贡献。五口通商之后，给了沿海发展的机会，刺激了当地商业，胶济铁路修通后，大量的商人赚了钱后，寄钱回老家，买地建房。

为什么那么多的商人把钱寄回老家？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他们认同在家乡搞建设是应该的，是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

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科举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人们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是很荣耀的事情。因此许多建设活动围绕科举制进行，比如乡间兴建许多学校，让子弟接受教育；要盖文昌阁、文昌宫，鼓励大家去读书，让子弟产生对文化的尊重。还有牌坊，这是一种表彰，能够流芳百世，对年轻人的影响力很大。那么建造的钱哪里来的？商人给的。商人认同儒家的观念。所以商人赚了钱之后，就会把钱寄回家乡。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教育是依靠宗族兴建的小学校，来实现文化的普及。

在古代，价值观是通过儒家思想，通过科举制来引导大家去认同家乡。有了这种认同，大家就会把钱投入家乡建设。正是古代商业和文化的结合，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那么多灿烂的乡村遗产。

探索商业与文化再度结合的乡村道路

离开了商业，文化是无源之水。怎么回到这种道路呢？让文化遗产回到市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探索一条乡村的商业与文化能够再度结合的道路，而不是简单地复古。

一方面我们要重新找回传统价值，许多传统的东西依然有价值，它们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安静，获得社会认同感。因此要分析它对现代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现代人的心理需求，毕竟我们是现代人，有两个东西是回不去的。一个是硬件，主要是基础设施。现在的乡村落后在哪里？基础设施缺失。城市人已经适应了有基础设施的社会，没办法回到过去了。另一个是软件，即现代人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三从四德、族长训诫的时代。那些禁锢人思想自由的枷锁，好不容易拿下，也不应该再捡起来。

那么，如何让现代人热爱和保护传统村落？这就需要互相适应。现代人要承认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知道从文化遗产中可以学到知识，尊重文化和历史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素质。同时乡村遗产也要尊重现代人对于基础设施、对于个人自由的向往。

中间的平衡怎么找？这就是建筑设计要与遗产保护在技术上要进行探讨的原因。不能只想到保护，也不能只想到设计，要承认双方的底线，找到双方认可的中间点。

商业消费背后是一种教育

乡村文化遗产已经与民众脱离太久了，这种疏离感让公众不愿意再向乡村投入，目前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少数人的力量来保护。如果我们能够搭起桥梁，能够让民众，包括市民和村民，拉近与乡村遗产的距离，让乡村遗产重新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对抗。

传统村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使得保护有持续性。比如在一座老房子里开了咖啡馆，每天有一定的客流量，那就意味着总有人在这里体会文化遗产，他们就会喜欢文化遗产，喜欢文化遗产的这种氛围。这种观念建立起来后，募捐也好，众筹也好，都会容易得多。

当然也可以修缮一座老房子后就放在那里，每天只有一两个人参观，这种方式就会让受教育的人数大大减少。

消费行为看似是一种商业，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力量相当强大，潜移默化之中就实现了熏陶。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乡村旅游，是因为旅游的背后是消费，消费的背后是教育，这是我们正规专业教育所做不到的。讲课的成本是很高的，讲的人累，听的人可能更累。喝咖啡聊天的成本就很低，同样也实现了教育。两者的覆盖面完全不一样。

把乡村旅游引向遗产保护

国家文物局每年有几百亿的资金，来做文化遗产的保护，这跟十几年前比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但其实这些资金也做不了太多事情。大头的钱在旅游产业上。2014 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 36 亿人次，人均消费就按 1000 元计算，这是几万亿元的大盘。旅游市场大体上是城市旅游、风景区旅游和乡村旅游三分天下，所以乡村旅游就有上万亿的规模。

这么一算，道理就很清楚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调动上万亿的乡村旅游资金的流向。如果我们不能把乡村旅游导向有利于遗产保护的方向，那么上万亿的资金就会导致破坏，文物局的几百个亿是根本挡不住的。如果我们把乡村旅游引导向有利于保护，其影响范围和保护数量就不是目前的量级了。

相关的例子比如大理的双廊。由于名人去那里建别墅，带动了一批人



丽江古城内的巷道（李君洁　摄）

进场，这些人又没有受过好的文化遗产训练，于是双廊的传统面貌很快就被改变了。破坏的势头是如此之快，政府部门想管都来不及。

丽江已经很幸运了，对它的破坏仅限于村民搬出去。新进场的人不敢在那里乱盖房子，一方面他们受到法规的限制，另一方面当地已经形成了观念，谁破坏丽江古城的风貌，就是抢我的钱，破坏我的生意。丽江已经进入了相对良性的发展环境中，风貌不会破坏，最多是内部会改造。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问题在于，正面的案例太少了。丽江也许交出了勉强及格的成绩，可中国有多少个及格的？很少。搞文保的人总是害怕别人犯错误，但其实探索的过程，大部分都会有失败。不允许失败，好的模式也出不来。

商业与古村保护合流的前景

合流的前景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探索，能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探索出好的模式和技术标准，要各种方式都允许尝试。工业化和旅游产业是不等人的，时间很紧迫，古村项目要加速做。

我的认识是，尽量多搞一些小型的案例，文化的或商业的，在半年之内实现，能够让做遗产保护、建筑设计和旅游的人高度一致。比如小型的餐馆、咖啡馆、图书馆等，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投资目标。在一个村子里面能够做出来一个案例，能够让大家去消费、参观、体验，树立起价值观导向。所有案例都需要成本，与其做一个大的案例，不如做十个小型的案例，这样见效更快，分布更广，影响更大。目前这种案例太少了。

我们最近在河南新县的西河村和湖南会同县的高椅村，都做了这样的尝试。西河村的粮油博物馆，是用老粮库改造的，设计师是我的同学、现在中央美院教书的何崴老师。这个博物馆一建成就在行业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当年就拿到了 WA 奖。可是实际上，民众对博物馆这种建筑还是有比较大的疏离感的。有一些人慕名来参观，但数量很有限，逗留时间也不长。真正让大家喜欢上这个博物馆，是我们把它的一部分改成了咖啡馆之后。政府官员也好，市民游客也好，看到西河村有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去处，都愿意坐下来，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欣赏河边的风景。这种良好的体验，很快就形成了口碑。现在新媒体很发达，好东西传播得非常快。于是到今年十一黄金周的时候，西河村居然有上万人来参观。热闹的景象，在豫南鄂北地区成了一个现象。

西河村的咖啡馆经验，我们也用到了湖南高椅村。高椅村有一个老的书屋，叫醉月楼，是个规模很小的文保建筑。房子很破旧了，文物部门出钱进行了修缮。修完就搁那儿了，躲在深深的巷子里。我们“发现”它之后，对它进行了二次设计，在完全保留老墙体、老梁架、老家具、老壁画的前提下，增加了书架，引入了灯光，还配上了咖啡机。一层的一半是门厅，另一半是儿童图书，地板上铺软垫，让儿童坐在地上看书。二层是大人的图书馆，可以让楼下儿童的家长或远道而来的游客看书。看书无疑是个高雅的事情，但是也很容易累。配上一杯咖啡，心理上就感觉好多了。醉月楼书屋重新开张之后，马上得到了儿童们的喜欢，为了在这里看书甚至有人连午饭都不愿意回家吃了。来参观的各路领导和游客也很喜欢这里的气氛，不但有品味，还挺休闲。

也有领导说不应该用咖啡，应该用茶。对这个问题，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咖啡或者茶，其实不是本质问题，都是为了让人待得住。但是，咖啡和茶的标志意义或者象征强度又是不一样的。茶给人以一种传统的意味，咖啡则更有一种自由的感觉。这种自由的感觉，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缺少的，所以在老房子里，咖啡比茶更能提供一种反差，更能营造出宽容的氛围。

遗产保护是没有满分的，永无止境。因此在操作上，可以先把标准降低，要尽快地出现分布在全国的 60 分的案例，即遗产保护标准的 60 分，起到导向性的作用。



荻浦村牛栏咖啡吧台（王斐　摄）

而在建筑设计和旅游回报上，分数是越高越好。一个古村想要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成本是非常高的，硬件基础设施的钱是省不下来的。从吸引客流量的角度来考虑，文保做得好，远不如建筑设计上出彩。对一般的游客来说，他们首先需要美的感受，舒适的体验；他们希望坐在老房子里，能够看到优美的周边环境。

小型项目也可以是文化方面的。比如搞艺术节，把艺术家带到村子里，和村民交流。当村民们看到艺术家很喜欢他们的老房子时，就得到了认同。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引导。

最后回到价值观的建设上，它指导着上万亿资金的流向，就像古代科举制的作用一样。怎么指导资金流向呢？如果我们的祠堂、庙宇和欧洲的教堂一样，天天被民众使用和景仰，保护自然就不会成为难题。然而，已经长期丢失的文化行为，要想找回来也不是瞬间可以完成的。目前而言，消费行为是可以最快拉近民众和遗产之间距离的机制。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博雅. 让乡村遗产重回日常生活[J]. 世界遗产，2015（11）:68-75.　）

第八节

为什么遗产保护需要文化创意？

二十年前，中国的乡村破坏程度还比较小，很多农村还是比较完整的。这些年乡村开始迅速地破坏和消失，势头越来越快。2011 年我参加红河哈尼梯田的遗产申报时，已经面临一个相当残酷的现实。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乡村的凋敝更加触目惊心：村集体手里几乎除了办公楼之外什么都没有，想办啥事都办不了；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村子愈发地“空心化”。而这样一个整体机制遭到破坏的社会，谁还会在乎几个破旧的老房子呢？

中国并不是一个不重视遗产保护的国家。自从 2005 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之后，“文化遗产”被提到了“文化安全”的层面，而国家的投入也催生了遗产保护的行业。尽管经济形势波动起伏，但遗产保护却由于国家的重视还是向上发展，在这个趋势的推动下，行业里也出现了更多的遗产保护专家。

中国的遗产保护缺少行业联动

中国的保护专家其实是很孤独的，因为没有别的行业跟他们联动。做好了保护，但没有人解决后续的管理运营问题，保护工作也只是做了一半。我们的遗产保护观念是从欧洲搬过来的，但是却没有欧洲那样完善的行业间联动。在欧洲，保护专家的工作完成之后，会有运营的人来思考建筑的用途，是做成博物馆、餐厅还是继续居住；然后还有别的专家，去琢磨怎样让博物馆更受社会欢迎、让餐厅吸引更多顾客，这样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从而让更多的资金来做更多的保护工作。中国的问题在于保护专家后面没有接盘的人，这导致乡村丰富的文化遗产只是资源，而不是成熟的、大家可以使用的产品。在中国乡村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是房子修完了就搁在那儿，等着几年之后再来一轮修缮。乡村遗产的修缮和维护成本是很高的，没有后续资金跟上，政府可动用的资金，在面对几百万个自然村、40 万登记在册的文物点时，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上游，资金来源匮乏；下游，没有完善的行业做运营。如果不想辛辛苦苦保护下来的遗产建筑变成徒劳，该怎么办呢？至少，要让它们有所用途吧。参观是一种用法，如果能产生社会效应，那么投入也是值得的，可是只有特别优质的遗产资源才能吸引来游客，在乡村更常见的是普普通通的民居，而居住功能恰恰是最难办的。欧洲人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觉得保护老房子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然而在我们的乡村，农民进城打工赚了钱，就认为拆了旧房建新房才是有面子的事情，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文化观念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但是讲利益是很清楚的——利益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这让各方更容易走向一致。如果急着跟村民讲保护，很可能会得不到村民的支持，往下就无法推进工作了，而从共同利益下手，各方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减到最小。地方政府希望建设新农村，建立起好的生活方式，村民希望改善生活、得到好处。新农村建设，我们相信除了拆旧

建新可以有更好的做法，而从大家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开始做工作，也会让我们不会被排除在游戏场之外。例如修路、种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总是政府和村民愿意支持的。

建筑又该从哪里做起呢？跳出保护的专业、站在使用者的角度考虑，这就让遗产保护成为一个文化创意行为，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平田村的集群设计

我们经常选择的方式是通过公家收购或者租一两个房子，把这些老房子改造成具有一定文化功能或者商业属性的建筑，这些建筑可以示范一种更有质量的生活状态，要“改得比城里人的房子还要漂亮”。

最擅长这件事的人就是建筑师，建筑设计的创意有可能成为突破口。在浙江省松阳县的平田村，我们找来了几位建筑师：何崴、徐甜甜、王维仁、许懋彦和李海虹。他们不仅在行业内外有较高知名度，而且对遗产保护的行业标准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平田村的老房子一共有十几个，长得都几乎一模一样，村子的经济实力并不算好，所以房子里也没有什么木雕。就是这样一些很普通的土坯房、木构房，在几位建筑师的手中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闲置荒废的破败黄泥房，被徐甜甜别出心裁地设计成了农耕馆和手工艺馆。从外面看，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大动，而在内部去掉一些隔墙、加上一些天窗，却取得了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制造出简洁而有秩序感的建筑美学。许懋彦和李海虹设计的木香草堂位于平田村中高处，原是一座石块垒砌、灰瓦覆顶的老土房，楼上楼下老屋 4 间，这座房屋的外立面也被保留了下来，只在室内作了木屋装修，竹筒做灯罩，做豆腐的棉纱布做窗帘，光线透柔而充满暖意。一栋年久失修的老四合院，已然贴上了危房的标志，在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维仁的手里却变成了一

座精致的四合院餐厅，他保留了四合院原有的格局，又加进现代化的设计概念，在屋外增加了一个茶室，可以眺望远处的山景。



浙江松阳平田村农耕馆改造后（由设计师徐甜甜提供）



浙江松阳平田村民宿——木香草堂改造后（李君洁　摄）

设计呈现出一种具有爆发感的力量，它走出了不同于传统和常规的保护路径。遗产保护和文化创意的关系，是前者在技术上要尽量地保守，后者在思路上要尽量地开拓。我们的经验是，在遵守保护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想办法把设计的效应放大，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社会公众关注度，最终改变村民的观念。同样的投入，一个好的创意可以改变村民的思想。

在河南新县的西河村，我们在完成基础设施和景观工程之余，请何崴设计了一座粮油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发建成后，迅速在业内成为知名的案例，也对村民产生一定的影响，让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乡了。一些游客慕名而来，但是看完之后很快就走了。怎么能让参观者逗留的时间更长一点呢？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开一个咖啡馆怎么样？

西河村的博物馆和咖啡馆

西河粮油博物馆是由两个粮库改造成的，一个做成了博物馆，可以展示当地的传统榨油工艺，另一个做成了餐厅，可以组织大的活动。我们把博物馆的一个小房间做成了咖啡馆，屋外沿河的一段场地也属于咖啡馆，这里有九棵几百年的枫杨树。摆几张桌子，在河边的树底下坐着喝咖啡，这种体验感和逛完村子就走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在村里头逛了两小时，在这里再待上两小时，然后就会在村里吃一顿饭，村民就可以从中得益。最关键的是，这让参观者留下了很好的体验感，他们会在微信上主动为西河村宣传，告诉朋友有一个这么有趣的地方，这就增加了知名度和带动了客流量。

2015 年 8 月 24 日，这座咖啡馆开始试运营。整个九月，周末的收入大概是每天 800 ~ 1000 元，平常大概是 300 ~ 400 元。到十一黄金周期间，传播效果显现，平均每天有近一万人来参观。度假时代的旅客需

要更深入一点的体验，咖啡馆大概是能够提供这种体验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比如祭祖、庙会这些传统的文化活动，但是它们在几十年前“破四旧”的时候被移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怎么恢复、怎么跟现代的生活相融合，需要一个再探索的过程。



西河粮油博物馆夜景（齐洪海　摄）

西河村博物馆和咖啡馆的探索达到了期待的目标，我们开始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尝试。在湖南的高椅古村，有一座保存至今的“醉月楼”。这座清朝同治年间由富户方绅集资兴建的建筑最初是文人学士聚会消遣的场所，宣统初年改办为女子学馆，从外地请来一位老秀才讲学，由送女儿在此求学的地主富豪家轮流供养，然而现在它却已被废弃多年。

高椅村的童书馆

这个房子有两层楼，一共 100 平方米左右，文物局出钱把修好了，

之后就荒在那里。这很可惜，因为过几年还会坏。这能怎么用呢？做一个儿童图书馆试试。村里有小学，但学生们缺少一个能看到优质儿童读物的地方。留守儿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而乡村的教育资源和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城市，所以在这里放一个儿童图书馆，能够把城里头好的图书资源通过捐献的方式集中到村子，对当地的儿童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2015 年 10 月底，这座小小的图书馆开张了。小朋友对图书馆的喜爱，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更出乎意料的是，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在高椅村我们还做了铺路、景观、上下水等一系列的工程，有一小批工程人员在村子里工作，他们每天没事都爱往这个图书馆里跑，觉得待在这里很舒服。



湖南高椅村童书馆（王斐　摄）

图书馆在二楼为大人提供了图书和咖啡，原本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方便带小孩来看书的家长，结果这里成了大人们常来的一个景点。有一个年轻的游客，本来到高椅村准备参观完就走的，但是发现这座图书馆并且在这

里待了一个下午之后，决定在高椅村多住一个晚上。这就让村里的客栈和餐厅多做了一桩生意。虽然这是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公共效益有可能是很大的。

当地的政府期望能够看到的“新农村建设”浮现出来了：保护文化遗产可以不再是花了几百上千万，结果村民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打动人心的保护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更让村庄重建了秩序和信心。小朋友喜欢图书馆，可不是因为喜欢保护文化遗产，而是我们这些做遗产保护的人和做建筑设计的人联合起来，站在使用者的角度考虑，将需求和保护结合，保证了遗产建筑的运营和使用。这些孩子在一座文化遗产的老房子里愉快地长大，就会对老建筑有感情，这会树立起一代人的遗产保护观念。

保护措施都是防御性的，做出让人真正喜欢的项目，才能够抓到人心。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为什么遗产保护需要文化创意？[J]. 灵犀，2016（1）。）



第三章

实践案例

第一节

西河村的规划实践

传统村落的规划实践正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态势，也存在很多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一条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成熟路径。本文以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西河村为例，分享其规划实践过程。

我们在西河村的规划上有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就是在实施过程中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技术上要遵循遗产保护的原则，要守住底线（所谓底线，主要是指遗产的真实性，但是具体划在哪里，也是存在一些弹性因素的，需要不断探索）；二是要尽量优先选择一些利于带动联动效应并具备可持续性的环节，以保障资金链不断裂。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村落的这七个领域要统筹兼顾：研究策划、规划设计、落地实施、环境卫生、营销推广、农业与手工产品、集体经济。这七个领域并不是由一个专家全掌握，而是要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要关联互动、合作推进。集体经济需要事先规划好，否则等市场利益出现后，贫富差距分化所产生的矛盾会特别突出。

规划实施的过程中有三个角色非常重要。一是县长要重视，因为他是调动资源的关键人物，而传统村落的规划实践是少不了资金和人力的。二

是村长在村民中起带头作用。缺少村长这个角色，规划实施起来会很困难。三是“设计长”，就是要有一名领头的专家，能够协调统一各方意见，在技术上决定是否做和怎样做。

西河村并不是一个区位优势明显的村落。它离最近的大中城市（信阳市和武汉市）也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不过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觉得它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通过规划调研，我们总结了西河村的几大特征，希望在此基础上寻找出它的发展路径。西河村有一个特别好的资源，就是穿村而过的河道景观。河水清澈，河边有九棵树龄三百年的枫杨。我们对河道景观的现状评估是 60 分 ~ 70 分，同时认为通过景观设计进一步优化，将可以达到 90 分，这样西河村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古村。西河也有成规模的民居，这也是非常好的资源，但是传统民居处理起来要非常谨慎，它也是规划实施中成本较高的环节。



从西河北岸看南岸原貌（范秉乾　摄）

河的南岸有一组“文革”时期的粮仓建筑，已经闲置多年。刚看见这组建筑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难办，因为它们的体量比较大，跟传统民居

小体量的风貌不是很协调。一起来调研的何崴老师提了一个设想：如果把它们改造利用好，把北墙打开，可能会产生很有意思的时代对话——河南岸是“文革”时期的建筑，河北岸是清朝时期的建筑。何崴老师后来就承担了这组建筑的改造设计任务，将这里变成了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

第一步

改善村庄卫生环境，并组织成立村民合作社。我们邀请了一位全国知名的志愿者——叶榄先生，来向村民介绍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在祠堂里讲完课，他就和村干部一起在村里捡垃圾。捡垃圾的动作不大，花费也几近于无，但是意义很重大，它向村民传达出一个共建家园的信号，而不是由政府包办。而且，当垃圾都被清理干净时，村庄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这会激发起村民、村干部和乡镇领导的信心。

第二步

河道景观。我们的景观设计师去到现场，跟加入了合作社的村民一起放线，一起完成驳岸工程。景观工程完成后，不但河道更加漂亮了，人与水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这里成了夏季村民和游客们最喜欢的地方。我们在岸边还有意地放了几块大石头，它们就是供人坐卧的桌椅——之所以没放常见的石桌石凳，是为了尽可能区别于城市。这一步完成之后，西河村就可以敞开大门迎接游客了。我们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迎合游客，而是致力于打造更好的乡村生活环境，村民感到自豪的同时，游客也会喜欢这个地方，而游客的喜欢也会反过来强化村民的自豪感。



改造后的西河南岸（李君洁　摄）

在河道景观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拆除祠堂前的一栋小洋楼。尽量少拆迁是我们的工作原则，这是为了减少矛盾的产生。但是祠堂前面的这栋小洋房，不仅风貌极不谐调，还刚好挡住整个老街景观。房主当然是不同意拆的，但是孙君老师跟村委会、合作社一起想了个办法，说这栋房子挡住了祠堂的风水（事实也确实如此，祠堂前面要“明堂开阔”，既是礼制需要，也是“好风水”的象征），于是这户人家就要承受全村人给予的巨大心理压力。最后这栋房子顺利拆掉了，传统街道全部显露出来，整体景观的分数大大提升。

第三步

粮仓改造。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先对老房子进行内部改造，让村民拥有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但是这一步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一个院子里有好几户人家，很难统一意见。反而是粮仓成为优先启动改造的项目。我们

将晒谷场改造成一个村民集会场地，在博物馆完工的时候请来戏班子唱戏。全村的老人小孩都出动，这个在我平时印象里空心化严重、呈凋敝状态的村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对粮仓的改造，设计师们花了不少心思。朝河的一边打通，让人从室内就可以看到河对面的清朝建筑，从而形成一种时代的对话。

改造后的粮油博物馆，我们也想办法加入了一些农耕文明的元素，比如收购并修复了一部油车，并恢复了全手工榨油的工艺。我们请老榨油工人来表演，榨出的油可以作为小纪念品被游客带走，同时还在网店上售卖。



村民进行榨油（陈龙　摄）

何崴老师跟我说过一件事：2014 年的 7 月 31 号，他和负责照明设计的老齐正领着合作社的工匠们在粮库里装灯具的时候，一位老乡走进来问这里能不能举办婚礼，因为他家老大马上要结婚，已经准备在县城订酒楼了，但是看到村里有这么一个场地，觉得没准更合适。当年的国庆，就在这里办了一场婚礼。参加婚礼对于全村人来说就像一次集会，一起吃饭喝酒，非常开心，为村里增添了不少活力。

这件事情启发了我们：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们就经常在村里组织各种活动，慢慢地其他公益组织也参与进来。比如以促进中国农村妇女发展为目标的 NGO 组织“农家女”，在西河村的粮油博物馆里举办过健康讲座、知识竞赛、烹饪大赛等活动，深受村民欢迎。活动多了之后，西河村逐渐有了名气，就有更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这个项目也在业内得到了不少重要的奖项。

第四步

改造老房子。首先对其进行修缮，并选了其中的一两户改造成可以居住的民房。但是，即使是修缮改造好的民居，村民还是不愿意住——在他们眼里，还是新的楼房“宽敞舒服”。我们又调整了策略，把一个老院子改成了一个青年客栈，让年轻的游客住进去。这些改造利用都是比较初级简单的，我们觉得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多方式。

第五步

给排水是成本较高的一项工程，对村子的后续发展意义重大，县里给予了大力支持。从现代化的硬件上说，乡村和城市的最大差距就是基础设施。村民打工挣钱之后，可以为自家建起一栋让城里人都羡慕的小洋楼，但是对于公共的基础设施，各家村民是无能为力的。乡村的给排水工程如果按人均算，是一笔远高于城市的投资，而回报在短期之内是看不清的。县政府要为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子，投入不菲资金去完成给排水系统，要下相当大的决心的，也需要有足够的远见。

传统村落里的给排水工程，在技术上的一大难题是如何保持和恢复原

有的传统路面。西河村老街上的传统路面是裸露泥土加部分鹅卵石。为了保持路面的传统风貌，同时又实现路面的硬化，设计师决定将铺砌鹅卵石的做法扩大到整条路面。设计师还和老工匠一起研究并反复试验了鹅卵石的铺砌方法，在样本区块试验成功之后再铺整条街。

第六步

我们说服合作社利用博物馆的一间小屋子，开了一个咖啡馆，还从信阳市里请来一位专业人士赵亮先生做运营。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事。咖啡馆是去年 8 月 22 日开业的，新县的吕县长亲自来做代言人。到十一黄金周，西河村的游客突然多起来，最多的一天据说达到一万多人。西河村规模不大，一万多的游客显然是大大超过容量的，需要加以限制。不过这也表明，大家已经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县、乡、村三级和村民们都因此有了很强的信心。小小的咖啡馆启动了古村的消费，带动了经济



古村里的咖啡馆（李君洁　摄）

发展。在赵亮的建议下，西河村还做了一个“帐篷酒店”，是完全临时性的建筑，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搭建和拆除。

到这个时候，西河村在河南省已经相当有名气了。河南卫视专门把《对话中原》节目搬到西河村录制，大大提高了社会对西河村的关注度，对村子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七步

我们策划了一次在村里的大会——2016 中国（新县）乡村复兴论坛。这次论坛有 600 多人参加，会场就设在老粮库里。村里办大会要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觉得它带给参会者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这对西河村发展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克服所有困难，实现这个目标。在会议组织上，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让所有参会者在学习全国各地保护发展经验的同时，也成为西河村的“义务宣传员”。所有没外出的村民，全都成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会议筹备和服务之中。这次论坛对西河村的发展，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近两年来西河村得到了一系列的荣誉，比如中国传统村落、河南省最美村落、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等。令我们比较欣慰的是它的扶贫效果立竿见影。西河大湾所在的三个自然村，一共有 118 户，之前全部是贫困户，到现在已经有 92 户脱贫。我觉得更大的收获还在于，经过这一阶段的规划实施，确实让西河村成为一个村民自豪，市民也喜欢的传统村落。在不久的将来，村民、市民之间的二元界限会逐渐被打破，成为一个共同的公民社会。我们需要提供让他们喜欢的地方。



2016 中国（新县）乡村复兴论坛现场（李青儒　摄）

结语

作为规划设计人员，我们的责任是要挖掘和放大规划对象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在具体实践环节，通常来说是先做景观效果更好，产生的矛盾会比较小，之后建筑再一步步跟上，逐渐引导和树立起保护观念。村落里面最好有鲜活的集体空间，这对村集体凝聚力的恢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时地制造一些小亮点也很重要，在互联网时代小亮点也会被无限放大。从最近积累的经验看，尽量从当地节庆的元素出发，策划一些事件，再围绕事件来配置硬件设施，会是有利于可持续推动的一个策略。

（本文发表于：罗德胤. 传统村落规划实践——以西河村为例 [J]. 小城镇建设. 2016（7）:19-22.）

第二节

西河村景观建设实践

西河村大湾自然村（以下简称“西河村”）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我国知名的将军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以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主要方向，而其丰富的山水田园资源和传统文化丰厚的村落资源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挖掘与保护。

2013 年 8 月新县启动了打造“一城三线”[1] 的“英雄梦 · 新县梦”公益活动，吸引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涵盖规划、建筑、景观、室内、生态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前往新县开始公益建设服务，笔者所在的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团队选择了西河村作为公益建设服务村，承接了从村落规划、专项设计、工程指导到运营策划等整套村落建设服务工作。

山水古宅承载西河景观

西河村距新县县城仅半小时车程，是县域范围内村落格局典型、山水

1 “三线一城”指新县“英雄梦 · 新县梦”公益项目所规划的四个发展方向，共涵盖 26 个景区景点，具体为：“一城”主要指首府景区核心区域。“三线”：红色历史线（县城—田铺—香山湖）、绿色生态线（县城—郭家河—卡房—苏河）、古色乡村线（县城—周河—八里畈）。

环境优美、交通较为便利的村落之一。

西河村以西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北区是张氏先祖最早的选址安家之所，是西河老村的所在地。老村体现了典型的背山面水的选址特征——集中连片的传统建筑北靠狮子山、南面西河、东望绣球山，在狮子山脚下沿河分布，建筑与河道之间由一条宽 3 ~ 5 米不等的老街串联起整个北区。南区与北区隔河相望，建筑并非均是风貌统一的传统建筑，但也体现了不同发展时期的建筑风格，因此在建筑方面，一河之隔的南北两岸产生了一种时代的对话。

南区东侧有部分农田，在山与河之间自由分布，而大面积的农田在村落南侧，已经被一个外地来的农民全部承包去种起了花生。南北片区之间便是景观资源最为突出的西河了，其河道自然风光优美、河水清澈、岸线自由曲折，两岸古树繁茂，汀步坚实古朴。



西河村张氏焕公祠（罗德胤　摄）

同时，西河村在村域范围内分布有 3 座祠堂、一处齐天大圣庙、一处观音庙。这些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河道优越的自然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

使西河村成为“英雄梦 · 新县梦”项目最早启动的试点村。

传统村落景观的构成要素

乡村景观是以大地为背景，以乡村聚落为核心，由经济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构成的环境综合体。乡土景观又可以说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生产和生活成为一体的“农业生产景观”和“农业生活景观”的复合景观[1]。同时，作为传统村落的乡村，其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又远高于一般的乡村。

如果将传统村落中所有能够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的景象都称之为景观，我们尝试着概括一些传统村落景观的基本构成要素，比如山林、水体、农田、建筑、道路、场所、生产生活要素等。其中，山林包括村落周边的山林、村落风水林、房前屋后林、道路或河流沿线的林木、杂木等；水体主要指自然河流、溪涧、水渠、池塘、水井等；农田以及与农田直接相关的要素，如水田、旱地、菜地、田埂、篱笆等；建筑特指有特定聚落形态的建筑群体，包括祠堂、社、庙等传统公共建筑，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部分外观协调的新民居，以及有乡土特色的简易棚舍等；道路指巷道、田间小道、林间小径、跨河小桥、河上汀步等；场所则指村头或村中集会地、晾晒场、洗衣场所、河滩地、荒地等；生产生活要素根据各村的情况会有所差异，但较常见的一般有水车、水碓等水利农用具，石碾、石磨等家常农用具，晾晒用的台或架，房屋周边简易的瓜果架，房前闲坐的石凳等。

这些要素都有较强烈的地域性特征，能够体现所在村落的自然美和人文美，具备这些要素的传统村落通常散发着乡土气息浓郁的亲和感、安逸感，体现出传统村落特有的景观美。

景观规划设计定位

通过对比分析西河村的现有资源，我们发现其村域范围内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传统村落景观构成要素，这是一个让设计师非常兴奋的结果。但同时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村落景观中的“景观”并非由设计师或村民刻意设计营造的，它们只是一种乡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是村民们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在选择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引入常见却本不属于传统村落的景观元素是不适宜的，有意去打造明显的景观节点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

拥有十几年乡村建设经验的画家孙君先生提出过一个“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的理念，这一理念给了设计师很大的启发，如果能够在景观建设中打破常规，只是再现劳动人民通过有意识的生产生活，无意识的景观营造创造出来的村落美，把乡村景观建设得更像乡村，也将成为可能。

最终，西河景观设计的定位是挖掘并还原传统村落自身的景观美，弱化景观设计师的主观意志，从农民生产生活的视角去发现可供景观使用的空间与元素，以最小的人为设计，引导人们发现并享受传统村落的景观美。

景观与非景观的协同共建

西河村的建设尝试了一种很独特的建设模式，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在我们的其他项目中被反复实践——全方位的协同共建模式。

这种模式包含了两类主要的人员力量——地方力量和设计力量。

首先，这个项目有一个完整的地方力量支持，他们分别是：新县县长亲自任西河村荣誉村长，全程督促西河村建设；新县人民政府特设文化改革办公室，统筹包括西河村在内的“英雄梦 · 新县梦”总体项目推进；乡、村一级领导干部全时待命服务设计团队、沟通村民关系；村内成立西河村

民合作社，表达村民意愿，参与工程建设。这样统一的地方力量是极为少见的。

在设计力量方面，有由孙君带领的北京绿十字配合新县文化改革办公室统筹县域总体项目，笔者所在的团队主持西河村整村建设项目，具体承担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景观设计及部分建筑改造设计的专项设计任务，又引入了更多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照明设计师等加入到这个公益项目中。

项目在统筹层面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同专业及参与主体之间的分工，而这种分工都充分考虑到相关专业在景观营造中可发挥的专业优势。

由西河村民合作社承担农田、山林为主要对象的农林产业发展规划及农业景观的营造；规划师负责整村规划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统筹协调工作；建筑师负责试点、重点建筑的改造以及将对村落景观风貌影响直接的沿街立面整治；景观设计师具体承接河道景观和老街的街道景观的规划设计，并配合其他专业领域进行景观改造；各级政府机构配合项目的资金保障、政策支持、项目监管。

这样的合作模式确保了地方力量与设计力量的及时沟通与交流，打破了景观在规划之后介入的被动局面，让很多原本难以由景观师独立解决的难题在西河村迎刃而解。

景观与村民合作社

西河村的村民合作社在整个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村民表达意愿的代表，也是设计师向村民传达设计思想的窗口，同时又是冲在项目施工最前线的战士。

在西河村建设初期，村民合作社一方面开展村域范围内的卫生整治工作，以及在农林产业方面做了多种尝试，另一方面鼓励村民以山场、田地入股的方式回收了大面积的山林与农田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发展观光农业。2014 年春季，在村落重要的风水山——绣球山上遍植了杜鹃花，而后在进村的大面积农田中广植了观赏向日葵，今年又改种为油菜花与水稻套种，每年都有新的田园景观。

合作社在建设初期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拆除工程。与很多传统村落一样，西河村也有一些严重影响景观的违章建筑以及已经残破到无法再利用的杂房、灰铺等需要拆除。最典型的是张氏焕公祠东南方向的出挑于西河村的风水石——狮爪岩之上的二层红砖建筑，直接阻挡了从西河桥看向祠堂以及沿河古树的景观视线，遮盖了奇石的主要观赏面，其建筑外观也与传统风貌极不协调。这样的建筑也在村委领导、村民合作社的反复沟通协调下顺利拆除。

在一定程度上说，村落景观的营造，就是把不和谐的、丑陋的“景物”去掉，让美景显露，这一点是在村民合作社的协助下才得以实现。在西河村建设的中期，村民合租社直接承担了观赏步道、河道、街巷景观修复及建筑改造等多项工程的施工，充分发挥了村民作为建设主体的重要作用。

回归人与自然的河道

西河对于西河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河道景观也是西河最为突出的景观要素。但是长久以来村民并未把它视作景观看待，西河对于村民们最直接的意义是生活用水、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阻断聚落与耕田之间的障碍，并且存在一定的山洪隐患。

相应的，村民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做过一些改造，比如沿河筑堤、上下游修坝、架桥、引渠灌溉等。这些是设计师可以观察得出的；通过对村民的调查与访谈，我们得知大概在三四十年前，村民与河的互动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农妇在河里洗衣洗菜，农夫放些水鸭，儿童赶着水牛在河滩玩耍，但这样的场景在今天已很少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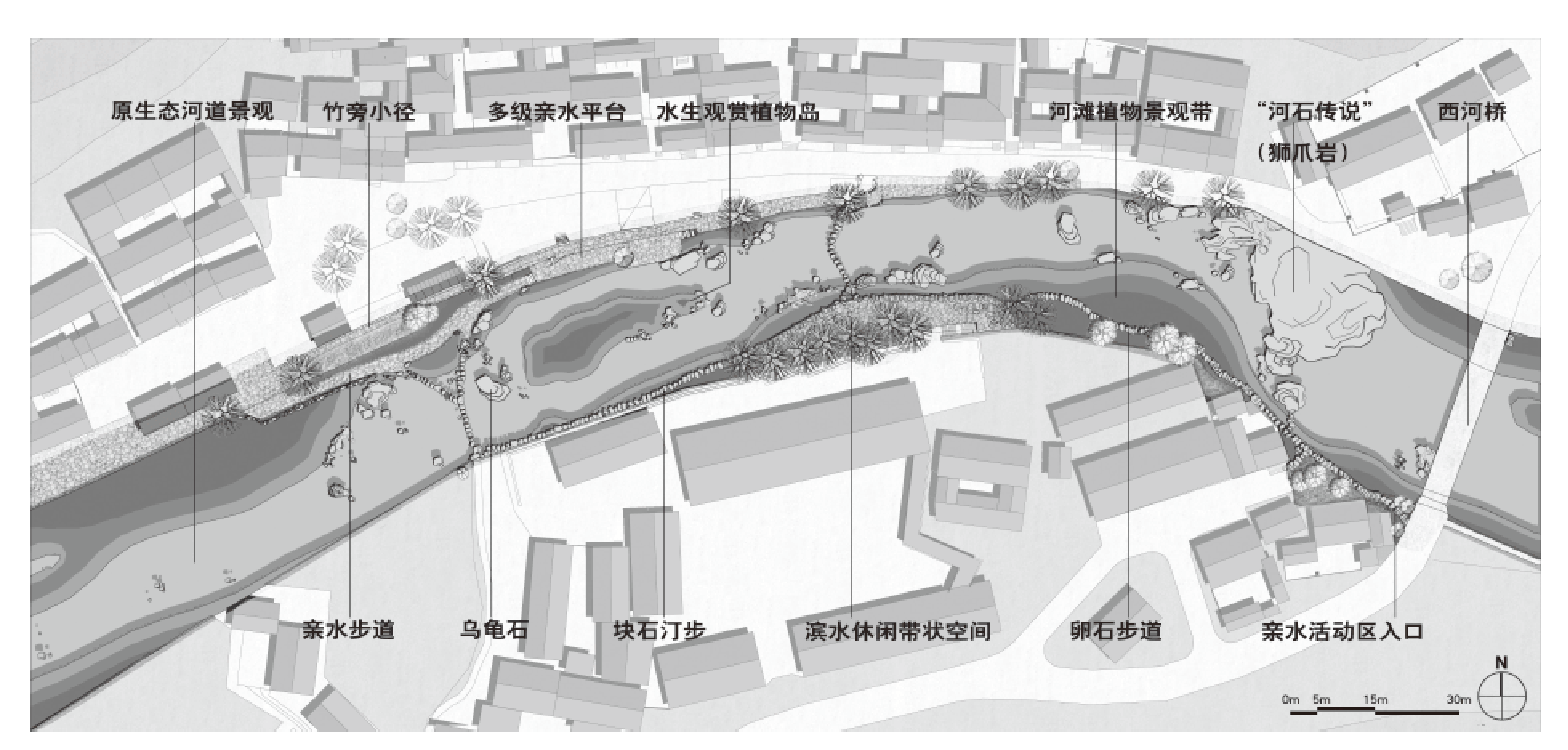
设计师发现，其实村民口中描述的那幅天然图画，就是最自然的村落景观——美景和享受美景的人们。所以设计师决定不在规划设计中赋予河道过多的功能负担，而是用最简单的手段，找回人与河的亲切关系。

从景观特征的角度，西河在流经西河村的部分大致可以分为 3 个明显的区段。河道景观粗野原始的上游段，沟通村落南北两处集中建成区的中游段，以及西河由东西向急转为南北向而形成的下游河湾段。这 3 段的风格特征可分别概括为野趣、活力、宁静。由此将西河村的河道景观分为 3 个区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第一，上游原生态景观区。这一区域基本保持了河道的原始状态，两岸均是农田和远山，远景视野开阔，河道内乱石和水生植物自由的组合，野趣十足。规划设计放弃了对河道本身的改造，保持河道内部自然粗野的原始状态，仅对上游的堰坝进行加固处理，同时，将建设重点放在滨河小径的建设上。南北两岸各有一条小径由堰坝的坝顶路连通，南岸穿过农田通往村级公路，北岸可沿河一直通向村外，途中可转向齐天大圣庙朝圣步道。南岸分布有大面积的农田，考虑到村民去往田间耕作的便捷性，设计在原堤顶路的尺度上略有加宽；北岸小径则完全延续了原有的路宽，保持其乡土气息。两条小径的修建，可引导人们在水边漫步，再由水边走向田间，或者拾级而上登山入林。这里原本就是村民通往自家田地的捷径，如今，小径之上既可以看到情侣们牵手漫步，又能看到村民在日落时耕锄归来。



原生态景观区北岸滨水步道（罗德胤　摄）



亲水活力区规划设计平面图（李君洁　绘）

第二，中段亲水活力区。中段位于西河村上游，两岸古树繁茂，夏季绿柳成荫，河道内有早年形成的跨河汀步和杂草中隐约可见的沿河小道，结合曲折变化的河滩天然形成了休闲纳凉的亲水空间，是河道景观中最重点打造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设计目标是重塑人与河的互动关系，使之成为西河最重要的活力空间，设计中具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处理：清理视觉障碍，修复优美河岸线；在亲水空间的营建上，两处主要的亲水空间被作为设计重点；在交通上，设计恢复了由西河桥北桥头走向河滩的滨水小径；在西河粮油博物馆餐厅处，沿河堤新增了块石汀步，与上游及新修复的小径相接。

第三，下游静水景观区。这一河段位于西河桥下游及雁湾堰之间，在此处西河由东西向急转为南北向，河水冲刷堤岸形成一片宽阔的河湾，西河村大湾自然村也是因此得名。河湾处因下游拦水坝的截流呈现出了与中段截然不同的静水水域，河道内水生植物丰富，两岸却植被稀少，可临河欣赏河湾、远眺对岸稻田。

设计中也不对这一部分作重点整治，与上游原生态景观区类似，以两岸观景为主，但是相比上游原生态景观区的“野”，这一段更突出“静”。设计方案被确定为再现河滩 30 年前的形态，还原村民回忆中的河滩。



改造后的西河南岸（李君洁　摄）



修复后的堰坝和凉亭（李君洁　摄）

重塑建筑与古街道的人文景观

景观设计的另一个重点区域是西河老街。老街东起于西河桥北，西至一口废弃的水塘，全长约 300 米。老街是西河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交汇处，也是最具潜力的景观走廊。

建筑整治：在老街景观工程开始之前，建筑师已经与村民合作社共同完成了大部分不协调建筑的风貌整治与拆除工作，呈现出一个古朴和谐的建筑群体景观。

老街路面修复：改造前的老街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块石路面，但因年久失修，已损毁严重；本次修复工程采用了一种最原始的操作方式——抛弃专业的施工图纸，直接由设计师现场放线确定路面边界，由老村民和设计师共同商定出铺设方案，经现场反复实验之后再开始全面铺设；完成后的新路面保持了老街原有的风貌，路面修复的同时完成了老街上电力电信、给排水管线的各类管网入地。

明渠与水塘：老街有一条废弃的明渠，曾是西河村下游重要的农用灌溉渠，也是老街主要的排水渠，而老街最西头的大水塘，也曾作为重要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它们都是乡村生产生活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景观的重要元素。景观改造中将两者全部重新启用。

结语：村落发展与景观的相互推动

一个常规的景观设计基本上止于施工图或结束于施工完成，工程验收后人们如何使用它，设计师是不可控的。西河村项目的特殊之处在于显示了村落发展和景观建设与维护之间是可以相互推动的，设计师也可以持续地跟进建设，助推发展。

当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欣赏、体验西河村的美景，村民自身对村庄的认同感、归属感就会加强，也会更加自发地维护已有的景观建设成果，并且开始主动向设计师提出后期景观建议的想法。于是我们从最初的向村民学习做村落景观设计，转变成村民自发地教我们做设计，这种村落发展对景观建设的助推效应，只有在一定的建设周期之后才可能遇见，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的重要收获。

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出现了一种设计之外的村落动态景观——鲜活有趣的“景观人”和“景观动物”。自从有了村民合作社，启动了西河村的建设活动，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村民开始回归，留守在村里的村民们也找到了新的生活动力——建设自己的家乡。两年前的老街上只能偶尔见到几位神情暗淡的老人，如今村里人兴旺了很多。那些村民脸上的笑容，耕田归来时的身影，孩子在水边嬉闹的场景，还有街上散步的大白鹅、河里畅游的鸭子……这些动态的景观并非任何一个设计师可以设计出来的，却是村落景观里最美的风景。

通过西河村传统村落的景观建设实践，让景观设计师认识到村落景观营造的复杂性，并非在于工程技术本身，而是源于影响传统村落景观的构成元素涉及面广、影响力直接，且改造整治难度大，需要多专业的协同配合，同时需要在规划设计中最大限度的加深村民主体对村落景观的理解，发挥村民在景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重返没有景观设计师的村落景观。

（本文发表于：李君洁，罗德胤. 重返没有景观设计师的村落景观——新县西河村的景观建设实践 [J]. 风景园林，2015（12）：80-88。）

参考文献

[1] [日] 进士五十八，等 . 乡土景观设计手法——向乡村学习的城市环境营造 [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8:5.

[2] 罗德胤 . 村落保护：大众化和产业化 [M]//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 旅游规划与设计——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8-17.

第三节

许村的艺术实践

许村的工作是以艺术家介入的方式开始的，投入到现在已有八年之久。不论当地人还是艺术家都从中得到很多，尤其在认知层面。作为介入到许村的艺术家，我深感乡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建筑问题，也不是发展话语下的物质改造，更不是灾难话语下的抢救，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表象，它实际的问题离不开历史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许村的工作

我们不是在许村建房子，也不是在许村引进艺术家。我只是怀抱复兴乡村文明的使命和方向来到许村。它既区别于现在各类社会团体帮助乡村的功能化方式，同时又包含了所有这些方向和任务。有抢救民艺和整理国故，有对有形的物质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遗产进行抢救和保护的，还有通过开展乡村农业、有机农业来实现经济救助的。当然，这里头夹杂着不同乡愁派知识精英的美好意愿，还有心怀不同理想的艺术家的介入，当然还有无法摆脱的乡村旅游。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也都很可贵。而许村的实践也包含了这些方式，或是说所有这些介入乡村的力量与不同的主体都一直存在，构成了当代乡村多元和复杂的社会生态。你无法像外科医生那样做一些非此即彼的手术，因为乡村也是一个始终与不同关系进行互动和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只要人还具备能动性，能在实践过程中相互敞开，就不会存在那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假想出来的矛盾，或是一成不变的权力关系。我们不能用决定论或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来认识问题，只是希望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与百姓们一起相互感染，彼此都有收获。

我觉得许村是一个建立在关系意义上的共同体，不论是村民、政府、企业还是不同的权力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不同的个人，只要卷入其中，并与在地的生活和知识发生关系，就会嵌入其中，就会成为许村的一部分。你把你自己的认知、智慧、资源、情感投入进去，就会制造出有社会价值的东西。老百姓得到了经济收益，当地政府也从中也获得了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不同主体相互之间形成互惠关系，这个过程就能持续进行。这是不同主体相互给予的过程，张力始终是存在的，但这恰恰是生命力的表现。所以，当有人问我“许村的项目……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说许村不是一个项目，是我们艺术家用个人化的方式和当地村民、政府相互之间进行的互动，是用时间和行动获得信任、理解并慢慢达成共识的过程。这种共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不断投入、沟通、协商和互动，不是一蹴而就，不是大刀阔斧，而是建立在多主体互惠关系上的润物无声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乡村最适合的方式。

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做，老老实实地做。比如抢救民居，帮助农民做农家乐的一些改造，帮助乡村教育，给村民的救助互动，对当地乡镇干部做一些讲座，给他们进行一些乡村价值的评估、乡村重建和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理念，包括《许村论坛》和《许村宣言》。这些工作不能用项目量化来判断，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启蒙的过程。

到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效果，由许村扩展到乡镇，由乡镇扩展到整个县以至整个晋中地区。如果说它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不同于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的社会工程，不同于光鲜亮丽的文化项目。艺术家介入许村的实践是从恢复人的关系开始的，是用艺术的方式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关系，重构人与信仰的原生关系。我们相信这才是当地人真正获得尊严的方式。

艺术家与村民

艺术家介入乡村的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他们超越功利的情感判断和较为深入的移情能力，都是在不侵害地方主体的前提下介入到乡村社会的文化和生活营建当中。我是很认同文化人类学对地方主体和他者所持的态度的，也就是互为主体的态度。尽管这听起来很理想，但这样的文化立场具有可持续的前景。我们要尊重乡村的主体，要了解中国乡村的文化和历史，要注意介入和实践的社会语境，要杜绝任何一厢情愿的强行介入。艺术家的介入是要嵌入到“乡村”的生命当中，要倾听当地人的需求、处境、遭遇和焦虑，理解他们的愿望与需求。只要在这个基础上，艺术家的介入才能往“互主”方向挺进，其友善的人人关系才具有可持续的出路。我们希望看到外出打工的人，还有许村的孩子，能看到自己家乡在当代社会复苏的希望。在家乡看到地方文化的尊严，这是最可贵的，值得我们持续投入，并用心好好经营。

我刚到许村的时候，尝试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做了一些不算合格的量化调查和个案访谈。目的就是想倾听每位村民的想法，想了解他们到底期待怎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居住环境？渴望什么样的家园？我们申请了政府的一些资金来改造公共区域的房子。问农民这个事情好不好，他们说

好，但是把钱分给各家就更好了。他们觉得公共的东西跟他们没有关系。后来随着乡村实践与外部世界链接渠道的多样化，随着艺术家在地实践的影响，使得当地人也从中得到一些来自物质和精神上的实惠，村民也慢慢接受了我们在许村做的工作，并且看到了希望。



许村大戏台的艺术节之夜（李青儒　摄）

艺术节的时候，我编写了一个《许村村民文明手册》，作为文明之间互动和互惠的尝试。这绝不是否认许村自身的文明，或是说艺术家用自以为是的文明来代替当地的传统文明。相反这是建立在互惠关系上的观念交流，类似不同文明之间的礼尚往来。许村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与外部他者的交流与互动，它绝不是闭门造车。许村的实践有它自己的特性，国外的艺术村都是艺术家单独居住的，许村的艺术家是住到村民家里的，这样村民就会获得经济收入。国外的艺术家带来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互动中也会对许村的孩子造成润物无声的影响。同样，许村老百姓人的生活方式与接人待物的习惯，也常常会给西方艺术家带来难以言说的感受和触动。我始终相信真善美的东西最具力量，它可以持久地渗

入人心，并且会影响到人的行为。这里头不存在什么较量，因为它超越了集团、民族、国家和区域等这些利益单位，它直通人性和人心。

神性的回归

我们在许村做的乡村实践，实际上是反思和回应城市的问题。乡村问题实际上就是城市问题。我们一百年的社会改造和乌托邦政治，是牺牲乡村来建设城市。今天的城市里，我们已经几乎看不到传统的痕迹。乡村是中华民族仅存的文化余烬。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文明基础和文化逻辑上。如果完全用“异”文化来改造，那就把自己的主体性完全丧失了，这种嫁接的文明没法往前走。传统已经消耗殆尽，所以乡村是回到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场。

我们在许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乡村是在皇权文化之外完成的系统。我觉得“百姓文化”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词汇。“百姓”对应的是“皇权”，“百姓文化”在乡村建立的完全是一个生命轮回的系统，它寄托了这个民族的生命价值和神性属性。他不像西方人的灵魂要到达到彼岸才能完成不朽。一些西方传教士在判断中国人的信仰时认为，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是属于妖魔鬼怪的东西。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人的信仰生成的方式和西方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体系，所以他们得出中国没有信仰的结论。如果没有信仰，中华民族是不会走到今天的。

说得再具体点，祠堂和家庙是乡村的神圣空间。老宅也有它特殊的神性，不是简单居住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神性的空间。它和祠堂一样，都是约束中国人行为的空间现场。我们把村庄摧毁，把老宅拆掉，把村民赶到城里去，就算他有钱在城里买套住房，这个房子也只是个物理空间，只管吃和住，对他已经没有神性的约束力。他失去了灵魂的救赎能力，再加

上生存压力以及不择手段的拜物导向，那么毒奶粉毒大米就出来了。这些社会现象就是我们神性约束的源头出了问题。

有人担心，许村一旦成为旅游区，繁荣之后农民势必就要涨价，人心就会变质。我的回答是：如果不在乡村重建主体性，重建信仰，这些担心都会变成现实。人性的恶一旦被释放，没法约束。这恰恰是乡村的主体被摧毁，价值碎片化之后，以拜物来决定成败的结果。以前官员、商人年老，都要荣归故里，回报家乡，做善事做好事。现在的乡村价值就是以物质论成败，谁家的房子好，宅子盖得大，家门口停的汽车豪华，谁就感觉体面和荣光。如果这些成为乡村主体性价值的话，那么我们乡村的自救是不可能的。

如何组织公益活动

非政府组织、社会机构和个人是很难介入乡村做一些脱离政府之外的社会行为。好在我们一开始是以艺术家的身份介入，其实就是志愿者的身份。

经过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我认为就是获得村民的认可和政府的支持。特别是今年，山西的经济下滑，甚至触到了红线底线。和顺主要的产值靠煤矿，好的时候，还能找到些赞助。政府也拿出一些钱来修建了一些公共机构和公共空间，另外通过政府协调，每年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向一些当地的企业寻找一点资金，有了赞助资金就投放进去。许村的影响和正面的消息传播出去之后，市里的领导也就非常支持。我前年在用半年的时间，由市里来协调找到山西的一些国有企业，我想说服他们来支援许村的基础建设。但是国营企业确实问题比较大，他们都属于国资委管，在许村要一些商业回报。许村如果要商业开发的话那就全都完了，所以我和县政

府都没有同意这种方式。后来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市县政府拿出了几百万给许村做下水道改造。以前许村是没有下水系统的，一到山洪泛滥的时候，满街都是泥和水。这个工程做了一个夏天，可以说惠顾许村每一个老百姓。这是我们今年做的最大的民生工程，经济对许村的投入我们也是慢慢一点点找吧，通过政府拨款、企业赞助、社会团体赞助，就这样一点点做起来，非常艰难。

不管你是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还是乡建团队，做的要比说的更重要。2011 第一届许村艺术节之前，村里的卫生状态非常差，村里垃圾非常多，塑料包装满地都是。我就带头在村里捡垃圾，他们说没有哪个艺术家，文化人、城里人、名人在村里捡垃圾的，这个事情对他们触动很大，感动了村民。我是以实际行动给他们提些建议，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很多抱着商业目的乡建团体和建筑施工队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这些事情是不赚钱的。但我并不是说要求别人不赚钱，只能义务去做。除非你是 NGO，或者有基本的收入来源，要不就做不下去了。我是画家，我可以靠卖作品维持。但是慢慢地，我也希望能找一个良性的方式吧，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当前的乡村教育就是让年轻人抛弃家乡，奔向城市。但有些农民在城市是找不到尊严的，没有尊严就要回到家乡。如果在自己的家乡能生产自救，他就不会离开。去年中央电视台一个导演在许村待了一年，拍了一个种粮农民白凤鸣的故事。他就认为在城市打工没有尊严，他喜欢土地，喜欢种粮食。他的儿子都不愿意种粮食，他自己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自己辛勤耕种。我非常感动，为了鼓励他，就给他拍纪录片。有的村民觉得生活在家乡很好，有的则受到城镇化诱惑，就希望开发商把村子拆了开发，挣钱了就走。

我把老房子和旧影棚改造成许村艺术公社，带着村民一起改造这些公共空间。我在北京买了很多被山西人丢弃的老家具。他们认为这些老东西都是不好的，要买新的组合家具，把这老家具全扔掉了，被文物贩子弄到



许村泥塑艺人（王斐　摄）

北京。我从北京买了几车拉回许村，和村民一起把它们修好。他们看到丢弃的旧家具经过收拾，也感觉很好看！用他们的话说，这破房子也能收拾得和外国的别墅一样——他们把外国别墅当成最高的追求。这就是一点点地去影响，去建构，不是一些建筑规划单位签合同做项目，画完图一交，拿上钱就走人。乡村需要长期培育和呵护，长期营造，是改良过程，不是激进和革命的过程。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王斐　摄）

许村的大学生晓宇，在大同大学读英语专业。发现家乡来了许多艺术家，被这些艺术家所感动，想回报家乡。她发现外国艺术家来了，小孩子英文不好没法给家长来翻译，或者见了外国人就跑，她想尽微薄之力帮助本村的孩子学英语。我们就和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的师生一起帮助晓宇建了英语班，教孩子们英语，效果非常好，对许村影响非常大。这是我们对在地大学生发现、挖掘、培养的案例。今年艺术节的志愿者很多，有来自

各大学美术学院的，包括从国外慕名而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对他们自身的影响也很大，他们以为找到了自己的根。在国外、在城市这代孩子，他们没有根了，非常困惑，非常痛苦，他们感觉在许村找到了精神家园，爱心也被感染和激活了，我觉得这对下一代年轻人很重要。

其实我是把许村作为讨论中国乡村问题的一个平台，社会奉献爱心的平台。作为一个普通的艺术家，我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参与这项事业。

（本文发表于：渠岩．“传统村落”微信公众号，2015 年 10 月 13 日。）

第四节

哈尼民居改造实验

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典型的哈尼族民居俗称“蘑菇房”，因其外形尤其是茅草屋顶类似蘑菇而得名。蘑菇房一般是 2 层的木构架土坯墙建筑，外形简单，几乎没有任何装饰。蘑菇房是元阳哈尼族文化最鲜明的外部表征之一。它是上千年来哈尼人应对当地气候和资源的最优选择，在景观上也已经和梯田环境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和谐关系。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外出打工和新农村建设等原因，蘑菇房已经大量消失。当地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用土坯和茅草、稻草建造的蘑菇房代表着贫穷与落后，只有住上砖混结构的新房子才是“现代化”的象征。

相比之下，近些年新建的水泥红砖房不仅丧失了地域特征，而且，由于当地经济条件尚不宽裕，很多红砖房都没有做外装修，坚硬裸露的红砖墙面与自然的梯田、山林环境格格不入。我们迫切希望寻求一种折衷方案，在保留传统民居的外观和主要文化要素的前提下，对内部空间进行调整，以改善其居住性能。于是，在 2010 年 9 月红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委托我

们做云南省元阳县全福庄村的保护规划时[1]，我们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选择适当的技术手段，让传统的哈尼族民居适应现代生活，以树立并推广传统民居的保护观念。



典型蘑菇房（孙娜 摄）

2012 年 4 月开始实施“红河哈尼梯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整治相关工程时，全福庄中寨的传统民居又比两年前减少了将近一半，只剩下 17 户土坯房和 1 户石头房。尽管剩下的传统民居已经不多，但全福庄中寨作为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哈尼族传统村寨，它在反映新旧观念冲突的问题上具有代表性。如果能在这个村寨进行几户哈尼传统民居的改造工程，将会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县政府将参与申遗工作的人员分到 17 个工作组。包括全福庄中寨在内的 5 个重点村寨，各由一个工作组负责，并指派一名副处级干部担任组长。

我们和工作组对村寨现场进行再次勘察之后，挑选了 3 户人家作为改造示范户。它们分别是中寨 42 号村支书卢世雄宅、中寨 46 号卢海师宅和

1 该项目由清华规划院名城保护研究所与乡土建筑研究所合作完成。

中寨 48 号卢有开宅。预算工程花费是每户 8 万元左右。4 月中旬工程开始前，我们又再次咨询了户主对于改造方案的意见，并据此制定了准备实施的方案——卢有开宅按照 2010 年的规划改造方案实施；卢世雄宅[1]和卢海师宅参照卢有开宅方案，并根据其家庭人口做局部调整。

蘑菇房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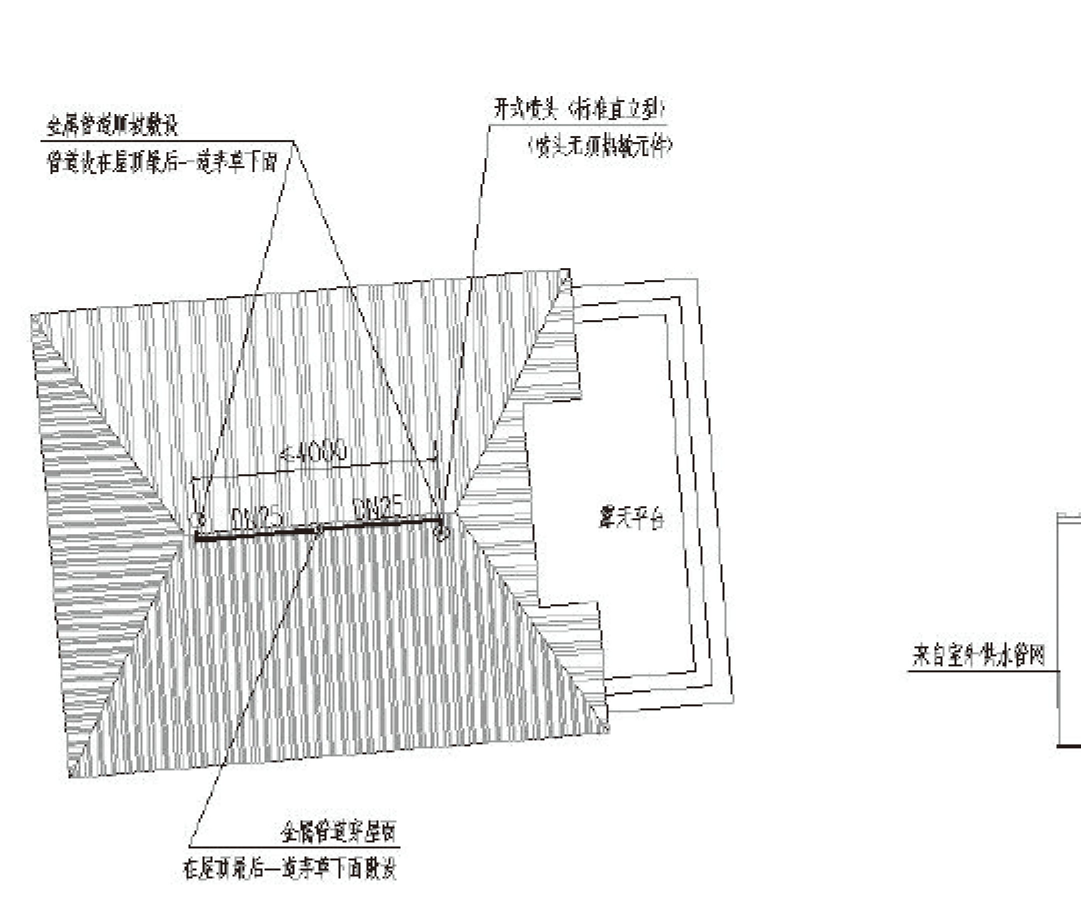
表面上看，传统的哈尼族蘑菇房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空间狭小、光线昏暗、容易着火、不够卫生等。然而，我们不能一概地归咎于蘑菇房本身，而是要做理性的分析，寻求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关于卫生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哈尼人传统的人畜混居的生活方式，和建筑材料、形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哈尼族村寨里见过一些贴满了白瓷砖的小洋楼，两三头水牛在楼下悠然地吃草，地上到处是牛粪，进门都要很不心才能不踩到“地雷”。又如空间狭小的问题，其实蘑菇房的建筑面积并不小，三层都算上的话可以达到 100 多平方米。之所以人们觉得地方不够用，是因为民居底层用来养牛，第三层用来贮藏，只有第二层是居民日常活动起居的主要空间。再如光线昏暗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蘑菇房的窗子开得很小（窗子小实际上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适应，一方面，以前人们不会在屋里进行阅读和看电视等需要大量采光的活动，另一方面，小窗子有利于建筑的防兽、防盗和防风保暖。开洞小也有利于墙体结构稳定性）。解决采光的问题，可以适度把窗子扩大，而不必把整个蘑菇房拆掉重建。我们认为，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可以解决蘑菇房的一系列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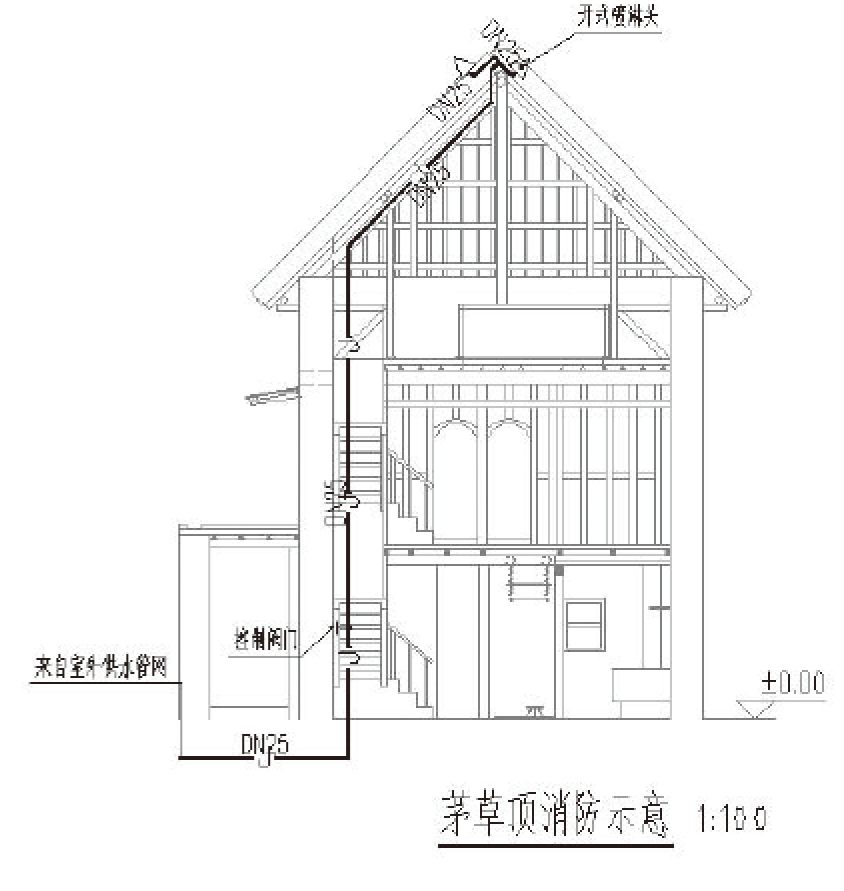
1 卢世雄家是 4 栋住宅围合中间院落的形式。仅西南角的建筑为土坯房，其余 3 栋均为砖混建筑。他家有六兄弟，现住在中寨的是老三（即卢世雄）、老四和老六（和父亲一起住）。土坯房原为老大的住房，老大过继给大寨的伯父后房子一直闲置，为村寨流转房，村民建房时可以来此暂时居住。

消防设计

消防是蘑菇房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蘑菇房的木架草顶因为容易着火，历来被人诟病。哈尼村寨的住宅密集，一家着火常常波及邻家数户，更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开展“铲茅工程”将大多数的茅草顶更换为不易燃的石棉瓦顶。没有了茅草顶的蘑菇房，就像美人秃了头，在景观上可以说是大煞风景，“蘑菇房”称号也已名不副实。要延续哈尼村寨的文化特色，在一些重点村寨恢复茅草顶是必要的。而恢复茅草顶，就必须解决防火问题。

我们通过采访发现，蘑菇房发生火灾有两种途径，一是从内部引燃，二是从外部引燃，多数火灾是先从住宅内部产生的。我们采取的解决方案是：在屋顶上安装喷淋系统，并在室外根据村落房屋总数配备一定数量的消火栓。喷淋系统没有安装在室内，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室内小型火情大多是人为引发，可直接扑灭——这也是城市住宅普遍不安装消防设施的原因。二是如果在室内安装喷淋系统，一旦启动则将导致屋内全面淋湿，甚至会危及土坯墙体的安全——土坯墙淋湿后极易崩塌，这是建筑常识。





说明：
1、本图为典型四坡屋顶的喷淋布置图。
2、引入室内管道采用金属管材，配套阀门为金属阀门。
3、喷头采用开式喷头。
4、消防管道根据现场情况从室内合适位置出屋面。
5、着火时，人工打开首层控制阀门，喷淋头喷水灭火。

哈尼民居的消防设计（何伟嘉　提供）

基于上述两个考虑，我们将哈尼村寨的消防设计定位于防止蔓延式火灾，即小型火情由屋主自行解决，当火灾严重到要超出个体建筑时，则启动该栋房屋及附近几栋房屋的屋顶喷淋系统，同时打开室外消火栓，以便将火灾范围控制到最小。

当然，再好的消防设施也不是万能的。为了充分发挥我们设计的消防设施，除了培训村民们如何使用消防工具外，还要普及消防常识，让人们注意日常防火，并会用正确的手段及时扑灭不同类型的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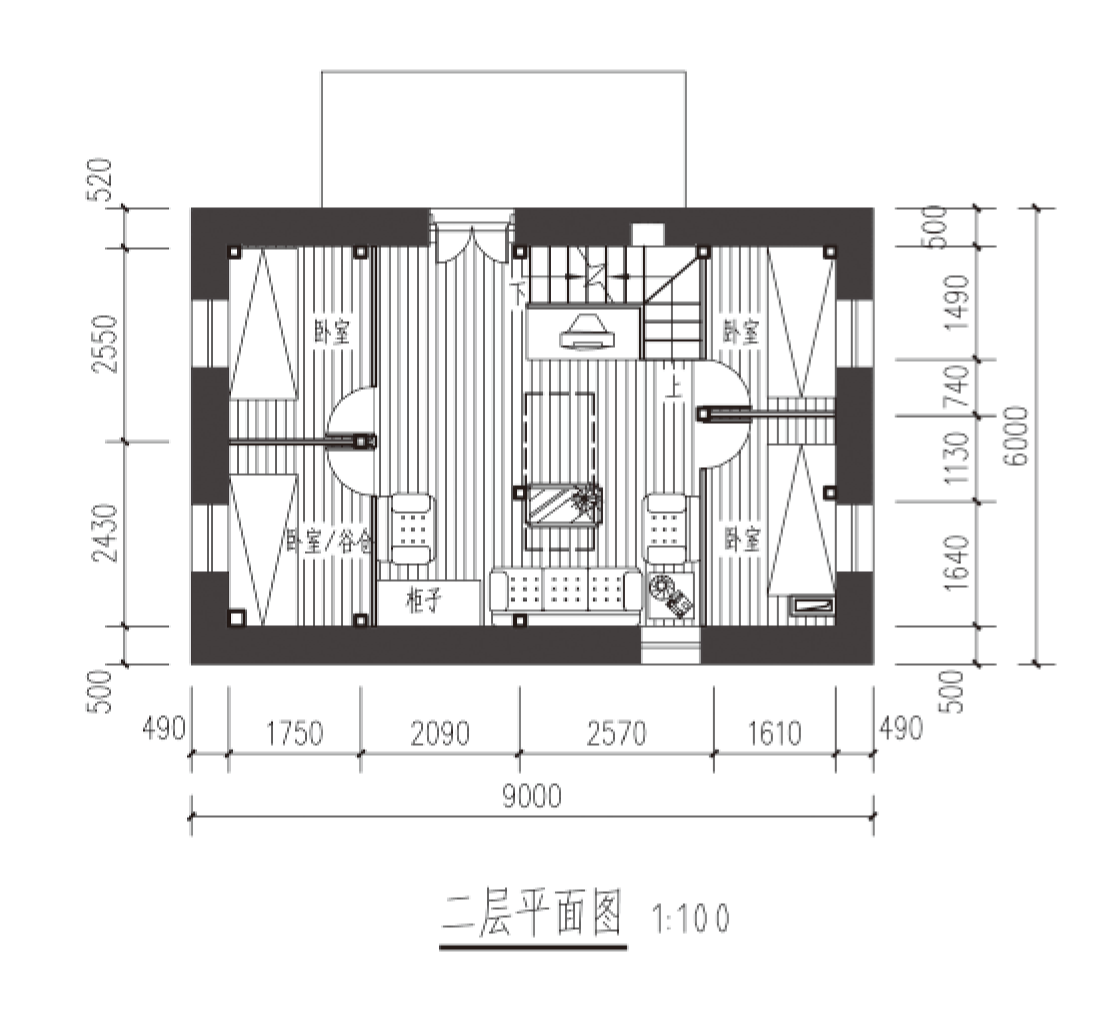
功能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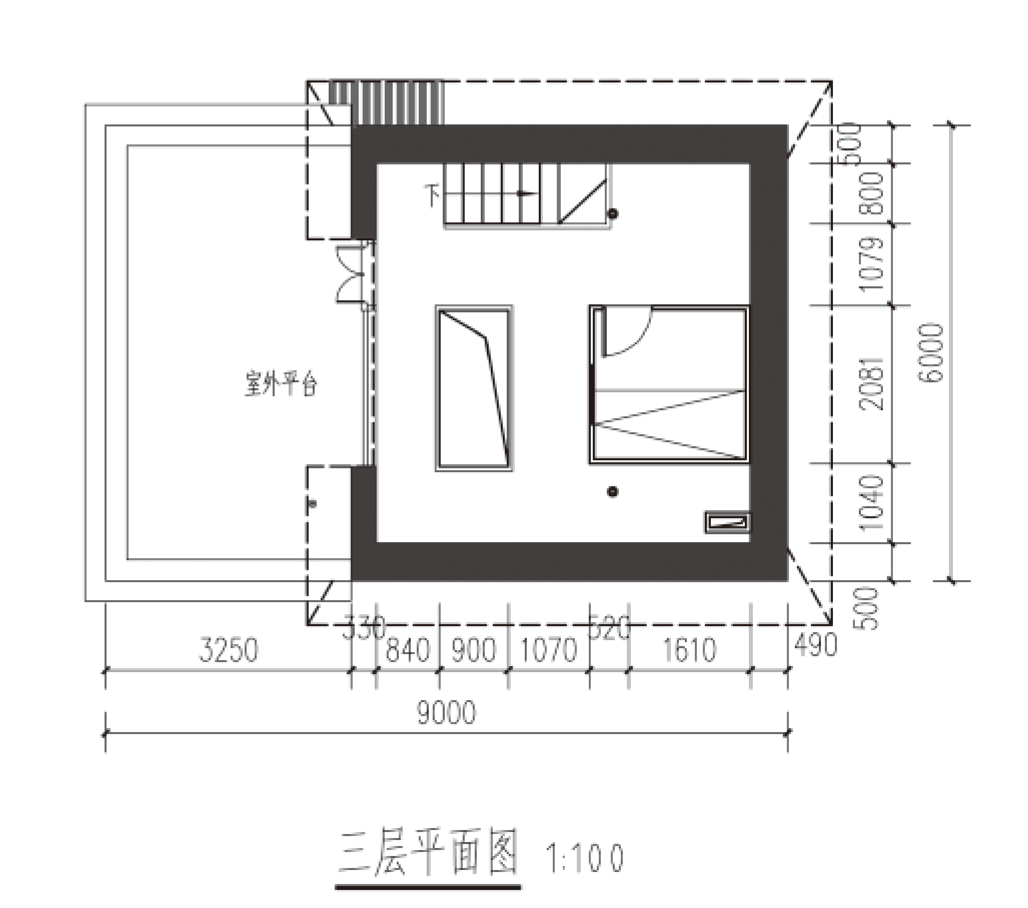
接下来说我们对蘑菇房的功能调整。传统的哈尼民居虽然有三层，但除第二层及耳房外，其他的空间都不能用于居住，所以显得空间狭小。传统的哈尼族生活方式注重家庭集体生活，对个体生活的私密性考虑较少。比如咪谷卢有开家有六口人，实际居住面积仅 40 平方米。二层的空间，除了两个分别为三平方米，四平方米的小卧室和不到五平方米的楼梯间兼谷仓[1]外，是围绕火塘为中心的混合功能空间；包括起居、厨房、进餐、祭祀、仓储[2]等多项功能，都在这个空间内进行。在现代生活观念的冲击下，传统的布局方式已经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感到不适。因此，势必需要增加使用面积，并对房间的功能进行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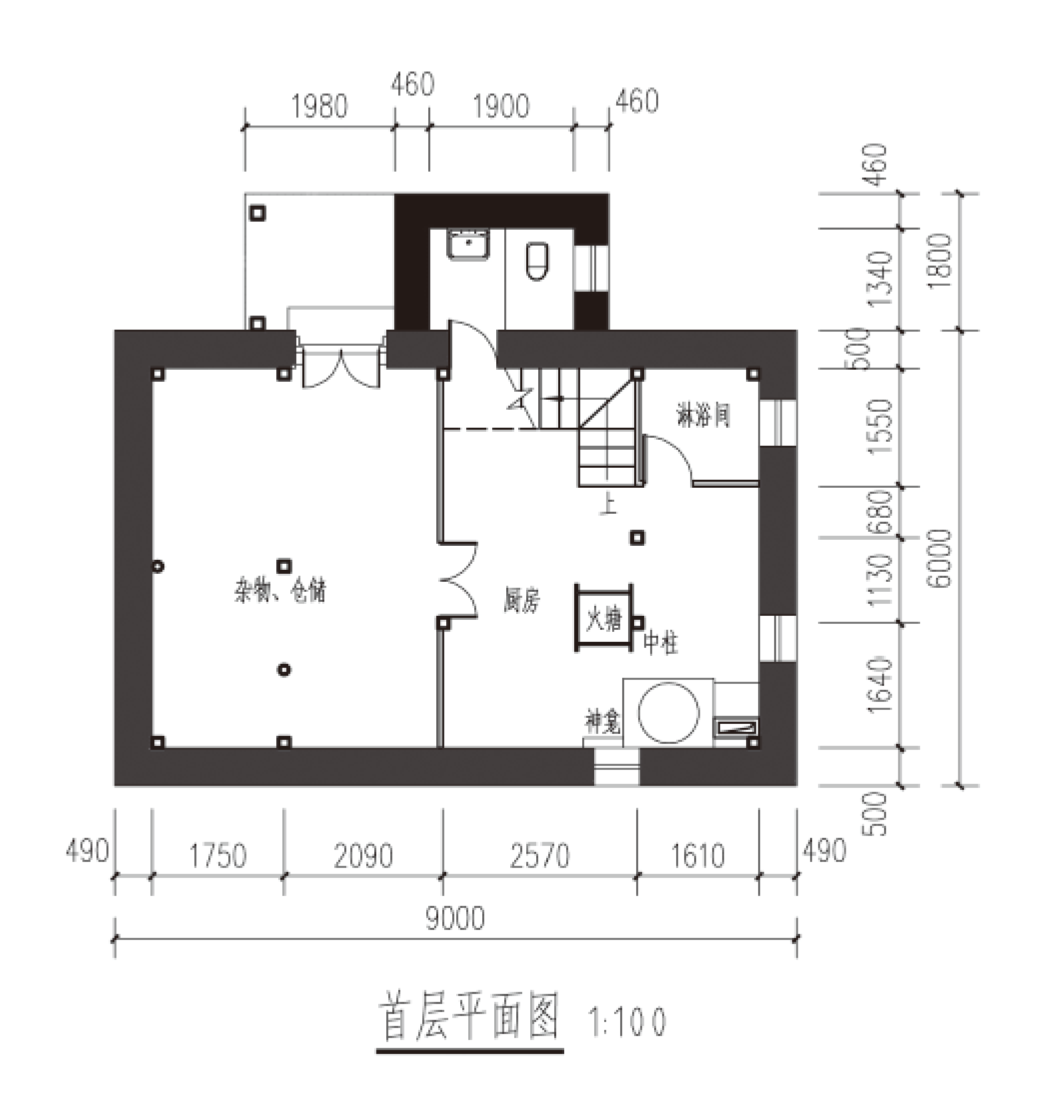
蘑菇房的形制和布局，在整个元阳县范围内是相当固定的。此次改造的三户民居，虽然使用和保存状况各有特点，但基本的改造策略是一致的。我们只根据各户的居住人口、实际尺寸和户主要求对平面功能进行了一些微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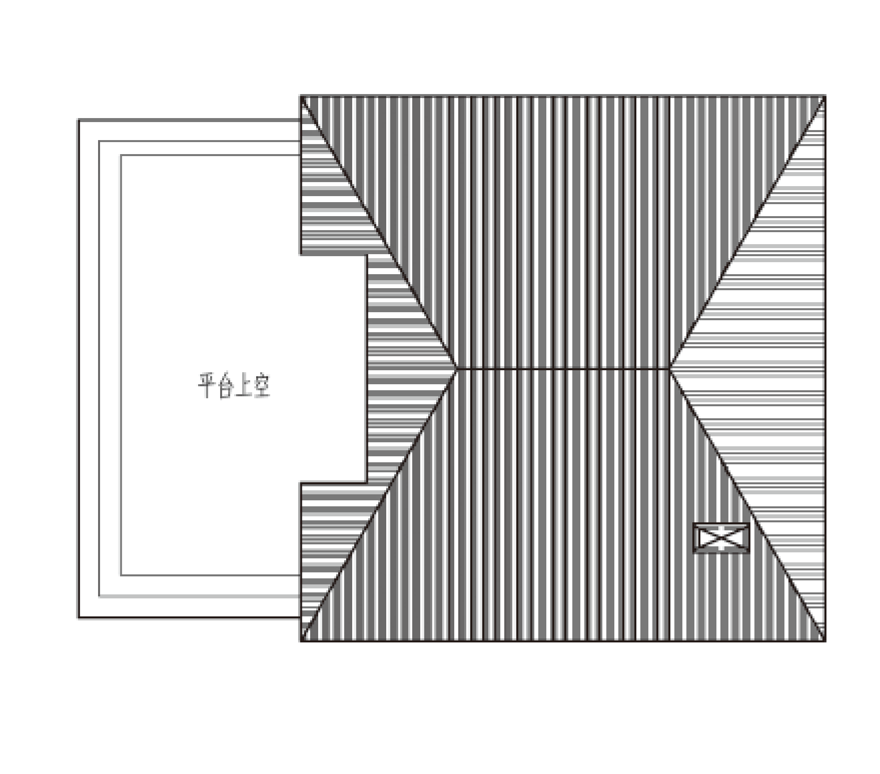
1　谷仓位一层二层的楼梯上方。

2　二层顶部有半米左右的空间可以搭木架，用来挂玉米、搁木柴等。火塘下方的篾架也可以放谷物等。









全福庄中寨 48 号改造设计（孙娜　绘）

首先要人畜分离，将家禽、家畜转移到主体之外，建立独立的圈舍。这样，就可以将之前用于圈养牲畜的底层也利用起来，大大增加居住面积，同时一并解决了人畜混居带来的卫生问题[1]。底层的舒适度不及二层，所以主要安排厨房、卫生间及储物室。二层仍为起居室和卧室。哈尼族一般是三代共居，所以在这一层一般要安排 3 ～ 4 间卧室。三层的阁楼原来比

1　改造过程中还提出以村寨为单位建立居中圈养牛、猪的圈棚的设想，此次未能实施，故不讨论。

较低矮，多用于储物，使用频率不高，采用爬梯上下。茅草顶的坡度比石棉瓦顶陡得多，只要适当加高女儿墙，大部分空间的高度就能满足日常活动的要求，爬梯也可以改为更实用的固定楼梯。经过上述调整之后，使用面积能增加至 100 平方米以上，人均使用面积达到 15 平方米以上。虽然仍不算宽裕，但已经达到小康标准[1]。

底层厨房内设火塘和灶台，位于原来二层位置的正下方。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尽可能保留住哈尼族的传统文化要素。另外，传统建筑内的隔墙是用木板拼接而成的，不利于隔声，我们在改造方案里采用了砖墙和轻钢龙骨双层石膏板墙（内夹石棉隔声棉），隔声性能大大改善。

其次是调整层高。传统哈尼民居的底层用于圈养牲畜和存放杂物，层高很矮。比如卢有开宅的一层层高为 2 米，刨除楼板、横梁，净高仅有 1.54m。为满足居民日常活动的基本要求，将一层层高提升至净高 2.0 ~ 2.2 米[2]。同样，三层阁楼的空间也需要适当提高。做法是将前后墙处的三层净高提升至 1 米左右——茅草顶的坡度约为 50%（即高度是进深的一半），进深约 6 米，故这种做法的阁楼内部高度为 1 ~ 4 米，大部分空间是可用的。

再次是改善采光。传统哈尼住宅开窗又不又少[3]，而且室内长期烟熏火燎，四壁黝黑，主要依靠大门、阁楼洞口采光。要改善采光条件，一是增加侧向采光量，即增加窗子的数量，并加大窗子的尺寸，二是室内采用浅色墙面。此外，还可以适当考虑增加顶部采光。

就采光而言，当然是窗子越大越好。问题是，土坯墙能开多大的窗，才不会对外观造成影响，同时又不损害其结构稳定性呢？此外，土坯墙厚

1 “1991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等 12 部委提出的由 16 项指标组成的中国小康指标体系”中规定农村钢混结构住宅人均使用面积 15 平方米。

2 建筑规范室内净高规定为 2.2 米，考虑到哈尼族平均身高比北方汉族略矮，且梁底距密檐层尚有 l5 厘米左右的高差，将净高标准调整到此高度。

3 一般一层无窗，二层有两个小窗，宽 0.6~0.7 米，高 0.7~0.9 米。

达四五十厘米，保温性能是很好的，开窗面积过大也会影响其保温效果。因为没有时间做实验，我们只能根据经验和讨论，先做一个大致可行的方案。即在底层设两个 60 厘米宽、80 厘米高的窗户，二层每个房间（包括客厅）设一个 80 厘米宽、100 厘米高的窗户。

元阳山区的冬季阴冷潮湿，原是依靠火塘产生的热量来烘干谷物、驱散室内湿气。将火塘移至底层后，二层的起居空间就没了取暖设施。解决这个问题是从附近的彝族民居借鉴来的——彝族民居普遍没有固定的火塘，他们用可移动的火盆来取暖。

墙体加高

改造工程中一个比较大的施工难点是如何提高一层层高。这三栋民居，最早的 46 号建于 1964 年，42 号建于 1973 年，最晚的 48 号建于 1978 年，都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它们的土坯墙和木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如墙体开裂、歪闪或土坯砖风化等。这些饱经风霜的老房子，还能经得住伤筋动骨的折腾么？对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外来的“专家”是远不如当地工匠有经验的。根据当地领导和几位木匠的观察，这几户民居除了室内部分木构件糟朽必须更换外，总体的建筑质量还是不错的，可以在里面进行我们计划中的改造工程。至于抗震方面，由于元阳的抗震设防烈度是 7 度（地震加速度为 0.10*g*），抗震设防要求不高，当地技术人员也强调元阳县地震灾害威胁不大，再加上工期紧张，此次工程没能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后来我们制定“红河哈尼族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和环境治理导则”的时候，增加了这部分内容。

蘑菇房在建造时，土坯墙和木构架是交替施工的。部分横梁的后端直接搭在后部土坯墙上，梁头伸入墙中，梁架和墙体形成相互支撑的结构体系。

木构架是用榫卯结构连接成的一个整体，可以采用杠杆法进行整体抬高[1]。施工队员首先用木板四面支护住外墙，再抽掉梁头处上方约 0.6 米高的土坯砖，然后用杠杆法，每次将一根柱子抬高一皮砖的高度，抬高后在木柱与柱础之间垫一块砖；等所有柱子都抬高一皮砖之后，再抬第二遍，逐渐将木构架抬至指定高度，最后用 60 厘米高的短木柱替换木柱和柱础之间的砖块，并将其加固[2]。木构架的抬升顺利完成。

加高土坯墙看似容易，实施起来却相当复杂。土坯砖是当地人用来取代夯土墙的一种施工技术。建造夯土墙的住宅，光是夯筑墙体就需要二三十天的时间。其间如果下雨，只能中断工程，等待天晴。建土坯房的话，农民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制作和晾干土坯，等土坯都准备好后，集中工作两三天，就能把墙体砌好。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每栋改造的住宅需要近两千块土坯来加高墙体[3]。土坯晾干，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大概需要 15 天，而我们的工程实施只有五月和六月这两个月的时间，正值当地雨季，就算打了土坯也无法晾干。

那么，土坯砖从何而来呢？——寨中那四五户正在进行翻修的人家，现在反倒成了我们的救星。哈尼人现在盖的红砖房，地盘比原来的土坯房要大上一圈，所以他们老房子先不动，建一溜砖墙把老房子围在中间，待建筑结构完工以后再把老房子拆掉。了解到这一情况，我们赶紧请工作组的同志请这几家人在拆土坯墙时要不心谨慎，千万别把土坯摔坏了。

1　增加一层层高也曾考虑过能否采取下挖方式。由于哈尼民居地基打得不是很深，根据经验最多只能下挖 0.2 米，这样对一层层高的改善不大，还可能会对结构造成威胁，所以没采用下挖的方案。

2　最初要求采用榫卯结构固定新柱和老柱，但在现场施工中很难实施，故改为后期用钢板加固。实际实施时，工人用夹板固定其两侧。

3　以 48 号卢有开宅为例，建筑而宽 9 米，进深 6 米，墙厚 0.3 米（墙体下部 0.5 米厚，上部 0.3 米厚，统一按照 0.3 米厚计算），增加 1.2 米高的土坯墙，土坯砖尺寸按照 0.3×0.15×0.12（长 × 宽 × 高，单位为米）计算，共需要土坯砖 1920 块。

从拆除屋顶和楼板到铺茅草顶为止的这段时间，木构架和土坯墙体是暴露在外的。其间不时地下雨，就算后来在顶部盖了防雨布做临时遮挡，墙体仍然局部受潮酥化。尤其是最早开工的中寨 42 号老宅，中间因为材料供应不上而停工半个多月，墙体严重受损，后墙向外倾斜，墙角还出现 1 米多长的通高裂缝。为保证墙体安全，施工队不得不将一部分墙体重砌。好在另外两栋住宅的墙体并没出现影响结构稳定性的变形。当屋顶完成后，土坯墙就可以得到较好的保护了。

内墙面处理

传统哈尼住宅的内部，多是裸露的土坯墙面，有的为了防潮而刷有一层石灰浆。由于长期的烟熏火燎，内墙面上积存了大量烟灰、油脂，形成一层黝黑的硬壳，这使得采光原本就不好的室内更显得昏暗。为了改善室内采光，同时也为了提高卫生水平，我们将内墙面改为白色。一层厨房和卫生间的墙面，满贴白釉瓷砖。二层则刷白色墙漆。土坯墙面不够平整，且附着力不够，无论是刷大白浆还是贴白瓷砖，都需要先做基层处理找平，让墙面材料能“贴”在土墙上。可行的方案有以下几种：①做龙骨，钉石膏板；②刷水泥砂浆；③先挂钢丝网（用 10 厘米以上的长铁钉固定钢丝网），再刷水泥砂浆。以上 3 种做法，第 1 种效果最好，但会牺牲本就不大的内部使用空间；第 2 种造价最低，但只能用于直接刷墙漆的做法，若水泥砂浆层太厚还有后期剥落的危险。第 3 种可用于贴挂瓷砖。最终决定，在不同部位视情况采用第 2 种或第 3 种内墙处理方式。从施工的效果看，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全福庄中寨 48 号改造后，左上为外观，右上为底层，左下为二层，右下为三层（元阳县住建局　提供）

户主的作用

由于要兼顾 5 个村寨及景区沿线的改造，我们没有办法对改造施工状况进行全程跟踪。其实就算进行了全程跟踪，我们也应将对施工的干预最小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户主和当地工匠能发挥出他们的作用。哈尼梯田申遗整治的专家组在改造工程开始之前，就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在传统民居的改造中，居民的积极参与能帮助设计师更好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避免出现外来设计理念的生硬移植，也能让这些改造工程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户主的意愿在改造中也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初版设计中，

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的效率，将楼梯和卫生间设在进门左手侧。但是，村民认为那里是男主人睡觉的位置，象征着家庭权威，这样重要的位置怎么能放楼梯呢？他们坚持将楼梯放在原来靠后墙的位置。在实施中，我们按照村民的意见调整了方案。

户主的从众思想也是比较普遍。如果是当地没出现过的新样式，一般很难被接受。比如为了改善室内采光，我们的方案里有二层的天窗和三层 2.4 米宽大窗，最终只有中寨 46 号实现了三层的大窗，其他均未实现。户主对外观和结构安全性考虑比较少。比如中寨 46 号，由主体和西侧后加建的一间卧房组成；户主觉得卧室的面宽太窄，要把隔墙打掉以扩大使用空间。而这里的“隔墙”，实际上是建筑主体的承重墙，去除之后将严重影响整体结构的安全。

另外，这家大门前的走檐带有顶棚，形成层次分明的建筑外观，是寨子里较有特色的一户。户主一是认为走檐下面的层高太低，进门要弯腰，不舒服，二是觉得走檐已开始漏雨，坚持要翻修走檐。蘑菇房的平台均是用石灰泥浆在石板上夯筑而成的，周边高起约 10 厘米，造型质朴大方。若要重做走檐，只能用水泥现浇一块平板。虽然只是建筑附属部分，但它对建筑外观以及村落景观的影响都很大。因此对这两处，我们都坚持没有按照户主意愿改造。

代表家庭和设计师、施工队打交道的是各户的壮年男人。42 号是村主任卢世雄，46 号是户主的女婿，48 号是“老咪谷”的儿子。他们的年纪都在 40 岁上下，属于乡村里的中坚力量。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更多的是对实际功能的考虑，至于传统文化和精神上的追求，基本上是放在一边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于火塘、中柱、神龛等传统文化要素是否需要保留，他们都表现得无所谓。

结语

到 2012 年 7 月，全福庄中寨的 3 户民居改造都已基本完成。总结这次改造工程，我们认为在以下 3 个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1）采光。窗子扩大和内墙面刷白之后，室内采光水平不仅较之原先大大改善，而且室内采光水平和村民自建的红砖水泥房相比也不逊色。

（2）功能。把底层也利用上之后，住宅的实际使用面积明显增加，人均面积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农村小康水平。

（3）外观。尽管高度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占地面积没变，建筑材料也保持原先的土坯墙，所以从外面看整体建筑风格与原先基本是一样的，传统民居的真实性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证。

由于民居改造工程时间较紧，施工仓促，仍有几点不足：

（1）结构稳定性。为了提高建筑底层层高，将建筑木构架整体抬高了 0.6 米。这算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对原始结构造成很大的扰动。我们的设计要用 L 型钢板加固增高的木柱和原木构架，对加固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保障房屋安全。

（2）材料。改造所用的木料大部分为未经过干燥防潮防虫处理的木材，且施工时段正值当地的雨季，木材长期被雨水浸泡，施工完成时木材仍是潮湿的，无法进行刷漆等防潮操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木材可能会变形、虫蛀和腐朽。

（3）文化元素。火塘、神龛、中柱等均为哈尼族民居中极为鲜明的文化符号，在原设计中对其进行了保留，并将之平移至一层。但是户主对这些元素的保留并没有兴趣。

（本文发表于：孙娜，罗德胤. 哈尼民居改造实验 [J]. 建筑学报. 2013（12）:38-43. ）

第五节

从郝堂项目看转型时代的村干部

村干部的工作方法，经常会让我们感到不适应。我们会认为他们不懂方法，不懂管理，也没有文化。但是与他们交往十年之后，我开始对乡村干部的工作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感觉到他们未来的工作会充满挑战，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郝堂茶人家

面对这种感觉与挑战，我在郝堂做了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现在工作有一个深层次的了解。只要我到信阳，每一天早晨都会来到村里，看他们的工作，与他们谈心，感受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在现有形势下，能把控村庄的人心，实在不易，我深表敬佩。二是对变化多端的乡村，我明显感受到他们力不从心，也感觉他们在某些领域与时代有很大的距离。

面对乡村干部，我们既是学习，又是引导，是处在二者之间。他们喊我老师，我也从心里又叫他们师傅。

“郝堂茶人家”项目进行有大半年了。这个项目一是需要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二是需要他们有良好的品德，三是能认同我们的理念，还需要他们未来具备有市场运营与管理的能力。

我和三农专家李昌平在村干部之间周旋，工作既很有意思，又常常无可奈何。

未来的“郝堂茶人家”，需要现代意识的管理与经营水平的提高，信阳平桥区委王继军书记在三个月前就一直强调。我们也感觉到这是一种发展方向，可是这种能力又怎么来提高呢?



郝堂三号院，画家工作室（李君洁　摄）

村干部的管理分为几条线

一是法律。法律对农民来说还是很遥远，道德才是他们的底线。村民对犯法是十分忌讳的，感觉是极不光彩的事，更是让村里人远离的事。犯法的事在农村很少，这是乡里乡亲熟人社会的现象。

二是村规。其实很多村民是弄不清村规的，可是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大家是清楚的。一般的村民都会尊重村规，就是不知道的，只要村干部说了，他们就会遵守。不过外来的项目与要求，往往不会被村民接受，这种事会经常发生。

三是政策。这类事情最让村干部郁闷，偏偏又最多。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要求农民冬季种小麦、拆猪圈弄卫生等，这些全是政府好意，可是好事往往得不到村民的支持，村干部只能凭着个人的关系来处理政府与村民的矛盾。村干部很有手腕，在政策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用感情，在感情不能解决的时候就用法律，在法律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用钱。钱也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动用外村的黑社会（极少用这种力量）。黑社会不能解决，他们就放弃。这是就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总之，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没有退路。

四是感情。这是村干部的工作法宝，也是村干部能够纵横乡村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更多的是道德品质与宗亲关系。农村的事，全是家事，家事就不可能动用法律与民主。人一过百，形形色色。一个村的事，只要有时间，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实际工作中，村干部有时会法律、村规、政策和感情一起用，这些工作的复杂性是我们不可能用单一种方法能解决的。在中国，同时运用法律与道德的人，只有两种。一个是皇帝，一个是村干部。

村规民约

郝堂村有一些事情很有意思。比如进村口有一家人，要砌围墙，并建一个大门。村干部说一定要按专家的设计来砌大门，可是这家女人做不了主，男人又在外打工。于是砌了一半的大门一放就近三个月，村干部不说

话，他们是不会砌大门的。有时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砌了，又会怎么样？村干部是不会怎么样的，可是村民就是不会砌。

又比如村民要建房，要改造房，村干部说哪家能建，哪家要拆，村干部有绝对的威信，村民们表面不同意，可是他们心里是明白的，村干部就是一家之主。这里没有民主与法律的因素，更多的是亲戚与道德的问题。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一直希望重新构建村规民约。爱党爱国的提法显得很无力，一个农民只要他爱家爱村就可以了。什么热爱集体、爱国、尊老爱幼等，说了也等于没有说。今天的村民很现实，做什么事，给多少钱。做义工多少天，也一定要说在明处。

传统的乡村自治，是以家族与亲情（包括熟人之间）来制约村中的各种问题。家长与族长有绝对的权力。在族祖或家庙上有一套严格的排位，尤其是死后，如果一个人名声不好，严重的真会被赶出村庄，死后是不能在祖宗位上记名的，那就会成为野鬼。在每一个村都有庙与寺，有功德碑，有贞节牌坊，有修桥修路等，这都是在先造功德，用今身来修来生，这是为什么呢？家规与家谱起了重要作用。

名声、荣誉感和口碑，在熟人社会中会起作用。在城市中，人与人是没有关系的。每个人的保障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这与乡村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了能深入地了解村干部，我们对村的家谱与村史也进行了调研。我以村干部为中心，对他们的血缘和亲戚关系进行了全部的排序。只有把这种家庭与家族式的关系弄清楚，才会对乡村社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正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相对比较细，在近半年多的工作中，郝堂村的工作推动得是比较快速的。乡村建设中，我们以经济共同体、孝道修复、文化重建、新构建的村规民约来推动“郝堂茶人家”项目。

我们整理了村规民约，并协助村干部完善新的村民管理模式。村规是指村干部，民约是指村民。我把村民分为三种类型：积极参与、遵守民约和落后帮扶。对他们有不同的要求与义务，自己可以选择。新农村建设应

该是全村人参与，不能只是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事情，尤其需要利用生产队长、优秀党员与积极分子。落实几个村民小组，把权利与义务分解到村组，村干部只管把关就可以了。村里要成立相应的机构：村规民约组、财务审计组、集体经营组、产业计划组、环境保护组、公益事业组、新房（旧房）建设组，还增加一个村庄治安组。



项目实施后郝堂村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姬东　摄）

村支两委的作用

郝堂目前步入了一个全社会参与、市场对接、专家渗透、规划全面调整、产业大调整、传统耕作向现代农村过渡的变化中。这些变化如果不能很快地适应新的管理与经营理念，郝堂村的改变是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的。

这是一个难题，我从 2006 年之后的五山模式、绿色问安、“5・12”灾后重建渔江村和秦家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村干部很固执，对新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市场经济他们是又爱又怕。新农村也罢，“5・12”

灾后重建也罢，村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是村支两委的管理水平、运作模式 30 年不变。

这一点要改变，我估计比新农村建设还要难，因为村支两委是在政府的领导下。今天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已经滞后于乡村社会的发展，服务与管理制约着社会发展与进步，这种现象也自然在侵蚀着基层的权利和自治。王继军书记与柳区长，有较深的社会责任感，有务实的精神，他们开始接受我与李昌平的理念，不然我们也不会选择平桥区。

村干部之所以很难接受我们的理念与思想，与他们的文化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熟人关系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角度与视野只看到村里，对村以外的世界是小心翼翼的，有时是规避的。

郝堂村的工作已经不是局限在村里了。郝堂村的项目完全超出了村的边界，与社会和市场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这就需要现在的村干部要面对外面的世界。郝堂村的曹书记做了 30 多年的主任与书记了，属于典型的保守型书记。这种保守包含着他对村庄的保护。村主任胡静年轻一些，自己还做过一些生意，所以思想就解放一些。这种组合我以为是郝堂村这几十年能平静发展的基础。

“郝堂茶人家”项目对两个村干部是一个考验，也是一次观念与思想的对接。他们与谁对接呢？跟李昌平、王继军和我对接。我们要把这种思想在很快的时间里统一和实施，显然是很难的。这就需要他们边执行边理解。

突破与寻找

未来农民有哪些东西会有市场价值？我以为有四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下生长的原种食品、人与人之间诚实与温度、情重于法的伦理道德的东方人的价值观。这四种形式的价值是用钱买不到的，也很难

用商品定价，可是这四种形式又是城市人，有钱人的梦想与奢侈品，所以价值无限。

郝堂做的事就是逐步完善和经营这四种形式的价值。这里指的价值不仅仅是钱，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生活方式和一种品质的理念。

我在"郝堂茶人家"项目中，做的第一条就是建立与完善村支两委管理与考核方法，坚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全力还权于村干部。在项目中多次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另一条就是只要让年轻人回家，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没有那么复杂。

这一切都带有较多的乡村改良方法，带有对乡村工作的摸索与尝试，同样也是对今天很多学者与专家的观点，包括政府方法的一种反思。

我们工作是对谁负责？学者要对他们的圈内负责，大学老师要对课题负责，官员要对上级负责。可是大家说的都是对农民负责，其实没有做到，他们离农民越来越远了。



郝堂秋景（孙君　摄）

只要是真的对农民负责，很多事就不是今天的局面。有些新农村的村庄让农民生活、生产越来越不方便，农村已经不像农村，这些村不到 20

年又会全部拆除。乡村经历了 30 年后又出现了不稳定现象，农民散、乱、私、靠的思想越来越重，政府与群众关系也不够和谐。

一句话，我们都在喊着为农民，其实更多的是为自己、为领导服务，这一切都源于乡村治理出了问题。

“郝堂茶人家”项目是我们这群人的一个梦想，现实中我们不太去想社会问题，就在自己的环境中，安静地做好这个小村，在项目中、在实践中、在冲突中，渐渐寻求解构郝堂村的现代管理模式。

（作者为孙君）

附：郝堂项目简介

郝堂村是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的一个普通乡村。2009 年，郝堂村借助信阳市平桥区政府主办的“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受到了三农专家李昌平的关注，并最终联合北京绿十字公益组织，开启了郝堂可持续发展实验村的建设。李昌平把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内置金融的理念带进了郝堂，奠定了郝堂农民的新农村建设主体地位。孙君致力于发展社区参与的农村生态保护，把现代文明中的艺术、审美、建筑、环保理念输送给农民，帮助农民建设有品位的新农村。两股力量的结合，重在为郝堂村奠定了新农村建设的农民主体地位与尊重村庄文明的建设理念基础。

第六节

获浦村的牛栏咖啡和猪栏茶吧

牛棚猪舍曾是乡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它们是农耕社会的见证。在乡村建设和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建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其铲平，让它们从村落中消失，还是选择将其保留，用另一种方式让其获得“新生”？

在以往的乡村建设中，像这种“没有特殊价值”且“有碍观瞻”的建筑通常是全部拆除的。究其缘由，是因为这些建筑大多已经废弃，失去了原有的功能。除此之外，它们大多是石头垒砌或生土建造的，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来说都算不上“美好”，对于前往村里参观的游客来说算不得一道“美丽的风景”。

浙江省桐庐县的荻浦村给了我们新的启示。荻浦村在 2006 年被评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并于 2007 年被评为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这个历史悠久的村子，形成了以孝义文化、古戏曲文化、古造纸文化、古树文化为代表的特色文脉。村内有宋代的范井、明代的水系、清代的石坊、庙庵、祠堂、民居等文化遗产。更为难得的是，还保存有三座较完整的明代房屋建筑。

与其他传统村落一样，荻浦村也留存有牛栏和猪舍。尽管它们大多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和当地的民居和大宅比起来却很容易被忽视。如何“处理”这些建筑，是当地村民和领导觉得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当，它们就会从村落中集体消失。主管村落改造的老项（项芳农）决定保留这些建筑，并对其进行改造利用。老项长期关注古村落保护和民居改造方面的工作，为了荻浦村的保护和发展，也请了不少专家来现场指导、把脉。通过不断地实践，他也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他打算将牛栏和猪舍进行改造再利用，不仅使建筑得以保留，同时也保存了村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记忆。



牛栏咖啡店门（王斐　摄）

怎么利用？是做展示，还是进行功能更新和置换？如果是后者，又该做成什么功能呢？老项提议，把一座牛栏改成咖啡屋。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质疑。牛栏变成咖啡屋，一时间确实让人从思想上不好接受。就连我

们听到“牛栏咖啡”这四个字的时候，也觉得匪夷所思。不过，当我们亲临现场时，却不得不赞叹这个创意的精妙。牛栏咖啡的成功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也让老项有了信心，于是后来又有了“猪栏茶吧”。

“牛栏咖啡”和“猪栏茶吧”一改传统农家乐式的做法，将文艺、小清新、小资这些属于城里人的追求带入乡村，从而形成特有的“乡土文艺范”，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特别适合“下乡”的城里人，质朴却不失个性。它们让参观者在乡村游览的同时又能够驻足停留，在感受到“独特”与“新奇”的同时也体会到改造者的初衷。

有了观念上的创意，还需要技术上的支持。牛栏咖啡和猪栏茶吧在做法上不尽相同。牛栏咖啡原为五间牛棚的单体建筑。在外观上几乎保留了建筑全部原有的特征，石砌的外墙，低矮的屋檐，室内裸露的墙体界面以及原先不太平整的泥土地面。在功能布置方面则比较简洁，桌子靠两侧外墙布置，中间留出走道，布局做简单的隔墙处理。在室内陈设方面，为了配合房子的原始纯朴，没用舒适的沙发，而是去厂里特别定制了几组木头桌椅，简单地铺上几块素桌布，放上几个抱枕，芦苇、野花等村内随处可见的植物点缀室内的装饰，原始而质朴，最大限度地突出了房子原始的建筑风貌，又营造出闲适惬意的氛围。

猪栏茶吧，在整体格调上延续了牛栏咖啡的质朴，同时，又离精致更近了一步。首先，它在功能布局上更加讲究。这与猪栏茶吧的原始布局不无关系。猪栏茶吧是一个小小的建筑群落，从建筑空间来说比单体牛栏丰富。进入猪栏区，一条二十几米长的小巷将其分为东西两区。东边是主茶吧区，有两个大吧间，总吧台也设在这边。西区有几个单间，包括情人包座、小酒吧以及卫生间。除此之外，猪栏茶吧在装饰方面也更加细致，几乎每个节点都做了精细的刻画。照明的灯具采用竹编工艺灯，有“黄鳝笼”“泥鳅笼”“鸡罩”等造型，别具一格。摆件有汤瓶、腰子桶、豆腐架、石磨盘、竹编篮等，都是乡村生活中的老物件。这些老物件都是就地取材，从

当地村民手中收集而来。它们看似普普通通，甚至并不起眼，但摆在猪栏茶吧里是恰到好处焕发新生。为了突出“猪栏”特征，将猪食槽予以保留，不过是用来当作洗水盆。茶吧一角还保留了猪圈的原生态场景，猪食槽、猪食桶、瓢、稻草等一应俱全，像博物馆里的一个场景陈设。它切中主题，又富有情趣，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



猪栏茶吧庭院（王斐　摄）

这两处建筑，由于建筑本体保存情况不错，对主体结构、围护结构没有做大的改动，仅在局部做了加固处理。改造者将主要的精力用在室内装修和陈设上。它们的投资规模都不大，可操作性强，易于实现，并且容易出效果。观念的转变和创意性的表达是牛栏咖啡和猪栏茶吧能够实现并得到大家认可的最重要因素。这也是乡村保护与发展中至为关键的部分。我们在乡村中有很多工作不能很好地实施，究其原因是观念和意识没有跟上。良好的方向引导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村民的认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只有观念和意识增强了，村民们认可了，才能形成凝聚力。而一旦凝聚力形成，所有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猪栏茶吧内部（王斐　摄）

（本文发表于：詹洁. “传统村落”微信公众号，2015 年 6 月 20 日。）

第七节

沿坑岭头村的写生之路

沿坑岭头村位于松阳县城西南部，是一个交通不便利的山村，入选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早年叶氏一直为避战乱自松阳县古市镇迁居于此，现在有户籍人口 350 多人。算上叶氏之前的村民，村子的历史有将近 400 年。村内黄泥墙、小青瓦的传统民居随处可见，成片上百年的古金枣柿树更是村里的一大景观。



沿坑岭头村局部鸟瞰（李君洁　摄）

第一、二代民宿

2012 年 5 月，浙江省丽水市技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李跃亮老师作为挂职干部，被派到松阳县枫坪乡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兼枫坪乡党委副书记。画家出身的他在闲暇之余，常走村进户寻找可以写生的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沿坑岭头村——一个在当地下山脱贫政策鼓励下即将被废弃的村庄。村落所在地自然环境非常好，整体山势如同一把金交椅。村落周围植被繁茂，有良田美竹散落其间，传统民居高低错落成片地分布于各个小山坳中。两片集中成片的金枣柿树群，在金秋时节美不胜收。画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告诉他，如果在这里办个“画家村”，一定可以吸引许多学生和画家前来写生创作，这样既可以保留整个村落，也可以帮助村民提高生活水平。“画家村”的种子就这样在李老师心里种下了。

适逢松阳县县长王峻到这里检查工作，李跃亮将这个做了汇报。在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李老师在村里举办了第一次沿坑岭头村画展，并通过微信平台推送这个村庄。不久，便有一些画家通过他的朋友圈被吸引到这里。



一代民宿“得造花香”天井院（张瑾乐　摄）

村子的人气起来了，问题也很突出。村内没有住宿，来村子写生或者创作必须每天往返于县城与村子之间，路途遥远，时间成本太高。李老师就萌生了在村里做民宿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一部分村民的支持。叶秋平是最早响应创建画家村的，他与其他两户人家一起，一起组建了合作社，将自家老房子改成了以高低铺为主的学生房（也就是村内的第一代民宿），以接待前来写生的学生。

尽管学生房的条件比较简陋，仅仅满足基本的住宿需求，但是有了这第一代的民宿之后，村子确实变得更加热闹了，也开始有其他游客前来探访。面对新的需求，第二代民宿应运而生。第二代民宿摈弃了高低床，改为标准间，并且进行了适当的装修，屋内整洁干净，屋顶采用明瓦，窗户加大，改善了通风和采光。每个房间也有独立的卫生间，还专门辟出公共空间，布置了茶几、沙发等现代生活元素。这样的民宿，以“速写小院”为代表。

第三代民宿

第二代民宿进一步促进了沿坑岭头村访客量的增加，村子的名气也随之大增。此时，李老师开始考虑请有知名度的画家前来作画。作为画家的李老师很清楚，画画是需要氛围和感觉的，第二代民宿简单舒适，还无法实现激发画家创作灵感的目的。有没有一个集住宿、茶歇、创作于一体的多功能第三代民宿，就成为“画家村”此时面临的瓶颈。“柿子红了”的想法，在李老师的心中浮现。

第三代民宿的选址很重要。首先要考虑房屋的位置及周边环境，其次要考虑民居的可塑性，以及主人的态度。杨乡长和李老师在村内走了多个来回，最终选择了现在“柿子红了”所在的这栋民居。它距离村口很近，

刚好在路边，门前有一个小院，坐北朝南，门前有开阔的山谷和层层叠叠的远山。除去房子本身比较破旧之外，其他条件都很不错。这是一栋木结构、夯土墙的民居，建于 1976 年，占地 16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主体两层加附属用房，坡屋顶，有较多的面积可用，也能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梁架结构完整且较为稳固，无须进行大的调整。

选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就需要解决房主人的问题。主人叫建芳，目前居住在此。他是否同意改造，改造的资金又谁来出呢？让村民自主投资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人知道具体的投资额，也不知道如何经营、多久能收回成本。世代以“柿子”为生的农民，对“投资”这件事情不敢轻易尝试。但是，第三代民宿对沿坑岭头村的重要性，李老师和县领导都是清楚的。最终还是由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向该户村民租赁了 20 年，并出资改造。

但问题又随之而来，房子由谁经营？房子租出去之后房主人住哪儿？农村问题的复杂性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乡长、李老师和户主反复谈判，最后的决定是：户主人在一楼的大房间，民宿的日常经营也由他来打理。



“柿子红了”一楼接待厅（原堂屋）（李君洁　摄）

接下来的就是对房子进行改造了。这项工作是由李跃亮老师和知秋画廊的吴小芳合作完成的，其中李老师负责了建筑改造和硬装部分，主要包括结构的加固、屋顶的改造、门窗的替换、楼梯的设置、室内墙面的设计与处理、室内的地板处理，以及院落的设计和铺装。改造主要以安全性、舒适性、多样性与本土性为原则。

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民居结构的加固、屋顶的防水（防漏）处理。沿坑岭头村的降雨量较大，当地的屋顶做法是在檩条上铺设望板，望板上直接搁瓦，屋面没有做防水处理，时间长了容易出现漏水、雨水腐蚀梁架结构的现象，需要经常对屋顶进行检修。这里的解决办法是檩条上放木板，木板上做防水层，防水层之上才是望板，上面再搁瓦。檩条上的木板一是给室内一个比较平整舒适的屋顶界面，还可以避免人直接看见防水材料。

在内部空间的营造上，李老师特别注重通透性、私密性和采光需求，以营造出舒适自由的居住、创作体验。通透性即能极目远望。改造民居所在地自然风光极好，南向可见远山、山谷、林木，阴雨天的云雾景观又是这里不可多得的自然之美。通透不仅在于“通”，更要“透”——要将四时美景收于眼底。实现的方法就是把二楼中间的窗户改大，变成大面积落地窗。一层原有的楼梯间十分暗，没有窗户。李老师为了增加通透感，在楼梯间的墙上开了四个小窗，增加采光的同时，又创造了画框一样的效果。这里还出现过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地流传着一种在堂屋后面（正中间）开窗会漏财的说法，于是主人极不同意开窗。游说村民也是需要技巧的，如果四小窗避开中轴线来开，是不是就不算正中开窗了呢！增加了四个小窗之后原有的墙体“透气”了，屋外的绿色也被画框收入屋内。在二层的客房中，都增添了天窗采光，也为客房营造了温馨浪漫的氛围。白昼的阳光，夜晚的星空，只要你抬头，它们一直都在。在公共区二层的咖啡吧有一处很有创造性的改造，原有南面墙体上有一处局部倒塌后残留的墙洞，

李老师顺势将其改造成了顶部倾斜的大面积条形窗，在传统的老房子里又增加了几分现代的时尚感。

“柿子红了”与一般的民宿或农家乐的重要区别在于空间使用的多样性。这里既有针对不同使用需求的单间和套房，又有可供创作或交流的公共空间。从建筑平面上看，“柿子红了”在常规三开间正房的东侧有一个不规则平面的两层建筑。主体部分的一层，正中是原堂屋改成的接待厅，东西两侧分别为西侧原主人的居住空间和东侧两间独立客房。客房之间的过道，可通往东侧的公共区域。二层正中是一个疏朗的公共空间，西侧有两间独立客房，东侧则是一个集茶饮、创作、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套房。主体建筑的东侧被改造为整个民宿非常重要的公共区域，分上下两层，以楼梯相连，一层通过西侧过道可达接待厅。一、二层均为可提供咖啡、茶饮的交流空间，吧台设在一层。这样的公共空间既适用于熟人的小聚会，又为陌生人的相识、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场所。

在满足安全性、舒适性和多样性之外，“柿子红了”在材料的处理和使用上非常注重本土性。改造中多采用当地传统的青砖、保留夯土墙、木隔断、红黑瓦顶，延续了浙南民居特色；室内地板和天花板尽量采用当地的旧材料，尽管旧材料在使用存在着重新拼接的难度，人工成本也相对较高，但保留了原始古朴之感，这是新材料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在屋面瓦的使用也上，也保留了当地传统的红瓦和小青瓦。公共空间和室内的墙面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夯土墙或木隔墙，对夯土墙仅做了简单处理，保持原有的肌理与色彩。客房部分为了满足使用者对干净整洁的需求，进行了风格适宜的室内粉刷。

经过李跃亮老师的改造，“柿子红了”已经拥有了一个多样的、流动的、有历史记忆的空间本体，更进一步功能与品质的提升就要依赖于室内的软装来表现了。

“热爱自然，回归简单生活，追求小而微的生活，以及这样的乡村生

活所带来的心灵修复和成长”，是室内设计师在体验了沿坑岭头村生活之后对“柿子红了”的定位。他希望把自己对美的感受，对生活的理解，对居住使用者的尊重与体恤，落实到“柿子红了”的一器一物。在独立客房的设计上，分别采用“幽兰生前庭”“野竹自成径”“采菊东篱下”“为梅且拆屋”“陌上缓缓行”五个主题，既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也富有乡村野趣。大部分的家具采用木质等自然材质。房间的装饰大部分是来自这个村子，如盛花的土陶、采摘的果子、野花，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是经过设计师仔细思考和精心挑选的。



左：“为梅且拆屋”主题房间改造后效果；右上：“陌上缓缓行”房间内摆件；右下：“陌上缓缓行”房间内茶具（李跃亮　提供）

公共空间的室内设计也是“柿子红了”出彩之处。二层低矮木梁结构的保留为咖啡吧创造了独特的空间感受。同时，咖啡吧的设计聚集了乡村、

工业化、自然和怀旧等各类元素。桌子是利用收集来的旧木料由村民亲手制作，天蓝色的旧墙壁是原来留下的，并保留了剥落的状态，没有刻意重新粉刷，这块墙壁成为留言墙，让充满历史记忆的老墙得以续写新的历史。

主体建筑二层正中的公共空间被用作了茶空间，命名为“茶余云起”，没有多余的装饰。中式茶几、简易的家具和通透的落地窗，既可以品茶聊天，又能观云。

在家具的使用上，设计师也逃离了固有的模式，将柱间横梁作为茶几、鼓当凳子。灯具的选择上则与当地编织手工艺相结合，保留了当地的传统元素。



咖啡厅一层改造后（李跃亮　提供）

“柿子红了”民宿改造总共用了 40 万元，包括硬装 30 万和软装 10 万，于 2014 年 10 月完工并正式投入运营。之所以叫“柿子红了”，正是源于村中 180 多棵古金枣柿树。“柿子红了”的庭院内，已为金枣柿预留下了树池，也是希望沿坑岭头村的标志景观在这里延续。

“柿子”红了之后，画家村的名声更响了，游客多了，柿子也卖疯了，还有人远道而来就为体验一下“柿子红了”。

从计划整村搬迁到如今的画家村，沿坑岭头村有了历史的转折。一间民宿的成名挽救了整个村子，这是我们从“柿子红了”中看到的最直观也是最好的结局。



“柿子红了”改造后（李跃亮　提供）

结语

沿坑岭头村的“柿子红了”为什么这样红？这值得从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我们认真思考。在它成功的背后，有需要发现千里马的伯乐，有政府领导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有村民群众的配合，有热爱乡村的优秀设计师，有技术过硬的施工队伍。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我们都可能看不到今天的“柿子红了”。

“柿子红了”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村落的好案例，又表达了希望传统村落能红起来、火起来、重生起来的美好愿望。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但其实保护并不是停滞不前，也不是固守传统，更不是只能延续原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更为持久的方式，应该是在保留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是针对村落特征找寻到新的发展点，从而让村庄焕发新的生命力。

（本文发表于：詹洁、李君洁，《传统村落通讯》第八期，2014 年 7 月。）

第八节

莫干山乡村改造实验

我们为什么选择做乡村建设？首先，想想未来20年，做一个大趋势的判断。我认为，未来应该是休闲旅游时代到来，当我国GDP到达一个高度，人的消费方式会转向休闲放松的旅游产品。我们想结合设计事业和爱好，选择顺应时代的方向走。其次，我过去做过很多大型城市景观，却没有太大的成就感，因为，我感觉，做得越多，离真正的田园土地和绿色生命却越来越远。而后，我接触了更多关于乡村建设、乡村经济的书，对土地、乡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当然，有很多问题没想清楚，但我感觉自己亟须去做。

因参与旅游规划的机缘，我2011年进入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山区。这里有莫干山风景名胜区，但景区属于浙江省，本地享受不到任何门票收益；该地又作为湖州水源保护地，所有产生污染的畜牧业、加工业都被清退。整个乡村，几乎没有更多除了小农耕作之外的更多收入来源；小农户经营一年，劳动力投入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小农经济已衰落，年轻人留在村里，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他们宁愿离开土地去城市，留下很多凋敝的建筑，社区被废弃，没有业态发展。这里有大量所谓良田耕地，却缺乏农村的产

业，除了竹笋业，残存的小耕作只够自给自足。很多土地闲置着，也未改善该区域的生态，不少耕地和房屋被废弃。算上被清空的苗圃、破败的村公所、养鸡场等，共计 60 亩农地和一些茶地，我们向乡政府一起打包租下，租期 20 年（2011—2031 年），想在莫干山做一个乡村改造的实验。

对设计公司来说，“乡村建设”是全新的，关系到集团的战略部署。乡村建设作为产品模型，精算师要对其计算运营成本、开发价值、未来的土地回报等。这使得“乡村建设”理念落地非常难。2011 年年底，我决定，用自己的资金自己做，莫干山计划的总投资是 5500 万元，于 2012 年 5 月启动建设。看到乡村凋敝的现实，我们引入台湾生产 · 生态 · 生活“三生”一体的建设模式，力图在莫干山建立农垦、乡居加集镇的乡村生态圈。农垦关乎农业生产、乡居关乎群体生活，市集关乎生意，让这“三生”围绕土地相互关联，构成乡村的生态圈聚落，以活化乡村。



山间民宿（乡伴东方团队提供）

考察莫干山基底环境后，我们 2011 年开始推行“山间民宿、山腰农耕、山下休闲”的联动经营模式，分别对应三个项目：清境原舍、清境农园、庾村文化市集，位置分散在山间、村里、镇上。这是一开始就没有规划，根据自然生长的雏形进行的布局。

农园：恢复土地产能

在一开始拿到的苗圃地上，大片香樟连着泥球已经被挖走，整片土地像被地雷炸开过，留下大大小小的坑。土地雨天积洼，干旱时干裂着，根本无法进行种植。第一年里，这片地里长不出任何东西。我们不着急，任其土地休耕二年多。休耕的同时，我们通过种植固氮的牧草、毛豆等这类植物，让土地依靠植物自身恢复肥力，还对周边崩溃的水系做了大量处理，并拣除杂石来提高土壤的平整性。最终，得到可以进行有序种植的肥沃土壤。然后，我们采用标准的自然农法种植。由此，清境·农园诞生。土地复耕之后，直到 2014 年夏天，才首次有了玉米、秋葵、红薯等产出。产值不到 5 万元，成本达 20 万元，主要开支是人工，比如请当地农民参与耕种、及时除草等。

对水系与土壤进行系统恢复后，我们从农品的选择、产品的销售渠道以及产品的包装设计三方面分别入手，制定出了一份详尽的农业运营计划。比如，会员馈赠制度，会员可以在不同季节享受我们的应季农品。之后，我们会出台相关实施计划，比如规划人员、资金运作，收割季是聘请工人还是自己逐步收割等。

目前清境·农园还在培养期，土地逐渐恢复了产能。复耕后的农园，不只产出果蔬，其生态景观已吸引城市人前往进行自助游、烧烤野炊、下地采摘等衍生活动。

原舍：营造乡情

我们对清境原舍的定位是，以乡宅示范出乡村建筑与环境的相谐。其中最难的是营造乡情，令外地人和当地人都有切实的进入感。清境原舍原

址是废弃的溪北小学，旁边是原来的村公所，位于莫干后山的村道旁。旧学堂被废弃约五年，此前多次换主，承担过多种功能，还用来做过养猪场。这样的资源不被村里看好。

但我们认为，这块建设用地，面青山背茶园，旁侧是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土地，这正是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我们把这块地租下来。我们的考虑是，20 年租赁到期后，村民可以涨租，如果村民不愿出租，我们就将土地和在土地上造的建筑一并归还。

对原舍建筑景观的设计，我们要求，营造回到乡村的感觉。原先的建筑虽然难以修复，但村民的记忆一直在。我们用建筑群的密度营造社区的亲切，以户外院落提供闲话交流的场所，以加厚墙体增添安全感，还注重每一面窗可观察到不同风景等细节。总之，让居住者在此地获得一份田园生活的认可。

从破败的校舍变成 5 栋新原舍，这凝聚了所有建筑师、设计师的田园梦想。从十几稿建筑方案中，我们认定“质朴当代乡村建筑”概念，质朴的理念体现在设计和施工的细节：建筑风格要浙北民居的朴素。

我们跑遍当地所有的窑厂，选择耐用的手工砖瓦；施工注重横砖竖砖的连接、颜色交错，以及采用便于爬藤植物生长的设计等。建筑完成后的软装陈设，应用当地传统的构筑手法，用原乡器物做摆设，从细微处呈现乡村生活之美。

原舍一建成，立即成为品牌。原舍投资约 800 万，回收期 5 年，共设 13 间客房。在 7 月—10 月之间，一般需要提前一个月才能订到房。原舍服务团队不到 20 人，大部分是当地村民和返乡大学生，采取管家加主人的模式运营。原舍与精品酒店区别在于，原舍没有标准模块，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地化的主人和生活方式。这是不可复制的，即原舍的厨员、服务员都围绕在地化的主人，表达主人的生活方式和偏爱。这样一来，每家原舍都不一样。



原舍室内一角（乡伴东方团队提供）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莫干山也有一些高端休闲地，它们的本质是精品酒店，是以买断土地收益权的方式，筑围墙封闭起来、高价收费运营，这样的经营模式，几乎不与当地乡村发生关联。像这样没有触动乡村变化的开发，是我们应该思考避免的。

文化市集：以交流激发活力

莫干山早有名声在外："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民国时，曾有那么多风流人物曾在此度假、会谈、居住，然而，这些历史记忆都没落了。莫干山整个镇区比较萧条，没什么收益，传统手工艺逐渐流失，饮食文化、乡村布局等也在没落。莫干山缺乏适应现代生活的业态，而老的业态已难以为继。

如何植入新业态来激活乡村文脉？我们提出文化"市集"的概念，即将空间、场所、舞台、市场、作坊等元素及其职能进行聚集，以之作为城

乡互动的空间节点、物资集散的商业节点以及邻里关系的社区节点等，并凸显当地文化价值。市集地点在庾村，庾村位于莫干山镇，是去莫干山景区必经之路。此村葬有民国高官黄郛。不过，黄郛墓穴荒凉，镇上图书馆也找不到他的任何传记资料。

殊不知，黄郛历任民国政府外交署长、上海市长。1931 年黄郛携家人退隐莫干山，发起了“莫干山农村改造实验”，即使在 1936 年黄郛病逝后，其妻子沈亦云率众还将改造实验坚持到 1949 年。《亦云回忆》一书中，也详细记录了为改变莫干山乡村面貌，黄郛当时进行的全面改造，如造林植桐，蓄水抗旱，办学，兴建藏书楼，发展牧场等。所有这些举措，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起，并为我们做了示范。

我们挖掘此渊源，做了一期“莫干山计划展”，展览详细再现了黄郛曾做过的那些乡村改造，并向当地人讲述这一段被埋没的历史。其中，庾村被废弃至今的蚕种场，正是黄郛做农村改造的生产基地。我们就利用庾村这 11 间蚕种场房舍，来做文化市集，其旧的建筑和格局都完整保存下来，加以修补和美化。

根据当地习俗，办大事前，一般要先搭棚。我们请来知名建筑师庄慎，在 10 万元的预算下，做了一个“搭棚计”。材料采用当地山里常见的绿竹，用竹棚把蚕种场所有活动空地串联起来，用河滩的石子铺好路面，营造“市集”。并对市集统一规划屋顶，改为一个与民宅风格迥异的双廊建筑群。

然而，改造后最难的是，植入的新业态，是否切合当地文化根基？对在地文化资源再利用，是否可行？或者，引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是否正是时候？企业做文化产业，一般而言得经过精细计算；而我们选择先去尝试。

我们将入口的旧厂房改造成餐厅，定位为乡村的本色清新。莫干山一带有很多骑行者，由此，我们植入自行车主题，以一位台湾收藏家的 20 件藏品做展览，营造骑行氛围。装点好餐厅后，我们又招聘厨员，开始运



庚村自行车主题餐厅（乡伴东方团队提供）

营。由我定菜系，观察村民饮食特色，采摘当地有机食材，根据不同时节引入当地的做法，加上大厨的创意，列为餐厅菜品，既切合当地的口味，又提升了传统的品质。

除了提供配套餐饮，主题餐厅还承载骑行文化。目前，自行车餐厅成为去莫干山的必游之地，还有全球知名的山地车品牌，选择在此举办新品首发。主题餐厅逐渐成为莫干山骑行大会中的一个站点，并联合其他业态，让整个庾村文化市集成为骑行者的补给站、文艺人的集结地。

我们看到，乡村祠堂等被推倒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出现空白。对此，我们考虑植入书屋。政府部门的图书室，硬件虽好，却不够可爱，或偏隅一角，孩子不愿进去待。对照之下，我们做了一间“属于乡村的书屋”，布置上简单亲近，便于乡间孩子随意进出。算上桌凳、书架、沙发等所有物件，预算不过五万元。

书籍则向城里人和集团员工募捐得来，图书分类上架，人们可以带走自己喜欢的书。书屋建成后，为持续运转下去，我们又嵌入了一个商业模式：书店里植入些茶水点心，将每月几千块的所得滚动下去。还有三名设计师参与义卖，利用当地的素材，如竹片等，手工制作灯具、竹篮、优盘等实用品出售，所得收入划入书屋公益基金。

2014 年 5 月正式运营后，不少路过的游客，都自己带书来丰富书架。如此，通过激发参与，庾村又多了活力。

早在 2013 年 10 月，我们在庾村市集里开起咖啡厅，一位老村民起初对此质疑：在这个村，这个业态一定不会成功。第一年，咖啡厅也的确冷清，偶尔路过的人，多是参观一下；然而一年后，今年 4 月，村民看到了人气，咖啡厅已运营持平。

还有面包坊，我们请来蓝带甜点师，一开始成本高，销量也少，但后来逐渐适应了村民以及游客的消费。如此一来，在乡村的人同样能享受到城里好品质的东西。

当然，在引入新业态上，也有不太成功的地方。比如，做青年旅社，我们原先设想，做些简单的小房间，请了 8 名设计师，任其想象发挥。结果，每个房间创意都不一样。

比如，有一间房间设置了大型的海洋球，不少孩子喜欢，但海洋球很占空间；一间房开了天窗，让人躺着就能看星星，但床距离天窗很近，居住舒适度不够。整体上，住宿的功能要求考虑不足，值得反思。

有了新业态，更需要多样的活动，让市集活跃起来。我们定期设摊，开农夫市集，任由周边村民卖自家东西；还筹备“庾村百年影像展”，以一张 20 元的面包券向村民换来一张老照片，这激发了很多村民参与。

以此，我们收集了大量民间老照片，进行扫描输出，在展览上呈现，村民在展览上会看到自己或乡邻。我们试图以这样的影像，激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每个月有不少本地团体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如骑行、音乐节等。庾村市集提供场所设施支持，并做各种业态的指导。围绕市集，庾村周边业态也活跃起来。比如，法国山居举办了竹制品专卖会，也开设了面包店；周边民宿开设了茶室，以及手作艺人创立的手工家具工作室等。也即原有的村民与有意识的投资商，共同投身于庾村的活化乡村计划。

同时，村民看到废弃的房子重获活力，认识到原有房子的价值，也自发保护模仿改建，开发出新的民宿或新的业态。比如，当地的农人也会将自家种植的农品与手作，放到我们市集上来展示售卖。

除了村民的自发改造，政府也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支持。看到游客聚集于此并喜爱这里，政府方面也加大了资金投入，新建了停车场、公共设施配套，对整个街道进行了外立面整治等。

另外，乡村有其区别于城市文明的逻辑，加之乡村资源缺乏和组织结构不健全，使得在乡村做任何事比城里难得多。厨师、面包师等人才，在乡村几乎没得招聘；而从城市来乡村的人才，也需要重新适应山间的慢节

奏；当然，也有不少内心真正喜爱与向往田园生活的高素质人才，愿意留下来。

2011—2013 这两年里，我们以 60 亩土地做的乡村改造，逐渐吸引众多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匠人、文化创意人、城市农耕践行者、绿色生活倡导者等，合力活化了凋敝的乡村。

目前，每个月都有全国各地的团队考察庾村市集，不少企业高管以及谭盾等艺术家，也在清境原舍入住。我们的管理层中，不乏高学历人才。所有这些城里人的活动，都在持续地、积累式地参与改变这个乡村。

至 2013 年 5 月，莫干山计划完成投资 1700 万元，到 2013 年 10 月时，一期园区开放，正式投入运营，目前第二期也正在推进中。

（本文发表于：朱胜萱，澎湃新闻网，2016 年 1 月 16 日。）

第九节

碧山计划

大概从 2005 年开始，我个人兴趣发生了转向，从研究中国的城市问题追溯到农村问题。在了解了历史上如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以及国内 2000 年之后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之后，我也想找个地方来试一试。2007 年我第一次来到碧山，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喜欢碧山首先是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徽州农村是中华乡土文明沉淀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其次，碧山村目前还没有变成景点，还是个自然聚落，这里的村民很友善，民风淳朴。

“乌托邦”和“碧山共同体”

我们要有勇气去谈论“乌托邦”。“乌托邦”是我们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它可以拓宽人类对共同生活的想象。

大概在 2015 年的时候，“碧山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五年，我重新整理过去五年的实践，对未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规划和想象。天马行空的构思，其实都是在调研、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的，我一直认为乌托邦

是一个动词，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从很小的尺度慢慢一点一点实现的行动过程。

在正式开始“碧山计划”之前，我们还邀请了很多智慧资源到碧山去做田野调查，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音乐人朱哲琴、平面设计师小马和橙子，服装设计师马可、杭州家具设计师张雷和陈飞波等，对整个黟县的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资源、手工艺资源、历史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进行一个普查。我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这样才是脚踏实地。

2011 年，做完田野调查之后就开始付诸行动。我在村里边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房主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铁匠，从浙江移民到了碧山村。后来浙江经济发展了，房主夏有龙就回了老家，儿女也到县城里面生活了，房子就空置了多年。我要想在那里扎根，变成村民的邻居，这样才可能更加透彻地深入到农村的现实里。



理农馆（朱锐　摄）

我决定买夏有龙先生的老房子。我的设想中，它既是我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开放给不同的人，我们在那儿交流、相互借

鉴经验，或者学习农业，是一个半开放、半隐私的空间，名字就叫“水牛学院”。后来我在村里有了第二个空间“理农馆”之后，这个地方就彻底变成我的家人跟志愿者的居住空间了。

“碧山共同体”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就是把一些对农村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一块儿，选择这样一个村落，在这生活和工作，大家不必有层级关系，松散但讲求效率地开展工作。“共同体”这个概念很重要。在农村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村民跟政府，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隔阂，这种隔阂导致了工作推进困难非常大。假如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村民，或者说不同的主体联合在一起结成共同体的话，利益共同体或者是思想共同体，工作推进就会容易很多。

“碧山丰年祭”：以文化滋养乡村

我们选择从文化这个角度切入，用文化作为一种滋润心灵、滋润乡村的方式，试图在文化上重建一种自信。我们在碧山跟村民相处得非常好。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我搬到村里住了，跟他们变成邻居，共处在一个空间里。

“碧山计划”一直是自发的，没有委托人，最初就想做一个小型的活动，叫“碧山丰年祭”。在筹办过程中我们找朋友和一些机构筹了点钱，基本上他们是纯支持不求回报。黟县当地政府则比较谨慎，没有提供资金支持，但是他们提供了很多行政支持，是一个试探性的合作。“碧山丰年祭”是以碧山村传统的丰收庆典为基础，我们把它重新做成一个混合多种文化活动和多种媒介活动的活动，包括重新使用荒废了很久的那座最大的祠堂——大本堂。

我们对村史进行了整理，把搜集到的老照片放在碧山粮库里展出，这

些照片大多数村民都没看过，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多年前的老照片时，都特别兴奋。通过这样的展览，一方面是对这个村庄历史的自我研究和了解，同时也让村民对村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体会。

我们还在这个祠堂里给小学生组织了一些文学课，讲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当然还有很多文艺节目，包括在县城的礼堂里邀请当地的戏曲团体来表演，从外面请来乐队用地方方言来表演等。同时也做了一个学术活动。放电影也是重新恢复碧山村公共生活一种方式。我们从深圳一个收藏家那里找到电影《小花》35 毫米的拷贝，从江西九江找到了一个 35 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又从深圳请了一个放映师傅到碧山去给大家放这个电影。很多村民大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看过这个影片之后就再没看过，当云门塔在屏幕上一出现大家就一阵欢呼。

我们还试图建立碧山村的集市。徽州农村一般买东西都要去县城，要不就是靠村里的小卖部，而小卖部的物品非常少。所以我们想在村里孵化一个集市出来，通过“丰年祭”，我们就在村口做了这个集市，村民免费摆摊，家里什么东西拿来卖都可以。我们也开始包装和整理黟县当地的土特产，甚至改进它的生产流程，比如说“鱼亭糕”。我们还请了广州的木刻艺术家刘庆元做了一套 2011 年《乡建日历》，用木刻的方法把外来知识分子和田畴劳动的农民在一起生活劳动的场景做成了一套挂历，都送给村民了。

黟县国际摄影节：城乡交响曲的国际化音符

2011 年我们组织的“丰年祭”非常成功，周边歙县、绩溪县的村民都跑过来参加，当地政府也非常满意，所以就委托我们来接办黟县政府主办的黟县国际摄影节，这个国际摄影节到 2012 年的时候已经办到第七届

了。借此机会，我们希望把黟县国际摄影节进行转型，变成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大型活动。这年我们定的主题叫“城乡交响曲”，主要目的就是批评过度城市化，宣传乡村建设。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摄影师，包括Iwan Bann，他是世界著名的建筑摄影师，他擅长拍单体建筑，没有拍过村庄，而徽州村庄都是聚落形式的，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这次合作之后Iwan Bann就开始对中国民居感兴趣，他准备要出一本书，以中国的民间建筑，从窑洞到客家土楼，到徽派等为主题，通过这个摄影节的邀请我们也激发了他新的出版项目。

在农村做展览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挑战非常大。很多村子车都没有办法开进去，展品运输经常要用到马力，要不就让村民帮忙抬进去。而很现代的作品跟老的祠堂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对比，从策展的工作经验上来讲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民间音乐艺人来黟县表演，包括从美国请了一个班卓琴乐手，班卓琴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代表乐器，这个乐手叫Abigail Washburn，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班卓琴乐手，英女王登基周年纪念的时候曾经邀请过她去伦敦表演。汶川地震时她曾经到四川做过志愿者，会讲一点中文，在摄影节上她跟广东的五条人乐队，一个唱潮州话的乐队进行合作表演。

在2012年的时候碧山村还没有路灯，那时候我们就想着要解决照明的问题，但是建路灯要很多钱。在第二届碧山丰年祭和国际摄影节期间我们就让台湾建筑师邓海做了一个临时照明设计，用管线灯把需要的村路，大概有五公里，让它亮起来，非常有气氛。因为管线灯要从农户家取电，摊分就很有问题，最后也只能做成一个暂时性的。

在调研村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乡贤人物汪达之，出生于碧山村，受陶行知先生之命创办了新安小学，并组建了全是小学生的新安旅行团，在抗战时非常有名，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我们请四川美院的老

师焦兴涛为汪达之做了一个雕像，立在村口，把他的生平事迹用文言文的形式做在碑后。很多碧山村人都不知道碧山村是著名教育家汪达之的家乡，通过这个雕像可以了解汪先生。汪先生是我们在碧山工作的一个楷模。

历史保护与现实需求的共同考量

很多人呼吁历史保护，其实根本不了解生活在那个历史社区的人的状况是多么糟糕。我们在碧山除了修老房子，也改变村民对老房子的价值观。以前村民会觉得你家有老房子，没盖新房子是人生失败的象征。我们把老房子修好，经常邀请他们来参观，他们发现自己不喜欢的老房子可以变得这么舒服，城里人大老远地来我们这儿买老房子，还搬到我们村里来住，就会对老房子有了新的认识，保护意识就上来了。

历史保护一定要跟最新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要考虑到现实的需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活。比如在整理徽商这个历史资源时，仅仅把房子留下来展示给后人看，主人当时多么有钱，房子多么豪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学习的是徽商的财富管理方法。当年徽州男孩子十三四岁就被送到长三角地区学习经商，那里的大城市有同乡会，大家互相帮助，他们在城市里挣的钱会定期反馈回家乡，反哺乡村，所以徽州老家才有那么多漂亮的房子。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城乡互补关系。

还有我们的农耕文化，讲究深耕细作，对土地的感情很深厚。如果只是搞一个农业博物馆，收几个农具在那儿展示一下，有什么意思？我们讲农耕文化，可以看看传统农业文化跟今天在欧美流行的永续农业观念有没有关联，就会发现它的思想跟我们传统的小农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理农馆活动（朱锐　摄）

乡村文化知识生产的实践与输出

南京先锋书店的创办人钱晓华是我的老朋友。2011 年他了解到我在碧山村做事，很快也来到村里，并且看中了启泰堂。启泰堂是碧山村废弃的一个小家祠，里边放满了草、杂物，还有牛粪和大量的蝙蝠。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践。这个祠堂产权是集体所有的，钱晓华跟老百姓打交道特别有经验，碧山村人都很喜欢他，同意不收他的租金五十年，然后报给碧阳镇和黟县文物局同意，这个地方就免费租给了钱晓华。

2014 年碧山书店顺利开张。当我们因为制度的约束没办法解决产权问题时，其实可以先把产权问题搁置一边。当时我买房子是不能过户的，如果当时我想着不能过户，没有安全保障就不买的话，今天我就做不了在碧山的这些事情。碧山书局也是这样，产权问题太复杂了，所以先做事，产权以后再议。

碧山书局非常成功。以前我们做大型活动，都是一年热闹一星期，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之后村庄又恢复平静了。书局每天都营业，不仅有外来的人，村里小孩在那儿上网、看书，老人家在那儿看书、聊天；它很快变成附近市民周末的一个去处。过年时很多在上海、杭州工作的碧山人回去都要带着朋友去看这个书局。一年之后，村里一户人家女儿结婚，还到书局里去办婚礼。



理农馆志愿者（欧宁　摄）

受到碧山书局启发，我开始设想要多引入一些业态。2014 年，村里找我，说还有一个老祠堂也快要倒塌了，希望我买下来。它也是荒废了好久，很乱的一个地方，村民都拿来放杂物，甚至还放寿材。这就是“理农馆”的前身。

“理农馆”的英文是 School of Tillers，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里的农家学派，英文译名就是它。这个学派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我们把它做到咖啡杯上，还做了很多束口袋。“理农馆”的功能

包括一个展厅，平常做免费的讲座、展览。还包括一个咖啡馆和一个杂货铺，杂货铺里有格子铺，格子铺开放给所有村民，可以卖米、绿豆，或者是手工纳的鞋，每月结算一次，不收任何费用，还免费提供包装。

以前我们做那些大型活动时动员村民有一定困难，但是开店帮他们卖农产品，卖他们的手工艺品，他们就很踊跃了。很多村民来理农馆应征格子铺，理农馆变成他们特别爱来的一个地方。

通过“理农馆”这个平台我们做了很多产品，这些产品都是从农业文化层面引发出来的。我整理了很多中国农业典籍和关于农业的诗歌、诗句，让浙江设计师应永会专门给“理农馆”做了一套字。把神农说过的话印在拖鞋上，把“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印到热水瓶上，把关于碧山的诗歌也做到热水瓶上去，毛巾上印的“力能胜贫”四字则是从《齐民要术》里提取的。

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衣服叫“碧山服”，我觉得乌托邦里的人的精神面貌可以通过他们穿的衣服反映出来。黟县纺织传统不够强大，就用了上海崇明岛老布和湖南浏阳夏布来做这十件衣服。每件衣服都起了名字，这些衣服不是为村民设计的，而是为那些有兴趣从城市到农村来生活、工作的人设计的。我们邀请摄影师肖全拍了一组照片，虚构和演绎一对从城市里回到农村的年轻人，他们怎样在农村定居，并生儿育女的故事。

乡村建设的互联网 +

碧山村很多村民都在上海、杭州、南京打工，空置房源很多。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Airbnb注册了一个理农馆的账号，把村民的房源整理后，作为理农馆的研究者驻地放上去。Airbnb的结算要通过PayPal，那个工具对村民操作来讲还有点困难，我们就帮他们收款，定期跟他们结

算，中间不收任何费用。

村里有个钱时安师傅，是个木工，他家院子特别漂亮，种了一百多种植物，他还会做盆景，搭了小桥流水，我们把他家挂在 Airbnb 上以后，每个晚上一间房两百块钱依然很受欢迎。

钱师傅把自己的家取名为靠山邸，英文名 Hillside Garden。靠山邸火了之后其他村民也来要求托管房源，所以就有了另外一对夫妇和查阿姨家的房子，这是真正的民宿。

理农馆开了之后，就变成了碧山的社区中心。村民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就会来理农馆看电影，还找我们点戏，要看 50 年代的黄梅戏电影，看 80 年代《红楼梦》电视剧等，我们的志愿者经常要到网上去给他们下载这些影片。以前他们打麻将，现在则在理农馆看电影、看电视。

理农馆还有“淘与拍”这样的拍卖活动，以及很多读书活动。理农馆慢慢变成了一个交流空间，有很多外国学校来研究碧山，“碧山计划”变成很多博士论文的题目。最早我想把我家变成一个公共空间，现在理农馆替代了它这个功能。

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们都要靠群众力。在理农馆工作有一位叫杨燕的村民，找她来工作时，她很自卑，说她不识字，不敢来理农馆工作。我说没关系的，我们教你做咖啡，教你做简单的记账，她现在很有自信。

多元交互与文化魅力

在农村这个场域里，应该是多元交互，不同主体共存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把不同的智慧力量和不同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让不同主体都交互发生作用在一个农村场域，让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主体性。

有两个人是我们了解碧山的两把钥匙，汪寿昌先生和姚立兰先生。汪先生做过村委会主任，他对汪姓在碧山村的流变历史特别重视，花了大量精力来整理汪家族谱，考证碧山村史，是碧山村土生土长的本土历史学家。每天他都记录碧山发生的事情，谁家买了房子，哪年哪月做了什么活动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汪达之这个人物也是汪寿昌先生挖掘出来的。

姚立兰先生是退休小学老师，很热衷碧山村的发展，镇里给他送了一个相机，他每天拍照，用照片记录碧山村的日常生活，农耕，村里的各种大小事。他还整理黟县的方言、谚语、民谣。

现在汪寿昌先生在碧山书局上班，主要的工作就是讲村史。他的手绘能力很强，很早以前他就自发整理了碧山八景，并且画了出来，碧山书局做成了明信片，卖得很好，都出第三版了。他还画了一组这几年碧山出现的新事物，包括猪栏酒吧、碧山书局、理农馆这些新场馆，碧山书局又把这组手绘图做成明信片，也很畅销。这些画都是有版税的。可以说，我们的平台让村民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绽放。

还有钱时安师傅，他承包了大概六十亩林地，一有空就到后山上去种树。他会到林子里边找那些长得奇怪的竹子，把它改成烟斗，要不就做成小孩的玩具，非常多才多艺。

“碧山计划”的工作包括历史保护，农村公共生活的培育，有经济方面的活动，同时也做知识生产，知识生产就包括出版和传播。我们每做一个活动都有出版物配合。左靖出了《碧山》杂志，主持了黟县的百工调查，也出版成书，收集了九十多项黟县手工艺的田野调查结果，形成了一个数据库，它为我们将来下一步请设计师和艺术家跟村民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资源。我在笔记本上画的那些草图也变成了一个在丹麦出版，同时使用中文、英文和丹麦文三种语言的书，是理农馆最畅销的一本书。3D 摄影展也做了一本书，这个书是用传统家庭影集的形式做的，用环线装订，还附赠 3D 眼镜。

传播主要是靠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在 Facebook 上则有两个页面是用英文更新的。在做“碧山计划”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离地展览，在广州做了第一个“碧山计划”的异地展览，接着在成都双年展做了一个碧山展览，还去了新西兰、奥地利、丹麦和意大利，这些展览把我们过去五年以来的工作文献用一个很详尽的方式向外展示，以激发大家产生到碧山去实地看一看的欲望。

永居才能保乡愁，经营方可谈经济

“永居才能保乡愁，经营方可谈经济”，用来总结我在碧山这几年最准确不过了。我把全家都搬到碧山，我的太太、妈妈、弟弟、侄子都来了。我在碧山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几个事件，我们整个家族每年都在碧山过年，我在碧山办了自己的婚礼，还生了一个碧山宝宝。

当你变成碧山村的村民时，这个地方就跟你的人生深深地发生了一种关系，你的情感，动力，都有了一个特别牢固的依托，这样的乡愁才是货真价实的。而农村真的要经营，不管是经济方面的工作，还是知识生产、传播，都要经营才会让它有可持续的可能性。

（本文发表于：欧宁，“乡愁经济”微信公众号，2016 年 7 月 1 日。）

第十节
贵州黎平县黄岗村的规划实践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的黄岗村，是国家文物局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侗族村寨之一。黎平县是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县，有 93 个。黔东南州是传统村落最多的地级市，有 309 个。



黄岗村鸟瞰（李青儒　摄）

中国传统村落是住建部牵头评选的荣誉称号。从 2012 年开始，每年评一次，到现在一共评了五批，上榜的村子总共有 4153 个。黔东南州占

全国的 7.4%，黎平县约占 2%。考虑到全国一共有 2800 个县，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古村资源如此丰富，加上这里是苗族和侗族的文化中心地带，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然而，巨大的文化财富也就意味着巨大的保护责任和巨大的监管压力。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如此迅猛的当下，村民要拆旧建新怎么办？那么多木头房子着火了怎么办？没人管的传统民居破败倒塌了怎么办？

两条建议

面对这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要想一下子就给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方案是不可能的。我们更常见到的地方政府的态度，是能躲就躲，少惹麻烦。幸好，贵州省有一批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特别理解古村价值的官员，愿意直面这个麻烦。

2015 年 11 月，贵州省政府主办了第一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这届峰会是在州府所在的凯里市举行的，规格很高，规模也相当大，贵州省卫视还进行了全程直播。会议开完，贵州省政府可以说是正式地表明了要重视和保护传统村落的姿态。

开了第一届，就得有第二届。2016 年 1 月，我们受邀赴凯里市，专门和州政府讨论怎么开好第二届峰会。我们的建议主要有两条。第一，不能为开会而开会，而是要利用开会这个事件，推动一批传统村落去做带有试验和示范性质的落地实践。第二，在这批村落里不但要把保护的工作做好，还要实现一些将现代生活引入传统空间的小项目。

这两条建议都是有针对性的。第一条建议针对的是乡村规划经常做完就束之高阁的现状。一直以来，乡村规划就存在着难以落地实施的窘境，甲方怪乙方规划做得不接地气，乙方怪甲方不理解专业。互相踢皮球，通常就不了了之。对此，我们的应对办法是设定一个 Deadline，这

个 Deadline 要够确定，不可取消，也不可改期。

峰会开会的日期，就是一个很好的 Deadline。有了这个 Deadline，我们就和州政府、县政府、镇政府、村两委、村民坐下来，好好商量，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在遗产保护允许的范围内，到底哪几件事是需要的并且是可以做成的？不需要或者做不成的，就别考虑了。有希望做得成的，列出项目清单，然后分解任务，每个任务再分解步骤，再把每个任务和每个步骤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负责人。

这个做法，是把乡村保护的抽象大目标给具体化和细化了，州领导对我们这条建议是高度接受的。我们请来了几位乡村领域的一线专家，和姜州长、吴局长一起考察了黎平、雷山、从江、台江、榕江等县的十几个村子，最后选定了其中的八个，作为第二届传统村落峰会上要推出的试验和示范村。黄岗村就是这八个村之一，由我们清华的团队承担了规划设计任务。

第二条建议针对的是遗产观念不普及的现状。我们认为，传统村落的贫穷和破败是表面原因，真实的原因是乡村遗产日渐脱离了生活，尤其是和现代生活是越来越远，从而让人产生了疏离感。这种距离感导致的结果，一是村民对乡村遗产的保护普遍持消极甚至抵触的态度，二是市民通常会认为乡村遗产的作用只是供人参观。

参观是一种很粗浅的体验，既累，又留不住人。国内目前的很多乡村遗产，连参观都是极为简陋的，体验感差。对此，我们的应对办法是要针对乡村遗产本身的特点，找到适合于现代人接受的、带有积极作用的使用方式，并根据这一原则来进行改造实验。可以是高品格的博物馆，可以是亲切而整洁的村民中心，也可以是有情调的茶馆、咖啡馆、手工艺品店，还可以是有文化又很舒适的客栈民宿，或者其他有意思的用途。总的原则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结合点，让两者之间产生化学作用。这些“积极使用”的改造项目，是需要有创意的。而正是因为要有创意，它们在遗产保护方面就可能是有风险的，会让遗产的真实性产生损耗。同时，也正因

为意识到有风险存在，我们主张拿小型的，最好是已经废弃的建筑来作为改造对象，这样即使犯错，代价也会比较低。

在把老房子改成民宿的时候，是要非常谨慎的。质量越高的老房子，越要设法做到干预程度最小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改错，是没办法 undo 回去的。我们在黄岗村改造的禾仓，即使是废弃的小型建筑，也只做了三个，将来可能会增加，但也绝不能超过六个。在这里，度的把握特别重要。少量的改造是以小代价换得大效益，数量一多就可能成破坏。

州领导对我们这第二条建议也是接受的。他们还很正式地成立了一家以州政府为背景的传统村落公司，来专门落实这些小项目的设计、建造和运营。

规划落地

第二届传统村落峰会的日期是 2016 年 10 月 13 号。会前的一段时间，是各个设计项目紧张的落地实施阶段。我们的团队在村里连续驻扎了三个月，和州、县、镇各部门以及施工队、村民们一起，逐个落实规划里制订的各个项目。



黄岗项目团队（李青儒　摄）

规划实施的阶段，对驻场设计师的耐心和灵活度是相当大的挑战。尽管我们在进场之前就已经把任务进行了分解，并将其落实到各个部门，但是真进到村里的时候，还是发现很多工作推进困难。比如安装排污管这事，施工队找村里，村里推给镇里，镇里推给环保局，环保局再推给县里，来回打了好几个圈，就是落实不下去。但是，毕竟有一个 Deadline 摆在那里，越往后就越有压力，最终县长还是把几个部门召集来开会，将其解决。这是有 Deadline 的好处。

我们在黄岗村制订了 10 个要做的项目，包括萨坛、水碾房、标本民居展览馆、荷花塘改造、公厕、村口大门等。萨坛是侗族人祭祀“萨岁”的场所。萨岁意为始祖母，是侗乡南部地区普遍崇拜的女性神，也是村寨的保护神。黄岗村的萨坛是一个小型的合院式建筑，已经塌毁多年。我们测量了遗址，并根据采访寨老所得到的信息，恢复了这座萨坛。村民们对这项工作是非常拥护的，因为它象征着集体凝聚力的回归。

水碾房是我们在规划落地阶段临时增加的一个小项目。在规划调研阶段，我们并没有发现黄岗村有过水碾房（因为它们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在驻场开始几天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老人们聊天才知道溪边某处曾经是水碾房。在传统社会，水碾是重要的劳动工具，水碾房也是重要的公共建筑之一。我们决定将水碾房恢复，一是为了让黄岗村的历史要素和历史信息更加完整，二是为了让制作水碾的手艺能够继续流传。

我们还把两栋也已经破败的民居——一栋有 100 年历史，另一栋据村民说有 300 百年历史——严格地按照文物建筑保护的原则给修缮了，然后把它们做成了展示传统侗族家庭生活场景的展览馆。这种标本式的保护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历史信息。它的商业效益不高，但是文化效益很大。我们认为在做商业项目的同时，如果能成比例地配上相应的文化或公益性的项目，将会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平衡策略。商业确实很重要，尤其是在近期，但是商业单极化的发展之后也会有很大风险。这种现象我们

已经见得不少了，比如在丽江、大理和平遥。黄岗村内有很多水塘，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防火，同时也可以养鱼。靠近村中心有两口面积比较大的水塘，村支书在几年前就提出要将其改造成荷花塘。村支书列出的原因，一是水塘里都是死水，经常散发出臭味；二是塘边有村民搭建的多处临时棚屋，影响村落整体景观。我们认为村支书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所以支持趁此次机会将其落实。为了解决死水的问题，我们从村中小河的上游引了一条小水渠过来。而水塘边的临时建筑拆除和水塘中种上荷花之后，也确实起到改善村落整体景观的作用。



三百年侗宅（李青儒　摄）

禾仓之家

我们一共改造了三个禾仓，两个小的用于住宿，一个大的用作活动中心。它不止可以住，还可以有小型会议、聚会交流等多种用途。

为什么会想到改造禾仓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它很有侗族特色。黄岗是一个侗族寨子。侗族人生活在森林茂密的山区，木材资源丰

富，所以住房整体上都是木材建造的。这种房子比较容易发生火灾。侗族人应付火灾的方法，并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地不让火灾发生，而是首先考虑当火灾发生的时候怎么不影响生存。这个方法就是在村子旁边挖个水塘，然后在水塘上面建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粮食的建筑，这就是禾仓。在侗族人眼里，家不如禾仓重要，因为家要是烧了，还可以重建，反正山里木材多的是。粮食要是烧了，这一年可就要挨饿了，后果会非常严重，因为寨子里别家也没有余粮，而政府也很难从外头把救济粮运进去。



二号禾仓外立面（李青儒　摄）



二号禾仓二层卧室（李青儒　摄）

因为每一家都建一个禾仓，所以在村旁就会有几十个禾仓，一起矗立在水塘之上。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侗族特色的文化景观。第二届传统村落峰会上，组委会还专门安排了一项很有趣的体验项目——扔禾把。体验者要把捆好的一把把水稻，从地面扔到空中，并且让事先已经爬到禾仓晒排上的人接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项目，值得推广。湿水稻是相当沉的，对臂力是个考验。而且，不但要扔得高，还要仍得准，要不然晒排上的人就接不住。其实接不住的时候更好玩，因为观众们会一阵起哄，更有乐趣。

其次，是因为有的禾仓已经废弃。前面讲过禾仓比家重要，这是古时的情况。在现代，因为粮食产量普遍提高，同时交通条件和社会救济的也大为改善，所以粮食不再像以前那么稀缺和重要。而随着外出打工的人逐年增加，有的家庭已经很少甚至没有种田的劳动力。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导致部分禾仓就废弃了。拿废弃的建筑来做改造，切换的成本就比较低。这里说的切换成本，包括跟房主人讨价还价的谈判成本，也包括政府从村民手上购买或租用的经济成本，还包括设计阶段跟甲方商量确定方案的时间成本。切换成本低对规划实施的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峰会的日期是不可更改的，于是时间就成为判断项目是否可行的重要指标。

因为这两个原因，我们选择了禾仓之家这个项目，而且在规划阶段就对这个项目寄予了比较大的期望。但是进到驻场阶段，我们突然发现，这事不归我们管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州政府把酒店设计、建设和运营的责任整体都划给了州传统村落公司，禾仓之家因为也属于酒店，也被纳入到这个范围。

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人眼里意义是不一样的。州传统村落公司对于禾仓之家可没我们那么上心，他们首先想做的事，是在村子外围找地方建几栋木制别墅。这是美国城市郊区常见的那种别墅，体量比较大，外观也比较规矩，待在里边也只是给人以普通家居的感觉，让人难以体验侗族特色的文化。

怎么办？难道就此放过一次好机会。我们趁姜州长有一次来现场开协调会，专门在私下里做了申请，希望把禾仓之家的设计和建造任务交还给我们。姜州长理解了我们的设计意义，同意了我们的申请。这件事回想起来，其实是有点后怕的。因为在驻场阶段，有太多施工上的问题要马上处理。这些问题会塞满大脑，导致设计师无暇他顾。禾仓之家也只是黄岗村要做的 10 个项目之一，少这么一项，在当时看来也挺正常。幸亏我们的驻场设计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放弃争取机会。

我们还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的施工队伍。黄岗村的施工队有两支，一支是州里本地的，另一支是从深圳请来的。深圳来的施工队，专业素养高，不但能理解图纸，还能根据经验，把图纸上表达不够的地方帮着深化了。有了这样靠谱的施工队，禾仓之家才得以顺利建成，而且保证质量。

结语

第二届传统村落峰会召开的时候，几百名会议代表和媒体记者来参观黄岗村。黄岗村有两件事给所有参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侗族男声大歌，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禾仓之家。在每个禾仓，我们有意地选择了朝向比较开阔的一面，装上了面积比较大的玻璃，以便从里面向外看，可以看见周围挂满了金灿灿的稻穗。这种体验感是非常特殊的，也很有一种冲击力。所有到禾仓之家的人，不管是文化遗产的专业人士（有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来的国际专家），还是见多识广的记者，抑或是普通的参会代表，他们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感觉：就想待着，不想走了。

这种评价，实在是对我们这些乡村设计者的最大鼓励。



2016 年黔东南传统村落峰会黄岗村盛况（李青儒　摄）

峰会结束之后，按计划应该是让禾仓之家进入正常的运营阶段。但是，等到 2017 年的春节都过去了，我们的设计师去到现场，却发现运营的事一直没有落实。这也太遗憾了。经过仔细了解，我们才知道，原来黎平县政府的态度有了变化。传统村落峰会和做乡村规划落地，在会议之前一直是州政府积极主动。县政府不主动的态度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一县之力有限，要保护的村子又很多，就怕太过积极反倒给自己揽下过多的责任。但是，等峰会期间看到参会者在黄岗的禾仓之家流连忘返之后，县政府的信心和希望也被调动起来了。他们现在提出，黄岗村接下来的项目都由县里出资，并且由县和村两委来统筹安排村落的整体运营。

这个略带戏剧性的暂时的结果，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这件事也让我们认识到，原来做一个好的改造项目，最大的意义是制造了希望。有了希望，各方人马、各路资源才会汇集到一个方向。而有了共同的方向，我们的希望才最终可以实现。

（本文作者：罗德胤，王斐。）